# 中国实学思想史

下卷

葛荣晋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02931*
B2
55:2
DG12/13 89587

# 中国实学思想史

## 下 卷

葛荣晋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2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实学思想史/葛荣晋主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9

ISBN 7-81039-211-5

Ⅰ.中… Ⅱ.葛… Ⅲ.哲学史 中国 Ⅳ.B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782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政编码100037）

国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9.125

字数1358千　　印数0,001—2,000册

全书（上中下卷）定价：125元

## 下卷撰稿人(按章为序)

| | | |
|---|---|---|
| 第三编引论 | 葛荣晋 | |
| 第三十三——四十一章 | 冯天瑜 | 周积明 |
| 第四编引论 | 葛荣晋 | |
| 第四十二章 | 衷尔钜 | |
| 第四十三章 | 李洪淳 | 潘畅和 |
| 第四十四章 | 衷尔钜 | |
| 第四十五章 | 潘畅和 | |
| 第四十六章 | 朱七星 | |
| 第四十七章 | 朱七星 | |

# 第三编

# 晚清时期的实学思想

# 目　　录

## 第三编　晚清时期的实学思想


**引　论** …… ( 1 )

**第三十三章　道咸年间的学风之变与经世派的崛起** …… ( 17 )

第一节　从“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 …… ( 17 )

第二节　《皇朝经世文编》及其社会影响 …… ( 23 )

第三节　道咸经世派的崛起 …… ( 28 )

**第三十四章　道咸年间的议政风尚与纳贿变法** … ( 62 )

第一节　“悲风骤至”与衰世预言 …… ( 62 )

第二节　“讥切时政，诋排专制”…… ( 66 )

第三节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 …… ( 81 )

**第三十五章　道咸年间的鸦片泛滥与禁烟之议** … ( 88 )

第一节　鸦片的输入与经世派的忧患 …… ( 89 )

第二节　严禁与弛禁之争 …… ( 94 )

**第三十六章　道咸年间的“实政之学”** …… (108)

第一节　漕运积弊与改革 …… (108)

第二节　盐业衰敝与盐政改革 …… (115)

第三节　河工研究与对策 …… (126)
第四节　货币研究与建策 …… (133)
第五节　农事研究与建策 …… (142)
**第三十七章　道咸年间经世派的史地学** …… (153)
第一节　探究西北史地，以筹边防 …… (153)
第二节　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 …… (166)
第三节　研治当代史，以求济世 …… (195)
**第三十八章　近代洋务派的经世观念** …… (207)
第一节　曾国藩的经世思想 …… (207)
第二节　李鸿章、左宗棠的经世思想 …… (216)
第三节　张之洞的经世思想 …… (226)
第四节　洋务思想家的经世之学 …… (237)
**第三十九章　洋务派"师夷智"的经世活动** …… (246)
第一节　"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 (246)
第二节　"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 …… (252)
第三节　"开馆教习，远适肄业，收远大之效" …… (256)
**第四十章　洋务时期的"格致之学"** …… (265)
第一节　"格致之学"的兴起 …… (265)
第二节　"格致之学"的创获 …… (269)
**第四十一章　洋务时期域外史地研究的新拓展** … (282)
第一节　郭嵩焘对西方的考察与研究 …… (282)
第二节　王韬对普鲁士、法国和日本史的研究 …… (290)
第三节　黄遵宪的日本维新史研究 …… (299)
第四节　从传统实学通往近代新学的桥梁 … (307)

## 第四编　中国实学在日本、朝鲜的传播及历史影响

引　论 …… (315)
**第四十二章　明代元气实体论与日本德川时代的实学** …… (319)
第一节　罗钦顺的实学对安东守约、贝原益轩的影响 …… (319)
第二节　吴廷翰的实学对伊藤仁斋、中江岷山、山片蟠桃的影响 …… (335)
**第四十三章　明清实测之学对日本实学的影响** … (348)
第一节　《本草纲目》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 (348)
第二节　方以智的"质测之学"与三浦梅园的实测之学 …… (358)
**第四十四章　陈元赟的实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 (365)
第一节　陈元赟及其在日本形成的学派 …… (365)
第二节　传播公安派文学及其对日本文学革新的影响 …… (369)
第三节　创编和传授柔道 …… (379)
第四节　传授制陶术及其他技艺 …… (385)
**第四十五章　清代科技实学与朴齐家的《北学议》** …… (390)
第一节　四次燕京之行 …… (390)
第二节　北学议与北伐论之辨 …… (393)
第三节　《北学议》的实学思想 …… (397)
**第四十六章　清代考据实学与金正喜的实学思想**

……（404）
第一节　全正喜的生平及其对清初考据实学的态度 ……（404）
第二节　阮元的求是学风与全正喜的实事求是 ……（407）
第三节　翁、阮的指导与全正喜的全石书法成就 ……（410）
**第四十七章　清初经世实学与丁若镛的实学思想** ……（412）
第一节　丁若镛的生平及其对清初实学的态度 ……（412）
第二节　清初经世实学对丁若镛的思想影响 ……（415）
第三节　“西学东渐”对丁若镛实学的影响 …（425）

**后　记** ……（430）

# 引　论

从清嘉庆以降，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开始由乾嘉盛世滑向晚清乱世。从道(光)咸(丰)到同(治)光(绪)的五六十年间，是中国经世实学思想的高涨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典传统实学通向近代"新学"的转型时期。

晚清时期的经世实学，虽然是围绕着"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而展开，但是根据晚清实学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又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道咸经世派的实学思潮与19世纪60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洋务派的实学思潮。道咸经世派与洋务派的实学思想之间，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时代的变异性，使晚清经世实学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历史画面。

从嘉庆后期开始，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而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土地兼并的加剧，统治者生活的靡侈，吏治的日益腐败，导致了1796年川楚地区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转战五省，历时九年。1813年，河南、山东、直隶等省又爆发了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乃至率众直闯紫禁城，严重地威胁了清王朝的统治。嘉道年间，英国侵略者除在沿海进行武装挑衅、加紧鸦片走私活动外，还唆使张格尔在新疆发动武装叛乱。正如魏源在《圣武记叙》中所说："荆、楚以南，有积感之民焉。生于乾隆征楚、

苗之前一岁，中更嘉庆征教匪、征海寇之岁，迄十八载，畿辅靖贼之岁，始贡京师，又迄道光征回、疆之岁，始筮仕京师。”这说明，从嘉、道以后，不仅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十分激烈，而且中华民族与西方殖民主义的民族矛盾也日趋尖锐，整个社会处于空前动荡的氛围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由忧患意识而萌发的经世实学，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道、咸年间，把实学推向高潮，除了社会阶级根源外，还有学术流变的内在原因。随着清王朝由盛转衰，文字狱已经松弛，统治者的文化控制也大为削弱，使士大夫有可能“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没有这样的政治气候，实学思潮走向高潮是不可能的。同时，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乾嘉汉学自身的弱点和不适应性也充分暴露，受到时人的猛烈批评。所以，一些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士大夫不再满足于“皓首穷一经”的考据之学，便由古文经学走向今文经学，由“纯汉学”走向“经世实学”，成为当时一种带有趋向性的学术转向。以庄存与（1719—1788）、刘逢禄（1776—1824）及其学生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为代表的常州古文学派和以包世臣（1775—1855）为代表的道、咸间经世实学派的出现，就是这种学术转向的反映。他们既批评宋学，也批评汉学，即所谓“恶夫饾饤为汉，空腐为宋。”（《魏源集》上册，《武进李申春先生传》）他们以“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匡时”为宗旨，重新恢复和发扬了清初的经世思想和批判精神，就是势在必然的了。

道、咸年间的经世实学思潮，是以传统的“经世致用”为其基本特征，社会内容极为丰富。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一、针砭时弊的批判精神。**

道、咸年间的经世学者，都是以挽救社会危机为己任，以匡济天下而自命，或以“国医手”自期，或被时人推尊为“国医”。全

面地揭露了晚清社会的各种弊端。包世臣痛恨清代各级官吏营私舞弊的鄙劣行径，指出："近者农民之苦剧矣。为其上者，莫不以渔夺牟侵为务，则以不知稼穑之艰难，而各急子孙之计故也。"（《安吴四种》卷 8）在《农政》一文中，他对地方官绅鱼肉乡民的罪行揭露说："自士不兴学，鄙夷田事，高者谈性命，卑者矜词章，洎乎通籍，兼并农民，盖田输两税复摊丁徭，则一田而三征，内外正供，取农十九，而官吏征收，公私加费，往往及倍。绅富之户，以银米数多，而耗折较轻；力作之民，以银米数少，而耗折倍重。是故鬻狱卖法，分绅富之膏肥；折粮加漕，浚茕独之聲血。至于申诉所及，绅则势胁，富则利诱，听论常速，以助其逾荡武断之威：乡里愚民，不识城市之区，未睹官吏之面，自非极屈，鲜敢吁号，而官则受词若罔闻，吏则居奇以责赂，偶有蹈触，厥罚必行。故农民终岁勤动，幸不离于天灾，而父母妻子，已迫饥寒；又竭其财以给贪婪，出其身以快惨酷，岁率为常，何以堪此？"（《安吴四种》卷 25 上）龚自珍对晚清官场的苟且、谄媚、寡廉鲜耻的丑态也有切肤之恨，认为"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工。"他们只知"思全躯保室家，不复有作为"，是一群"缚草为形，实之腐肉"的傀儡。魏源谴责清朝官吏"除富贵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是一批贪婪竞进、庸碌无能之辈。林则徐指责各级官吏"色厉实内荏，骄昼而气昏，岂其匙才智，适以资攀援，横棱计滋巧，刀笔文滋繁。峻或过申商，滑乃愈衍髡。"徐继畬痛斥清代官员"廉偶既毁，罔惜声名，竭其聪明才力，尽卒于纳贿之一途，至于民生之休戚，地方之利弊，无复有过而问焉。"他们只是"长于酬应，善于逢迎"，一年之中主要忙于"营求迁擢"。龚自珍还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尖锐地批判了"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君主专制，提出了"君臣共治"的政治理想。在经世学者的笔下，不仅官场腐朽黑暗，社会经济也是

日趋凋蔽，民不聊生。对此，包世臣描绘说：清代“吏无大小，各忧其贫。军国告需，上勤宵旰，调发不给，捐输不继，雍梁荆豫，跳梁百万，而兵弁望风逃北，郡邑为墟，淮泗偶被水灾，数百为群，露刃望食者千，莫谁敢何！”龚自珍一针见血地指出清王朝“开捐例、加赋、加盐价”，是“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致使广大人民或“取诛戮，或冻馁以死。”在魏源的著作中，卖妻鬻子者有之，冻死饿死者亦有之。张际亮则对“吴民多苦难，朽骨连江村”，“室有冻死骨，野有逃荒民”的惨状，表示极大的同情。在人才问题上，龚自珍痛斥清代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指出“一限于资格，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面对“一睨人材海内空”的局面，发出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激昂呐喊。对于清代的用人之弊，魏源深刻地揭露说：“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之才，举天下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指出文人学士终生“书小楷，诗八韵”，诚所谓“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痛斥乾嘉汉学家是“书蠹”，对其“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的危害，也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林昌彝对清代科举制度甚为不满，抨击说：“士子以腐烂时文互相弋取科名以去，此人才所以日下也。”

**二、革新时弊的经世思想。**

道、咸经世学者不但以敏锐的目光“洞见症瘕”，而且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拯救之策。针对清代漕运积弊，包世臣在《海运南漕议》中，主张以海运代漕运，即主张雇用私人商船，把江浙一部分漕粮，由海道运送北京，以减少运输耗费，保证京城粮食供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漕运之弊，他主张“先减（南漕）运什之一，以此米价及运费”，在京畿地区设置官屯，召募农人垦殖。认为采取这一措施，“漕可罢，赋可宽”，“百世之勋可集，而东南之困可苏

也。”魏源亦主张“以海代河，商代官”，认为海运“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人积极支持魏源等人的这一漕运改革，并且在他们主管的部分地区实现了这一社会改革。针对晚清盐业的衰敝，他们主张在盐法上，以“票盐”代替“纲盐”，即主张废除“纲商”的垄断特权，改行“盐票”，允许商人领票买盐，按规定向国家交纳盐税后，即可自由运销所买食盐。他们在盐业中实行自由贸易，如同他们在漕运中提倡漕粮商运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个新的突破。针对江河之患，包世臣在《筹河四略》中，认真总结历代治河经验，提出御坝、浚淤并举的治河方法。魏源在《筹河篇》中提出黄河“唯北决于开封以上则大益”，主张以建立分湖区，禁止围湖筑圩等办法来救治长江之患。针对当时白银外流的问题，王鎏提出纸币说，包世臣亦主张“以纸为币，不以银为币”。在货币问题上，魏源、林则徐则高于包世臣，为了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他们主张以银为币说，实开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河。为了挽救农业危机和解决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包世臣提出的州县屯田法，龚自珍提出的农宗法，虽没有超出重农主义的范围，但是有时在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也显现出某些新的思想闪光，如包世臣针对“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提出“本末皆富”的观点，作为“千古治法之宗”和“子孙万世之计”，颇具新意。道、咸经世学者面对当时鸦片的大量输入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不但揭露了吸食鸦片的危害，而且也提出了各种禁烟的方案。在禁烟方案上，不管是以黄爵滋、林则徐、魏源、陶澍、包世臣、徐继畬等人为代表的严禁派，还是以吴兰修、许乃济等人为代表的弛禁派，他们尽管在策略上有分歧，但都是为解决由于鸦片泛滥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作出的一种努力，其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在治兵上，魏源主张以“除弊”、“节用”、“塞患”、“开源”四法来解决兵饷

问题，达到“强兵”之目的。在政治上，龚自珍针对君主专制，提出“政道者，天子与百官之所图也”，主张君臣“共治吾天下”。这与清初顾炎武的反对“独治”、提倡“众治”的思想是遥相呼应的。龚自珍还就扩大内阁权力，将军机处改为“内阁之分支”，提出过具体改革意见。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废除有名无实的“谏官”，以“人皆谏官”，“人尽其言”来代替之。黄爵滋主张“广贤路”。林则徐在一定范围内“肃清吏治”，将一切不合格的官员或降或革。在“一祖之法无不敝”的认识基础上，他们主张“更法”以达到革故鼎新之目的。

**三、边疆与域外史地学的崛起，是道、咸年间经世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前面所述的漕、河、盐、农、兵、吏治、人才诸大政是着重解除“内忧”的话，那么道、咸年间史地学的兴起则主要是应付“外患”的产物。正如晚清姚莹所云：他所以“喋血饮恨”来撰写《康輶纪行》，完全是为了“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蜮。”（《东溟文后集》卷 8）根据研究对象不同，道、咸间的史地学又分为两部分：一是探究西北史地，从筹边防；二是谈瀛海故实，以谋外御。从嘉庆以降，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少数民族在边疆多滋事，再加上沙俄和英国对西北地区的威胁，形成了严重的边疆危机。面对这一形势，经世学者不得不留心于西北地区的史地之学。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祁韵士、徐松、沈垚、龚自珍、张穆、何秋涛等人。祁韵士（1751—1851）立足于经世，撰有《新疆要略》、《西域译地》、《西陲总统事略》、《万里行程》等书。徐松（1781—1848）谪伊犁后，在将军松筠支持下，以“才不为世用，乃著经世书”的情怀，足迹遍于新疆南北，撰成《新疆识略》12 卷，“有图有叙，论山河之襟带，城郭之控制，兵食财富之储积，田野畜牧之繁博；条分件系，详核该洽。”（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第 17）

此外，他还通过实地考察和“遍稽旧史方略”，撰成《西域水道纪》、《新疆事略》、《西域水道记校补》、《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长春真人西游记考》等书。龚自珍也长于西北舆地之学，撰有《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力主迁徙内地百姓到西北垦荒戍边，以增强西北的防御力量。他还撰有《书番禺许君》、《东南罢番舶议》，着重讨论对付西方殖民者对东南沿海的侵略问题。魏源为了救治晚清之时弊，十分注意明史与元史的研究，撰有《明代兵食二政录叙》、《西北疆域沿革图》、《元代征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元史新编》等，以便为清王朝提供“殷鉴”，告诫清朝统治者不要重蹈元、明亡国之覆辙。张穆(1805—1849)与徐松等人交好，“剧谈西北边外地理”，撰有《蒙古游牧记》十六卷，“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之益”。何秋涛(1824—1862)不同于徐松、张穆等人，他在鸦片战争的推动下，将目光由开发西北边疆转向巩固边防，以抵御沙俄入侵，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面对沙俄侵略西北边疆所造成的巨大危机，撰成《朔方备乘》一书。自称著述此书的目的是：“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著地理以备出齐，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此外，沈垚的《新疆私议》，姚莹的《康輶纪行》等，都是道、咸学者研究西北史地学的重要经世之作。

道咸年间，除了探讨西北史地学之外，面对英国等殖民者的入侵，经世学者也掀起了研究域外史地学的热潮，他们针对“详中国而略外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缺陷，大力“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以谋“制夷之策”。林则徐作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深知“不谙夷情”之苦，提出了“师敌长技以制敌”的口号，有计划地翻译外国书刊，如《澳门月报》、《四洲志》、《华事夷言》

等。他在遣戍伊犁期间，著有《荷戈纪程》，天才地提出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25）的著名论断。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100卷。他不仅揭露了英国侵略者扩张本性，而且也向清王朝发出了“严戒备”的警钟。在《海国图志》中，依据他对外域的周密观察与研究，提出了“以守为攻”、“以守为款”、“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抵御外侮的方略。在他看来，所谓“夷之长技”者，主要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这些都是中国人应当学习的。他建议在中国建立造船厂、火药局等机构。他认为“师夷”并不限于军事技艺，还要求在经济上努力发展工商业，在政治上赞扬美国的联邦制和民主选举制。继林则徐、魏源之后，徐继畬所撰《瀛环志略》，更加全面地介绍了西方文明，其中包括对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的介绍。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特别是对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介绍尤为详细，在中国实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四、史学经世的思想。**

道咸年间的学者继承和发挥中国史学经世的优良传统，突破中国历来“重古略今”的嗜古之弊，十分注意探讨“现代史”并把它作为重要的经世武器，表现出史学研究由“嗜古”转向“究今”的新动向。魏源编纂的《圣武记》与《道光洋舰征抚记》，首开清代研究“当代史”之新风。魏源的《道光洋舰征抚记》是以“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为目的。在《圣武记》中，他认为“不师外洋之长技，使兵威远见轻岛夷，近见轻属国，不可也”。梁廷枏的《夷氛闻记》与夏燮的《中西纪事》，也都是探讨晚清“现代史”的重要著作。在《中西纪事》中，夏燮正确指出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源“在市而非起于鸦片也”。他透过鸦片而看到这场战争背后的经济利益，揭示了英国发动鸦

片战争的必然性，实为一种真知卓见。在这两部著作中，他们一方面讴歌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姚莹等爱国将士，另一方面针对琦善等卖国投降派加以无情的揭露与抨击，从而揭示了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在总结鸦片战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梁廷枏认为御侮之策当以"自强"为主，建议在广东、福建、浙江、江南等地发展军事工业，训练水师。在战略战术上，建议采取"人自为战""战不择地"的游击战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从本质上看，道咸年间的经世实学思想，虽属于中古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文化意识形态，但是在他们的实学思想中，也蕴含有某些"西学"的成分。在"师夷"的口号下，他们"放眼看世界"，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有时也流露出对发展工商业和民主政治的向往之情。这是中国人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第一步。随着中国近代历史步伐节奏的加快，很快地将道、咸间的经世实学转变为同、光间的洋务派社会思潮。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为了"求富"、"求强"，他们"采西学"、"制洋器"、"师夷智"，努力发展近代工商业和培养西学人才，具有浓厚的西学色彩。尽管如此，在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深层结构里，仍然是古老的"经世致用"的传统。不管是曾国藩的"义理经世实学"，还是张之洞的"恶公羊、弃汉宋，通经致用"之说，都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古典经世实学的本质和风格。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集中地反映了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中古意识。洋务派实学思想的这种二重性，完全是由鸦片战争后的时代文化背景所决定的。

曾国藩深受程朱理学和湖湘学派的思想影响，提出了"以礼经世"的口号。在他的礼学中，十分"留心经济之学"，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添了"经济"一目。"经济之学"包括有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

地舆、河渠等诸项内容。可见，曾国藩的经世思想虽有适应"变局"而接受西学的一面，但是"礼治"本位的价值观念仍占据主要地位。李鸿章虽是曾国藩的学生，但他不注意"义理之学"，肯定"制胜之经济"高于道德之空谈，主张"天下事变则变，变则通"，反对顽固保守派。认为只有"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才是唯一的出路。左宗棠深受魏源、陶澍经世实学的思想影响，力排"制艺帖括"，提倡"穷经将以致用也"，主张"多读有用之书，讲求世务"。他的经世实学的主要内容有舆地学、农学、财务之学(包括荒政、盐政、漕务、河工等)和兵学。他对兵学的研究，完全是出于鸦片战争后的抵御外侮的社会需要，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曾国藩等人的"义理经世之学"思潮发展的逻辑结论。张之洞一生治学"以实用为归"，"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提倡"经学贯通大义"、"史学考治乱典制"、"地理考今日有用者"等。正是从"经世致用"这一价值取向出发，他认为泰西智巧"皆可供我策遣"，充分肯定西技、西艺、西政的意义，从而揭橥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所谓"中学为体"，既指以儒学维持的专制政体，又指以儒家的名教纲常来规范人的行为；所谓"西学为用"是指"西政"即："学校、地理、官吏、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西艺"即"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这里既有科学技术，又有法律制度，还有行政措施，就是在政治上不主张设立议院，提倡民权的西方民主政治。这一"中体西用"的理论思维模式，既可以主张采取"西艺"以镇压国内民众之反抗，巩固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又可以通过"西艺"、"西政"来增强国力，抵御外侮，保全"天朝上国"。这种两重品格是洋务派实学家在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而作出的一种积极反应。

但是，我们还必须着重指出，当中国于 1840 年跨进近代门

槛，由封建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但从西方输入了近代科学与民主，而且也出现了亡国亡种的民族危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使洋务派的经世实学不可能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经世济民”、“通经致用”上，而是要求它必须紧紧围绕着“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而展开。不管是他们的“师夷智”的实学思想和提倡西方的“格致之学”，还是呐喊政治改革和域外史地学的新拓展，其宗旨都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之危机，使中国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正是这一治学宗旨，使洋务派的经世实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洋务派的经世实学中，研究与学习“西艺”、“西政”是一个突出的主旋律。在这一方面，主要内容是：

（一）“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使洋务派认识到“制造轮船实为救国要策”的道理。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机械所，在上海创立江南制造局，大力振兴与发展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李鸿章认为“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积极筹建金陵机器局，经营天津机器局，“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左宗棠力排众议，创办福州船政局，甘肃制造局，大量制造新式武器。张之洞认为“雇匠购器，设厂自造”是中国奋发自强的两大法宝。他在两广与湖广总督任上，积极创建枪弹厂、枪炮厂。在洋务运动中，不管是官办、商办，还是官督商办，“采西学，制洋器”，公开把西方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引入中国，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意义是深远的。

（二）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为了制造机器与枪炮，就必须大量翻译西方有关工业制造和实用科学的著作。曾国藩、李鸿章在江南制造局内专设翻译馆，聘请洋人与中国科学家合作，将西方的兵法工艺和自然科学著作大量地翻译出来。在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北洋水师学堂、金陵机器局、开平矿务局、

京海关税务司等机构内，也都设立了专门人才与机构，负责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著作。大量的西方书籍报刊被译成中文，作为中国治兵之用和治国之本，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开馆教习，选派留学生，培养科技人才。首先，洋务派的领袖人物奕䜣提出在北京设立“天文算学馆”，命正途科甲人员入馆研习。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容闳创办新式机械学校，为洋务派培养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李鸿章主张改革“文场科举之制”，建议增添“考算术格致，以觇其通；问机器制作，以尽其能”，从而达到“求实用人才”之目的。他还建议在海防各省设立“洋务局”，开设“格致、测算、舆图、火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器学”等课程，培养出懂洋学的科技人才。他还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设立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效法西方，培养近代社会需要的各科专门人才。张之洞在湖广设立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聘请西学专家讲授西方语言、化学、物理学、电学、光学、机器学以及西方的农艺学等。洋务派除了在国内开馆教习外，还主张派遣留学生出洋学艺，以“收远大之效”。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是积极主张派遣留学生的倡导者与推动者。随着洋务派经世思潮的展开，在《皇朝经世文续编》、《三编》、《新编》中，不但专列“洋务”一项，而且“西学”在经世之学中的比重亦日益增加，这生动地反映出儒家传统经世意识正在鸦片战争刺激下，具有一种强烈的应变能力，具有开放的品格，而决非一种僵死的封闭系统。

（四）推行“格致之学”。洋务派实学家认为“一切西法无不从格致中出”，所以他们在上海、宁波、广州等地相继成立格致书院，以“兴行格致之学”为宗旨，编译《格致启蒙》、《格致测算》、《格致举隅》等书，以达到“求富”、“求强”之目的。洋务时期“格致

之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人。在他们的思想深层结构中，虽与传统的经世实学有着密切联系，但他们广采西学，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李善兰在墨海书馆翻译西方格致之书，其中重要的有：与伟列亚力合译《几何原本》后九卷和《谈天》，与艾约瑟合译的《重学》等。华衡芳“讲求经世有用之学”，“专究乎致知格物之学”，制造出火轮船、蒸汽机、木壳小火轮。徐寿编译的格致之书，主要有《汽机发轫》、《化学鉴原》、《化学求数》、《西艺新知》、《营阵发轫》、《测地绘图》、《法律医学》等。华衡芳不但担任上海格致书院董事，而且也在湖北自强学堂、两湖书院，“宣讲格致之学”。在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科学家的倡导下，使“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从而为传统经世之学过渡到近代新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拓展域外史地学。洋务派发挥史学经世思想，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的史地之学。由域内史地学的研究拓展到域外（主要是西方与日本）史地学的研究，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郭嵩焘深受湖湘学派和王夫之的思想影响，极为推崇“经世之学”。他在英国、法国任职期间，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西方所以强大，“其本在朝廷，其末在商贾、造船、选器，相辅以益其强”，因此，他主张学习西方不应着眼于“造炮制船”，而应全力潜心研究西方的“朝廷政教”，并且全面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政教”。鸦片战争后，王韬在上海与外国人合译了《格致西学提纲》、《光学图说》、《算学浅说》、《华夷通商事略》、《泰西著作考》等，全面地介绍了西学。在漫游欧洲期间，他不但广泛地考察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也考察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民主政治，尤其羡慕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他所以撰写《普法战记》和《法国史略》，“求法之所以衰，俾便为中国之殷鉴”，蕴含着深刻的经世意图。认为要使中国永安久治，

"以制国宪定君民权限为第一要义也,"既反对君主专制,也反对民主共和,主张"君民共治"。王韬东渡日本后,撰成的《扶桑游记》一书,全面地介绍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变化,指出魏源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尚属"皮毛之变",应如日本实行深层次的"肺腑之变",即实行"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的君主立宪政体。黄遵宪在日本任职期间,深入地研究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史,撰成《日本国志》一书,作为一种拯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匡时之策"。指出日本明治维新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在政治上推行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推行"地税改革",在文化上发展科学技术,大声疾呼中国应当向日本学习。由此可见,洋务派的域外史地学的拓展,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近代如何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挽救民族危机的这一历史课题,它是洋务派经世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晚清经世实学,不管是道咸年间的经世派,还是同光年间的洋务思潮,都是既有对中国传统经世之学的继承,又在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孕育着某些新的启蒙思想。晚清经世实学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中,大量吸取"西学",推行"洋务",这是中国古代实学所没有的。这种两重性格,我们可以郭嵩焘同治五年(1866)撰写的《保举实学人员疏》一文为例,作一典型剖析。在这篇短文中,他针对当时存在的"人尚虚浮,士鲜实学"的状况,指出:"方今要务,莫急于崇尚实学。"郭嵩焘在清代是以我国第一任驻外公使而闻名,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理解的实学是什么呢?他所理解的"实学",既有旧的社会内容,也有新的社会特质。他所以保举广东陈澧,因为陈澧"行谊渊茂,经术湛深";保举长沙丁叙忠,因为他"质行精粹,深明易理,年老而学益笃";保举江苏顾广誉,因为他"研精经学,力敦实行"——这是宋明以来的"经学即实学"思想的继承。他所以推崇

湖南朱宗程，是因为他“究心理学、精练世务”，“出入军幕十余年”——这是儒家的经世致用的传统观点。他所以保举湖南罗汝怀，是因为他“笃于古学（系指汉唐经术注疏），广博易良”；保举江苏杨敏嵰，是因为他“覃思博览，崇尚朴学”——这是晚明以来的“考据（朴学）即实学”的思想的承袭。除了上述旧的社会内容外，郭嵩焘所说的实学也含有近代社会的新要素，主要有两点：

（一）他把“西法”涵盖于“实学”之中。在他举荐的崇尚实学者之中，有一位广东生员邹伯奇（1819—1869），他“本纳简古，专精数学”，是近代一位著名数学家。著有《学计一得》2卷，《补小尔雅释度量衡》1卷，《乘方捷法》3卷，《对数尺论》1卷。郭嵩焘建议将他征召北京同文馆，“使与西洋教师合同课习算学，开示源流。”还有一位浙江诸生李善兰（1811—1882），他“淹通算术，尤精西法”，著有《方圆阐秘》、《弧矢启秘》与《对数探源》，翻译有《几何原本》后9卷、《代数学》13卷，《代微积拾级》18卷、《重学》20卷、《圆锥曲线说》3卷等，都是李善兰会通中西科学思想的研究成果。这说明郭嵩焘不但把中国古典科学包括在实学内，也把西方传入的科学思想包括在近代实学之中。这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融合的进一步发展。

（二）他把“洋务”纳入“实学”之中。郭嵩焘在《举使人才》一文中，指出“立国家久远之基，诚莫急于洋务。”他所以保举薛福成，是因为薛氏“博学多通，如西洋地势、制度、条举委分，精习无遗，而性情纯朴笃实，一无虚饰”；所以推举兵部主事潘骏德、候选知府杨昉，是因为他们“于西洋制造及化学之理，皆能研习”。从郭氏这篇短文可以窥见晚清经世实学的特点，即它在经学、朴学、经世诸方面虽与古典实学有相承袭的一面，另一方面它大量地吸收了“西法”，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是晚清实学不同于明清实学的主要方面。

单从经世实学意义上，晚清实学是中国传统经世之学的高潮，成为中国经世实学的殿军。但是，随着时代的继续前进，晚清经世实学的局限性也就由洋务运动的种种败局中反映出来。实践证明，“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固然取得了洋务运动的辉煌政绩，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近代社会提出的“救亡图存”的这一课题。随着西学的大量传入，要求以西学促进与改造中国的传统经世之学，以近代新学取代古代实学，并逐步占据社会主潮，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了。晚清经世实学所以能够从中国古典实学通往近代新学，除了它主要地适应于近代社会的需要外，晚清实学的两重性，也为这一过渡提供了学术流变的内在根据。当然，晚清经世实学作为一种中古意识形态虽然已经终结，但是它的“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并没有泯灭，经过现代转换，这一文化传统是可以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继续发挥作用的。

# 第三十三章　道咸年间的学风之变与经世派的崛起

乾嘉盛世之后，社会矛盾的激化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唤醒了中国士大夫的经世意识和爱国热情，他们借助于今文经学，从乾嘉考据学转向道咸间的经世实学。在这股思潮中，涌现出了后来史家所称的“经世派”，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陶澍、包世臣、姚莹、徐继畬、贺长龄等人。《皇朝经世文编》的修纂是道咸年间经世意识的集中表现，标志着道咸年间学术的转向。

## 第一节　从“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

无论是对清王朝还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19 世纪都充满了严峻的社会挑战。嘉、道以还，“乾隆盛世”如梦幻般消失，社会危象如火山喷发般展现出来。1813 年 10 月，林清率领天理教教徒起事，竟然直捣京师紫禁城，攻入西华门，占领尚衣监、文颖馆，直逼隆宗门。这一“汉唐宋明未有”的“非常之大变”(《清仁宗实录》卷 257)，标志着清王朝无可挽回地正向“乱世”、“衰世”滑落。与国内危机日趋尖锐化同步，来自远西的资本主义殖民侵略者以咄咄之势向中华帝国步步逼进。1840 年 2 月，英国政府

终于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契机发动了对华战争。步英国侵略者之后尘，美、法、日、俄、德、奥、意蜂拥而至，中华帝国在一次次战争中连连败北，不得不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随着国门的洞开，西方的商品与资本主义文化汹涌而来，其速度之忽，力度之烈，势头之猛，皆前所未有，从而造成一种旷古未见的历史"变局"。

在空前的社会变动面前，乾嘉时期盛极一时的考据学显得苍白无力，一部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子惊觉起来，他们不再"猥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而是从古籍考证和玄学思辨中解脱出来，把眼光转向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现实社会，转向中国人十分陌生的，色彩斑驳的外部世界。于是，"士大夫多喜言文术政治，乾嘉考据之风稍稍衰矣"。

对于道咸年间学风之变的社会背景，近人梁启超曾有如下精辟分析：

> 所谓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何耶？其一，清初"经世致用"之一学派所以中绝者，固由学风正趋于归纳的研究法，厌其空泛，抑亦因避触时忌，聊以自藏。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源，归咎于学非所用，则最尊严之学阀，自不得不首当其冲。其二，清学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江浙；咸、同之乱，江浙受祸最烈，文献荡然，后起者转徙流离，更无余裕以自振其业，而一时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凡学术之赓续发展，非比较的承平时代则不能。咸、同间之百学中落，固其宜矣。其三，"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

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

引文或太长，但却十分真切地指出了乾嘉——道咸间从"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的学术转向的社会文化背景。印证道咸经世派的自述，可见梁启超之言不诬。

魏源是道咸经世实学乃至整个晚清经世实学的开拓者，他在《圣武记叙》中开宗明义地直陈社会剧变给一个敏感士子造成的心灵震憾，十分典型地勾勒了嘉道以降经世实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他说：

荆楚以南，有积感之民生焉，距生于乾隆征楚苗之前一岁，中更嘉庆征教匪、征海寇之岁，迄十八载戡辅靖贼之岁始贡京师，又迄道光征回疆之岁，始筮仕京师。京师，掌故海也。得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于是我生以后数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讫。国初数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晚侨江淮，海警飚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

在这里，魏源明确指出，他之所以撰述《圣武记》一书，是因为天下大势动荡不安：白莲教起事遍及大江南北，天理教徒攻入清王朝统治中枢，西北边疆战争频仍，加之西方殖民者入侵造成"海

警飚忽，军问沓至”，东西南北中可谓无一安宁之地。时势的刺激使作者“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于是“排比经纬，驰骋往复”，终于完成经世史著《圣武记》。

魏源如上所述当然并非个体性心声，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士人文化心态。如姚莹著《康辖纪行》是因为“澳门人至于著书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宜其轻中国而敢肆猖獗也。莹实痛心！故自嘉庆年间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近岁始得其全，于海外诸洋有名大国与夫天主教、回教、佛教一一考其事实，作为图说，著之于书，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闻，知彼虚实，然后徐图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姚莹：《东溟文后集》卷 8）。徐继畬撰《瀛寰志略》也是因为“蒿目时艰”，“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王韬：《瀛寰志略跋》，《弢园文录》外编，卷 9）。由此可见，严峻的时势，险恶的国际环境，造成一种巨大的文化迫力。它推动那一时代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士子愤然推开“镇日书帷校勘劳”（赵翼：《瓯北集》卷 23《晚步村落》）的鱼虫之学和空谈心性的性理之学，义无反顾地举起“经世致用”这面古老而仍然富于生命力的旗帜，形成波澜壮阔的道咸经世思潮。

清代学风由乾嘉的考据学转向道咸的功利主义、现实主义，还与下面三个具体因素直接相关。

第一，由于清王朝盛极而衰，嘉庆以降，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大为松弛。嘉庆五年八月，清仁宗郑重宣布了所谓“但治从贼，不治从教”的信仰自由化方针，指示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若无犯法言行，“何必问其所习何教？”（《清仁宗实录》，嘉庆五年八月己巳谕内阁）嘉庆八年，江苏巡抚汪志伊“奏请颁《御制诗文集》于江南各书院，上勿许，曰：“朕之政治即文章，何必以文

字炫长耶?"(《清史稿》,卷 357,《汪志伊传》)如上迹象,皆暗示着意识形态领域强控制的松动。由此而来,许多在乾隆间绝对不能论及的敏感问题,尤其是当代问题,得以日益公开地展开讨论,士子"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方有可能。《皇朝经世文编》之类"不泥于古而切于时务"的著作亦才会竞相涌现。对于嘉庆以来思想界的渐趋活跃,近人孟森评议道:

> 仁宗尽失(雍、乾)两朝钳制之意。历二十余年之久,后生新进,顾忌渐忘,稍稍有所撰述,虽未必即时刊行,然能动撰述之兴,即其生机已露也。……道光间学士大夫之著作,非雍、乾之所有,亦可谓非嘉庆朝所有矣。(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 614 页)

考据学风靡乾嘉,其重要原因之一乃是社会相对安定而清廷在康、雍、乾三朝厉行文字狱,对思想界严密加以控制。经世实学在道咸间勃兴,则是社会大动荡而统治者对观念世界的控驭力降低的结果。

第二,清中叶以降,士人数量不断增长,但各级官职数却大体保持常量,自然经济又没有可能把士子吸引到科学文化事业上,于是,读书人便拥挤于狭窄的"仕途"。在日趋腐朽的取士制度和官僚制度的支配下,许多具备匡济之才的士子或"遏之于登进之前",或"排斥于致仕之后",以致出现了士人生产过剩的畸形现象。如嘉道间的饱学之士包世臣"十余试,迄无一遇"(姚东之《书安吴四种后》),一生以布衣自处,"食贫居贱";有些学者虽然取得功名,但也无法在科举的高级层次上获得成功,如"龚自珍中礼部试,殿上三试,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军机处不入直"(《干禄新书自叙》,《定庵续集》卷 3)。魏源等人情形亦类似。这种"旷才在野,可为寒心"(包世臣:《说储上篇序目》)的境遇,加剧了那些怀抱"治世"、"更法"愿望的士子对科举制度的愤懑和

鄙视，他们谴责科举制度“驱天下尽纳于利禄之途”(陈寿祺：《科举论》，《左海文集》卷3)，甚至公然声言：“翰林之无用，同于他途，而不得力甚于他途者，以其不明理，不识世务。”(汪士铎：《汪海翁乙丙日记三》)与“翰苑清才”的“不识世务”相背反，这批士人摆脱八股制义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士子学用脱节的通病，毅然走向实政、实用、实行之学，从而有力地壮大了经世派的队伍，鼓动着道咸间经世实学的勃兴和长足发展。

第三，就学术流变的内部因素而言，极一时之盛的汉学(考据学)因专事训诂章句、搜罗遗逸而暴露出自身弱点。乾隆间已有人批评其“擘绩补苴，不足与言学”，嘉、道间汉学更遇到来自宋学与今文经学两方面的挑战。站在宋学立场上批驳汉学最力的，是著《汉学商兑》的方东树(1772—1851)。他斥责背弃朱学的汉学有六大弊病，认为汉学家们“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汉学商兑重印》)。而从宋学家唐鉴、倭仁学的曾国藩更以清醒的政治眼光洞察到清王朝的统治危机需要经世实学的扶持。他在强调“义理”的同时，又肯定了“经济”的重要性，在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学并举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学并举的观点(《曾文正公日记》咸丰六年七月)，创立了“合汉宋、兼实学”的“礼学”，这是宋学走向经世实学的路径。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在咸丰、同治、光绪几朝发展的经世实学，大体上也是沿袭着这条路径。

另一方面，今文经学派在嘉道间趋于复兴，其健将为庄存与的两位外孙刘逢禄(1776—1829)和宋翔凤(1776—1860)，而刘逢禄的弟子龚自珍、魏源发展了刘、宋“通经致用”的活泼学风，既鄙弃一味训诂古籍的汉学，也藐视空论心性的宋学，诚所谓“恶夫以饾饤为汉，空腐为宋”(《魏源集》上册，第361页)。以“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匡时”为宗旨，龚自珍、魏源在今文经学的

大纛下，开学人议政之风，倡变法之议，引导一代学子走向经世实学。

## 第二节 《皇朝经世文编》及其社会影响

道咸经世实学的勃起在嘉庆间已现端倪，至道光初年则从涓涓细流汇为巨川，其标志便是贺长龄、魏源所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问世。

《皇朝经世文编》一书于道光六年(1826)成书，次年刊行，共120卷，收清初至道光三年(1823)间各家(702人)议论、条陈、章奏二千余篇，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八纲，纲下再分若干子目，如治体门又分原治、政本、治法、用人、臣职等五目，共六十五目。从经世致用的宗旨出发，魏源在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时，极重文选的当代性、实用性。该书"经世以表全编"，"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魏源集》上册，第158页)所录者亦不限于名位，"硕公庞儒，俊士畸民"皆被纳入视野之内，"大旨欲救儒之不适于用"(《魏源集》上册，第158页)。为了给有志于经世者提供可资参考的思想资料，魏源对具体经世方略采取兼容并包的通达态度："有利必有害，论相反者或适相成，见智亦见仁，道同归者无妨殊辙。"(《魏源集》上册，第158页)由于魏源确立了如此开明的编辑方针，《皇朝经世文编》得以集清初至道光以前经世致用文章之大成，体现了经世派注重实用、功效，注重研究当代制度及其历史沿革的风格。

值得指出的是，以"经世文编"的选本形式作为经世派经世思想的载体以及播扬经世思想的器具，并非始自魏源、贺长龄，

其滥觞可追溯到晚明的《皇明经世文编》。

《皇明经世文编》编纂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其编者为复社陈子龙与他的同道徐孚远、宋征璧。陈子龙等人有感于晚明危如累卵的统治危机,更愤慨于其时"士无实学"的恶劣风气,遂以"明治乱"、"存异同"、"详军事"、"重经济"为方针,"网罗本朝名卿巨公之文有涉世务国政者",编成508卷的《皇明经世文编》,其"志在征实","以资后世之师法","通今者之龟鉴"(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上)。吴晗在《影印明经世文编序》中说:"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后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吴晗:《影印明经世文编序》)这是对《皇明经世文编》历史价值的恰当评价。

继《皇明经世文编》之后,陆燿(字青来,号朗甫,江苏吴江人,由举人官至湖南巡抚)于乾隆年间搜集清初各家(兼及前明遗老)关于时政得失、礼俗盛衰、民生疾苦等方面的著述,分类编排,成《切问斋文钞》30卷。《切问斋文钞》虽然没有以"经世"命名,但就其性质而言无疑是一部"经世文编"。

和《皇明经世文编》比较起来,《切问斋文钞》体例要严谨规整得多。《皇明经世文编》依撰文者编排全书,而陆书则依经世之学的类别分全书为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等十二门,对于研究者来说,此种体例无疑提供了方便之门。在《文编》的选文上,《切问斋文钞》有三个特点:一是"立言贵乎有用";二是尊古亦颇重今;三是歧说并存。与"仅为施政文牍之汇编"的《皇明经世文编》相较,陆书显然更具经世之学的理性自觉。

魏源、贺长龄所辑的《皇朝经世文编》显然是远绍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近承陆燿的《切问斋文钞》,但和两书相较,《皇

朝经世文编》在分类上则更为成熟。陆书原分学术、风俗等十二门，显得较为散漫。《皇朝经世文编》则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八门，这八门又可概括为三大部类，此即学术类、治体类、中央机构六部事务类。八门之下更立六十五目。由此而来，《皇朝经世文编》无论在宏观把握上还是在细密分类上都较《切问斋文钞》要成熟得多。《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还具有一种学术上的自觉，这就是"视经世之学为一门学术，足与汉学、宋学分庭抗礼"（刘广京：《〈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之学的理论》，载《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5月版。）这一点更为《皇明经世文编》和《切问斋文钞》所不具有。从《皇明经世文编》到《切问斋文钞》再到《皇朝经世文编》，经世文集从滥觞走向逐渐成熟，而这一历程，展示了从晚明到晚清经世实学的进步。

《皇朝经世文编》一经问世，便对当时和后世产生巨大影响。晚清汉学大师俞樾说："《皇朝经世文编》数十年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榘矱，几于家有其书。"（俞樾：《皇朝经世文续编序》）《皇朝经世文编》之后，从晚清至民初，遵其宗旨，仿其体例的续编之书如雨后春笋，相继涌现：

道光二十九年（1849），由举人官至州判的陕西安康人张鹏飞辑《皇朝经世文编补》，两年后，即咸丰元年刊行。该书除全录贺、魏所辑《皇朝经世文编》外，并就四十二个子目分别补选或续选若干篇附刻于后，在取材上，尤注意弥补《皇朝经世文编》"详东南、略西北"的缺点。

光绪八年（1882），双峰书屋刊行了官至长沙县尉的江西东乡人饶玉成所辑的《皇朝经世文编续集》104卷，共增选519篇，补续兼具，时限截止光绪初年。

光绪十四年（1888），图书集成局以铅字排印本出版了上海

人葛士濬所辑的《皇朝经世文编续编》。该书120卷，共1368篇，由于时势已有变化，葛士濬的《续编》在对《皇朝经世文编》补续的同时，对原书体例略加变化，加"洋务"一门（分通论、邦交、军政、教务、商务、固圉、培才等七目），其它方面也略有新增，如学术门的文学目中附算学，并选辑若干介绍西方各国情况和学术的论述，从而映现出时代变迁的轨迹。

光绪二十三年（1897），江苏武进盛氏思补楼刊行盛宣怀的父亲盛康主持选辑的《皇朝经世文续编》。该书120卷，共2085篇，主要续选道、咸、同、光四朝晚出的论述。与葛编相似，由于时势发生变异，盛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在子目上略有增减。如户政门中增厘捐、开矿等目，兵政中增水师、台防等目。共八门，七十一目。

光绪二十三年，亦即盛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刊行的同一年，宝文书局刊行了陈忠倚（淞南香隐）所辑的《皇朝经世文三编》80卷。本书承葛士濬的《皇朝经世文续编》之后，所选文由光绪十四年始，门目上则多有增减，如吏政门只存吏政、吏治两目，学术门增格致、化学等目，礼政门增聘使、约章等目。并另立"洋务"门，分沿革、军政、疆域、邻交、国势、商务、通论七目，专载介绍各国情况的文字。最后两卷标题为《外洋通论危言》，系摘录外人的言论辑成，意在警惕危亡。

也是在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扫叶山房刊行了署名三画堂主人所辑的《皇朝经世文三编》。该书48卷，80篇，主要辑录同治、光绪间洋务官僚和维新人士的言论，分为"时务"、"洋务"两大部分。"时务"系有关"新政"的论著，洋务专述各国情况，反映出其时维新改良思潮与洋务运动风起云涌的态势。

光绪二十三年，还有一部名为《时务经世文编初集》（又名《时务经世分类文编》）在香港宜今室刊行，作者署名求是斋主

人，姓名不详。《时务经世文编初集》系选录甲午以后关于新政时事的文字，以梁启超、汤震、郑观应、陈炽等人著述较多，并有部分外报论说，共382篇。其子目中包括各种新学（电学、天文等）、新政（银行、邮政等）和议院、变法等项。

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上海大同书局刊行广东顺德人李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21卷，615篇，该书虽收有清初顾炎武与黄宗羲的若干文章，但主要搜集有关"变法"议论，选录自龚自珍以来各家著述并有外人言论，故名《新编》。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慎记书庄刊行求自强斋主人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2325篇，该书体例仿照《皇朝经世文编》，门目俱有增加。如加"西政"一门，分史略、交涉、制造等二十二目，专述各国情况。学术门则新添格致、测绘、译书、医学等目。选辑范围为龚自珍以后各家著述，较多变法言论。

光绪二十七年，上海宝善斋刊行邵之棠（润甫）辑《皇朝经世文统编》107卷，2664篇。该书主要搜集清季以来有关新政言论，混合中外著述，依经济八科（文教、地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考工、格物）分为八门、九十九目，其余归入通论和杂著两门，从而显示出那一时期旧学向新学过渡、演进的态势。

光绪二十七年，上海慎记书庄又刊行佚名辑《增辑经世文统编》，亦称《皇朝经世文统编》。该书体例仿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即在贺书八门之外另加"洋务"一门。全书共收1833篇，内容主要与西学（如格致、译书）和新政（如厂局、铁轨）相关。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书局刊行何良栋辑《皇朝经世文四编》52卷，670篇。该书体例亦仿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于原书八门外另增"外部"门介绍各国情况，在子目上则多有增加，如学术门增电学、化学等目，礼政门增公法、议院等目，工政门增机器、铁路等目。主要汇录以前各编未收著述，更多外人言

论。

光绪二十八年(1902),甘韩辑《皇朝经世文新编续编》刊行,该书共21卷,560篇,体例同麦仲文《皇朝经世文新编》,所选多属1901年6月以后的续出各文,部分系报刊材料。6月前而为它书所遗漏者亦有补入。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官书局刊行于宝轩辑《皇朝蓄艾文新编》,主要收辑冯桂芬以后有关变法的著述。该书体例略同《皇朝经世文新编》,共80卷,1075篇。

民国初年,上海经世文社印行《民国经世文编》四十册,分政治、法律、内政、外交、财政、民政、教育、实业、交通、宗教、道德等十一门,二十二目,共收678篇。该书辑者拥袁反孙,故有关张振武被害、宋教仁被刺以及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的镇压等方面的公文、著述均列入内政门的"定乱"目中。

从《皇朝经世文编》到《民国经世文编》,以"经世文编"名目辑成的选本在短短七八十年间竟如此之多,足见魏源、贺长龄所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具有深远而广泛的文化影响。与此同时,这一令人瞩目的"'经世文编'现象"也表明,在多事之秋的晚清,"经世致用"的思潮是何等强劲有力,而传统经世之学的承袭与近代新学的开启,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嬗递中完成的。

## 第三节　道咸经世派的崛起

经世派在道咸间崛起,昭示了晚清学术的新走向。这批学人精研边防、漕运、海运、盐法、钱币、兵饷、刑名等实际学问,"举凡宇宙之治乱,民生之利病,学术之兴衰,风尚之淳漓,补救弥缝为术具设"。

## 一、开风气之先的龚自珍

龚自珍是一位开风气的先觉者。梁启超指出："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俛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第七卷）这是就龚自珍忧患意识的巨大影响而论。梁氏又说："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先导，必数定庵"；"维新思想之萌孽，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这里褒奖的是龚自珍开启近代民主思想的重要功绩。龚自珍的好友张维屏另有一说：

> 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龚定庵全集》，国家整理社出版，第23页）

这里肯定的是龚自珍创辟晚清经世实学的历史地位。

龚自珍，字璱人，又字爱吾，号定庵，又名易简、巩祚，晚年自号羽琌山民。他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尽管他的绝大部分年岁是在近代以前度过，而其文化影响却在近代以后充分得以展示。

龚自珍出身于一个三世京官的书香世家，自幼深受汉学熏染。12岁时，龚自珍从外祖父段玉裁学许慎说文部目图解，奠定了"以经说字，以字说经"（《己亥杂诗》自注）的考据学基础。然而，面对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年轻的龚自珍不甘埋首于脱离实际的正统考据学，"慨然有经世之志"，以"澄清"天下、兴利除弊为己任。21岁那年，龚自珍赋诗述己志向："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经世济民，"为本朝瑰玮"方是他所怀抱的宏愿。嘉庆十九年（1814），年23岁的龚自珍有感于嘉庆十八年林清率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的事变，作《明良论》四篇，猛烈抨击清王朝的种种社会弊端，外祖父段玉裁对此文大加赞誉：

> 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髦矣，犹

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段氏评语附于《明良论》（四）后，《龚自珍全集》第36页）

这是一位乾嘉考据大师对走向经世实学的后辈学人的真挚而又热忱的称许，从中透露出清代中后期学术变迁的时代消息。当然，段玉裁的评语中又有"岂必别制一新方哉"的劝谕，其间透露的是这位饱览政治风云的老人对龚自珍热心于设计政治方案将会招祸的担忧。

嘉庆二十三年（1818），27岁的龚自珍第五次参加科试，中浙江乡试头名举人，为"五经魁"之一。对于龚自珍来说，中举便意味着有机会实现少年以来的经世抱负。同年，有两件事对龚自珍产生过重要影响。一是他携功令文拜见他所崇敬的学者姚学塽。姚氏表示他的学问与志趣皆不在功令文，自珍遂自烧功令文2000篇，以示不再虚耗光阴于无用的"雕龙文卷"。二是庄存与的孙子庄绶甲于是年馆于自珍家。庄存与系晚清常州今文学及公羊学的开山。庄绶甲向龚自珍介绍庄存与的学术路数，极大地诱发了龚自珍对藉微言大义"以学术开帝"的今文经学的兴趣。

嘉庆二十四年春，应恩科会试落第的龚自珍滞留京城，从当时任礼部主事的刘逢禄"问公羊家言"（《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附注，《龚自珍全集》第441页），明西汉微言大义之学，这是龚自珍一生学术活动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多采用"狂言"的形式犀利批评时政，指斥时弊，与考据学亦未全然割断干系。转向公羊学之后，龚自珍更多地运用今文学家的手法，通过五经中的"微言"来发挥"经世"大义。此种意绪的转机，可见龚自珍在会见刘逢禄后写下的一首诗：

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语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亥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十四首之六）

所谓"虫鱼学"乃人们对醉心繁琐考据,甚至津津乐道于鸟兽虫鱼考辨的考据学的讥称;所谓"卖饼家",系三国时人们对公羊之学的鄙称,意指《公羊》不过是街头巷尾的粗粝饮食,决计无法与有"大官厨"(即正式高级的烹调)之称的《左传》相抗衡。然而,龚自珍却决心抛弃考据鸟兽虫鱼的学问,心甘情愿去做任人嘲笑的"大饼家"。这一价值取向的变迁,预示了嘉道间学风转变的大趋势。

作为一位经世学者,龚自珍不仅致力于"研诸经,讨诸史,揆诸时务"(《对策》,《龚自珍全集》第114页),而且多方面阐发他关于经世之学的思考。龚自珍经世观念的最突出之处,就是主张道、学、治三者合为一体,相得益彰,而不应截然分割,相互对立。他热烈推崇的是:

>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龚自珍全集》第4页)

与"道、学、治合一"的致思趋向相关联,龚自珍还十分崇仰古代"君与师之统不分,士与民之薮不分,学与治之术不分"(《龚自珍全集》第115页)的传统。龚自珍认为,唐、宋、元、明以来,尤其是在清代,学与治相分离的现象日趋严重。他指出,近世士子"生不荷耰锄,长不习吏事,……,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龚自珍全集》,第5页),是一群学用脱节,不通实务的人物。这种学治分离的风气弥漫开去,其后果的严重性决非限于士人,而将祸及社会:

> 是故道德不一,风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赀,士无报国之日,殆夫,殆夫!终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谓夫?(《龚自珍全集》,第5页)

龚自珍还具体剖析了学治分离、学用脱节风气形成的原因,

他将这一社会病端的缘由归结到中古教育和科举制度。这无疑是极有见地的。他指出，古代的圣人，如皋陶、夔、稷、契，所学所治是统一的，而且“终身治一官”，如皋陶之掌管刑法，后稷之掌管农耕，契之掌管教化，而后来的士人学用两分，“教之，使之，又非其道，疲精神耗日力于无用之学”。（《龚自珍全集》，第116页）为了应付科考，这批士人不得不全力钻研八股时文，一旦得官，对兵刑、钱谷之事懵然无知，其结果是：

> 之人也，少壮之心力，早耗于禄利之筌蹄。其仕也，余力及之而已。……夫未尝学礼乐之身，使之典礼乐而不愆，以凡典礼乐者，举未尝学礼乐也。未尝学兵之人，使之典兵而不辞，以凡典兵者，皆未尝知也。古者学而入政，后者皆学于政，此唐、宋、元、明之人才所以难语夫古初也。（《龚自珍全集》第116页）

龚自珍虽然痛恶学用分离，一生致力于“谋大事”、“医大病”，但他的雄才大略始终未得以施展，龚自珍只能遗憾地自嘲：“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龚自珍全集》第565页）然而，尽管龚自珍个人命运坎坷，但他那炽热的爱国热情、迫不及待的变革要求，抒发“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叛逆精神，以及对“道、学、治合一”的呼唤，昭示着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来临。《定庵文集》的编者曹籀在同治年间称龚自珍是“英姿挺拔之士”，“翘然独秀，抗先哲而冠群贤”，其“平生著述等身，出入于九经七纬，诸子百家，足以继往开来，自成一家”。（《曹序》，《龚自珍全集》第554—655页）这“继往开来”四个字是对龚自珍在中国实学史上地位的恰当评价。

## 二、“倡经世以谋富强”的魏源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与龚自珍比肩并立的英俊人物是魏源。

魏源，字默深，生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卒于咸丰七年(1857)。他比龚自珍只小两岁，但辞世却晚了十多年。因此，他的一生经历了鸦片战争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如果说，少年时代的龚自珍主要受到考据学的熏陶，那么，少年时代的魏源则是从理学入门。

魏源的出生地湖南是宋学的重要基地，魏源自幼受理学影响甚深。他在北京期间，曾求教于理学家汤金钊，以后一直以汤氏"门人"自视。对于"为学恪宗程、朱，躬行实践"的董桂敷，魏源亦"执弟子礼"。另一位理学家姚学塽也是魏源"终身仰止"的老师(《魏源集》上册，第356页)。对于阳明心学，魏源亦曾"究心"研习。理学两大流派在魏源思想的深层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

魏源在深受理学熏陶的同时，也从乾嘉考据学中吸取了必要的营养。21岁时，他随父亲赴北京，向"究心经学，尤专意于毛氏诗传"的胡承珙学习汉儒家法，此为魏源治汉学之始。此后，他又与汉学家胡培翚过从甚密，与"平生精治小学"的宋翔凤相往来。在南京时，魏源又与段玉裁弟子陈奂相交，与汉学家的密切往来以及对汉儒家法的切磋琢磨，使魏源在音韵，训诂之学上具有相当功力。

但是，魏源毕竟不同于一般汉学家和宋学家。他目睹道咸间严重的社会危机，深感时人尊奉的汉学、宋学皆无补于世。他既鄙视"皓首穷经"，不问世事的考据家，又不满意于"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的理学家，并对这两种传统学术的弊端痛加讥弹。他指出：

> 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彼钱穀簿书不可言学问矣，浮藻饾饤可为圣学乎？释老不可治天下国家矣，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默觚下·

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 36 页)

他又痛诋儒者之喜空谈,不问效验:

> 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 36 页)

在他看来,只有"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方能"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魏源集》上册,208 页),重新赢得生命活力。

说来也有意思,促成魏源从汉学、宋学的旧樊篱冲决出来的学术动因也是其时方兴未艾的公羊学,其情形正与龚自珍相仿,魏源接触今文经学是在 21 岁,即嘉庆十九年,那一年,他随父入京,一方面从胡承珙习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塽,另一方面又向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请教《公羊》大义,当他得以研读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山者庄存与的著作,不禁击节叫好,称赞庄存与的学说是"真汉学"。

魏源之所以服膺公羊学,除了公羊学活泼少羁绊,便于作为反传统的思维工具外,还在于公羊学着意于微言大义,提倡经解为现实政治服务。对于"经世"心切的魏源来说,这正是渴求甚急的学说。正因为如此,魏源在批评"争治诂训声音,瓜剖铢析"的汉学和"空腐"的宋学的同时,大力提倡公羊学"通经致用"的精神:"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上册,第 24 页)

"以经术为治术"是魏源对一代新学风的热情呼唤，这一呼唤与龚自珍"道、学、治合一"的主张彼此推引，宣示着学术思潮的嬗递。

魏源经世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他在道光五六年间(1825—1826)代贺长龄编纂《皇朝经世文编》。魏源自称："少游京师，好咨掌故，曾以道光五载为江苏贺方伯辑《皇朝经世文编》。"(《明代兵食二政录叙》，《魏源集》上册，第163页)在《皇朝经世文编叙》中，魏源明示该书编撰的四项宗则，这就是：

> 事必本夫心。……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
>
> 法必本于人。……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
>
> 今必本夫古。……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
>
> 物必本夫我。……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魏源集》上册，156页)

此四项原则在心与事、人与法、古与今、我与物四大关系上强调了事法、今、物的重要性，从而不仅为"经世致用"这个古老的概念制定了较明确的界说，而且鲜明昭示了近代经世实学的基本精神。与此同时，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中明确揭示经世学者的两大主张，这就是：

1. 研究当代之典制及其历史沿革："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

2. 注重功效与实际"治术"，而决不可如宋学所主张的那样，把治国平天下简单视为修身养性内圣之学的延长，诚所谓："盖土生禾，禾出米，米成饭，而耕获舂炊，宜各致其功，不可谓土能成饭也。脉知病，病立方，方需药，而虚实补泻宜各通其变，不得谓一可类推也"。(《魏源集》上册，第160页)

台湾学者刘广京认为，魏源所撰《皇朝经世文编叙文》"不啻为晚清经世运动之宣言"(刘广京：《魏源之哲学与经世思想》，

(台北)《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第364页)这是富于眼力的概说。

魏源一生,孜孜不倦于经世之学,"尤悉心河道水利,海防边防,上下古今而明究其得失"(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第11—12页)。他曾入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佐贺氏筹划漕粮海运事;入两江总督陶澍幕,佐其筹划淮北盐政改革。他着意研究当代史,撰写了直面时政的《圣武记》与《道光洋艘征抚记》。他以满腔爱国热忱研究域外史地,完成了面向外部世界的《海国图志》,并鲜明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今人齐思和说:

> 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皆魏氏倡导之,或光大之。(《魏源与晚清学风》,《中国史探讨》,中华书局1981年版)

这就是魏源在晚清经世运动中确立不拔的地位。

### 三、"以经世自励"的林则徐

在中国,或许有人不知道魏源与龚自珍,然而,却几乎无人不知林则徐。

林则徐以"虎门销烟"与抵抗英国侵略者而闻名于国内与域外。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虎门销烟"的浮雕,铭刻着中国人民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崇敬。

林则徐出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比龚自珍大7岁。与龚自珍少年便受考 据学训练,魏源自理学入门不同,林则徐较早就开始接触、研习经世之学。

据来新夏《林则徐年谱》,林则徐自4岁到20岁中举以前,主要在父亲林宾日的教读与熏陶下,完成"自之无以至章句"的最初教育。(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第6页)因此,林宾

日可谓林则徐的启蒙老师。作为一位失意知识分子，林宾日一生“舌耕”，无功名可言，但他却对“探求经世之学”（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第3页）有浓酣兴趣，这一致思趋向，对林则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嘉庆十四年（1798），林则徐考中秀才，旋入福建最高学府鳌峰书院就读。其时主持书院的山长郑光策是一位“喜读经世有用之书”（《儒行·郑光策》，《福建通志》卷40），注重经世有用之学的学者。他愤慨“近日学者，气习污下，奔竞卑鄙”，因此，于主持书院期间，讲求“明礼达用之学”（林则徐：《郑苏年师抢膝图遗照》诗引，《云左山房诗钞》，卷4），鼓励学生“以立志为主”，“谓志定而后教有所施”。（《儒行·郑光策》，《福建通志》，卷40）得益于郑光策的严格教诲，林则徐博览群籍，汲取了广泛的经世致用之学的养料，在这一时期的读书笔记《云左山房杂录》（原无题名，书名为后人所加）中，林则徐记下了他的心得与思考。其中的一些警句，如“岂为功名始读书”，“崇实行而不事虚行，秉公衷而不持偏见”，映现出林则徐经世思想的雏形。

曾经孕育过龚自珍、魏源经世思想的今文经学也对林则徐产生过影响。大约也是在鳌峰书院学习期间，林则徐通过父亲林宾日认识了著名学者陈寿祺。陈寿祺对“今文遗说”颇有研究，著有《三家诗遗说考》（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虽然，陈寿祺比林则徐大14岁，但两人过从甚（《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6页）。林则徐在一首诗中说：“束发读公文，珍如靓鸿宝”（《答陈恭甫前辈》，《云左山房诗钞》卷2），其欢悦心情竟大似龚自珍与刘逢禄相识时油然而生的拨云见日的感觉。可见今文经学在嘉道间学术思潮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一种中介、导向、推动的综合性功用。

嘉庆十二年（1807），林则徐入闽抚张师诚幕司笔礼。在张幕

四年，是林则徐直接接触“经济之学”并走向“经世致用”道路的关键时期。金安清的《林文忠公传》指出：

> 张兰渚中丞抚闽，招入幕府。张为乾隆枢直旧臣，精史治。公相从四、五年，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渚大政，益以经世自励。（《续碑传集》卷24）

“益以经世自励”六个字生动道出了林则徐经世济时的坚定信念。正是怀抱如此热望，林则徐在任京官期间，谢绝庸俗的应酬社交，抓紧时间“力学而潜修”，“益究心经世学”。他“虽居避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25）与他同乡编修郭先生的交往，亦是“相与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有用之学”。在以后出任外官的宦海生涯中，他更是致力于实政——无论是整顿河口、兴修水利、救灾放赈还是查禁烟害、改革财政，林则徐均有政绩，金安清《林文忠公传》对林则徐在朝野的形象有一番生动描述：

> （公）所至贪墨吏望风解绶，疆臣重其才，皆折节倾心下之。多所兴革。凡民生疾苦，吏事废坠，人才贤否，无纤悉不知，知无不行。上亦眷倚特甚，一时贤名满天下。至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辄曰：‘林公来，我生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诸歌谣，荒村野市，传之以为乐。本朝自陈恪勤（鹏年）、陈文恭（宏谋）后，长吏声誉之盛，无与公并者。（《续碑传集》卷23）

即使是远戍边疆，林则徐也仍然倡导垦荒开井，传播先进技术，切望他经营的“大漠广野，悉成沃衍”。在林则徐生命途中，经世、用世的旋律一以贯之地激昂奏鸣。

以大吏之身从事经世事业的林则徐是道咸经世派的另一种类型——官吏型。他们与龚自珍、魏源等学者型的经世派不同，不是以学术研讨经世，而是通过行政手段戮力于实务，将种种经

世方案付诸实践。中国传统经世致用之学本来就是以政治为本位，只有实际参予政务，方可能实践形形色色的经世构想，经世的最终目标是“治世”、“理世”。因此，官吏型经世派是中国传统经世精神的重要实践者。

在道光前后经世派中，林则徐与龚自珍、魏源是最有影响的三位人物，他们之间有着真诚的情谊。

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龚自珍孤傲狂放。《清朝艺苑》说他“名振都下，朝贵倒屣相迎。而口若悬河，每当及世事，纵横陈说，四座皆暗。与之讦难，鲜不辟易者”。吴昌绶的《定庵先生年谱》也说：“其为学，靡书不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博引以伸己说。”他本人也有诗描述自己的傲气：“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瞋。”（《龚自珍全集》第463页）但是，龚自珍虽狂放多傲言，却偏偏对林则徐深为敬佩。据《清朝艺苑》记载，林则徐与龚自珍曾同赴某贵第参加一次集会。聚会中，林则徐纵论天下奸人之所以能售其奸的原因，认为这种人“不过见当时人才脆薄，学识猥陋，故肆无忌惮，挟其术以沽名猎位，眩其学以动众惊俗。一旦得志，殃民生而败国是。如此辈者心逆而险，行伪而坚，老成谋国在所必诛者是也”。其至为深刻的议论使龚自珍大为折服，从此两人交往更为密切。龚自珍写有一篇文章，叫做《重摹宋刻洛阳赋九行跋尾》，文中开列了与他聚会论学者的名单，其中有魏源、有徐松，还有林则徐。在北京宣武坊南龙树院举行的多次文酒聚会中，林则徐与龚自珍亦往往是参加者。道光十八年（1839）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海口禁烟事件，龚自珍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赠行，文中，龚自珍向林则徐献上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其中特别指出在禁烟问题上，要有果断的决心，要采取“刑乱邦用重典”的严厉措施，“宜以重兵自随，”“多带巧匠

以便整修军器”。林则徐对龚自珍的意见大为赞赏，以为“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并有复札致龚自珍。在龚自珍与林则徐之间，不仅流溢着英雄相惜的知己感，更有着一脉相通的经世济民的情愫。他们的友谊折射出那一时期的特定文化趋势。

林则徐与魏源相识相交是在林则徐任京官期间，两人自此“成为密友，以经世之学相讨论”（李伯荣：《魏源师友记》第30页）林、魏友谊最具深意的一幕发生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初，其时，林则徐遣戍伊犁，途经京口（镇江），当时正居此地的魏源赶去会见。二人同宿一室，对榻倾谈。其情形与心情在魏源所作《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二首中有真切描述：

> 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
>
> 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宵对榻，三度两翻蘋。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魏源集》下册，第781页）

在这仓促的聚散间，林、魏两人百感交集，他们相逢时竟“一语无”，不知该说什么方能表达自己的复杂心情。入夜，他们对榻长谈，又有说不完的话。此时此刻，他们最为关注的倒不是自身命运的蹇落，而是国家、民族深陷其中的巨大灾难，诗中所说的“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即指要密切注意西北和东南两处边界，作好防范英国在东南再次发动入侵与沙俄在西北进犯的准备（两戒即两界），其胸襟之博大令人感怀。就在这次短短的会见期间，林则徐将他在广东广泛搜集的关于外部世界知识的资料及他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交给魏源，嘱他在此基础上编撰《海国图志》，魏源果不负林则徐之望，于次年完成《海国图志》50卷，以后又陆续增订为60卷、100卷，对中国的洋务运动乃至日本明

治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

林则徐与陶澍以及其它经世人物如黄爵滋、包世臣、徐松、姚莹等人亦有密切的交往。这种交往以一个侧面映现出经世致用之学在道咸间勃起的趋向和时尚。

**四、"以济人利物为志"的陶澍**

如果说，林则徐在当代中国家喻户晓，那么，陶澍则知名度较低。然而，在道光前后经世派中，陶澍的重要性决不下于林则徐。

出生于湖南安化的陶澍(1778—1839)比林则徐大六岁。陶、林二人的出身与经历颇有相似之处：陶澍父亲陶必铨与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都曾饱读诗书却失意于科场；陶澍和林则徐的启蒙教育，都由他们的父亲完成；陶澍 23 岁中举，25 岁取进士；林则徐 20 岁中举，27 岁取进士。陶澍"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病"。(《魏源：《陶文毅公行状》、《陶文毅公全集》卷末)林则徐也"以经世自励"，"究心经世学"。陶、林二人先后做过庶吉士、编修、监考、御史之类的小京官；嘉庆二十五年(1820)，陶澍任川东兵备道后，受到道光帝的赏识从此青云直上，由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一直升到两江总督，并兼理两淮盐政。林则徐于道光二年(1822)任江苏按察使后也一帆风顺，连任布政使、巡抚、总督、钦差大臣。从"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莽"易米就学"(《安化县志·陶必铨传》)的社会下层上升为统率一方、举足轻重的朝廷重臣，林则徐、陶澍可为典型。

在嘉道间封疆大吏中，陶澍是一位政绩显赫的重要人物。魏源评价他："生平所至，兴革务，挈大纲、导大窾"。(魏源：《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续碑传集》，卷 23)陈銮说他"无时不以济人利物为志"。(陈銮：《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两江总

督陶文毅公行状》、《续碑传集》卷23)抚安徽,陶澍"厘库项亏空",查清了纠结30年之久的贪污案。抚江苏,陶澍"创行海运,以甦苏、松、常、镇、太仓之漕困"。兴修水利,"大疏吴淞、浏河、白茆、孟渎,以酾三吴之积潦"。督两江兼司两淮盐政,陶澍"汰浮费二百余万,以剂淮南;去坝费,岸费各数十万,改行票盐,以苏淮北"。(《魏源集》上册,第347页)"巡城时则倡建悦生堂以赡京师穷民","回籍时则捐渔税,议禁罟簖,以利资江之行旅"。(陈銮:《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续碑传集》卷23)魏源说,陶澍的一系列业绩"他人得其一皆足名世,而于公(陶澍)则为余绪"。(魏源:《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这并非溢美之辞。在长期仕宦生涯中,陶澍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凡所施设,不任独,不任同,朋是勿壅,朋挠勿从"。"智不惑,勇不惧。"(《魏源集》下册,第347页)既能毅然决断、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又有虚心听取幕僚意见、保持清醒头脑的作风,在昏聩平庸的清朝官僚中,如此干才可谓鹤立鸡群。

和林则徐一样,陶澍与诸多经世派人物交谊甚笃,是道光前后经世思潮中的心人物。

陶澍与魏源为湖南同乡。陶澍未仕前,即与魏源的祖父和父亲有往来,时魏源尚幼小,与陶澍不可能交往。嘉庆十九年(1814),陶澍在京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并为甲戌科会试考官,时魏源亦在北京设馆授徒。由于湘潭人周系英对魏源的才气"四出揄扬",使魏源"数日名满京师,中朝公卿争纳交焉"。(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陶初交即在此时,魏源说:"源自弱冠入京师及来江左,受公知数十年"。由此可见两人交往渊源。道光五年,陶澍由安徽调任江苏巡抚,其时魏源正在贺长龄幕编纂《皇朝经世文编》,两人往来十分密切。道光七年,贺长龄调任山东布政使,魏源即转入陶澍幕,直至道光十九年陶澍逝世转入陈銮幕。

在陶幕间，魏源多有谋划之功。“凡有漕、河、盐、兵等政更张，皆延与议定而后行”。陶澍推行的南漕海运及票盐法等重大改革，便皆有魏源参谋献策于其中。

林则徐与陶澍初交于两人任京官期间。道光十一年(1831)，林则徐初任江苏布政使，旋任江苏巡抚，时陶澍任两江总督。两人自此合作共事六年之久。陶澍与林则徐虽为上下级关系，却“志同道合，相得无间”。(魏源：《陶文毅公行状》，载《陶文毅公全集》卷末)于整顿漕务、赈济灾荒、兴修水利、改革币制、革新盐法、严禁鸦片等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事务上通力合作，取得重要成绩。对于“奋不顾身”、“勇于任事”、有“干国良臣”之誉的陶澍，林则徐十分尊重与衷心服膺，当陶澍六十大寿，时升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武汉“撰成七律三十首，邮稿致祝”。诗中称颂陶澍“重镇南天半壁雄”的功业，以为足可配晋朝谢安与明朝李东阳。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陶澍病逝，林则徐从广东寄来挽联：“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深切缅怀他与陶澍的多年友情以及陶澍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对于林则徐，陶澍也奖掖有加。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因病请求开缺，在《恭谢恩准开缺折子》中，他向道光帝大力推荐林则徐：“林则徐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陶文毅公全集》卷30)道光帝接受了这一提议，任林则徐为两江总督，后因禁烟未及莅任，改委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在道光朝官僚集团中，陶、林联盟意义深远。黄彭年《林文忠公政书序》说：

> 当道光之中，承乾、嘉之后，西域底定，海宇宴然，……而文忠与文毅独于宴安无事、局守文法之时，洞见症瘕，亟起救药。

在道光前后的政局中，陶澍与林则徐以卓越的才干与魄力，率先

推行改革，乾隆朝以来的某些政经体制，正是在他们手中被打开缺口，终于发生重大更新。

**五、"有经济大略"的包世臣**

短小精悍、口若悬河的包世臣(1775—1855)出生于安徽泾县。泾县"本汉县，而三国时尝置安吴县，以故学者称(包世臣)安吴先生"(谢应芝：《书安吴包君》，《续碑传集》卷79)，或"安吴包"。包世臣一生经历乾、嘉、道、咸四朝，是嘉道——道咸间又一位颇具盛名的经世人物。

青少年时代的包世臣，也如龚、魏一样，经历了由"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的转折。他幼时受父教，"为八比六韵"，以后"诵选诗而好之"，"诵选赋又好之"(包世臣：《安吴四种总目叙》)。年稍长，因受乾隆末世时势的刺激，开始转向经世之学，他自称："自十二、三岁即慨然有志于用世"，并将留心经济问题视为"吾儒分内之事"。(包世臣：《中衢一勺》卷4，《与秦学士书》)十八岁时，包世臣获读顾炎武的《日知录》，大感兴趣，认为"百余年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读《日知录》三十卷，叹为经国硕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风俗。"与此同时，他又指出，《日知录》尽管精深博大，但书中尚存在"摘章句以说经及畸零证据"的缺陷，"犹未免经生射策之习"。(包世臣：《安吴四种》卷8)

着意于经世致用，包世臣对"高者谈性命，卑者矜词章"(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5上)的恶劣士风甚为不满。他在《与杨季子论文书》中尖锐批评桐城派热衷古文义法的学风："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夫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如卒，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关国家也。"包世臣"文以纪实"的思想，对道咸士人有重要影响，直接孕育了《夷氛闻纪》、《中西纪事》等记录鸦片战争史事的纪实性作品产

生。

包世臣虽然“慨然有志于权家”,(包世臣:《安吴四种总目叙》“以亭林经世之志自许”(包世臣:《艺舟双楫》卷1,《读亭林遗书》),但命运对他却并不慷慨。他“十余试,迄无一遇”(包世臣:《中衢一勺》卷7,《说储上篇序目》),直到35岁才考中秀才,60多岁才“以知县分发江西,权新喻县”。然而,这一七品官职位只当了一年即“因劾”解职,自此“寓居江南,布衣翛然”,“唯以卖文字自给”。“每作书自署曰:‘白门倦游阁外史’”。(谢应芝:《书安吴包君》,《续碑传集》卷79)这一自题字号深深地渗透着寂寞与失落感。

然而,包世臣虽命运多厄,却“不以所遇谿勃,稍减救世汲汲之志”(姚东之:《书安吴四种后》),他“转侧江淮燕齐数十年,时时与当路者论说民间疾苦,为补救之方”(包世臣:《安吴四种总目叙》)。由于包世臣长期为地方大员作刑钱幕僚,大量接触并参予处理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战守、货币等实际问题,积累了大量“经济之学”的经验,从而成为一位“善经济之学”(李伯荣:《魏源师友记·包世臣》)“有经济大略”(《清史稿·包世臣传》)的专门之家。“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慷慨言之。”(《清史稿·包世臣传》)范麟在《读〈安吴四种〉书后》记述了包世臣的如下实绩:

> 嘉庆戊午(嘉庆三年,1798年)冬游楚北,为浦城祖承宣画招流亡、开屯田、营战、屯守之策。……戊辰(嘉庆十三年,1808年)游袁甫,觉罗长文敏公、大庾戴文端公闻声下交,立谈之间,以罢徐、扬六府州摊征三百六十万已成之议。辛未(嘉庆十六年,1811年)秋,佐百文敏公治河,临工决盖坝之策,旬日间,使袁浦、板闸淮安百万家得免为鱼而就高枕。丙寅(嘉庆十一年,1806年)夏,在扬州,诱伊太守举荒

> 政，全流民三万。甲戌（嘉庆十九年，1814年）冬，在白门，激百文敏公举荒政，活饥黎八万。……其余当路，多采先生河漕盐法之论而行之。

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途经南昌时，也曾与包世臣相晤，听取他的建策。

在嘉庆、道光、咸丰间经世学者群中，包世臣的经世思想自有特色。如果说，龚自珍侧重于尖锐的社会批判，魏源侧重于当代史研究与域外史地研究，那么，包世臣则最为关注财政问题。他认为，立国有三要事，这就是德、威、财：

> 国立于三，行之以一。夫维心以德，养尊以威，合众以财，财匮则威不行，威沮则德不立。（包世臣：《中衢一勺》卷7下，《说储上篇前序》）

三者之中，财的地位最为重要。他又称：平生所学"大半在此，如节工费、裁陋规、兴屯田、尽地力，在在皆言利也"（包世臣：《齐民四术》卷2，《答族子孟开书》）。如此大谈财利的观念与《大学》所谓"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的传统价值体系相悖反，也和管同秉理学泛道德主义余绪的"闭言利之门"，"杜口不言利事"（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4，《拟言风俗书》）的迂阔主张相对立，透露出市民阶层倾慕物质财富的精神。

包世臣治学，十分注重社会调查。范麟说，包世臣之遣诣"得于学者半，得于问者亦半"。"其于问也，……虽舟子、舆人、樵夫、渔师、罪隶、退卒、行脚僧道，邂逅之间，必导之使言"。"是者识之，否者置之，于是悉知水陆之险易，物力之丰耗，官场之情伪，穷惨之疾苦"。（胡朴安：《仓世臣传，包世臣全集》附录）由此而来，包世臣所提出的种种经世方案，"无不可见诸实事者"（姚东玉：《书〈安吴四种〉后》）。

包世臣的论学名著为《说储》及《安吴四种》。他曾述《说储》

一书的著作来由：

> 嘉庆辛酉（嘉庆二年，1801年）孟夏，天津姚承谦从余游，问古今治乱之故，予与极论斟酌损益、可措施补救者，作《说储》二篇。（包世臣：《齐民四术》卷29，《跋石瑶辰所藏明新城县知县赵日崇新城保甲图册》）

包世臣的儿子在《安吴四种》序中也简要介绍了《安吴四种》的著述过程：

> 在袁浦遇郭君大昌，从悉河事，侨扬州久，知盐漕得失。道光初，有《中衢一勺》之刻。时释碧溪好书，为刻论文论书诸作，名曰《艺舟双楫》。先大夫出游日久，习知民间疾苦，时时与当道论说，而信从者少，至道光甲辰，就旌德谭氏讲席，方裒生平著述，集为《管情三义》、《齐民四术》，并旧刻《中衢一勺》、《艺舟双楫》更加增益，名曰《安吴四种》。

由此足见《说储》与《安吴四种》均是包世臣关于当世社会问题思考的结晶。在《说储上篇序》中，包世臣声称：

> 苟有用我，持此以往，虽三代之盛不可妄期，汉唐二宗复见于今日。

在这狂生派头的宣言中，透露出一派经世、用世的热情与自信。

**六、"以经世自任"的姚莹**

道光十二年（1832），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专折上奏，请补一位名叫姚莹的官员为江苏长洲知县。（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第121页）时隔两年，林则徐又会同陶澍将这位官员力荐入朝，"谓可大用"。（《中复堂全集》附录《姚莹年谱》，第15页）这位颇得林、陶二人赏识与奖掖的便是道咸经世派中又一重要人物——姚莹。

姚莹（1785—1852）的出生地安徽桐城，因清代著名的文学流派——桐城派而声振遐迩。姚莹的从祖即桐城派大师之一的

姚鼐。姚莹的诗与古文，俱得姚鼐亲授，颇有根柢。

“承家业治经史为诗古文之学三世”（姚莹：《东溟文集》卷3）的姚莹，在科举道路上春风得志。从入府学至考取进士，四年之中连连告捷，“试数县皆最”（李伯荣：《魏源师友记·姚莹》），时仅24。然而，姚莹虽出身科甲正途，却“不好为制举之文”（姚莹《东溟文后集》卷9）。“弱冠时即以经世自任”（姚莹：《东溟文后集》卷9）。在他心目中，科举之学“猥俗浅陋”，浮华造作。对于士人而言，除了由此路径入任治民、经国济世外，别无其它意义。因此，他在一封信中一方面向朋友指示：“夫士人进身之正，舍科举无由”（姚莹：《东溟文后集》卷2），绝不可过于轻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道：“科举之学，出其绪余而已足，又何全力之攻焉”（姚莹：《东溟文后集》卷2）。认为只要跨过入仕门槛，大可抛弃科举之学这块敲门砖，去专务经世之学。

道光初年，姚莹赴北京，结识了一大批朋友，其中不乏著名经世之士。在《汤海秋传》一文中，姚莹曾叙及其时情形：

> 道光初，余至京师，交邵阳魏默深（源）、建宁张亨甫（际亮）、仁和龚定庵（自珍）及君（即汤鹏）。定庵言多奇僻，世颇訾之。亨甫诗歌，几追作者。默深始治经已，更悉心时务，其所论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厉，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世乃习委靡文饰正坐气痿耳，得诸子者大声振之，不亦可乎！（《东溟文后集》卷11）

姚莹衷心服膺“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的龚、魏诸人，他自己亦沿着这一路径，致力于经世之学，“意济世利人”（《东溟文后集》卷8）。

纵观姚莹一生经世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嘉庆二十一年（1816）出任福建平和县令至道光十七年（1837）擢台湾兵备道之前。这一阶段姚莹初任福建平和

令、龙溪令、旋调台湾令，兼理海防同知，摄噶玛兰通判。道光十一年后，历任江苏武进、元和知县，淮南监掣同知，护理两淮盐运使。在这一系列职务上，姚莹戮力于实政，“于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政绩颇佳。在福建时，姚莹所至，“士民好之”，“政声震一时”，有“闽史第一”之誉（《东溟文后集》卷9，《重刊中复堂集后序》）。在台湾令任上，姚莹“多方规划，兴利除弊”，“宽以容奸而有犯必惩；惠以养士而非公不见；调和营位，平心以驭浃洽；亲接贫贱，广问以达上情”（《答东信斋论台湾治事书》，《东溟文集》卷4）。由于姚莹在台湾士民中拥有极高声誉，当他离职时，台湾士民“群走道府乞留”。后来，他再到台湾任官，士民又“争以鼓吹来迎”（姚莹：《中复堂全集》附录年谱）。两淮盐运使在清代官场素称肥缺。可姚莹任此职却“负债万数金”久而未偿，其清廉可知。林则徐曾以江苏巡抚之职考察姚莹的才识行事，出具了甚为积极的考语：

> 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在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东溟文后集》卷9）

鉴于姚莹的经世才干，当道光十五年（1815）“有诏中外大臣荐保人才”时，“江督陶公、苏抚林公以府君（姚莹）名上”（姚浚昌：《先府君（姚莹）年谱》，道光十四年条），而更早一些时，编刊《皇朝经世文编》的贺长龄、魏源已将六篇姚氏之作收入该书之中。由此可见，嘉道之间，姚莹已是具有一定影响的经世派官员与经世学者。

从道光十七年（1837）被任命为台湾兵备道（例加按察使）至道光二十三年被革职投狱，是姚莹经世活动的又一阶段，亦是他一生中颇具光彩的一页。

姚莹任台湾兵备道期间，正值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威胁台湾。姚莹与总兵达阿洪联手，一方面加强台湾十七个重要海口与澎湖七口的防务，并经常亲自巡视各口，查看海防；另一方面广泛发动台湾士民共同御侮。他“印发谕数百道，委员交各处耆壮，申约连庄，添练壮勇，家自为守，人自为兵。……一面将逆夷凶淫贪狡恶状，遍加晓谕，使人皆切齿，共奋同仇”。又“颁发示，擒斩逆夷，击沉贼船者，赏格自数千至巨万不等”（姚莹：《鸡笼破获夷舟奏》，《东溟奏稿》卷2）。“如兵民奋勇破夷，凡所获夷船银货，悉与出力兵民充赏”（姚莹：《与曾方伯书》，《东溟文后集》，卷7）。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台湾军民的爱国热情。在很短的时期内，台湾团勇增至47000余人，3倍于戍兵的数额，从而大大加强了台湾抵抗侵略的力量。为了有力打击敌人，姚莹制定了“不与海上争锋”，而“以计诱其搁浅，设伏歼擒”的方略，并实行塞港、御炮、破鸟枪、守城邑、稽查奸民等五项防御措施，台湾的防务因而更为坚强。在姚莹的领导下，“台中擐甲之士，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威奋于杀敌”，取得了“夷五犯台湾不得一利，两击走；一潜遁；两破其舟，擒其众而斩之”（姚莹：《再上督抚请急发台饷状》，《东溟文后集》卷5）的重大胜利。“方是时，台湾军声震天下”（徐子苓：《桐城姚先生墓志铭》、《续碑传集》卷35）。“一方屹然，洋船不敢再犯。”（《魏源集》上册，第202页）

然而，英国侵略者虽然一再受挫于台湾海口，却在东南沿海取得重大进展。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英军攻陷镇江，进逼南京。八月，在咄咄逼人的炮口威胁下，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由于姚莹在台湾保卫战中使“所到之处，无不纵横为志”的英国侵略者遭到惨重挫折，因此，当中英双方根据和议交换俘虏时，久已对姚莹衔恨在心的英军首领璞鼎查以姚莹斩俘一事指诬台湾镇道“妄杀其遭风难民”，从而形成南

京和议后的善后交涉巨案。清廷担心“抚局决裂”，遂以“冒功欺上”的罪名将姚莹逮捕入京，交刑部审讯。姚莹被逮问一事，在朝野上下引起极大震动。“一时中外诸著论甚众，闺阁中多感咏。”（姚莹：《中复堂全集·后湘续集》卷2）当怡良赴台湾逮捕姚莹时，“精兵千万，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姚莹：《再与方植之书》，《东溟文后集》卷8）。“全台士民，远近奔赴，僉呈为镇道申理者甚众”（姚莹：《奉逮入却别刘中丞书》，《东溟文后集》卷7）。尽管怡良四处搜求姚莹“冒功欺上”的罪证，但“台中士民，无肯为夷人作证者”（姚莹：《复怡制军言夷事》，《东溟文后集》卷7）。当姚莹被押送至京，30多个京官、名士，包括曾国藩在内，候迎于京郊长辛店。一时之间，“台谏交章论救”，不少人前往狱中探望慰问。台湾士民亦“复有舆论之刻”。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在拘禁姚莹12天后，即将他赦出。尽管已有论者指出，姚莹在处决英国俘虏问题上确有处理不妥之处，但他率领台湾军民奋勇抗击侵略者的行动却是他“以经世自任”的一次大规模实践。

姚莹免罪出狱后，被发往四川任职。他初抵成都，即奉总督之命先后两次入康藏地区查案。两年后也即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他才就任四川顺庆府蓬州知州。三年后引疾乞归。贬谪川藏是姚莹仕宦生涯中的一次大跌落，但他“聊存面目于百折崎岖之后而不敢变”，“忧国忧民之心”未改。在困苦颠沛的环境中，他撰成《康辖纪行》一书。

报道域外史地及中国西南边疆域情的《康辖纪行》是道咸间的一部重要经世著作。对于此书的经世性质，姚莹有多方阐述。他指出，鸦片战争期间，由于“中国不知其情”，“执事者不悉地形兵事”，因而失去许多“难得之事会”（《康辖纪行》卷3，《东溟文后集》卷8）。而《康辖纪行》一书使“四海万国，具在目中，足破数

千年茫昧"(《康辖纪行》卷16)。"经略中外者"从中可以获得诸多重要消息。在《复光律原书》中,姚莹又直述他撰《康辖纪行》的动机:

> 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东溟文后集》卷8)

反对闭关自守,强调了解外国,努力把研究介绍敌情外事与拯救民族危亡联系起来,这就是姚莹著《康辖纪行》的目的。方复恒评《康辖纪行》,称姚莹"忧国忧世之心,岂不深远也哉"。(《康辖纪行》跋)斯言不诬。

**七、"志经世"、"究时务"的徐继畬**

在道咸经世派一章中,为徐继畬(1795—1873)专辟一节似乎于和谐交响乐中插入了不协和音符,因为,徐继畬不仅和林则徐、陶澍等人不属一个交游圈中的人物,而且在诸多政见上与林则徐不合。道光三十年(1850),两名英国传教士入居福州城内乌石山下神光寺,激起一场著名的英人租屋事件。在这一事件中,林则徐与徐继畬是尖锐对立的两方。林则徐主张采用强硬手段驱逐英人,徐继畬则力主采取审慎、稳妥手段,双方互有攻讦。因此,当代史著对徐继畬的评价大多不佳,将他视为"投降妥协势力的代表"。

然而,在道咸经世思潮中,徐继畬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

出生于山西五台县的徐继畬,字健男,号松龛。"幼承父广轩先生润弟学,颖敏工文"(《山西献徵·京卿徐松龛先生事略》)。他19岁时应乡试中举人。22岁主讲五台崇实书院32岁中二甲第80名进士,朝考第一,自此跨入仕途。徐继畬中试为进士的道光六年,贺长龄、魏源正着手并完成《皇期经世文编》的编纂,经世致用的新鲜士风有力地影响着徐继畬。《山西献徵·京卿徐松

龛先生事略》如此介绍徐继畬初任京官的活动：

先生读书志经世，于部曹事例、郡国利病，无不穷研。

道光十三年(1833)，徐继畬由翰林转为御史，他“思有所建白”(杨笃：《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徐公家传》，《松龛先生全集·叙传》)。“前后上书，皆关天下大计”(《山西通志·徐继畬》)。“凡上章，宣宗无不称善，谓不蹈空文无实之故习。”(《山西献徵·京师徐松龛先生事略》)道光十六年七月，徐继畬针对官场中繁琐、沉滞的官僚作风，上《政体宜崇简要疏》，主张教令宜简，部例宜简、处分宜简，颇得道光帝赏识，“立召对，与语移时，询及民瘼，先生剀切陈之，至为流涕”(《山西献徵·京师徐松龛先生事略》)。次日即擢为广西浔州府知府。半年后，升调至福建。以后的18年中，徐继畬除任广东按察使3个月外，其余的17年零9个月都在福建任职，官至福建巡抚。

从内地调到正值多事之秋的福建任官，使徐继畬有充分机会施展他的才干与抱负。徐继畬为政，力主务实，他认为，清代官场上，“所短者唯一实字”(《松龛先生全集》奏疏上，《请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疏》)。“大臣之负清名、有时誉者，大约以缄默不言为慎密，以圭角不露为深沉，以漫无可否为和平，以多所容忍为宽厚，以模棱两端为和衷济事之道，以遵循故事为奉公守法之规。观其章奏所敷陈似乎精密周详，了无遗憾，而实则铺张粉饰，纸上空谈，稽诸事实，大谬不然，于圣训所谓‘实’字者则固相远矣”(《松龛先生全集》，奏疏上，《请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疏》)。他反对弥漫官场的腐败作风，并将实政作为医治各种痼疾的良方：

> 实事求是，无一影响揣摩之语。为将帅者果能遵而用之，战无不可，守无不固，正如良医立方，病者覆杯而沉疴立起，空言之与实用岂可同日语哉！(《松龛先生全集》文集，《壁勤毅公兵武闻见录序》)

在闽粤任职期间，徐继畬力行他一再阐明的“务实”思想，政声颇佳。福建巡抚刘鸿翱，闽浙总督颜伯焘，钦差大臣怡良均以“清廉明达，有守有为”八个字作为对徐继畬的评语，列之荐牍。

徐继畬任职闽粤期间，正值“海氛甚恶”。他“驰驱海岸，日不遐给”(《松龛先生全集》文集，《致五台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以拳拳爱国之心，积极投入边疆防守事务。在汀漳龙道任上，他“调兵募勇，运木拦港，劝练诸事”(《松龛先生全集》，文集，《致五台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并“每夜间登城与守陴者垂泣告语，勉其敌忾”(《松龛先生全集》文集，《致某方伯书》)。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初四日，英军以坚船利炮攻陷厦门。与厦门一水相望的漳州顿时防务吃紧，“民心惶骇，一日数惊，文武官中有将家眷偷运出城者”。在此紧要关头，徐继畬镇静自若，勉力安定人心，“督兵勇昼夜防守，志在与城存亡”。在后来致赵盘文、谢石珊的信中，他剖白自己当时的情状与心迹：

> 自厦门失守之后，则寝食不遑，心力交困，劳悴不堪言状。……当此危难之际，正当捐糜图报。逆夷叵测，事无了期，与此土为安危，与此城为存亡。(《松龛先生全集》文集，《致五台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

与此同时，他与夫人相商：“城如不保，陈忠愍公祠内，吾尽节处也，卿且奈何?”夫人笑曰：“‘相从俱死耳，此事岂待商量’。”“同官有私送眷口出城者，婢媪或私劝夫人，夫人叱之，谈笑如平日，无惊惧意。”(徐继畬：《续夫人传》，转引自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第 2 版，第 81 页)其坚贞气节令人油然起敬。

由于徐继畬“久官闽，且究时务，了然于世界大势”(《山西献徵·京师徐松龛先生事略》)对西方列强的实力与中国内部的虚弱有清醒的认识，因而，他力主在外交上采取稳健的方针，避免

因不必要的冲突而授敌以侵略口实。在福州神光寺事件中，他采取的便是如此策略。诚然，对于徐继畬在神光寺事件中的处置方法与他的外交思想人们可以有多角度的讨论和评估，但随意冠之以投降妥协路线似乎有失妥当。在神光寺事件中，徐继畬曾向林则徐诸人表示：

> 敌来则惟有与之拼命，不来则审己量力，不宜与之生端。继畬之不敢轻于召衅，实为地方计，非为一身谋。傥仓卒之间，夷船忽来恫喝，暂当乘一小舟，直造其船，与之讲说情理。如有不测，当陨身以谢吾民，再与之开炮未晚。（徐继畬：《复福州绅士神光寺夷人并无携械炮情事函》，道光三十年七月十八日林扬祖奏折附件）

这是一种大谋略、大勇气，与那种一味高呼“打仗！打仗！不怕！不怕！”（德雷克：《徐继畬与〈瀛环志略〉》）的莽勇比较起来，徐继畬高明得多。关于林则徐与徐继畬的不和，晚清杨笃有一段精辟议论，他说：“两公深谋远虑，持论不同，而为国之心则一。”（杨笃：《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徐公家传》）这确是允当之论。

作为经世派的徐继畬，一生最大的功绩在于《瀛环志略》的制作。该书以开阔的世界视野、卓然不群的自强意识，向中国人展示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天地，使“才士倾心，小儒咋舌”（《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第106页）。“当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徐继畬同时代的魏源，继道咸经世派而起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明治维新前夕的日本有识之士均曾从这部书中汲取充分营养进而丰富、发展自身的学说。《瀛环志略》的深远文化影响，有力地铸就了徐继畬在道咸经世思潮乃至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而由徐继畬的经世活动，“可以觇一时风尚”（金梁：《近世人物志》），这一风尚就是经世致用思潮的风起云涌。

## 八、贺长龄、黄爵滋及其他经世派

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对艺术家的文化氛围有一段绝妙的论述：

>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显赫的代表。

艺术家不能脱离"艺术家族"，政治家和学者同样需要一种特定的群体造成的氛围。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陶澍、包世臣、姚莹只是嘉、道、咸之际经世思潮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们周围，拥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经世派"家族"：

**贺长龄(1785—1848)**

与林则徐同年生，与陶澍、魏源同乡的贺长龄字耦耕，号耐庵。嘉庆十一年(1806)受业于岳麓书院。次年湖南乡试第一，同年成进士。贺长龄初入仕途，即以"才识优长"引起封疆大吏的注意。道光二年(1822)，两江总督孙玉庭对时任南昌知府的贺长龄等人密疏优评："臣于校阅安徽、江西两省营伍之便，沿途接见各官绅耆，留心延防年来两司道府，……安徽藩司陶澍、江西藩司邓廷桢、南昌府知府贺长龄，尤为才识优长，持论公正，皆有根柢，洵堪委任之员"。(孙玉庭：《延厘堂集》，奏疏卷下)诚然，在后来的仕途中，贺长龄屡屡受挫，未能如陶澍、邓廷桢那样大有名气，但同时代人对他是甚为服膺的。林则徐称："如贺某者殆古所称大人君子者。"(《左文襄公奏稿》，卷57)左宗棠说："耦耕(贺长龄字)先生实嘉道两朝名臣，学术之纯正，心地之光明，一时仅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2)"中丞公(长龄)当代巨儒。"(《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近代黄濬则将贺长龄与陶澍、林则徐相提并论："湘军自起自曾左，砥砺贤才，则始自贺耦

耕、陶文毅、林文忠等，相与提倡”（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民国五十四年香港龙门书店影印，第200页）。由此可见贺长龄在嘉道间颇有影响。

贺长龄论学术，至为强调“经世致用”。他对他的朋友黄惺斋说：“我辈读书非关身心性命，即系天下国家，余可概置弗阅，实亦无暇旁及”。（贺长龄：《耐庵文存》卷6）他释儒学核心伦理命题“仁”，声称“‘热肠’二字即是‘仁’字”。（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2）所谓“热肠”即满腔热忱关注社会人生，全身投入经世济民之业。而这一切在贺长龄的心目中，均是“仁”的表现。从经世观念出发，贺长龄极为憎恶科举之学，斥之为“俗学”、“误子弟终身”（贺长龄：《耐庵文存》卷6），与此同时，他积极倡导学人从理学著作中汲取经世济民精神，“必如是方为真人才、真人品、真学问、真经济”（贺长龄：《耐庵文存》卷6）。此种从理学中发展经世之学的路数，是湖南籍经世派学风的特色。

贺长龄与陶澍、林则徐作风相似，是一位实务的实干家。官南昌时，贺长龄“别设自理谳局，详定章程，局员以劳叙考绩。”他“日与诸员会食，辄随事究情实，辨疑难，自是讼无留牍”。布政江苏时，“值清江口塞，诏群臣议海运，尚书英和连疏其利，长龄力主之，海运乃行”。在贵州，“以僻远之区，文教不启，长龄乃饬官方练营伍，缉盗贼，赡仓储，种桑麻，民利赖之”。（李柏荣：《魏源师友记》，第24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贺长龄对典籍的整理与出版甚为热忱，“生平历宦所至，广刻书籍”。（《耐庵文存》卷6）在这些书籍中，有顾炎武的《日知录》，有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与《宋论》，有学者指出：“船山的史论，可能到此时才有刻本行世。”（《王船山学术讨论集》，第514—515页）深刻影响清季经世思潮，被刘广京称为“晚清经世运动宣言”的《皇朝经世文编》，更是他的“经国杰作”。尽管《皇朝经世文编》的实际编选者是贺长龄

当时的幕友魏源，但若没有贺长龄促成并主持其事，此部经世大书的问世或将是另一种形式。近人黄濬说：

> 耦耕刊《经世文编》一书，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花随人圣盦摭忆》第200页）

这是《皇朝经世文编》的巨大影响，也是贺长龄在晚清经世思潮中的重要功绩。

**黄爵滋（1793—1853）**

出生江西宜黄的黄爵滋，在经世事务上或乏于贺长龄那样值得称道的业绩，但就知名度而言，他却远胜于贺长龄。黄爵滋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在道光十八年（1838）上了一个《严禁漏卮以培国本疏》，力主严禁鸦片，成为禁烟运动的先声。人们论及林则徐禁烟，往往也注意到黄爵滋。其实，黄爵滋所关注的不仅仅是鸦片问题，在道咸时期，他与龚、魏等人俱以究心时务名于当时。黄爵滋的经世风格乃是利用御史之职，指陈时政得失，“遇事精锐风发，无所回避”（孙衣言：《光禄大夫前刑部左侍郎黄公行状》，《续碑传集》卷10）。“御史台以公为敢言”（孙衣言：《光禄大夫前刑部左侍郎黄公行状》，《续碑传集》卷10），从而成为中枢机构内刷新腐败政治的一支活跃力量。鸦片战争爆发后，黄爵滋奉命往福建，“会同总督邓廷桢阅海口”。他就战守问题提出了诸多建议，“且以海防图表进”（孙衣言：《光禄大夫前刑部左侍郎黄公行状》，《续碑传集》卷10）。在力主抗御英国侵略者的抵抗派集团中，黄爵滋无疑是一位重要成员。

提到黄爵滋的禁烟奏疏，不能不旁及与此疏相关联的其他经世派人士。种种记载表明，黄爵滋的禁烟奏疏大有可能不是他个人的产品，而是他与朋友磋商、讨论后拿出的共同意见。《水窗春呓》一书记载说，黄爵滋上的禁烟疏，是吴嘉宾、臧纡青、江开三人剪烛夜谈时起的底稿。雷瑨的《蓉城闲话》则说：“黄爵滋上

折奏请禁止鸦片烟，其属稿者为富顺倪印垣、书折者为庐江江开”。谢章铤的《稗贩杂录》卷三《夷事》条提出另一种说法：“初，宜黄树斋爵滋请禁鸦片，则建宁张亨甫际亮为之起草。”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卷五也说：“黄疏实出张亨甫（际亮）之手。”这些说法虽然无一能得到最终确证，但至少映现出黄爵滋上禁烟奏疏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代表那一时期经世派的共同主张。

**张际亮（1799—1843）**

时人推测曾参予黄爵滋奏疏起草工作的张际亮，字亨甫，是道光年间颇有名气的诗人。道光三年（1823），他以诗谒姚莹，姚莹大为赞叹，称他“才可及空同（李攀龙）”（姚莹：《张亨甫传》，《续碑传集》卷78）。“乙酉入京师朝考，报罢，京贵人及名士言诗无不知亨甫”（姚莹：《张亨甫传》，《续碑传集》卷78）。然而，张际亮虽长于诗才，却决不沉溺于吟花咏月。他尖锐批评乾隆以来诗坛“以口角婉媚轻率之语，写目前琐屑猥俗之事。”“或以议论考订为事，或则轻佻浅鄙，无与于风雅之旨”。由此而来，“至今之为诗者，可悦人者多，可感人者恒少”（《张亨甫全集·文集》卷3）。与脱离现实的诗坛风气相悖反，张际亮义无反顾地走向广阔社会生活。他“一生足迹半天下，道途遍历知民隐”。在实际接触社会的过程中，张际亮将“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阅历，心之所喜怒哀乐，口之所戏笑呵骂，一皆托诸诗”（《张亨甫全集·文集》卷3）。他的诗作中，有“骨肉卖为奴，百钱聊救死”，“室有冻死骨，野有逃荒民”的残破悲惨社会生活的写照；有对鸦片烟“千万去中原”，“毒土换黄金”的极大义愤；有对坚持抵抗英国侵略者的爱国将士的讴歌，也有对琦善一类投降派向敌乞和的鞭挞。姚莹评价张际亮的诗“感时纪事，沈郁雄宕”，“接迹放翁、遗山”（《东溟文后集》卷14）。这确是不妄之言。

张际亮的诗歌创作趋向十分鲜明地展示出与龚、魏、林、姚

等人一脉贯通的经世风格。姚莹说他“负奇气大节”,“尤留心当世”(《东溟文后集》卷14),“有经世才”(姚莹:《张亨甫传》,《续碑传集》卷78)。林则徐也对他有相似评价(姚莹:《张亨甫传》,《续碑传集》卷78)。然而,由于张际亮蔑视权贵,不与流俗合,“以是负狂名”,“为朝贵所忌”,以致“试辄不利”,“沦落不偶”,(姚莹:《张亨甫传》,《续碑传集》卷78),年方45即因病而逝,无以施展其经世之才,这不能不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张际亮平生多经世派好友,龚自珍、魏源、汤鹏、黄爵滋皆与他交谊。他与姚莹关系最为密切,吴嘉宾《姚公传》说他与姚莹为“昆弟交”。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函邀张际亮赴台协助筹划抗英事宜,张际亮欣然就道,行至厦门,因惧风浪,终未渡海。道光二十三年(1843),姚莹因斩俘一事被逮问,张际亮抱病到江苏清江迎候,并跟随囚车入京,其真挚之情为人传诵。张际亮与林则徐的关系也甚为亲密。道光十八年十月,林则徐离湖广总督任,启程晋京,张际亮自安襄归来,未及相晤,遂作诗抒怀,诗中写道:

> 幕府重闻歌角声,九重高望不胜情。重臣报国心原瘁,圣主忧时事可争。江汉朔风连夜永,幽并寒月近天明。衰梧细竹萧凉地,亲见陶公运甓行。(《张亨甫全集》卷24)

诗中既寄托有张际亮对林则徐的殷切思念,又表述了他对时局的关切之情。道光二十三年,张际亮病逝,正在新疆戍所的林则徐悲恸异常,他作《哭张亨甫》诗,以表哀悼之情。诗中有句云:“修文定写平生志,犹诉苍苍寒漏卮”(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钞》卷6)。所谓“塞漏卮”似指黄爵滋著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由此看来,张际亮与黄爵滋的禁烟疏确有关联。

在龚自珍、魏源、林则徐所置身的经世派“大家族”中,不仅有贺长龄、黄爵滋、张际亮,还有“读书颇亦忧苍生”(张维屏:《甲花闲谈》卷6)、为龚自珍“心所敬慕”的张维屏;与魏源、张维屏

"以经世、诗文相推许"(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吴兰修》的陈澧;"负大志,区画世务,体明用达"(姚莹:《东溟文集》卷6)的刘开;"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姚莹:《东溟文后集》卷11)的汤鹏;与包世臣"以实事相切劘",与魏源"同以经世史地之学见长"(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周济》)的周济;"实事求是,研穷利病"(李柏荣:《魏源师友记·谢元淮》)的谢元淮;对经世之学"尤为讲求"(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张穆》)的张穆;道咸间"海内谈实用之学必首推重"(李柏荣:《魏源师友记·王凤生》)的王凤生;开广东经世致用风气的李绣子①;创建广东经世致用学术团体——希古堂的吴兰修②;"才不为世用,乃著经世书"(徐松:《西域水道纪》题词,张邦畴诗第一首)的徐松;撰《粤汉关志》并发起反对英军入驻广州运动的梁廷枏……他们"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然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个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一涨一涨,而达于满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近代经世实学的高潮,正在这种同趋性心理中神彩飞扬地来临。

① 梁廷枏在《越华书院志》中说:"至今粤士能娴习典制,海南、番禺两县附郭者更能左右逢源,俯拾皆是,皆(绣子)先生为首开风气也。"

② 希古堂的宗旨是:"吾辈讲习,以经史为主,子史辅之,熟于先王典章,古今得失,天下利病,而后发为文。"

# 第三十四章　道咸年间的议政风尚与吶喊变法

道咸间的经世学者，都以匡济天下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他们或者被时人推尊为："国医"，或者以"医国手"自期。这表明，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国家多病，需要有人起来"医大病"、"谋大事"。正是在这种时代要求的推动下，经世学者怀着"挽狂澜于既倒"的悲壮而执著的意愿，注目于"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的现实，崇尚议政，呼唤变法。

## 第一节　"悲风骤至"与衰世预言

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庆十三年(1808)爆发的西南苗民和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标志着清帝国从颠峰时期急剧地向衰世滑落。尽管嘉庆、道光二帝一再宣称天下大势是"海宇义安，黎民康阜，持盈保泰"，但是，统治系统内乃至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无序力量正迅速集结，社会危机蓄势欲发。

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在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士人阶层中酝酿。清王朝的危机，其实早在潜伏于"乾隆盛世"的后期。忧郁诗人黄景仁对此有敏锐的感受。乾隆三十八年除夕，当"中天空光若电扫"、"旧雨当筵酒正醲"时，他独自徘徊于夜色中的小桥上，

一首七言绝句在他心底酿成：

千家笑语漏迟迟，
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知，
一星如月看多时。(黄景仁：《癸巳除夕偶成》)

诗人从“千家笑语漏迟迟”的表面盛象中，透见到危机四伏的阴云，已经悄然逼近18世纪的中国。

假如说，黄景仁已经嗅到海潮上涨前的潮湿气息，那么，嘉道之际的经世派则直接感触到风暴的即将来临。

大约在黄景仁作《癸巳除夕偶成》后的第20个年头，包世臣在《再与杨季子书》中写下了这样一番话：

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汙而民气郁，殆将有变。(《安吴四种》卷8)

以明朗的语言预言天下“殆将有变”，包世臣是嘉道经世派中的第一人。

继包世臣而起，龚自珍以其特有的敏感，对清王朝深入骨髓的病症和大局“有变”的紧迫性有更为充分的揭示。

嘉庆二十年(1815)，24岁的龚自珍撰写《尊隐》一文，把社会境况比喻为“日有三时，一曰早时，二曰午时，三曰昏时”，而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由“人功精英”“府于京师”的早时盛世，变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衰世。龚自珍还以“京师”代指朝廷，以“山中”代指“民间”，指出由于“人功精英”“京师弗受”，导致“京师贫，则四山实”。清王朝的统治中心——京师已如同“鼠壤”，基础空虚；反之，“山中之壁垒”充实而强大，两相比较，其结论是，“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矣”(《龚自珍全集》第87—88页)。龚自珍预言，“山中之民”起而推翻清王朝的时刻即将来临。他说：

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

鹞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龚自珍全集》，第 88 页）

这里以富于象征意味的语言指出：朝廷失道，将有生气勃勃的“山中之民”奋起，他们“一啸百吟”，汇成“大音声”，而“天地”与“神人”将“为之钟鼓”，“为之波涛”。在如此气势磅礴的风雷面前，统治者将战抖而无所措手足。19 世纪初叶，清王朝虽然已多有衰象，但尚掩盖于“中外乂安”的外观下，龚自珍却独具慧眼，锐利地发现“世运潜运”的大势，并预见到“山中之民”即将奋起，而这一切预见，均在 19 世纪中叶以降清王朝的溃败以及太平天国起事等历史事变中一一得到印证，其洞察力之犀利令人叹服。就是龚自珍自己，亦在晚年时为自己青少年时代的敏感而感到骄傲。他曾作诗云：“少年《尊隐》有高文，狼鹤真堪张一军”（《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310 页）。

继《尊隐》之后，龚自珍又相继撰成《平均篇》与《乙丙之际箸议》，更以“后史氏”即预言家自命，声称自己的使命是“探世变也，圣之至也”（《龚自珍全集》第 7 页），并进一步对自己所处时代的险境作了形象的描绘。他说：

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痺痿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龚自珍全集》第 7 页）

在龚自珍眼中，笼罩大清王朝的，是一片凄凄惨惨的萧条景象，老大的中华帝国，已经是满身疥癣，病入膏肓。他再次预言道：

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龚自珍全集》第 78 页）

起视其世，乱世竟不远矣。（《龚自珍全集》第 7 页）

触目的语句展示了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有力地震憾着有良知的士人心灵。梁启超说：“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惸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积，举世莫能及也。”（梁启

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第七卷)对龚自珍呼啸呐喊的启蒙意义予以高度评价。

与包世臣、龚自珍心绪相通,其他经世派也对时局的危急有深入揭露。姚莹认为,天下"有开创之天下,有承平之天下,有艰难之天下"。而嘉道间已经是"艰难之天下"。这种艰难性表现在:"生齿繁而地利不足养,文物盛而干盾不足威,地土广而民心不能靖,奸伪滋而法令不能胜,财用竭而府库不能供,势重于下,权轻于上,官畏其民,人失其业。"(《东溟文后集》卷6)整个社会已陷入全面危机之中。魏源于道光十七年(1837)即鸦片战争前三年著《明代食兵二政录叙》,叙中指示,嘉道时期的王朝统治已全面跌入低谷:

> 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鲑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训诂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史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

一连数个"前代所无",道尽了魏源深重的忧虑。他之所以在《明代食兵二政录叙》中大谈明亡教训,在《拟上〈元史新编〉表》中大谈宋亡、元亡的教训,正因为他已于种种"前代未有"的社会危象中看到了清王朝灭亡的阴影。

对于清王朝深陷其中的巨大危机,林则徐也有深入觉察。他在《致邵懿辰》函中说:

> 今之时势,观其外,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即得大有为者以振作之,尚恐其难以程效,况相率而入于因循粉饰之途,其何以济耶!狂澜东下,诚有心者所欷歔而不能已耳。(致《邵懿辰》,道光二十九年七月,见

《林则徐书简》，杨国桢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年 5 月版，第 274 页）

与林则徐交好的蒋敦复亦“深观默计”，于道光十一年(1831)致函林则徐指出：

> 国家承平二百年矣，今上下相蒙，无法不敝，宴安鸩毒，情伪日滋，祸患之来，气机已召，不出十年天下多事。(《上抚部侯官公书》，《啸古堂文集》卷 3)

揭示社会危象需要敏识，需要勇气，更需要经世济民的拳拳之心，包世臣、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经世派正是以极端关切民族国家兴亡的经世观念去透视自身所处时代的险境，并发出惊醒世人的呐喊，从而为更深层次的社会总批判提供了逻辑前提。

## 第二节 “讥切时政，诋排专制”

岌岌可危的时局，使道咸经世派忧心如捣，寝馈不安。为了拯救渐趋糜烂的时局，他们竞相剖析社会病端，展开犀利的社会总批判。梁启超说：“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沈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所谓“指天画地”，正包括锐利的时政批判。

### 一、龚自珍的“讥切时政”

道咸经世派中，抨击时政最为激烈的首推龚自珍，他正视现实，“所见所闻，胸弗谓是”，则“感慨激奋”，放言无忌(《龚自珍全集》，第 319 页)。晚清守旧派王芭孙曾指斥龚自珍的诗文“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记》)。由此可见龚自珍政治

批判的尖锐与广泛。

纵观龚自珍对时政的批判，大致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抨击官场腐朽、贪婪的风气

龚自珍探究清王朝的衰败原因，首先把批判锋芒指向腐败的官场。他指出，清代官场，弥漫着苟且、谄媚、寡廉鲜耻的污浊风气：

> 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记》）

在这污浊的官场上，“内外大小之臣，具思全躯保室家，不复有作为”（《龚自珍全集》第31页）。所谓“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所谓“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此外非所问也”。至于“堂陛之言”，则是“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间少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龚自珍全集》，第32页）。这真真是一幅苟且敷衍、庸懦趋奉的图景。在《与人笺（五）》与《人草稿》一诗中，龚自珍又描画道，清代大大小小的官员，是一群“缚草为形，实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的傀儡，他们“或则头帖帖，或则头颥颥，丹黄粉墨之，衣裳百千身”，全然没有生气和活力。由这样一批人把持朝政，当然会导致国家的衰亡，“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龚自珍全集》，第32页）。道光十年（1832）秋，龚自珍参加军机大臣王鼎的宴会，席间他赋诗一首，锋芒毕露地指责官场虚伪的习气：

> 迩来士气少凌替，毋乃大官表师空趋跄；
> 委蛇貌抚养元气，所惜内少肝与肠。
> 杀人何必尽砒附？庸医至矣精消亡。
>
> （《饮少宰王定九丈鼎宅，少宰命赋诗》，《龚自珍全集》第499页）

尖锐辛辣的诗句直斥保守因循的官僚贵族如庸医害命，治国无方，致使国脉精消命亡。尽管龚自珍的“酒席谭论”因过于激烈而受到友人魏源的规劝，但鸦片战争爆发后，朝廷面对外来侵略者的手足无措与一味妥协投降却宣示了龚自珍揭露官场腐败的政论具有真实的预见性与现实性。

第二，抨击朝廷腐朽的用人制度

龚自珍在揭露官场腐败风气的同时，着重解剖了造成这一病症的重要原因之一——用人制度腐朽黑暗。

龚自珍指出，清代官僚制度的用人之法只重资格而不重才学政绩，一味“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导致有才之士在官阶递进的漫长岁月中耗尽青春而无所作为。他在著名的《明良论》中揭示道：凡仕宦者，由读书而登仕途，大抵需三十年，“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这样做的结果是士人“自三十进身，以至于为宰辅，为一品大臣，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也；然而，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偃然终日，不肯自请去”。他还用大门外的石狮子形象，来讽刺那些资格最老却稳坐其位、无所作为的官僚。腐朽用人制度的严重恶果，必然是进取精神被窒息，畏葸退缩、萎靡不振的风气蔓延泛滥，整个社会失去活力，正如龚自珍所痛切分析的：

> 一限以资格，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

（《龚自珍全集》第34页）

如上切中肯綮的批判，表明龚自珍早在近代史前夜，就已敏感察觉到论资排辈的官僚政治是行政机制严重老化和惰性化的重要根源。

龚自珍还指出清王朝用人政策的腐朽，一方面使官场充斥

"诈伪不材"、昏馈庸碌之辈，另一方面造成人才困厄，使"资格未深之人，虽勤苦甚至，岂能冀甄拔？"(《龚自珍全集》，第33页)他揭露道：

>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生，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龚自珍全集》，第6页)

可怕的是，这种屠戮人才的办法，不是公开的，而是暗地的，不是宣之于法，而是行之于风俗习惯。"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龚自珍全集》，第6—7页)。这是一幅多么触人心惊的情景。

龚自珍不仅以犀利的笔锋揭示出封建末世人才遭到多方扼杀的命运，而且指出人才困厄的两大恶果。

首先，由于才士与才民的"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俱被戮杀，士人道德品质日益败坏，"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龚自珍全集》，第31页)。龚自珍指出，"士皆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龚自珍全集》，第31页)。龚自珍的这一思想与清初顾炎武强调"行己有耻"极相类似，都认为士子的情操是人才高下的主要衡量标准，如果情操沦丧，士子的价值便丧失殆尽，并将"延及于社稷"，祸及国家民族。这是对中国传统的儒家人才观的一种发挥。龚自珍在道德危机深重的嘉、道之际强调"士皆有耻"，是有社会批判意义的。然而，龚自珍毕竟无法揭示"士不知耻"的更深层的社会原因，所以也就提不出有力的救治

方法，只能用“教之耻为先”这类空泛的古训敷衍故事。

其次，人才的被扼杀，使整个社会跌入平庸、鄙俗的低谷，以致“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其鲜”(《龚自珍全集》，第6页)。不仅将相士大夫无才，连小偷、大盗也无才，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无才之世”是何等失望、何等轻蔑。道光三年(1823)，龚自珍作七律诗《夜坐》抒怀。诗中有句云：

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
塞上似腾奇女气，江东久陨少微星。

寥寥数句，描绘了一个黑暗、压抑、妒忌、排挤的腐朽社会环境，在如此文化氛围中，万籁无言，唯有帝坐星(暗喻最高统治者)阴鸷地闪烁，象征杰出人士的少微星则早已陨落。这正是那一时代人才命运的真实图景。

龚自珍关于专制主义毁灭人的本性和创造力的批判，石破天惊，震聋发聩——既然专制制度扼杀人的创造力，泯灭人的个性，那么它就失去存在的合理性，而必须加以否定。这无疑是一种意义深刻的思想启蒙。面对“一睨人才海内空”的死气沉沉的局面，龚自珍发出激越的呐喊：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全集》，第521页)

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批判精神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朦胧向往。

第三，指斥“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君主专制

龚自珍犀利披露清王朝官僚制度的黑暗，并进而有力揭示，这种黑暗实际上源于顽固腐朽的君主极权体制。他一针见血地说，士大夫的无耻和柔弱，全然是“霸天下之氏(即开国帝王)”所

造成的：

> 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疆武。（《龚自珍全集》，第20页）

龚自珍在这里披露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帝王的绝对权威是在摧折臣子百姓的人格独立性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王者"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弥、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于臣，不亦暮乎！"（《龚自珍全集》，第20页）由于君权的树立依赖于臣民的奴性，清代官场因此多"好好阁老"、"泥塑宰相"以及"少说话，多磕头"的"磕头宰相"，盛行逢迎拍马、趋炎附势的劣习，比较清廉的士人则"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全集》，第471页）。这一切都是"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专制君主制度造成的恶果。

"药方只贩古时丹"——托古制以纠弹当代弊政，是龚自珍的基本运思和论战方法。在抨击封建专制君王时，他也采用了此种手段：

首先，在君臣礼仪方面，为了衬托近古问题，龚自珍专门考察了古来朝仪，他指出："唐、宋盛时，大臣讲官，不辍赐坐、赐茶之举，从容乎便殿之下，因得讲论古道，硕儒兴起"（《龚自珍全集》，第31页）。这种君臣关系显然比明清两朝臣见君必行三跪九叩之礼要融洽得多。龚自珍十分欣赏"古者大臣"对帝王"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他痛心地看到，近古以来"臣节之盛，扫地尽矣，臣子会君王，"朝见长跪，夕见长跪"，"殿陛之仪，渐相悬以相绝"（《龚自珍全集》，第31页）。龚自珍认为，这种做法必将导致君臣阻隔，亿兆离心，臣子表面对君王唯唯诺诺，实则"岂有为主人分一夕之愁苦者哉？"（《龚自珍全集》，第32页）他还转引贾

谊之言，说明一个道理："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龚自珍全集》，第31页）龚自珍认为，君对臣应待之以"礼"，臣对君才能报之以"节"。

> 故曰：厉以之礼出乎上，报之以节出乎下。非礼无以劝节，非礼非节无以全耻。古名世才起，不易吾言矣。（《龚自珍全集》，第32页）

只有君待臣以礼，臣报君以节，社会政治才能达到和谐、美妙的境地："内外官吏，皆忘其身家以相为谋，则君民上下之交，何事不成？何废不举？"（《龚自珍全集》，第30页）这是龚自珍设计的一种防止清王朝解体的方案。

其次，在君臣权力分配方面，龚自珍崇仰古代君臣分权，天子，百官、吏胥各守其责的作法："律令者，吏胥之所守也；政道者，天子与百官之所图也"（《龚自珍全集》，第34页）。他还特别强调了君臣共治天下的原则：

> 为天下者，训迪其百官，使之共治吾天下，但责之以治天下之效，不必问其若之何而以为治，故唐、虞三代之天下无不治。治天下之书，莫尚于六经。六经所言，皆举其理，明其意，而一切琐屑牵制之术，无一字之存，可数端了也。（《龚自珍全集》，第34—35页）

龚自珍观念中的理想境界是"三代之治"、"六经之治"，然而，现实却与之南辕北辙。帝王和朝廷对于大臣一味"约束之，羁縻之"，"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则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以行一谋，专一事"。（《龚自珍全集》，第35页）由于极端专制政治使臣僚们有职无权，实际沦为办事员式的吏胥，因而，其风习日益敝坏，诚所谓："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敝"。（《龚自珍全集》，第35页）对于皇权过重的"今日束缚之病"，龚自珍"急思

所以救之”。他期望“仿古法以行之”，解除对臣僚的束缚，使“守令皆得以专戮，不告大官，大官得以自除辟吏”(《龚自珍全集》，第35页)。与此同时，要恢复臣僚的尊严，使他们“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难御侮，而不死私仇。”(《龚自珍全集》，第27页)再扮演君王家奴的角色。

再次，龚自珍从古代的原始民主思想中受到启迪。他指出，“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古者未有礼乐刑法”(《龚自珍全集》，第49页)。君王、礼乐、刑法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而批驳了君权与天地并存的谬论。他还就上与下孰先孰后的问题力斥传统旧说：

> 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则曰：先有下，而渐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说于天，是故本其所自推也。”(《龚自珍全集》，第49页)

这显然是对柳宗元《封建论》中“先有下渐有上。”说法的发挥，是从国家起源论方面向“君权神圣说”发起进攻的精彩政论。

龚自珍还进一步对“圣人创世说”提出挑战。他指出：

> 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为无尽。……毛人、羽人、角人、肖翘人也者，人自所造，非圣造，非天地造。(《龚自珍全集》，第12—13页)

龚自珍又警告道：“夫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龚自珍全集》，第27页)圣人君王并非某一姓氏的特产，他们如果失误太多，“圣”位便可能从这一姓手里丧失。在专制君权达于极端的清代，特别是在道光皇帝宣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清宣宗实录》，卷47)的时候，尤其显示了龚自珍超群的理论勇气。

值得指出的是，龚自珍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并未超越传统士

大夫的眼界，他所责难的只是君主专制走向极端造成君臣、君民关系紧张以及士大夫人格与权利失落，而决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君权。因此，就其"诋诽专制"的总体水平而言，并未达到黄宗羲、唐甄曾经达到过的高度，就是与鲍敬言、邓牧相比，亦多有不及之处，但是，在嘉、道年间人人畏谈国事、思想空前沉闷的氛围中，他对恶性发展的君主专制的抨击就显得格外大胆，突出。又由于龚自珍生活在中国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时期，因此，他的议论对近代资产阶级改革家来说更具亲切感。梁启超说：

> （龚自珍）其于专制政体，疾之滋甚，集中屡叹恨焉。（集中如《古史钩沉论》、《乙丙之际著议》、《京师乐籍说》、《尊任》、《尊隐》、《撰四等十仪》、《壬癸之际胎观》等篇，皆颇明民权之义，其余东鳞西爪，（全集往往见）……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第96—97页）

梁氏又说道：

> 自珍性诙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如上评说，指出了龚自珍在近代反对专制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及对思想文化史的深远影响。

第四，揭露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深重的社会危机

龚自珍的社会批判不仅"上关朝廷，下及冠盖"，而且包括对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广泛揭露。在他笔下，根株朽烂的清代社会阶级矛盾尖锐，"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陷，富者安；贫者日愈

倾，富者日益壅”（《龚自珍全集》，第78页）。社会经济也日趋凋蔽，“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遑问年岁？”（《龚自珍全集》，第106页）。在如此情势下，统治者“不论盐钱不筹河”，全然不虑国计民生，而是以“开捐例、加赋、加盐价”等“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的手段大肆搜刮老百姓，致使“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或“取诛戮，或冻馁以死”（《龚自珍全集》，第106页）。其局面已无法收拾。基于这样的认识，龚自珍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辞官南归时，接连写了两首关于清王朝安危的诗：

颓波难挽挽颓心，壮岁曾为九牧箴。
钟虡苍凉行色晚，狂言重起廿年喑。

（《龚自珍全集》，第510页）

卿筹烂熟我筹之，我有忠言质幻师；
观理自难观势易，弹丸累到十枚时。

（《龚自珍全集》，第510页）

这两首诗逼真地道明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是“颓波难挽”，“危如累卵”。

**二、魏源、包世臣的时政批判**

就其批判的深度与广度而言，长于“经济大略”的魏源与包世臣虽比龚自珍略逊一筹，但作为道咸经世派的主将，魏源与包世臣也向腐朽的清王朝掷去锋利的投枪。

和龚自珍一样，魏源、包世臣也愤恨于官僚集团的腐朽。魏源指出，清朝官吏“除富贵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魏源集》上册，第66页）。“人心之寐”与“人才之虚”是当时官场与知识界的严重忧患。他把清王朝比做一个身上虮虱累累而又不愿洗沐的懒汉，而所谓虮虱，即那些贪婪竞

进、庸碌无能的旧官吏。(《魏源集》下册,第666—667页)他又尖锐指斥清王朝的腐朽——即使在病入膏肓,"药石攻补百不授"的危急情况下,还一味歌舞升平,粉饰宴安,"堂上称觞万年寿"(《魏源集》下册,第666—667页)。

"时时与当路论说民间疾苦……然卒之未有能举其事"(包世臣:《安吴四种总目叙》)。的包世臣对官僚系统的腐朽也有切肤之痛。他揭示道:由于各级官吏醉心于渔夺牟侵而对国计民生漠不关心,因此,"上利国下利民"但"不利于蚕蠹渔牟者"的政治经济改革建策是"百言而百不用"。"上病国而下病民"但"大利于蚕蠹渔牟者"的方案则是"说一出而万口传播,终得达于大有力者"。(包世臣《安吴四种总目叙》)在《〈齐民四术〉叙》中,他又厉言谴责各级官吏营私谋利、巧取豪夺的行径:"近者农民之苦剧矣!为其上者,莫不以渔夺牟侵为务,则以不知稼穑之艰难,而各急子孙之计故也"。整个社会因而不可挽回地败落下去,陷入"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汙而民气郁,殆将有变"。(包世臣:《安吴四种》,卷8)的危局

对于充斥尖锐矛盾与危机的社会现实,魏源、包世臣有多方面揭露。早在嘉庆六年(1801),率先呼吁大局"殆将有变"的包世臣便在《说储上篇序》中描绘了一幅民生凋蔽、社会动乱的景象:

> 今者民无殷妻,莫安其生。吏无大小,各忧其贫。军国告需,上勤宵旰,调发不给,捐输不继,雍梁荆豫,跳梁百万,而兵弁望风逃北,郡邑为墟,淮泗偶被水灾,数百为群,露刃望食者千,莫谁敢何。

他进而尖锐指出,面对如此危局,"公卿"、"贵戚""无肯暂易其营私之智,为国久计深远,或乃骈金约紫,坐观叹息,以告无罪"。(包世臣:《中衢一勺》卷7,《说储上篇序》)统治机构的昏聩无能暴露无遗。魏源对于社会的病端与统治危机亦有周密观察。他

指出，清中叶以后，国力贫弱，财政枯竭，“东南之漕运困于输将，中外之仕途困于需滞，沿边之军饷诎于度支”(《魏源集》上册，第163页)。他研究食兵二政，呼吁世人注意道光中期的现实比明亡时的情势要严重得多：“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鹺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士人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史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叙》)。其忧愤意绪溢于言表，他还多有诗作揭露“满耳号饥寒”的民生困苦。在他笔下，有农家甕女的悲苦情状，有“麦秋不及待，人饥已奈何。明知麦花毒，急那择其他。食鸩止渴饥，僵者如乱麻”(《魏源集》下册，第577页)的惨景。他有一首诗，揭示社会贫富，苦乐的悬殊：

> 华堂置酒客，氍毹艳花烛。翠袖围锦屏，春风回室燠。咫尺庭户外，雪深没牛目。征衣照铁铠，冻夫守破室。试问丰狐人，岂知寒貙觫！(《魏源集》下册，第581页)

冰天雪地中，一边是华堂欢饮，翠袖歌舞，另一边却是征衣铁铠，冻夫破屋，强烈的社会批判寓寄于鲜明对比中。

对于人才问题，魏源也特别关注。他激烈批评清王朝的各级官吏“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魏源集》上册第66页)，其养士、取士制度更是弊端百出。在一首随口吟成的小诗中，魏源辛辣地讽刺道：“小楷书，八韵诗，青紫拾芥惊童儿。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魏源集》下册，第675页)依凭小楷八韵诗一类学问便可做官进入仕途，国家政务必然败坏不可收拾，因为，无论是小楷还是八韵诗都与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相去甚远。诚所谓“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魏源集》上册，第37页)中仕官员因此无实际才干，“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魏

源集》上册，第37页）“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魏源集》，第37页）上册。由此闹出“昨日大河决金堤，遣使合工桃浪诗；昨日楼船防海口，推毂先推写檄手”（魏源集》下册，第675页）的大笑话。魏源深刻认识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财用不足”还称不上“贫”，真正的“贫”乃是“人才不竞”（《圣武记序》）。中国虽然“智慧无所不有”（《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但由于“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魏源集》上册，第37页），以致人才奇缺，整个国家孱弱无能，“患于四夷”，“忧于御侮”（《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魏源、龚自珍之所以对才智之士的命运痛心疾首，既与当时社会的实际弊端相关，也与他们科场一再受挫的坎坷身世和愤懑心态有关。他们对“无才之世”的抨击也因此富有强烈的战斗精神。

嘉、道、咸年间，抨击时政的并不局限于龚、包、魏，而是在经世派士人中具有普遍性。

林则徐身为封疆大吏，言行谨慎，对社会现状的指斥比不上龚、魏那么大胆、显直，但是，他的愤激之情却时时有所流露。他一再指出清王朝“积重难返”、“患贫为甚”（林则徐致李星沅函手迹，原件藏故宫博物院。转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修订本），第416页），“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致邵懿辰》，道光二十九年七月，见《林则徐书简》，杨国桢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74页）。“诚有心者所欷歔而不能已耳”（《致邵懿辰》，道光二十九年七月，见《林则徐书简》，杨国桢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74页）。对于社会危机的病根，他也多有尖锐抨击。道光二年（1822），林则徐赠诗陈寿祺，诗中谴责各级官吏“色厉实内荏，骄昼而气昏。岂其鲜才智，适以资攀援。横棱计滋巧，刀笔文滋繁。峻或过申商，滑乃逾衙髡”（林则徐：《答陈恭甫前辈寿祺》，《云左山房诗钞》卷2），逼真地刻画出当时官场

的污浊风气。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致函毕星楼,论时文之弊:

> 言学者,无处而非集益之资,不拘拘于时文试帖也。向见埋头帖括者欲叙半点小事亦不能明晰,无怪老辈以为社稷苍生晦气也(林则徐致毕星楼函手迹,原件藏故官博物院,转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修订本)第484页)

科举制的无用于世及其戕害"社稷苍生"的恶劣文化影响,在这里被揭露得淋漓尽致。

其他经世派人士也多有抨击社会现实的议论。徐继畬曾屡屡上疏,指斥吏治腐败。他考察山西吏治,揭露"山西州县贪墨成风,或遇言官参劾或遇民人告发,则百计消弭化为乌有,此种风气历来已久"(《松龛先生全集》奏疏上,《特参退脏诱结疏》)。州县各级官员"廉隅既毁,罔惜声名,竭其聪明才力,尽萃于纳贿之一途,至于民生之休戚,地方之利弊,无复有过而问焉"(《松龛先生全集》,奏疏上,《请整顿晋省吏治疏》)。他进而举例道:朝廷素称"能员"的山西官员史梦蛟、林树云实际上不过是"长于酬应,善于逢迎"。他们"一年之中在州署者不过三、四月",其余时间均在省中"营求迁擢"。他们所辖州府因此"一岁之中常有七八月无官,不知仓库监狱何人典守,命盗案情何人勘验,户婚争讼何人判理,水旱偏灾何人查办"(《松龛先生全集》,奏疏上,《特参州县入省钻营疏》)。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山西的吏风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在他省固亦不乏。""直省中似此者正复不少"(《松龛先生全集》,奏疏上,《特参州县入省钻营疏》)。山西"刑政之废弛",实际上是全国吏情的写照。依照历代王朝组织原则,吏员的情形自有监察部门予以考察监督,然而,清王朝的监察系统也是一片污浊,由于徐继畬"历任台谏",对监察系统的弊端有切肤之痛。其有关揭露自然来得相当深刻,如在《请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疏》中,徐继畬尖锐揭露道:对于涉及官员的案件,督察官往往

"每遇发交之案，授意承省之员，先思开脱之方，次讲弥缝之术"，千方百计加以回护。其结果是，"查办之事，大半融化消弭，竟未有水落石出、大快舆论者"(《松龛先生全集》，奏疏上，《请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疏》)。黑暗、污浊的官场风习昭示着统治系统的紊乱，行政效率的低下，而这一切正是王朝衰落的标志。张际亮、张维屏也是时政的尖锐批判者，他们的诗作多直面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如张维屏以"穷黎菜色纨袴饱"的诗句揭示贫富两极的尖锐对立。张际亮则忧愤于"吴民多苦难，朽骨连江村"，"室有冻死骨，野有逃荒民"，"骨肉卖为奴，百钱聊救死"，"迩来东南困，十室八九存?"他们笔下残破悲惨的社会生活，有力地粉碎了道光帝"黎民康阜，持盈保泰"(《清宣宗实录》，卷 333)的自我粉饰之词。

关于嘉、道、咸年间的士人议政风尚，《水窗春呓》有一段记载：

> 自来处士横议，不独战国为然。道光十五六年后，都门以诗文提倡者，陈石士(用光)、程春海、姚伯昂(元之)三侍郎，谏垣中则徐廉峰(宝善)、黄树斋(爵滋)、朱伯韩、苏赓堂、陈颂南，翰林则何子贞、吴子序(嘉宾)，中书则梅伯言，宋涤楼(稷辰)，公车中则孔宥涵(继鑅)、潘四农、臧牧庵(纡青)、江龙门(开)、张亨甫(际亮)。一时文章议论，掉映京洛，宰执亦畏其锋。

所谓"处士横议"即在野士人任意议论时政。《孟子·滕文公下》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寥寥数语，道出了战国时期思想自由、议论风起云涌的特定文化氛围。而如此情形竟然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于道光年间，即使权高位重如宰执者"亦畏其锋"，由此可见道咸间"讥切时政"的议政风尚已具一定规模，呈现出一定声势。

## 第三节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

道咸经世派以触目的语句抨击时政、揭露社会黑暗，其目的在于“醒世”，在于改变现实，因此，他们大声疾呼改弦更张，为处于危局中的民族、国家输入新鲜血液。

开一代经世之风的龚自珍是变法、改革的呐喊者。他指出：

>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何莽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乐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奋之，奋之！将败则豫师来姓，又将败则豫师来姓。（《龚自珍全集》，第6页）

道光九年(1829)，龚自珍在《上大学士书》中再次阐述改革之义：

> 自珍少读历代史书及周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龚自珍全集》，第319页）

在如上议论中，龚自珍有力地阐明了改革、更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指出，一祖之“法”没有不出弊病的，任何议论都会过时，“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到了法弊议靡的时候就需要“改图”，但是，历来的改图者都是“踵兴者”。当代“革前代之败”，前代又“革前代之败”。而后来者的“改图”，首先意味着前朝的覆灭。因此，龚自珍向执政者提出警告：“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在把握自身命运上采取主动。

龚自珍的更法思想，在当时是有针对性的。清朝统治集团自中叶以降愈益高唱“法祖”老调，嘉庆帝声称：“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循旧章，恒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清

仁宗实录》卷 56)。在这种特定氛围下，龚自珍呼唤出“一祖之法无不弊”是具有相当勇气的。

魏源对于社会变革的必然性亦有深刻的认识。他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指出“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魏源集》上册，第 48 页)，一切事物自生自息，自变自化，因此，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东西。他具体论证道，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变易不居的实体。在赋税制度上，“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在取士制度上，“乡举里选变而门望，门望变而考试”；在徭役制度上，“丁庸变而差役，差役变而雇役”；在兵役制度上，“丘甲变而府兵，府兵变而弓骑，而营伍”(《魏源集》上册，第 48 页)，而所有这一切变革都是“天下大势所趋”，“即祖宗亦不能不听其自变”(《书古微·甫刑篇发微》)。总结历史，魏源断言道：

> 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魏源集》下册，第 432 页)

> 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圣武记》，卷 7，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96 页)

这确是关于社会进步真谛的透彻见解。作为一位具有慧识的思想家，魏源对于改革的艰难性有深入认识，他指出，改革虽然是历史大趋势所使然，但往往要遭到“中饱不便之人”的反对，应付这种阻力比“豁积弊”要难得多。“任事者遂动色相戒，以改作为多事，以因仍为持重”(《魏源集》上册第 243 页)，因此，改革欲顺利推行，务必克服积习的阻力以及文化心理上的障碍。对于改革的基本原则，魏源也有独到见解。他认为，改革应“根柢于民依而善乘夫时势”(《魏源集》上册第 414 页)，亦即顺应民情，善于掌握有利时机，“乘天时人事至顺而行之”，“乘天时人事交迫而引

之"(《魏源集》第 415 页),这样,改革才能取得成功,在道咸经世派中,魏源关于改革的思想无论就其深刻性而言还是就其全面性而言,都堪称第一流。

道咸经世派不仅为"更法"的合理性、必要性大声疾呼,而且为朝政的改革提出种种具体方案。

龚自珍强烈呼吁分轻君权,加重臣权。他认为,君主只宜"总其大端",对臣下"但责之以治天下之效,不必问其若之何而以为治"。如果事无巨细,一揽于君主之手,对臣下则"约束之,羁縻之",使群臣无所适从,动辄得咎,那么即使圣如孔子、才如管仲、直如史鱼、忠如诸葛,也绝对治理不好国家(《龚自珍全集》,第 35 页)。他挥笔写下《病梅馆记》,把盆景梅称为"病梅",比喻在高度集权束缚下,才能无从发挥的人们,主张对这些"病梅"要"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龚自珍全集》第 186 页)。在《上大学士书》中,龚自珍还就扩大内阁权力,将军机处改为"内阁之分支"等体制改革的具体问题提出了意见。

言路闭塞是旧有体制的一大弊端,龚自珍毫不含糊地申明普通士子具有议论国之大典的权利:

> 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同异之事,有考订同异之事,则或胸以为是,胸以为非,有是非,则必有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上位,有其力,则所是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龚自珍全集》,第 319 页)

这实在是一份士人议政的宣言书。龚自珍虽"居下位",但他敢于"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正是本着这一精神,龚自珍奋笔直书,写下了《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古史钩沉论》、《东南

罢番舶议》、《西域置行省议》等政论，全面评论清王朝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其凌厉笔锋涉及经济、文化、吏治、刑狱、社会风气等各方面，从而显示了战斗的批判精神与"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风格。

对于言路的重要性魏源也有精彩议论，他把通言路比喻成"受光"：

> 受光于一隙见一床，受光于牖见室央，受光于庭户见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君子受言以达聪明亦然。（《魏源集》上册，第67页）

言路愈开通，"君子"愈聪明，"天下无不起之疾苦矣"（《魏源集》上册，第67页）。因此，在魏源心目中，"言昌"就是"世昌"的确切保障。为了广开言路，魏源主张废除有名无实、专取诸科目资格的"谏官"，以人人"皆谏官"、人人"尽其言"来取而代之。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瞽史、百工、庶人、刍荛皆得进言"（《魏源集》上册，第68页），天下"壅情之人皆为达情之人"（《魏源集》，第67页）。而当权者亦方能"广闻天下之言"，进而刷新朝政。龚、魏的上述议论，意在救正清王朝箝制言论的专制政治的弊端，以挽救大厦将倾的危局，因此，他们的"广开言路"之议不能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划等号，只是古代朴素民主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但是，他们要求改革专制制度，主张朝政"受光于天下"，毕竟对清王朝的黑暗政治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后世维新派正是从中汲取营养，为波澜壮阔的政治革新提出有力论证。

人才问题是切关官僚行政效能与整个政治文化振新的大课题，道咸经世派注目于此，再三吁请朝廷重视人才。林则徐说，"欲图整顿，务在得人"（《林则徐集·奏疏》中册，第482页），国家"首以人才为重"（《林则徐书简》第274页）。魏源提出"天下有不可强者三：有其人无其财，一难也；有其财无其人，二难也；有

其财无其材，三难也”(《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一个民族要强盛，财力、材料和人才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朝廷“皇然以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圣武记序》)，那么“何患于四夷，何忧于御侮”？(《圣武记序》)姚莹疾呼“人才为天下之本”，期望当权者“毋以毁誉惑听”(《东溟文集》卷1)，高度重视人才的发现与擢用。龚自珍则呼吁“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些共识映现出一种关于人才的迫切的时代要求。

在人才的收揽上，龚、魏、林等人也提出诸多意见。林则徐认为，用人要“尽其才”。如果用非所用，“其人之志困而不能自伸”，那么“天下之有才者闻之，亦多有所阻”(《林则徐书简》第274页)，魏源指出，广收人才首先要有一种热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魏源集》上册，第57页)。其次要善于慧眼识珠，提拔人才。他比喻说：“星非能自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物非能自浮也，载而浮之者水也；臣非能自遇也，引而进之者也”(《魏源集》上册，第55页)。因此，执政者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龚自珍力主废除用人论资格的陋习：“一限以资格，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生气者也。当今之弊，亦或出于此，此不可不为变通也”(《龚自珍全集》第33—34页)。这些意见对于一个“无才之世”尤其具有积极的意义。

对于嘉、道、咸年间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吏治问题，经世派亦密切关注。他们在尖锐抨击腐败吏治的同时，提出救正吏治之弊的种种方案。针对清朝实行的低俸禄职官制度，龚自珍建议改善士大夫待遇，使他们在无家庭之忧的情势下，“皆忘其身家”，全力报效国家。龚自珍乐观地预言，只要推行他的建策，吏治将一改旧貌，“何事不成？何废不举？”(《龚自珍全集》第30页)。魏源、林则徐则主张以个人的表率来转移吏风。如林则徐认为，“察吏莫先于自察”，“以纠正者纠吏”(《林则徐集·奏

稿》上册，第13页）。魏源提倡“以诚感人”。而他们在各自任内也真真确确地做到了“奉公洁已”。但是，无论是龚自珍提高官吏待遇的建议还是魏源、林则徐以个人模范行为来转移风气的设想，在救治清代吏治弊端上都是苍白乏力的。因为，清代吏治的败坏，导源于整个官僚制度的腐朽以及封建社会晚期地主阶级特有的贪婪性，个人的道德感召力在这里全然不起作用，提高官吏待遇也决不能满足众多官吏己身的物欲，贪墨之风将以不可遏止之势增长，直到旧的统治系统崩解，新的有序形成。值得一提的是，在吏治问题上，林则徐由于身任要职，因而得以从容施展他“肃清吏治”的抱负。他从四个方面对属吏加以考察：一考诸公牍之事理；二验诸接见之语言；三证诸采访之声名；四征诸管辖之成效。总之，“求一实学”（《林则徐·奏稿》中册，第482页）。在“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于心”的前提下，林则徐将“贻误公事之员”、“官声平常”、“听断未能明允”、“气质粗浮”、“心地欠明”、“不谙吏治”、未能“洁己奉公”以及体弱多病的府员知县，或降职或革职。尽管，林则徐的整饬吏治终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并不能有效影响整个吏治大局，但是，与龚、魏的苍白主张相较，无疑来得实在得多，这一情势再次有力地表明，经世之学只有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其积极效应。

必须指出的是，道光前后经世派对时政的批评虽然尖锐、辛辣，呼吁变革的呐喊虽然激越，但是，他们所提出的革新方案，却只能是封建制度内部“因时制宜”的变革。如黄爵滋奏陈的“广贤路”、“整戎政”、“严剿御”（《敬陈六事疏》，《黄爵滋、许乃济奏议合刊》）；包世臣著《说储》“以郡县至为枢要，详说保甲、学政、戍政、课税、农政五事”（《安吴四种总目叙》）；龚自珍提出的按封建宗法组织授田以解决流民问题的方案与以平均的办法调济“贫富不相齐”的设想；魏源劝谏专制帝王改变“高危自处”的状况，

与遮民息息相通(《默觚下·治篇十二》),都是统治阶级的"自救"努力,这些努力不仅未能越出专制制度的轨范,甚至没有突破维护本朝廷"家天下"的范围,连当时思想最激烈的龚自珍也认为,清朝统治者只要"更法","天何必不乐一姓"(《乙丙之际著议第七》,《定庵文集》卷上),由此可见,道咸间经世派的职志是为专制制度和清王朝"补天"、"救世",他们的全部学术活动和政治实践都立足于此。

# 第三十五章　道咸年间的鸦片泛滥与禁烟之议

从晚明开始输入中国的鸦片至19世纪初中期呈现出急剧增长的输入态势。1820—1824年间，鸦片输入为7889箱；1825—1829年间，鸦片输入数达到12576箱；1835—1838年间，鸦片输入较10年前翻了近三番，达到35445箱。

鸦片的泛滥在19世纪的中国造成极为严重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嘉、道、咸年间的政治、经济以及士习民风无不打上鸦片的阴影。鉴于鸦片输入日益深重地威胁清王朝统治的稳定，嘉庆元年(1796)，嘉庆帝决定禁止鸦片入口。然而，鸦片给贩烟者带来的高额利润以及给吸食者带来的空幻快慰，使鸦片贸易决不因一纸禁令而中止，“自此入口之鸦片，率暗中偷售，而其价益增”(夏燮：《中西纪事》卷4)。尽管清政府其后一再重申烟禁，并加强巡缉措施，惩办鸦片贩子，但在染指于鸦片走私贸易的大小官员的包庇纵容下，鸦片走私愈演愈烈，鸦片销售点“散布各城乡市镇，指不胜屈，所在皆有”(御史冯赞勋奏《严禁鸦片烟折》，道光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原载《史料旬刊》)。

面对潮水般涌入中国社会角落的鸦片，道咸经世派忧心如焚。讨论鸦片问题并为禁绝鸦片设计种种方案，成为他们的重大课题。

## 第一节　鸦片的输入与经世派的忧患

经世派士人对于鸦片问题有一种普遍的忧患感，他们对鸦片泛滥的现状及其危害有着比其它阶层人士更清醒的认识。

在嘉道之际，经世派便开始揭露弥漫社会各阶层的吸食鸦片的风气。包世臣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报道说："数十年前，吃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则山陬海澨，男女大小莫不吃烟"。"即以苏州一城计之，吃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包世臣：《庚辰杂著二》)。道光九年(1829)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上奏指出："其始食此(鸦片)，仅系幕友、长随，今则官民士绅，皆所不免；其始仅在海滨近地，今则染十数省之广"(《道光朝外洋通商案》，见《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道光十八年(1838)，黄爵滋奏称：吸食鸦片者"其初不过纨袴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渐染成风"(黄爵滋《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道光十八年闰月初十)。其情势至为严重。关于鸦片走私的猖獗，徐继畬指出，道光年间以贩毒为生的鸦片贩卖集团，规模已经十分庞大，仅"闽越之民，自富商大贾，以及网鱼拾蚌，推埋剽劫之徒，逐其利者不下数十万人"(徐继畬：《禁鸦片议》，《松龛先生集》)。御史冯赞勋《严禁鸦片烟折》详细描述了鸦片走私"肆无忌惮"的具体情形。他说，沿海一带专门包揽运送鸦片的船只名曰"快蟹"。"船之大可容数百石，帆张三桅，两旁尽设铁网，以御炮火，左右快桨，凡五六十，来往如飞，呼为'插翼'。星夜遄行，所过关津，明知其带私，巡丁呼之，则抗不泊岸，追之则去已无及，竟敢施放枪炮，势同对敌。……其

余各省私贩，则必由快蟹包送入口，包送出境。……其由大窑口分销内地，则有奸民串同各衙头役，开设私局，是为小窑口，散布各城乡市镇，指不胜屈，所在皆有（冯赞勋：《严禁鸦片烟折》，道光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原载《史料旬刊》）。正是藉助于从沿海到内地的一整套鸦片走私网，鸦片在中国广泛蔓延开来。

嘉道经世派还尖锐指出，鸦片"蔓延中国"引发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包世臣说：鸦片害人"不异鸩毒"（包世臣：《庚辰杂著二》）。而这种"鸩毒"极大地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周石藩《严禁吸食鸦片烟示》具体指陈道：鸦片使人"精枯骨立，无复人形，即或残喘苟延，亦必俾昼作夜，外则不能谋生，内并不能育子，是其毒并不止于杀身，而且至于绝嗣"（周石藩：《海陵从政录》）。其弊害触目惊心。

林则徐在论列鸦片毒害中国人的灵魂与肉体的同时，还特别指出：烟毒"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林则徐集·奏稿四》（上），第134—137页）。

鸦片"为厉于国计民生"，约略包括如下几方面：

（一）由于鸦片含有毒素，吸食易上瘾，因而吸鸦片者往往深溺其中，不能自拔，以至倾家荡产，造成社会不安定。章沅于道光九年（1829）说："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道光朝外洋通商案》，见《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徐继畬在《禁鸦片论》中也指斥道："夷以鸩毒啗我，载我金钱货贝以去，而我因之以贫，使我耕田服贾之民，挽弓持戟之士，遍饵妖淫之药，而破家废业，宛转尪羸以死"。

（二）鸦片大量输入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对此，包世臣、林则徐、黄爵滋等人论述甚详。包世臣根据苏州吸食鸦片者的消费计算道：

即以苏州一城计之，吃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鸦片之价较银四倍，牵算每人每日至少需银一钱，则苏城每日即费银万余两，每岁即费银三四百万两，统各省名城大镇，每年所费，不下万万。（包世臣：《庚辰杂著二》）

他接踵指出，这些耗银"皆归外夷"。"（英国）三十年来造作鸦片以害中华，每岁取中华银不下四五千万"，"近来银价日高，市银日少，究厥漏卮，实由于此"（包世臣：《庚辰杂著二》）。包世臣还分析了吸食鸦片狂潮所带来的另一严重后果，这就是"各处膏腴皆种烟叶"，占用大面积的"生谷之土"，浪费大量的人工与肥料，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使社会生产力遭到重大破坏。林则徐也以实地考察的现状吁请清最高统治者高度注意鸦片输入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作用，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八月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原片》，奏片中说：

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阛阓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需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三十六两。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四万万人，若一百分之中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两。此可核数而见者。

大量货币流向鸦片，极大地削弱了正常商品交换中的货币流量，商品流通自然阻滞。林则徐所论，十分尖锐地揭示了鸦片输入对国民经济的灾难性影响。黄爵滋也说：

臣查粤海关之税，所入者不过百万，而鸦片烟之银，漏出外洋者不下二三千之万。（黄爵滋：《敬陈六事疏》，道光十五年九月初九日）

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道光十八年），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黄爵滋：《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

鸦片的泛滥，实实在在地把整个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

（三）鸦片泛滥、白银外流直接动摇了清王朝政治统治的稳定性。对于这一点，林则徐揭示得十分明白。他在《银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原片》中指出："夫财者，亿兆养民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借寇资盗，不亟为计"。白银散入民间，尚有"藏富于民"的意义，大量"漏向外洋"，则不仅削弱国力，动摇"亿兆养民之原"，而且"借寇资盗"，增强了敌手的实力。徐继畬的见解与林则徐相似，他说："英国占领印度的鸦片产地孟加拉与孟迈后，岁得税银七百余万，"皆鸦片之利"。"其鸦片售之中国者，常十之七八，是英夷之剥我元气而富强其国者，专在是矣"（徐继畬：《禁鸦片论》，道光二十年，《松龛先生集》）。鸦片贸易造成中国与英国在实力上的悬殊差距，其情势对于清王朝的政治统治无疑是莫大的威胁。林则徐、黄爵滋又指出：

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黄爵滋：《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

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原片》，《林则徐集·奏稿八》）

国库空虚，军队疲弱，清王朝的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

应该指出的是，对于鸦片泛滥的严重危害，清王朝并非毫无觉察。从嘉庆元年"始禁其（鸦片）入口"（《夷艘入寇记》上，见《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至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为了杜绝鸦片泛滥，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禁烟令，宣布"买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不将贩买之人指出者满杖，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俱加一等，兴贩、种卖煎熬者充军，开设烟馆者绞监候，地保邻佑俱满徒"（《厦门志》卷15《风俗记》）。但是，鸦片走私与鸦片吸食不但稍未止息，而且愈演愈烈，对于个中奥秘，嘉道经世派有锐利的分析。包世臣指出："司禁之人，无不早中其毒，又复得受肥规，即再加严法，终成具文"（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魏源说："中朝但断大官刖，阿芙蓉烟可立尽"（《魏源集下册》，第673页）。两人皆指认官吏的包庇纵容是鸦片泛滥的症结所在。林则徐的指陈更为具体。他说："（鸦片）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原片》）。这正是鸦片禁而不止的真实原因。黄爵滋也愤激地指斥道："（鸦片）屡禁不绝者，则皆汉奸为之也。臣闻近来广东抢劫大案，大半以搜查鸦片为由，各关亦以搜查鸦片为名，实则需索客商"（黄爵滋：《敬陈公事疏》，道光十五年九月初九日）。极为紧迫的禁烟要务竟在官吏手中变成"需索客商"的手段，腐败的官僚政治不祥地透露出禁烟运动的悲剧性命运。

## 第二节　严禁与弛禁之争

面对"耗财伤人，日甚一日"的鸦片贸易，嘉道经世派不仅淋漓尽致地揭示其祸害，而且竞相提出形形色色的禁绝方案，总观这些主张与建议的路向，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端：一曰严禁，一曰弛禁。

### 一、严禁派的主张

严禁派的代表人物是黄爵滋与林则徐，前者于道光十八年(1838)奏上著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竖起严禁论的大旗，后者于道光十九年五月销烟虎门，中外鸦片贩子和包庇鸦片走私的大小官吏为之失色。他们的呼吁，典型地代表了严禁派的主张：

> 鸦片……今日蔓延中国，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未有之大患，灾祸烈于洪水猛兽，非雷厉风行，不足以振聋发聩，请仿周官重典之法，治以死罪。(黄爵滋《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
>
> 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
>
>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禁烟派的队伍颇为壮观，属于这一阵营的有张际亮、龚自珍、魏源、陶澍、包世臣、徐继畬等经世派人士。张际亮极有可能参与了黄爵滋《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的起草，在黄疏上奏后他又从北京至汉口会晤林则徐，向林传递黄奏的反响动态，并和林则徐筹议推动禁烟论的有关事宜。林则徐所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等有名折片，张际亮肯定参与其事。(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第192页)龚自珍于林则徐赴广东禁

烟前夕，向林则徐建议用绞刑、砍头等办法严厉打击食鸦片、贩鸦片、制鸦片者。他说：

> 其食者宜缓首诛！贩者、造者，宜刎脰诛！兵丁食宜刎脰诛！此决定义，更无疑义。（《龚自珍全集》，第169页）

在《农宗》篇中，龚自珍还有禁种鸦片之议：

> 诛种艺食妖辣地膏者，枭其头于陇，没其三族为奴。（《龚自珍全集》，第50页）

其严禁鸦片的立场甚为鲜明、坚决。与其它严禁派相应和，包世臣呼吁"漏卮之塞，必在厉禁烟土"。（《安吴四种》，卷35）陶澍有《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子》与《严禁鸦片章程八案》等奏疏。陶澍在奏折中指出：

> 鸦片之害，起自粤洋，留毒内地，中其引者，殃身废务，如醉如迷，久且竭中国之货财，贻害及于国计。苟有人心，孰不切齿痛恨？（《陶文毅公全集》23卷）

正是本着这样一种"切齿仇恨"，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查获了大批烟土上缴，得到清廷嘉奖。魏源、徐继畬亦围绕禁烟这一主旋律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严禁派固然在厉绝鸦片这一问题上意见一致，但在具体措施上却有不同见解。就当时主要分歧而言，大致可分两类：一以"重治吸食为先"，一以断绝鸦片来源为重点。

"必以重治吸食为先"是大多严禁派的意见。道光十六年（1836）内阁学士、礼部侍朗朱嶟、兵部给事中许球在与弛禁派辩论时，提出了"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的禁烟策略思想，以重治吸食者为禁烟重心。道光十八年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疏中，他对其时流行的严查海口、禁止通商、查拿兴贩、开种罂粟之禁等杜塞漏卮的意见一一加以驳斥，进而明确提出重治吸食的主张：

> 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

徐继畬于鸦片战争后重申禁烟务以治吸食者为重的主张。他在《禁鸦片论》中指出，就鸦片泛滥的本末而言，“满船载烟土”而来的“夷舶”是症结所在，“夷舶不载之以来，安知有所谓鸦片者”。其间推波助澜，使鸦片“布之中夏”者则“兴贩之奸民也”。因此，“夷舶之罪，浮于奸民，奸民之罪，浮于吸食”。然而，徐继畬认为，尽管从逻辑上来看，“法宜先杜来源，次绝兴贩，吸食者无所从得，将不禁而自止”，但就事态发展的现实性而言，此种方案实际上难以行通。他进而陈述理由说，首先，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已有百年之久，“岁获金钱数千百万”，因此，他们是绝不会“舍置”鸦片贸易而“专售其羽毛诸货”的。其次，广东惠州、潮州、福建漳州、泉州的居民“自鸦片之利兴，趋之者十人而九，其事逸于农贾，一出而偿其息者数十倍，从吾法则饥而死”。因此，将“绝兴贩”作为禁烟重点便有可能激起从走私鸦片中获取巨大利益者的叛乱，“不掉艇于海洋而为蔡牵、为张保，即啸聚于海岛，揭竿于薮泽，而成为矿徒驿卒之乱”。“杜来源”、“绝兴贩”既然一时难以推行，重治吸食者便成为唯一的选择，“若果有缳首于市者，则惊相告矣。凡人无不畏死，彼非有所驱迫，何为冒死习之？”由于以往的禁烟令因贵族官吏中多吸食鸦片者而流于一纸空文，徐继畬提议，对吸食者的打击“先贵而后贱，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访其素行可诛，而兼有此病者，藉以锄莠，即藉以警众。每岁大县以十余人为率，次者递减，秋谳则概拟情实，概予勾决”。对于“重治吸食”方案的前景，徐继畬充满信心。他认为，对于鸦片贩子来说，一旦吸食者少，兴贩鸦片无利可获，“彼亦将图改业而稍稍解散矣”。英国侵略者虽“强甚”，“然鸦片

之来，彼亦讳之。吸食少，兴贩绝，彼数万里载之而来，将安用之，虽含怒蓄怨，终不能藉为兵端”。而国内的吸食者在“持之不少懈”的打击下，“能改者改，不改者或罹法，或物故，鸦片亦绝矣”。针对当时有人把鸦片战争的发生“归咎于鸦片之禁，又或疑吸食拟绞为重欲从轻典”，徐继畬鲜明指出，此种论调全然是“因噎而废食也”。他指出：

> 倘将来吸食之犯，概拟缓决，则堤防溃决，不可御止。英夷知我法令之不行，而愈有以轻我，诚不知其患之所终也已。

值得指出的是，徐继畬与黄爵滋虽然都为主重治吸食者，但两者的意旨也有所不同。黄爵滋主张重治吸食，其着眼处在挽救漏银。徐继畬重申重治吸食方案则是于鸦片战争失败后，其意在于减少对英国侵略者与潜伏叛乱危机的鸦片走私犯的直接刺激，“弭大患于无形，而复凋敝之元气”。其主张固然包括一定消极因素，但也不乏现实合理性。

以黄爵滋为代表的“重治吸食”的禁烟方案在当时受到琦善等等贵族官僚的竭力反对。他们的理由是：(1)吸食者众，诛之不可胜诛，重治吸食，等于“兴率土普天之大狱”(琦善《遵旨复奏禁烟折》)。(2)圣朝宽大，不事竣法严刑。重治吸食，“未免矫枉过甚”、“操之太蹙”(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3，第 59、65 页)。(3)重治吸食是“治流而不澄源”、“不揣本而仅齐其末”(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2，第 43 页；卷 4，第 94 页)。只有“不准通商”，才是“正本清源之道”。(琦善：《溃痈流毒》，《鸦片战争》第一册，第 496 页)。琦善之所以坚决反对先重治鸦片吸食者，其真实奥秘在于保护鸦片受贿者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提出的重治兴贩、不准通商等建议，实际上只是欺骗舆论的幌子，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和黄爵滋等经世派“先重治吸食”的意见不同，林则徐更倾向于“拔本塞源”，断绝鸦片来源。

林则徐最初也赞同黄爵滋的主张，认为禁烟“必以重治吸食为主”。他认为，重治吸食不仅可以挽救漏银危机，断绝鸦片贩运者牟利之企望，而且有利于扫清禁烟运动中的障碍，因为，在鸦片吸食者中，“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打击吸食者，对鸦片贩子无异于致命一击。在江苏巡抚任上、湖广总督任上，林则徐厉行禁烟，又采访戒烟良方十余种，向民间推广，使不少人戒烟断瘾，其成效颇为可观。

但是，在湖广禁烟的过程中，林则徐发现“凡各省之贩鸦片者，不曰买自广东，则曰广东人夹带而来也。吸鸦片者，不曰传自广东，则曰广东人引诱所致也”。（林则徐《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林则徐集·公牍》，第52页）此种情势使他深感断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当林则徐奉召入京，与道光帝商议禁烟大计时，其思想已从重治吸食转向“拔本塞源”。而“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英吉利也”。（林则徐：《致叶小庚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广州，见《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卷8）赴广东任后，林则徐禁绝烟毒的思想有进一步发展。他在《察看义律及英国烟贩反复情形遵旨不准交易折》中明确提出“首贵杜其来源”的主张，随之而来林则徐将“必先重治吸食”的禁烟方针更正为“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林则徐集·公牍》第65页）驱逐外国鸦片趸船，“节次拿获鸦片烟犯”、大规模销毁鸦片，皆为林则徐所奉行的“清源之计”。

在禁烟“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这一思路上，包世臣与龚自

珍皆持相同意见。如龚自珍在林则徐奉旨前往广州之际，曾致书林则徐，力主以极刑处治吸食、贩卖、制造鸦片者。他进而指出，由于鸦片泛滥，食鸦片、贩鸦片、制鸦片者"诛之不可胜诛"，因此，"不可(不)绝其源。绝其源，则夷人不逞，奸民不逞"。然而，龚自珍、包世臣在断绝鸦片来源的思想上有更激进的主张，这就是禁绝贸易，关闭国门。如包世臣说：

> 绝夷舶，即自拔本塞源。一切洋货，皆非内地所必须，不过裁撤海关，少收税银二百余万两而已。国课虽岁减二百万，而民财则岁增万万，藏富于民之政，莫大于是。(包世臣：《安吴四种》，卷 27)

龚自珍也说，不但鸦片要杜绝，而且"宜并杜绝呢、羽之至"，以及钟表、玻璃、燕窝之类"不急之物"。并勒令"夷人"迁到澳门，只留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栖止"。"将关税定额陆续请减，……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入"。包、龚二人的主张无疑具有浓重的自然经济的痕迹。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大背景下，他们所期望的通过"绝夷舶"、"撤海关"来排除外国侵略威胁的想法，无疑是眼光浅陋的一厢情愿。

和包世臣、龚自珍断绝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想法相比较，林则徐显然要高明得多。他一方面坚决禁绝鸦片贸易，并遵旨中止与英国的贸易。另一方面对对外贸易采取积极态度。他在《察看义律及英国烟贩反复情形遵旨不准交易折》中说："以鸦片出自英国，此后该国买卖可减，别国买卖可增"(《林则徐集·奏稿九》(中)，第 172 页)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二十六日，林则徐议复曾望颜"封关禁海"之议，不仅批驳了曾望颜的闭关自守主张，而且指出："鸦片断与不断，转不在乎关之封与不封。……专断一国贸易与概断各国贸易，揆理度势，迥不相同"(《林则徐集·奏稿十》(中)第 793 页)。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林则徐的眼光

已大不同于顽顸守旧的封建官僚士大夫，而这一点乃是和他睁眼看世界的伟大实践密切关联。

林则徐“首贵杜其来源”、“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的禁烟思想意味着对外国鸦片侵略的坚决抗御，其间闪烁着伟大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救的坚定信心，但是，在禁烟大局的把握与具体策略的施行上，林则徐也有诸多失误，对此，魏源于鸦片战争后有重要总结。

魏源是林则徐禁烟斗争的坚决支持者。他曾著《英吉利小记》揭露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蓄谋和罪行，有力地批驳了投降派所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的谬论。在著名的《寰海》组诗中，魏源更怒斥投降派对林则徐的诬陷、迫害，他说：

谁奏中宵秘密章，不成荣虢不汪黄。
已闻狐鼠凭城社，安望鲸鲵澥渤攘。

功罪三朝云变幻，战和两汉镬冰汤。
安邦只是诸刘事，绛灌何能赞边防。

（《魏源集》下册，第 805 页）

但是，作为一位眼光远大的思想家，魏源对林则徐广州禁烟的得失有更深入的思考。他认为，林则徐禁烟“惟外夷操切是求”（《魏源集》下册，第 886 页），失之“过急”、“过详”（《魏源集》下册，第 886 页；上册，第 185 页）。例如，林则徐一再坚持外商具结，便是以“化内之法”来绳“化外人”。其实际意义也并不可靠，因为，即或外商如式具结，而中国内部“水师之通贿不惩，商胥之浮索不革，战舰之武备不竞”，鸦片来源的断绝仍不可能依靠一纸具结

书而长久维持。① 再例如，禁烟固然正当，但若辅之以安抚策略，使外商“失诸彼者偿诸此”，“夷必乐从”，而不会过激生变。其具体办法是：与英国订约，如果能刈除鸦片产地，改种五谷，则允许其多运“洋米”入口，“并援例酌免其货税”；如果能保证鸦片不运来华，则尽裁海关“一切浮费”。遗憾的是，林则徐在禁烟中“过急”，未给双边谈判留下更多的机会。依据禁烟斗争和鸦片斗争的经验教训，魏源提出与徐继畬相似的主张，这就是对鸦片之“患”“治内详、安外略”。所谓“治内详”即重点打击国内的吸食者与贩运者，其具体措施是：对吸食者先行“刺面之法”，后再申“大辟之法”。对贩烟者则立诛。允许对贩烟和吸烟告发，告不实者反坐。魏源认为，只要认真切实贯彻如上措施：“水师禁饬，而外洋无庇贩之人；绣衣四出，黥面令行，而内地无尝试之犯。如是而烟不绝者，无是理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第549页）。所谓“安外略”即“暂宽市舶之操切”，避免对“外夷”“操切是求”，柔软的外交策略将避免与西方势力的不必要的冲突，争取时间，使中国得以获得相对稳定的环境，集中精力“整水师之武备，尽除海关之侵索”，学习西方之长技，“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魏源认为，假如中国真正从内部强大起来，“虽有狡敌其敢逞？虽有鸦片其敢至？”（《魏源集》上册，第186页）。在严禁派的禁烟议中，魏源的议论无疑眼界较高，富于历史性指导意义。

## 二、弛禁派的主张

与严禁派的主张相对立，道光年间关于鸦片问题还有另一种意见，这就是弛禁。

---

① 在具结问题上，梁廷枏、徐继畬等人亦有与魏源相似的看法。如梁廷枏在致邓廷桢函中认为“就使彼能具结，亦不过一虚应故事耳”（《夷氛闻记》卷1）。徐继畬在《禁鸦片论》中也说：“就使申以信约，亦不过藉以给我”。而林则徐在具结问题上，确有过分轻信“夷人最重然诺”的失误。

弛禁鸦片的思想最早酝酿于广州"留心士务"的一批士大夫中。广州由于地处沿海，士人思想开阔，经世致用风气兴起较早。道光初年，以吴兰修（石华）为首的一批淡薄科举功名、弃括帖之学、讲求经世致用的士人组成了最初学术团体——希古堂。希古堂的宗旨是："吾辈讲习，以经史为主，子史辅之，熟于先王典章、古今得失、天下利病，而后发为文。"嘉庆二十二年（1817），阮元总督两广，此位强调"实行"、"实事"的经学大师与广东士林领袖张维屏商议，在广州粤秀山建立了清代广东第一所废除时文制艺课程的官办学府——学海堂。学海堂提倡实学，教学内容以经史为主，学府中的学长多为原希古堂的成员或主张经世致用的名士。希古堂的发起者、魏源的好友吴兰修①便是学海堂的第一批学长之一。在弛禁派中，吴兰修是至关紧要的人物。熊景星、仪克中等学长则是吴兰修的呼应者。

弛禁鸦片的建议最初提出者是从浙江乍浦同知任上罢归的广东顺德籍官员何太青。他的观点是：

> 纹银易烟，出者不可胜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价廉，销路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夷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如无敢举以入告何！（梁廷枏：《夷氛闻记》卷1）

何太青的上述想法是在与许乃济讨论鸦片问题时提出来的。许乃济是浙江仁和人，嘉庆十四年进士。先后任给事中，广东按察使，太常寺少卿等职，他于国计民生事务素来关切，并致力于经世之学研究。纵观许乃济仅存的13篇奏折，除关于鸦片问题和要求续缮四库书籍二折外，其余11篇直涉招纳贤才、整顿吏治、

① 李柏荣著《魏源师友记·吴兰修》说："默深游广州，其契友有张维屏、陈澧等，……兰修亦岭南声气相应之一人也。吴氏集中有赠默深诗数首。"

漕运水利、保护工商业、改革旧制等方面内容，而这些问题都属传统经世之学的范畴。许乃济任广东按察使后，对“纹银易烟，出者不可计数”的严重情形焦虑万分，“时怀隐忧而未得清源之法”。正当此时，他的同年赞友何太青提出了弛禁论，许乃济深为所动，遂请教于“留心世务”的吴兰修。吴兰修大为赞同何太青的构想，著《弭害篇》进一步阐发弛禁论。在吴兰修看来，弭鸦片之害有上中下三策：“上焉者拔本塞源，次则严法厉禁，下则避重就轻”。所谓“拔本塞源”即闭关绝市，实际上办不到。采用“严法厉禁”，其后果将是“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其包庇如故，护送如故，贩与食者卒如故也”。因此，“为今之计，亦惟权害之轻重而已。自一人言之，则鸦片重而银轻，合天下言之，则鸦片轻而银重”，而所谓弛禁就是避重就轻的良策，其要义便是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商将鸦片“交付洋行，兑换茶叶”，“内地种者无论”，以此挽救白银外流所导致的财政危机（吴兰修：《桐华阁文钞》）。

吴兰修的《弭害篇》很快送到时任两广总督的卢坤及广东巡抚祁㙫手中。卢、祁两人“见而心折”。吴兰修更约请学海堂书院学长熊景星、仪克中等分别著论，以相呼应。于是，道光十四年（1834）十一月三日，卢坤以“粤士私议”的名义将吴兰修的《弭害篇》附片奏陈，然而，因当时“以例方严”，卢坤“仅约略其词，终不敢明请弛禁”（梁廷枏：《夷氛闻记》卷 10）。

尽管卢坤上奏的“粤士私议”未能激起反响，但弛禁论作为关于鸦片问题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思考并非因此消弭，而是寻找机会执著表现自己。道光十六年六月十日，由广东按察使调任太常寺卿的许乃济将吴兰修的《弭害篇》稍加润饰，以《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上奏，公开竖起弛禁旗号，奏折中建议：

（1）鸦片贸易合法化。“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

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

(2)提高鸦片税收。标准是“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

(3)准允民间自种罂粟。“各省旧种罂粟处，如果于早晚两季均无防碍，亦准听民之便”。

(4)严禁官员、士子、兵丁等吸食，否则立予斥革，“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许乃济自信地表示，依此方法办理，不仅“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并从关税中得到高额财政收入。而且因“内地之种日多”，造成外洋无奇货可居，致使“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疏合刊》，第218—219页)。

许乃济的奏折，在朝臣中得到曾任两广总督的阮元的强有力支持。同年九月初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埙，粤海关监督文祥上奏支持许乃济的弛禁主张，认为许乃济“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如蒙谕允，弛禁通行，实行国计民生，均有裨益”(《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第7—11页)。奏疏中又具列弛禁章程九条：

一、以货易货，应计全数计算，不准影射也。

二、水师巡船及各关口员役，宜责令专在隘口稽查，不准出洋藉词滋扰也。

三、洋银应照旧章仍准带回三成，并先确查来银数目，以杜欺隐也。

四、鸦片应与别项洋货一例交易，不必设局专办也。

五、额税宜遵旧制，不必加增，并严禁需索例规也。

六、价值不必预定也。

七、内地各省海船运销鸦片应由粤海关印给执照也。

八、民间栽种罂粟，似可稍宽厉禁也。

九、官员士子兵丁，宜严行饬禁，不准吸食也。

据梁廷枏《夷氛闻记》记载，为邓廷桢等人起草这篇奏稿的，是曾任学海堂书院学长，时任祁埙幕僚的仪克中，因此，如上九条弛禁章程可谓广东士子弛禁观点的集大成与条理化。

弛禁论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严禁派官僚的强烈反对，在道光帝的支持下，严禁论终占上风。道光十六年十二月，邓廷桢等上奏，声明放弃弛禁主张。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许乃济被"降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以示惩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8，第125页）。同年十一月，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弛禁论遭到彻底否决与沉重打击。

评价弛禁派的主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由于弛禁派主张使鸦片的入口、运销、种植完全合法化，因此自然获得英国鸦片商与贩食鸦片者的热烈响应。据清廷留中密奏中的一佚名附片报道，邓廷桢、祁埙的奏折尚未到达北京，广东已是"纷纷传布，贩食之徒无不欢欣鼓舞，明目张胆"（《史料旬刊》第38期，第401页）。此种情形对弛禁派无疑大为不利。而严禁派在论辩时把弛禁论与实属社会性的吸毒问题纠缠在一起，更使弛禁派处于不利的地位。

其实，从经济学角度观看，弛禁主张颇富精彩思想。吴兰修、许乃济们建议的根本精神，诚如谢刚在《清史嘉道朝研究论纲》中所指出的，"就是要求把鸦片如实地当作一种商品来对待，然后按照商品经济的价值法则，严格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运用关税壁垒和对等贸易等手段，把英国鸦片挤出国内市场"。谢刚认为，"许乃济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对策，是迄今看到的可以不通过战争、挫败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罪恶企图的最早一个理性解决方案"（《南开学报》1991年第4期）。这确是只眼独识的见解。实际上，

早在1858年，马克思就对许乃济及其弛禁方案作出了与中国当今史学界迥然不同的评价。在《鸦片贸易史》中，马克思不仅称许乃济为“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而且不无遗憾地指出：

> 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使国库得到385万美元的收入，而在1837年，会使收入增加一倍。可是，天朝的野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必定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税收。
>
> 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栽种罂粟，这意味着英印国库会遭到严重的损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8—29页)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克思又在《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中重申道：

> 既然英国现在已在法律上认可鸦片贸易，那么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无论从政治上和财政上着想，都将试行一种方法，即准许在中国栽种罂粟并对外国鸦片征收进口税……这种改变一经实行，印度的鸦片垄断以及印度的国库一定会受到致命的打击，而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

值得注意的另一事实是，在弛禁派与严禁派论战的过程中，代表鸦片受贿集团利益的朝臣和疆吏均保持缄默。他们固然决不赞同严禁鸦片，但弛禁主张若得实行，鸦片买卖合法化、商品化，他们从鸦片走私中所获贿赂必然大大减少，因此，弛禁论也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当然，弛禁鸦片贸易必然付出代价，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民堕落的程度”加剧，这无疑是严禁派以及后来的史学家在情感上不能接受的后果。问题在于严禁派以强硬手段禁烟，也并不能避免这一后果的巨大阴影，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完全不具备完成有效禁烟并成功抵御外国侵略的历史任

务的基本前提，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失败后，严禁派中的若干理智人士开始重新估价弛禁派的观点。道光二十六年或更早，宣南诗社成员、曾经极力支持过林则徐事业的梁章钜感叹万分地说：

> 近日英夷就抚而鸦片之禁渐弛，漏卮之弊愈不可稽。……愚谓为今之计，则不如仍用前许青士太常所奏，甚可行也。（《浪迹丛谈·鸦片》）

严禁派的领袖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七年也表示：

> 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食？（《林则徐书扎·复署江西抚州府文海信》）

历史总归是不可逆转的，苛求前人更是非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但是，当人们发现在19世纪初期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并非只有一个唯一的选择，终不免扼腕而叹。

不论严禁派与弛禁派在鸦片问题上有多么严重的分歧，也不论严禁与弛禁方案的理论和具体施行中存在着多少失误，严禁论与弛禁论的提出，归根结底是企图解决鸦片泛滥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是道咸经世派从“留心世务”的同一宗旨出发，在处置鸦片问题上引申出的两个大相径庭的策略走向。

# 第三十六章　道咸年间的“实政之学”

道咸经世派的“补天”劳绩，不仅表现在他们议政、呼吁革新，而且突出表现在他们一扫士大夫耗毕生精力于诗赋八股的脱离社会实际的积习，公然宣称：“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也。”（包世臣：《赵平湖政书五篇叙》，《艺舟双楫》卷10）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钱、谷、兵、刑诸实政成为他们研究的对象；而一些务实的当权者，特别是出任封疆大吏的经世官僚，因“洞见症瘕，亟起救药”（黄彭年：《陶楼文钞》，《林文忠公政书序》，癸亥刊本），多采纳经世学者的“河、漕、盐法之论而行之”（范麟：《读安吴四种书后》），这样，关于实政之学的研讨，便构成道光前后经世实学的一个重要侧面。

## 第一节　漕运积弊与改革

“车运曰转，水运曰漕。”（《〈史记·平准书〉司马贞索隐》）自汉代始，中国历代皇朝将田赋征收所得粮食，从水路运往京师和其它地点，以供官俸、兵饷、宫廷消费与皇朝其它开销，是为漕运。隋代开凿运河，漕运畅通，洛阳积粟至2600万石。唐开元、天宝间，每年漕运粮食200—300万石。宋都开封，东南和西北的

粮粟分由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输送，以汴河为最多。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仰给于江南漕粮，因运河壅塞不畅，遂行海运，每年海运漕粮100—200万石。明初建都南京，对漕粮依赖不大，明成祖移都北京，漕运变成京师命脉。成化八年(1472)定制，每岁漕粮400万石，外加耗米100万石，合计为500万余石。这个定额基本上沿袭到清代。

漕务实际上是政府自营的一个庞大的运输系统，为了保证这一系统运转正常，清政府专门设置了漕运总督。总督之下，各省又分设粮道。粮道在运河两岸设立卫所，保护漕粮运输。有漕粮的省分设漕运屯田，以赡养屯丁运兵，漕粮的大部分运到京城仓库，叫正兑米，专供京师驻军食用；少部分运到通州，供皇室百官俸食。如此庞大的系统，每年要耗费大量费用，再加漕运以运河为基础，河溃则运阻，政府为确保运河畅通，又必须有巨额付出。而由收兑、起解、押运到验收的无数浮收、勒索、舞弊，更使漕运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清史稿·食货志》说，清朝漕运的情形是"河运剥浅有费，过闸过滩有费，催攒通仓又有费。上既出百余万漕项，下复出百余万帮费，民生日蹙，国计愈贫"。改革漕弊，既稳定京师地区的漕粮供应，又避开治河、治运庞大而无效益的资金投入，遂成为道光前后经世派人士反复考虑的实政问题之一。

### 一、包世臣、魏源的改革漕弊论

道咸经世派中，包世臣是一位研究漕运颇有心得者。包世臣突出的经济观点是以"言利"自居，漕务改革为言利之大者，故包世臣亟亟讲求于此，并有建设性方案设计。

包世臣青年时代即游历大江南北，其后长期游幕两江，对于漕务积弊感受颇深。他揭露漕运弊害说：

南粮三、四百万石，连樯五千余艘，截黄达卫，以行一线

运河之间，层层倒闸，节节挽绰，合计修堤防，设官吏，造船只，廉丁舵，每漕一石抵都，常二三倍于东南之市价。(《安吴四种》卷 3)

这些费用，无不直接或间接强加于人民身上，而地方官吏在征漕时又浮收勒折，致使农民完漕一石，必须粜米二三石。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愤慨地指出，漕务之弊"皆由奸人之中饱"，这确是切中时病之论。包世臣进而预言，漕务现状若不加改革，那么，必将酿成"东南大患"。为此，他提出了改革漕运的两大方策。

方策之一为海运南漕。所谓海运南漕即将运输漕粮的路线由内河转向沿海，这样，不但没有什么风险，而且较河运更为迅速和安全。然而，包世臣所提出的海运南漕主张并不仅仅是对漕运的技术性改进，而且包含着更深刻的内容。这就是引进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在《海运南漕议》中，包世臣有如下一番意味深长的议论：

国家除南粮之外，百货皆由采办，采办者，官与民为市也。间岁并有采买米粮，以民船运通之事，而山东、江南拨船，皆由雇备，是雇船未尝非政体也。取其便适灭他患，何必官艘哉？

在这里，包世臣反复论证的是雇民船的合理性，并对固守政府自营传统的旧式漕务格局提出批评。从这一新思路出发，包世臣提出，当时麇集在上海一带的浅海沙船达数千艘，这些船只每年由东北载运豆麦南下，回运往往不能满载，甚至有放空的现象，而漕粮海运的关键，便是官方把漕粮运输业务委托给这些经营沙船运输的船运资本家。尽管，在提出海运南漕主张上包世臣并非第一人，但是，建议在漕运中推行招商承办，包世臣则是先行者，而这一主张无疑透露出若干新鲜气息。

包世臣提出的改革漕弊的方策之二，乃是从根本上扭转南

粮北运的被动局面。他建议"先减(南漕)运什之一,以其米价及运费"在京畿地区寻觅一片靠近水源的地方设置官屯,从东南各省召募一批有水稻生产经验的佃农从事垦殖,"开沟渠,治畔岸,先以方十里之地,画畔而耕,既效而徐扩之,要以十年至方百里而止"。收获的谷物除付给佃农一半外,官府每年可得五百万石,较北运的漕粮绰然有余,如是则"漕可罢,赋可宽","举事而不惊众,益上而不剥下,百世之勋可集,而东南之困可苏也"(《安吴四种》卷3)。这一着意于改造传统农业布局的思路不无可取之处。

无独有偶,在漕务改革的思路上,魏源与包世臣有不谋而合之处。

魏源也主张南漕海运。他指出,河运积弊甚重:"过浅过闸有费,督运催攒有费,淮安通坝验米有费,丁不得不转索于官,官不得不取赢于民"(《魏源集》上册,第405页),而海运适可以救"漕运之穷",发挥"治漕"功用,其间优劣"有霄壤之殊"。针对当时有人对海运信心不足或将海运视为权宜之计,魏源强调指出,河运改海运是漕运改革的根本性方案,"舍是而徒斤斤补救,议八折,议邮丁,禁包户,禁浮收,皆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即不然,名议海运,仅斤斤于河道之通塞,而不计东南民力之穷困,吏治之澄浊,亦见其轼不见其睫也"(《魏源集》上册,第406页)。

同包世臣主张将商品经济因素引入漕务改革的思路相近,魏源也认为,漕务改革不仅仅是运输路线的更迁,还必须深入到其运行机制中,在"官先竭"亦即官办营运制度运转失灵的情势下,引入私商成为必然趋势,诚所谓"非商不为功也"(《魏源集》上册,第411页)。他概括漕政改革的两大基本精神,这就是——

海代河,商代官。(《魏源集》上册,第411页)

非如此漕务无法摆脱穷途末路的困境。

和包世臣比较,魏源的重商意识更加自觉。在他的筹划中,

将海商引入漕运事务不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是推进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他屡屡强调：

海运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魏源集》上册，第498页）

（海运）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魏源集》上册，第416页）

魏源还具体估算道，当时南漕年运四百余万石，沙船只要运输一半，就可"每年藏富于民数百万金"（《魏源集》上册，第427页）。

真心诚意地把商民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是魏源经济思想的重大特色，他的这一思想趋向在实政之学其它领域的研究中也一再表现出来。

**二、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的漕务改革**

包世臣、魏源关于漕务改革纵然有种种高见，但他们的建策只有付诸实施，方能完全实现其经世价值。因此，漕务改革的真正实行，还有待于行政力量的干预，而这样一种格局，在道光初年的江苏终于出现。

清代漕粮征区包括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粮产丰富，水运至京师较方便的八省。其中江苏漕粮额又占大半，仅苏、松、常、镇四府和太仓一州，就比浙江一省的漕粮多至一倍，较江西多三倍，比湖广更在十倍以上。因此，江苏漕务繁重，为全国各省之冠。嘉庆、道光年间，江苏漕务发生严重困难，林则徐接任江苏巡抚之初，便在报告接任的奏疏中论及漕务之弊：

（江苏）漕务已成痼疾，辗转生奸，……不独州县之浮勒，旗丁之刁难，胥吏之侵渔，莠民之挟制，均为法所不宥。即凡漕船经由处所，与一切干涉漕政衙门，在在皆有把持，几乎无一可恕。（《林则徐集·奏稿四》（上），第43—44页）

在友人的信中，林则徐又屡屡提到“近来江浙漕运已成不治之症”（林则徐：《复陈恭甫书》，道光十三年正月于苏州），“（江苏漕政）积重难返之情形，实非语言所可殚述”（林则徐：《致郑仁圃书》，道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于苏州）。焦急万分的语言，充分显示出江苏漕务深陷于极大危机中，若不毅然施以大手术，将对“天庾正供”造成致命的威胁。

道光初年的江苏，不仅存在着漕务改革的紧迫性，而且在当地的行政官员中拥有一支锐意改革漕务的中坚力量，其领袖人物便是当时先后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的陶澍，先后任江苏按察使、江苏布政使以及江苏巡抚的林则徐，一度任江苏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对漕务改革深有研究的魏源则先在贺长龄幕下，贺长龄调山东布政使后，又转入陶澍幕下，从而成为漕务改革的重要智囊人物。

林则徐自接任江苏巡抚，便被漕弊搞得焦头烂额，“精力日以消沮，心绪日以恶劳”（林则徐：《致陈恭甫书》，道光十三年正月于苏州）。因此，他对于漕务改革竭尽心力，“自甲午冬至乙未春，无日不究心于此”（王鎏：《钱币刍言续刻》毛应观序）。结合长期理漕经验与丰富的经世学识，林则徐提出了四项救治漕弊的方案，这就是：“正本清源”、“补偏救弊”、“补救外之补救”以及“本源中之本源”。在此四种方案中，“补偏救弊”和“补救外之补救”是“先计一时”，而“正本清源”和“本源中之本源”则是“勉图经久”的重大改革。所谓“正本清源”指改革现行的漕政制度，实行“县督帮办”，使漕运“自南至北皆无例外苛求”，以“杜州县之浮收，绝旗丁之勒索”。所谓“本源之本源”即取消漕政，治水造田于畿辅一带，以此方法来解决南粮北运的老大难问题（《林则徐集·奏稿九》（中），第715—724页）。由于“正本清源”与“本源中之本源”两项方案牵动全局，“一时难以骤改”。林则徐所能做到

的只能是"先计一时"的"补偏救弊"、"补救外之补救"而已。

在剔除弊端、整顿漕务上，林则徐得到两江总督陶澍的全力支持。他和陶澍反复商议，立定章程，限制州县浮收和旗兵勒索，规定闸坝人夫用费，派遣精干官员验漕督运，修浚河道，保障漕运畅通。虽然，林、陶为整顿漕务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于漕务大局无补，但江苏漕运积弊毕竟因此有所减轻。

为疏解漕务危机，陶澍、林则徐对漕粮海运、商运的方略大力支持。道光四年(1824)十一月初五、六日，江南高家堰决口，溢水四流，淮河水位因之下降，清廷为之震动。经过反复辩论，道光帝决心试行海运，责令陶澍具体筹办。陶澍受命后，在林则徐、魏源、贺长龄等的协助下，决定苏、淞、常、镇、泰五府漕粮归海运。在筹办海运过程中，林则徐因操劳堤工事务，"积劳疮作"，因此，尽管"大府交章荐公为(试行海运)总理"，林则徐终"困于疾，未赴"(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24)。海运一事遂由陶澍亲自督办。陶澍与贺长龄"亲赴海上，筹商船，访道路，定价值"(陈銮：《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续碑传集》卷23)，并在上海设海运总局。道光六年正月，漕船"衔尾鱼贯"，由吴淞口出崇明十滧入洋，"旬月直抵天津"，"不损一人一舟"，"每百石费仅数十金，视河运省费固倍，视前抚臣章煦所奏海运每百石价三百两之数且省数倍"。为试行海运的成功所鼓舞，陶澍于次年先后"陈章程六条、八条"，"拟改苏、淞、太仓三属永归海运，以大苏官民之困"。但因朝臣中诸多阻碍，"事格未竟"(魏源：《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续碑传集》卷23)。至光绪年间轮船始用，漕粮才全改海运。

被誉为"东南拯弊第一策"(魏源：《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续碑传集》，卷23)的漕粮海运，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形势颇为严峻的漕运危机，

在大大节省国家财政支出的同时，确保了南漕畅通无阻运往京师。由于海运大量减少了原河运中官吏盘剥的层层环节，人民负担也有所减轻。另一方面，漕粮商运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了自然经济总体结构内生产关系的变革，并推动了沿海沙船业的发展。据《上海县志》载："去秋(道光六年，1826)增造(沙船)三百余艘，以备今岁海运之用。"金銮撰《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也说：漕粮商运使海商"运漕而北，载豆而南，两次得价，且由部发帑收买海船耗米十余万石"。因此，他们"皆踊跃过望"，对漕粮商运持积极欢迎态度，并将此举视为发展自身事业的契机。如果清王朝按照陶澍与魏源的设想，将漕粮海运永为定制，其改造传统国民经济结构的作用将会更大。

## 第二节　盐业衰敝与盐政改革

中国盐业自汉以后一直实行官营，盐利成为国家极为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汉代"盐铁之利"，"所给甚众，有益于国"(《盐铁论·非鞅》)。唐代大历末年(约779)，"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新唐书·食货》)。宋代盐利"最资国用"(《文献通考》卷16)。迄于明清，盐利仍然是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对国家财计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清道光年间的盐课收入就占国民经济收入总值的14.3%。

清代盐政，积弊甚深。乾隆朝以后，盐务更急剧败坏，官引滞销、课额积欠、盐商疲惫、私盐猖獗，皆呈现严重情势，"自嘉庆末年，口岸滞销，商情困敝，大局难支，驯至道光十年，纲坏已一蹶不可复振"(陶澍：《兼理盐政八载情形折子》，《陶文毅公全集》卷18)。改革已是刻不容缓、事在必行，围绕盐政改革这一课

题进行相关研究并提出改革方案，自然成为道、咸间经世派人士讲求实政之学的重要内容。史料记载，这一时期出现了多种盐政研究之作，如乔林纂《票盐志略》14卷，王凤生编制《淮南北场河运盐走私道路之图》，童濂著《淮北票盐志略》15卷，周星棨《壮学斋文集》一部论史，一部论盐，一部论文，"颇有纵横排宕，利弊洞悉之作"（李柏荣《魏源师友记》第95页）。而包世臣、魏源的盐法论以及林则徐、陶澍分别在湖广、江苏推行的盐政改革则尤为引人注目。

## 一、包世臣、魏源的盐法论

在嘉、道年间的经世派人士中，包世臣与魏源素以讲求盐法著称。李柏荣说："默深好谈盐法，发为弘谟"（《魏源师友记》第101页），其情形对包世臣完全适用。

作为思想敏锐的经世学者，包、魏二人对乾隆朝以来盐务的不景气有深切认识。包世臣描绘两淮盐商的困顿局面说：

> 两淮纲食引地，无论城市村庄，食私者十之七八。两淮运本项二千万方敷转输，而各商实本，不及四分之一，余皆借贷，贷息重至每月分半。盐去课回，非六百日不可，盐滞本压，贷息日行，完课无资捆盐。（包世臣：《中衢一勺》卷5，《小倦游阁杂说二》）

资本是商品流通、商业发达的根本性前提，两淮盐商资本贫乏，不得不借贷负息，盐引积压滞销又造成资本周转不灵，身陷恶性循环中的盐商，意气消沉，盐业也随之冷落萧条。包世臣在谈到淮北盐务时说："淮北盐务，久已消沉"（包世臣：《中衢一勺》附录四，《上陶宫保书》）。这不仅是淮北乃至两淮盐务境况的写照，而且是嘉道间整个盐业面貌的缩影。

对于嘉道间盐务衰敝、萧条、积重难返的情势，魏源也有十分犀利的揭示。他说：

> 淮盐十载以来，江南、湖广大吏整饬又整饬，弥缝又弥缝，而银价愈昂，私充愈甚，官销愈滞。场岸复积存三纲之盐。去冬甫请对折行盐，今冬复请两纲展缓。如窭夫之患债，如逋户之畏赋，如垂病之日延一日，如穷邻之月攘以待来年。（《魏源集》下册，第431页）

这确是一幅糟糕透顶的图景。

清代盐政何以敝坏至此？包世臣与魏源对其间症结加以多方面的剖视。

魏源指出，清代盐政，产销制度过于烦琐，“方其赴场采盐也，每票千引，需七屯船，前后牵制，不能分拆。且钱粮分四次完纳，又有窝单、有清单、有照单、有引目、有护照、有桅封、有水程、有院司监制批验子盐五次公文”。这些“委曲繁重”的过程不仅使盐商“徒稽守候”，浪费大量时日，而且为盐务官员的中饱盘剥提供种种便利条件，例如，“商盐到岸也，有各衙投文之费，有委员盘包较砝之费，有黄河烙印编号之费，……又有南北两局员换给水程之费，三关委员截票放行之费，名色百出，不可胜胪”（《魏源集》下册，第435页）。“官为盐蠹”成为盐务中一大祸害。一方面，盐商因产销制度的过于繁琐与盐官的层层盘剥而失去经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食盐运输过程中的各种浮费都转为食盐售价，使盐价高昂不下。这确是切中时弊的论析。

清代盐法，固定销区销额，如淮盐分南、北食岸，北食岸分销淮安等六县，南食岸分湘岸、鄂岸等四纲。与淮盐区相邻的有川（四川）盐、云（云南）盐、粤（广东）盐、潞（山西运城）盐、应（湖北应山）盐等，而各盐区引盐课税由于多种原因轻重不一，如“在大宁、云阳等地淮盐课较川盐课重十数倍”。“潞盐为二十引纲100两，而淮盐需纲480两”（《清朝续文献通考·盐法》）。由此造成各地食盐在销价上大有差异。淮盐由于盐课重于邻盐区，加上远

程运输的耗费，其价格往往数倍于邻盐。盐区间食盐销售的差价诱发私盐活动猖獗。仅两淮盐区便"私有十一种"(包世臣：《中衢一勺》卷3，《庚辰杂著五》)。对于其中种种情形，包世臣甚为详尽地加以揭示。如揭露邻私的泛滥："灌安、襄、荆、郧者，潞私也；灌宜昌者，川私也；灌永、宝者，粤私也；灌南赣者，粤东与闽私也；灌归、陈者，芦私也；灌饶州、宁国者，浙私也。"(包世臣：《淮盐三策》、《皇朝经世文编》卷49)这里所谓潞私、川私、粤私、闽私、芦私、浙私皆指邻区"浸灌"两淮行盐地区的私盐，其情形甚为严重。再如枭私是清代私盐中的一大宗，其含义指地方黑社会势力和骠鸯之徒纠党私营。包世臣对枭贩的组织与活动有颇为细致的描述：

> 枭徒之首，名大伙头，其副名副伙头，下则有称手、书手，总名曰当青皮。各占马头。私盐过其地则输钱，故曰盐关；为私贩过称，主交易，故又曰盐行。争夺马头，打伙过于战阵。又有乘夜率众贼杀者，名曰放黑刀。遣人探听，名曰把沟。巨枭必防黑刀，是以常聚集数百人，筑土开壕，四面设炮位，鸟枪长矛大刀鞭锤之器毕具。……大伙常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为辈。(包世臣：《中衢一勺》卷3，《庚辰杂著五》)

其规模与势力显然相当可观。包世臣又指出，枭贩的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往往与盐商走私、船户水手走私相勾结，诚所谓"商被船挟，而纵船买枭私，随带赴岸……枭徒与船户交密，洞悉各弊。五六年来，枭私竟有长船赴岸者矣"(包世臣：《中衢一勺》卷5，《小倦游阁杂说二》)。私盐活动因而愈演愈烈。私盐与官盐是一种彼此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私盐多则官盐滞，私盐少则官盐畅"，清廷势必要采取严厉手段来惩处走私、缉捕私贩，但是，吏治的腐败决定了清王朝反私盐的行动不仅落于一纸空文，而且

成为缉私官员乘机走私、中饱私囊的极好机会，包世臣对此种情形揭露道，缉私官吏往往或借缉私之名，“在产地购买私盐，运往销地出售”，或“捕获私盐入店，名曰功盐，作官售卖（包世臣：《中衢一勺》卷3，《庚辰杂著五》），由此而来，“多一捕役，即多一私贩”。私盐愈禁愈炽，其势不可遏止。

包世臣忧心忡忡地揭示私盐的种种内幕及其弊害，又对造成私盐的某些缘由有深致入微的分析。例如，食盐生产地区的走私亦即场私向来被称为“贩私之源”，而场私不仅包括盐商的夹带私贩，还包括灶户的多煎偷卖。包世臣分析场私的原因说：“夫盐法最苦者，透私。而私之所以不可止者，在科则之征于商也太重，而场商之待灶户也太刻。灶户苦累，非卖私则无以自赡。”“非透私无以为生。”（包世臣：《中衢一勺》附录4，《上陶宫保书》；《中衢一勺》卷3，《庚辰杂著五》）此中关系恰如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清政府对盐商科以沉重的正杂盐课以及各种浮收摊派，盐商不堪其负，将其中的一部分转嫁到灶户身上，灶户为生计所迫，只得走私，否则无以生存，包氏所论，无疑颇有见地。

烦琐的产销制度，官吏的层层盘剥以及走私的猖獗，造成盐利的多方分割。魏源算计道：“坝工、捆夫去其二，湖枭、岸私去其二，场、岸官费去其二，贾伙、浮冒去其二，计利之入商者，什不能一。”（《魏源集》下册，第439页）盐业的萧条成为势所必然。

针对清代盐务“利不归于上，不归于下”而“尽分于中饱蠹弊之人”（《魏源集》下册，第439页）的大漏卮，包世臣、魏源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盐法的建议。

包世臣指出，解决盐务敝坏问题有上、中、下三策可采用。采用严厉的警察手段“严禁私枭”为一策，但此策为下策，因为，缉私者对于私盐酿成的相因病势“莫洞其源”，无从下手。在缉私过程中，手段太激烈，有可能激化矛盾或牵连无辜，酿成巨案。措施

过于温和又"徒增官费而无成效"。因此,"缉私"政策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所谓"中策"包含二种方案:"一曰稽查火候,一曰烙验官盐"。所谓"稽查火候"就是"饬灶户所有之盐,场商尽数收买,则枭徒无所得盐,而私之源清矣"。所谓"烙验官船"即"官先按船编号排甲,量其载之所胜,烙于船而注于册。载不及九分,即不准开行,而私之委清矣"。由于这两种方案的要义只是在生产和运输诸环节上加强严格控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只能算是中策。紧接着,包世臣提出了他认为属之上策的方案:

> 若夫上策,则裁撤大小管盐官役,唯留运司主钱粮,场大使管灶户,不立商垣,不分畛域,通核现行盐课,每斤完数若干,……听商贩领本地州县印照,赴场挂号,缴课买盐。(包世臣:《中衢一勺》卷3,《庚辰杂著五》)

包世臣深信,采用此种变盐业官营为商营的自由运销政策,"民间盐价必减于今十之五六,而私盐十一种皆输官课,课入必数倍于今",整个盐务困顿不振的局面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包世臣关于改革盐务的设想载于《安吴四种》中,由于《安吴四种》编成后,包世臣"嘱默深为之订定。默深摘要签出,世臣则有改有不改焉,故默深复致书以正之"。(李柏荣:《魏源师友记》第87页)。因此,魏源在盐法改革的思路上与包世臣不谋而合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包世臣思路相通,魏源也认为,靠缉私来解决私盐问题是徒劳无效的,诚所谓"龂政无缉私之法"(《魏源集》下册,第438页)。欲取消私贩,只有打破垄断的运销制度实行自由运销的票盐制度,无论何人,只要照章缴纳盐税,就可以领票采盐贩运。国家只收税利和场价。魏源指出,自由运销制度的推行,将使大批走私的"散商"获得堂堂正正的贩卖食盐的权力,从而于无形中消弭走私,达到"化私为官"的效果。由于场价、税金在采盐时一

次缴清，没有中间环节，浮费无所自出，盐价亦会大大降低。改革的最终结果，将是国家得益，诚所谓“减价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且向日仰食于弊之人，即今日仰食于利之人，昔之利私而今之利公”(《魏源集》下册，第439页)。

包世臣、魏源所提出的票盐议亦即在盐业中实行盐业自由贸易的主张无疑是富于建设性的，它与漕粮商运的建议相互呼应，映现出传统经济思想出现新突破的趋向。

**二、陶澍、林则徐的盐政改革**

和包世臣、魏源关注的焦点一致，陶澍、林则徐等人对嘉道年间的盐业衰敝亦深怀忧虑。在两江总督与湖广总督任上，他们分别厉行盐政改革，一时颇见成效。

陶澍初行盐政改革是在道光十年(1830)，这一年，陶澍加太子太保，署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务。“两淮者，天下盐法之表率”，“国帑民生攸关甚巨”。陶澍锐意革新，决心以两淮为盐政改革突破口，进而推进全国盐政改革。

魏源曾言，“兴利由于除弊”，要除弊“必知弊之所由，而后知利之所在”(《魏源集》下册，第442页)。陶澍剖析两淮盐政积弊，发现“其弊一由成本积渐成多，一由藉官行私过甚”(《再陈淮鹺积弊折》，《陶文毅公全集》卷11)，因此两淮盐务改革的路径，“惟有大减浮费，节止流摊，听商散售，庶畅销价平，私盐自靖”(《清史稿》卷123，《食货四》)。

从两淮盐务的弊端入手，陶澍于道光十一年裁盐政陋规十六万多两，缴还盐政养廉五千两。随之而来，陶澍又在魏源、包世臣的支持与协助下，于淮北盐区二十九州县“一律变通，改行票盐，以资补救”(陶澍：《酌议淮北试行票盐章程疏》，《陶文毅公全集》卷15)。淮北票盐法是对旧盐法由政府主控、特许商人承购包销的垄断性经营的一次大革命，其基本内容有二：一是废除世

袭专利的“纲商”或曰“窝商”。二是扩大特许商的范围，听商民在试行州县自由运销食盐，与此同时，简化特许证发放手续，降低票商承销单位额。由于颁发给散商的特许证曰“票”，以区别于垄断型商人的“引”，故曰“票盐法”。

“票盐法”一经付诸施行，迅即表现出其优越性。由于“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魏源集》下册，第439页)，食盐成本大为降低。“(旧盐法)每引成本已达十余两，价不偿本，故官不敢私。今票盐……每引五两有奇，减于纲盐大半”(魏源：《淮北票盐记》，道光《淮北票盐志略》卷首)。“盐法成本既轻”，盐价也随之跌落。陶澍称：“自票盐到境，盐价顿减”(陶澍：《淮北票盐试行有效折》，《陶文毅公全集》卷14)。魏源亦言：“票盐售价，不及纲盐之半，……而利尚权其赢也”(《魏源集》下册，第439页)。包世臣则报道说：“倡改票盐以来，……洪湖以南食盐居民，率出贱值得净盐，以为有生所未闻见。”(包世臣：《中衢一勺》附录四，《上陶宫保书》)。由于盐价降低，“私贩无利，皆改领票盐”(《清史稿》卷123，《食货四》)。淮北盐业一时间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诚所谓“人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抵岸，为数十年中所未有。未及四月，请运之盐，已愈三十万引”(《清史稿》卷123，《食货四》)。长期无法解决的盐课拖欠问题亦迎刃而解。《安化县志·陶澍传》言：

> 道光元年至十年，淮南行六纲，淮北仅行三纲。澍承积弊之后，自十一年至十七年，淮南已完六纲有余，淮北率一岁行两纲之盐，尽完以前滞欠，且割淮南悬引。两淮共完正杂银二千六百四十余万两，库贮实为三百余万两。

王守基《两淮盐法议略》也高度肯定票盐法对增加清廷课额收入的积极效应：

> (票盐)行之期年，淮北大畅，不但正课复归正。额，每年

销盐至四十六万余引(原为二十九万余引),除奏销淮北正杂课银三十二万两外,嗣又带销淮南悬引二十万,纳课银三十一万两。是淮北之课较定额又增两倍矣。(《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36)

"票盐法"的社会效益不仅表现在私盐自禁、政府课额收入增加,而且对公益事业起到积极作用。"是岁海州大灾,饥民赖此转移佣值,全活无算。"道光十三年,淮北一律改票后,"非特完课有赢无绌,兼疏场河、捐义厂、修考院,百废俱兴"(《清史稿》卷 123,《食货四》)。

有鉴于淮北推行"票盐法"的成功,道光二十九年(1849),湖广总督陆建瀛于武昌盐岸失火以后,依魏源之议,改淮南票盐,"楚西各岸盐价骤贱,农民欢声雷动"。是年仅两淮即"实收"盐课银五百万两(《清史稿》卷 123,《食货四》),占嘉庆五年全国盐课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继淮南盐区后,河东、两浙、福建都改票盐,盐业领域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陶澍于淮北推行"票盐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如同他改漕粮海运一样,艰难曲折,魏源《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说:

公初议海运则南漕、北仓挠之;议裁鼛费则窝商、蠹吏挠之;议截粮私则长芦、总漕挠之;议改票盐则坝夫、岸吏挠之。群议沸腾,奏牍盈尺。(《续碑传集》卷 23)

其阻力之大可以想见。然而,陶澍"奋不顾身,力排众议"(陈銮:《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续碑传集》卷 23),终完成漕运、盐法的重大改革,从而在道咸经世实学上竖立起丰碑。魏源评说陶澍的功绩时说:

今日东南民计国计,莫困如漕、盐,公所排决疏导可垂久大者,亦莫如海运与票盐。后有来者欲大苏东南之困,为

国家筹百世利，非赓其绪而恢之不可也。（魏源：《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续碑传集》卷23）

这确实是不枉之言。

林则徐的湖广盐政改革要晚于陶澍推行"票盐法"，然而，他走的是另一条路径。

林则徐于道光十七年(1837)授湖广总督。此时淮北盐区虽已推行"票盐法"，淮南尚行"纲盐法"，积弊甚深。两湖为淮南纲盐的重要引岸，淮南纲额一百三十九万五千五百余引，十分之六在两湖疏销。整顿两湖盐务，成为林则徐赴湖广任后的重要任务。

林则徐上任后，对两湖盐务敝坏的原因详加考察分析，他认为，湖广地区之所以私盐充斥，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曰"民间生计维艰，故凡有盐利可图之处，贫民无不百计挑运，四处售私。"

二曰淮盐官课比川、晋、粤各省都重，"况又加以无课之私贩纷纷浸灌，其势之不能相敌，更不待言"。

三曰湖广地区"为邻盐必由之路"，如"潞盐之行于陕西，有应于湖北郧阳府经过者。川盐之行于贵州，有应从湖南辰沅等府经过者"，因此，"虽欲禁其私卖，势必不能"。

针对两湖地区私盐泛滥状态，林则徐采用了"恩威并用"的方针，一方面"剀切示谕绅民，晓以利害大义"，"责令绅衿大户以及乡团牌保，互禁食私，犯者公同追究"，并"严饬弁役缉私"。另一方面又许挑卖私盐的"穷民"改贩官盐，"由各处官盐子店给票挑赴四乡，卖完缴价"(《林则徐集·奏稿八》(中)，第509—515页)。陈寿祺《郎潜纪闻》卷6高度评价林则徐后一方面的措施，他说："林文忠公督两湖日，整饬淮纲，许挑卖私盐之穷民改悔，投充肩贩，由各处官盐子店给票，挑赴四乡，卖完缴价。此化莠为

良之第一法也。”

在大力整肃私贩的同时，林则徐还严惩了襄阳地区故纵私盐、贪污中饱的缉私员弁黄幗祥等人。根据吏部处分条例，黄幗祥等人之罪应“杖一百，徒三年”，但林则徐认为此种惩处过轻，是“情浮于法”。他指出，“不肖员弁每视鹺务为利薮，执法营私，靡所不至，非从严惩办，无以杜绝弊源”。为了“正官常而肃鹺政”，他上奏将黄幗祥等人从重惩处，“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林则徐集·奏稿八》（中），第492页）。这一行动对于积弊甚久的两湖盐务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

在林则徐的悉心筹议、严厉督责下，两湖盐务颇有起色。从道光十七年四月至十八年三月，两湖共缉获私盐一百余万斤。道光十七年亦即林则徐赴任的当年，两湖疏销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引，比疏销“大有起色”的道光十六年还多三千余引。

纵观林则徐在湖广的盐政改革措施，其主要路数显然在缉拿、打击私贩上。《清史稿·林则徐传》说：

> （林则徐）整顿盐课，以减价敌私，无成效。专严缉私之禁，销数大增。

这的确是真实情形。

以缉私作为主要手段来整顿盐务无疑是治标不治本之法，其间亦不具备任何新鲜信息。正因为如此，湖广盐务虽振奋一时，随即又萎靡下去，直到道光二十九年改行票法，湖广盐务才面貌一新。

林则徐湖广盐务改革之所以缺乏活力与生气，有多方面客观原因可寻。如林则徐在湖广任内总共不到20个月，政务纷扰之中，很难全力筹划盐政。再加堵缉私贩是道光帝指令林则徐整顿两湖盐务的手段，林则徐不可能不奉行不误。但是，就总的思想体系而言，“林则徐‘严以缉私’的指导思想，与他空言根治黄

河、京畿植稻以代漕粮，以致招来当世和后世物议的固守自然经济体系的经济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谢刚：《清史嘉道朝研究论纲》，《南开学报》，1991 年第 4 期）。在这一方面，林则徐显然逊色于他的亲密同事陶澍。

## 第三节　河工研究与对策

河工在明清两代与盐务、漕运并称为“三大政”。所谓河工本指修治河道堤防的工程，因黄河水患独多，故河工多指治理黄河工程。如《明史·河渠志一》：“复命尚书衡（朱衡）经理河工”。这里的河工即治河（黄河）工程。

治理黄河，对清王朝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清朝政治中心在北京，而北京在经济上需要依赖南方的支持，每年源源不绝地从南方各省运输漕粮到北京的运河因此成为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大动脉。然而，由于黄河、淮河、运河交织于苏北一隅，“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清史稿》卷 127，《河渠志二》）故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治理黄河，诚所谓“国朝以来，无一岁不治河”（《魏源集》上册，第 365 页）。其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济运通漕”，以保证秩序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定。康熙帝当三藩之乱一触即发之际，“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之宫中柱上”（《清圣祖实录》卷 275）。其高度重视的程度可以想见。

然而，清代治河，除靳辅、陈潢大有成效外，其余治河者皆败绩累累，庞大的治河堵决经费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漏卮。魏源概述其每况愈下的情势说：

乾隆四十七年以后之河费，即数倍于国初；而嘉庆十一

年之河费，又大倍于乾隆；至今日（道光中）而底高淤厚，日险一日，其费又浮于嘉庆，远在宗禄、名粮、民欠之上。……自嘉庆十一年至今，凡三十八载，始以岁增三百万计之，已浮旧额万万。（《魏源集》上册，第365—366页）

他又尖锐指出，清代治河的困窘为历代所没有的情景：

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魏源集》上册，第165页）

为了解决国计民生中的这一大漏卮，道咸间的经世派人士竞相研求河工问题，并提出多种治河建策。

**一、魏源治理黄河的建策**

在实政之学的研讨中，魏源十分重视黄河治理问题，道光二十二年，黄河水患震动全国，魏源著《筹河篇》，尖锐批评朝廷河政。他指出，面对黄河水患，朝廷采取的是消极对策："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故河成今日之患。"（《魏源集》上册，第635页）在治河中，主持河工的吏员又对策失误，"不治海口，而惟务泄涨"。"涨愈泄，溜愈缓，海口渐淤，河底亦渐高，则又惟事增堤"。如此下来，"河高而堤与俱高。起海口，至荥泽、武陟两堤，亘二千余里，各增至五六丈。束水于堵，隆堤于天"（《魏源集》上册，第366页）。其危机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为加剧。他还愤慨揭露贪官污吏上下欺蒙，"每岁必涨，每涨必险，无岁不称异涨"，由此而浸吞"溃决堵合之费"。由于治河堵河成为"食河之餮"的发财之机，"其不肖者，甚至有以险工有另案为已幸"。河务中的黑暗污浊可以想见。

由于朝廷治河战略的错误，黄河一再在南岸决堤，像一匹脱缰烈马，纵横于泰山以南、淮河以北的广大区间。魏源在对黄河下游的地理形势作认真考察的基础上，大胆提出以下意见：

近日黄河屡决，皆在南岸，诚为无益，即北决，而仅在下游徐、沛、归德之间亦无益，惟北决于开封以上则大益。何则？河、济北渎也，而泰山之伏脉介其中，故自封丘以东，地势中隆高起，而运河分水龙王庙，遏汶成湖，分流南北以济运。是河本在中干之北，自有天然归海之壑。（《魏源集》上册，第368—369页）

魏源所提出的通过黄河人工改道来彻底根治黄患的建议，是依据山川地理形势之实以及黄河改道历史而提出的，他认为，"人力纵不改，河必自改之"。魏源的意见并未为当政者所重视，而自然规律却证实了他的真知灼见。咸丰五年(1855)六月亦即魏源提出黄河改道建议后的十三年，黄河果然在河南铜瓦厢(开封附近)决口，夺张秋奔大清河从山东入海，其道与魏源设想的相同。咸、同年间士人谭献曾将清代学者列表排列，以龚自珍、魏源列入"绝学第一"。他称赞魏源说："阅《古微堂外集》，论治河主故道，论鹺主减价票运，论漕主海运，今皆如其言。"(《复堂日记》卷5)这是对魏源关于漕、盐、河"三大政"建策的公允评价。晚清社会和自然界的变迁，有力地证明了魏源的经世实学是可行的、有用的、富有效应的。

魏源对于水利的研究，不限于黄河。他在《畿辅河渠议》中对北京附近的漳河、永定河、滹沱河、子牙河等河道的治理，提出了"如治黄河小异而大同"的方法；在《上陆制府论下河水利书》中对运河与周围河、湖水系的关系问题发表了精辟意见；在《湖广水利论》、《湖北堤防议》中，魏源又提出了"江患"问题，他指出，长江流域随着人口增多，上游山林被砍伐，中下游湖泊围垦日多，导致"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魏源集》上册，第389页)这一见解，以今日科学观点检验也是完全正确的。他

提出的救治江患的办法，如建立分洪区、禁止围湖筑圩等等，也有极强针对性。鉴于时处鸦片战争之后的“衰世”，魏源深知根治江患只有留待将来，他说：“今海警甫息，经费告殚，非兴举水利之时”，“其能举而行之，以大剂东南田赋之穷，则俟后之君子。”（《魏源集》上册，第394页）这是一位深怀“经世济民”之念的学者对后人的期望。

**二、包世臣综合治理黄河的主张**

包世臣论学，往往与魏源一脉相通，在河工问题上，两人见解也多有如出一辙之处。例如，在治河方略上，包世臣也反对消极的“防河”而主张积极的“治河”。他指出：

> 河之治乱，以河底之高下为定。近时专论河面之涨落，何异梦呓。治河，犹御寇也，强则备之，弱则攻之。河流激悍，伏秋暴发，其强难以驯制，惟有加意防闲，不令横突，至冬令力緜，可以惟我所为，以坝导溜，或东或西，任人驱率，久之而工减底深，汛至则水归漕中，更借其力猛，以涮旧淤，是以盗治盗之方也。（《安吴四种》卷2）

无论是“加意防闲”还是“以坝导溜”、“借其力猛，以涮旧淤”都贯穿着治河的主动性，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性应付。此种见解与魏源评击朝廷河政“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在根治黄患与运河问题上，包世臣也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方案，其中不乏精辟透彻的见解。如他在《筹河四略》中主张治河要御坝、浚淤并举，正切中黄河泥沙大量淤沉的症症。嘉庆十六年（1811）秋，包世臣佐百龄治河，“临工决盖坝之策，旬日间使袁浦板闸，淮安百万家得免为鱼而就高枕”（范麟：《读〈安吴四种书〉后》）。其建策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可见一斑。

然而，包世臣以言利自居，他的河务论更多地从治河的综合性利益立论。在《安吴四种总目叙》中，包世臣发表精辟意见说：

河，治水事也。水有利有害，能去水害者，在能收水利。包世臣心目中的水利，内容广泛，其中既包括田地的灌溉与防涝，又囊括漕运、盐务等大政，正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包世臣指出：河、漕、盐三大 政不可分割，“（人们，大都视三事为三，而不知其实一也”（包世臣：《安吴四种总目叙》）。由此而来，包世臣所言的治河自具有某种系统的意味。

包世臣关于治河兼顾水利、河运的思考虽然富于经济头脑，但仍然囿于自然经济总体结构，相对而言，他的后继者，洋务派官僚李鸿章、沈葆桢更有眼力，他们在论河工问题时发表了与包世臣不同的见解。沈葆桢说：

> 议者谓运河贯通南北，漕艘藉资转达，兼以保卫民田，意谓运道存则水利亦存，运道废则水利亦废。臣以为舍运道而言水利易，兼运道而筹水利难。民田于运道势不两立。兼旬不雨，民欲启涵洞以溉田，官必闭涵洞以养船。迨运河水溢，官又开闸坝以保堤，堤下民田立成巨浸，农事益不可问。（《清史稿》卷 127，《河渠二》）

李鸿章则言：

> 近事治河兼言利运，遂致两难，卒无长策。事究则变，变则通。（《清史稿》卷 127，《河渠二》）

在沈、李二人的思考中，治河的意义已经远离支持农田水利的范畴，而是主要服务于独立发展的航运业，而治河功能的转变，寓含着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突破。

**三、林则徐治河与根治河患的设想**

作为研心实务的经世派官吏，林则徐在河工问题上虽乏于理论上的创见，但对河务的重要性有清醒深刻的认识。他曾概言道：

> 河工修防要务，关系运道民生最为重大。河臣总揽全

面，筹度机宜，必须明晓工程，胸有把握，始能厘工剔弊，化险为平。(《补授河督谢恩并陈不谙河务请另简放折》，《林则徐集·奏稿》(上)，第9页)

林则徐在仕宦生涯中几度受命治河，尽管他深知经办河工有"极多难言处"，担任河臣实际上无异于身处"陷井之中"，但是，为国家"兴利除弊"的经世抱负，激励他"自持刻苦，不避怨嫌"。(林则徐：《接任河东河道总督日期折》，《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3页)全力以赴办理河务。

道光十一年(1831)十月初七日，林则徐擢任河东河道总督，管辖山东、河南两省境内黄河、运河的防修事宜，这是他直接经营河务的重要职务。林则徐赴任后，尽管时令正值严冬，冰冻雪阻，但他亲自周历沿河工次，对已完工程"逐段丈量"，"验其灰印志椿均相符合"，以防止"偷减情弊"发生。在查验河南东部黄河沿岸贮放的料垛时，林则徐极为认真细心，他"于每垛夹档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束以称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斤不拆"，结果发现河吏将好的秸料堆放于表面，在容易蒙混的底层架开虚空，或用朽黑腐烂的秸料充塞，"更有理旧翻新名曰'井垛'，以新盖旧名曰'戴帽'，中填碎料杂草以衬高宽，旁插短节秸根以掩空洞。若非抽拔拆视，殊难悉其底里。"(《林则徐集·奏稿三》(上)，第27页)林则徐将他所查验的河工之弊上奏，颇得朝廷称赞。道光帝朱批说："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林则徐集·奏稿三》(上)，第28页(注一))陈康祺的《燕下乡脞录》卷13也记此事说：

> 河工为国家漏卮二百年矣！道光十一年，林文忠公擢东河总督，奏言秸料乃河口第一弊端。其门垛、滩垛、并垛诸名目，非抽拔拆视，难知底里，遂将南北十五厅备垛逐查，有弊

端者察治，所属懔然。岁省度支无算，得旨向来河工从未有如此精核者。

此种认真精核、一丝不苟正是林则徐一以贯之的经世风格。

在督办河工过程中，林则徐就碎石抢河险问题"两次上堤，周历查访，并询之年老兵民"，得知"每遇险工紧急，溃埽塌堤"，"力加抛护"碎石，"功效甚著"。于是，他"就埽前有石之处，细加测量，悉心揣度"。其结论是"碎石斜分入水，铺作坦坡，既以偎护埽根，并可行回溜势"(《林则徐集·奏稿三》(上)，第30页)。这一从治河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经验，无疑包含有真知灼见。

通过实地考察，林则徐对河工形势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他"绘全河形势于壁，孰险孰夷，一览而得"，以此作为指挥施工的依据。"群吏公牍，不能以虚词进。风气为之一变。"(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24)

在查验黄河两岸防务的过程中，林则徐究心于黄河的治理，形成了改黄河由千乘即利津河入海以根治河患的初步想法。他在给陈寿祺的一封信中说：

则徐窃不自量，谓欲救江、淮之困，必须改黄河于山东入海，而以今之黄河，于淮涸出洪泽湖以为帝籍。(林则徐：《复陈恭甫书》，道光十三年正月于江苏)

林则徐的上述设想因不具备可操作性而被后人批评为"空议"，而他本人因担心"都中物议，也从未把此"非常之议"向朝廷提出，但是，这一方案映现出林则徐根治黄河的热忱愿望以及"为国为民兴利除弊之实心"(王鎏：《钱币当言续刻》毛应观序)。

# 第四节　货币研究与建策

19世纪以来，由于鸦片输入日增，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日益显见。本来，银钱法定比价是银一两换制钱1000文左右，至鸦片战争前夕，某些地区的银价已达到银一两约换制钱1600文。鸦片战争结束后的道光二十六年，“南方银一两皆以两千为准，北方闻更增于此。”（包世臣：《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安吴四种》卷26）由于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零售和工资用钱，商品批发和赋税交纳则用银，故银贵钱贱，自然使以钱为价值尺度的“零售和工资”大吃其亏，由此造成“小民重困”（包世臣：《庚辰杂著二》，《安吴四种》卷26）的严重情形。关于货币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因此成为朝野上下的热门话题，也成为经世派学者、官吏倾心注意的问题之一。

## 一、王鎏的纸币说

在嘉、道、咸年间货币问题的研究热潮中，苏州儒生王（1786—1843）的纸币说独树一帜，颇为引人注目。

王鎏初名仲鎏，字子谦，一字亮生，江苏吴县人。此公书生气十足，“自束发受书以至华颠，未尝一日释卷，素嗜考订，兼好儒家言”。人称他为“粹然儒者”（张履：《王君亮生传》，《续碑传集》卷77）。

然而，儒家的文化本性是出世、入世而非遁世，王鎏概莫能外。张履的《王君亮生传》说他“尤志在经世，慕贾生、陈亮之为人”。可见其志趣所在。在嘉、道实政之学中，王鎏议海运，主和籴，论畿辅水利建设，颇为活跃。林则徐一度欲召王鎏入幕属，王鎏“感其知己，慨然思就之”。只是因为情形发生变化，“卒不果

往”(张履:《王君亮生传》,《续碑传集》卷77)。

王鎏对货币问题深感兴趣,《钞币刍言》一书便是他潜心研究货币问题,“穷积思三十年”的重要作品,也是他“最自信”的一部经世之作。

《钱币刍言》最初于道光十一年(1831)以《钞币刍言》之名刊行,由于其父认为“体例未精,必致人驳诘,遂毁其板”(王鎏:《钱币刍言·目录》)。在后来的七年中,王鎏进一步积思、旁搜与修订,终于在道光十七年以《钱币刍言》之名刊行。稍后王鎏又刊《钱币刍言续刻》、《钱币刍言再续》加以补充。《钱币刍言》刊行后,颇有反响,“学士大夫往往宝藏其书”(许楣:《钱币论·许楣叙》)。

王鎏货币思想的精髓乃是发行钞币以吸收流通中的白银,并代白银作巨额交易往来之用,小额交易仍以铜钱作为补充的流通手段。此即所谓“行钞以收银,使银贱而不为币;行钞以收铜,使铜多而广铸钱”(王鎏:《钱币刍言·钱币议一》)。王鎏认为,根据19世纪初叶的财政经济态势与社会情况,行钞法为“富国富民第一策”,其大利至少有二十二条。

1. 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无尽;盖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则操不涸之财源。

2. 万物之利权收之于上,布之于下,则尊国家之体统。

3. 百姓便于行钞,洋钱不禁自废,则免外洋之耗蚀。

4. 海船载鸦片烟土,每岁私易中国银累千万以去;若用钞则彼将无所利而自止,则除鸦片之贻祸。

5. 民间多用钱票、会票,每遇钱庄歇闭,全归无用。今若行钞,则绝钱庄之亏空。

6. 百姓若于用银之重滞,故乐于用票;易之以钞,则顺民心之所欲。

7. 钞法既行，然后禁打造银器，而以重价收铜；铜既多，乃铸钱为三等：当百、当十、当一，则极钱法之精工。

8. 国赋一皆收钞，则无火耗之加派，其大利入也。

9. 钞文书明定数，虽欲上下其手而不能，则绝胥吏之侵渔。

10. 钞直有一定，商贾不得低昂之，则去民心之诈伪。

11. 奸民猖邪教，蓄逆谋，类皆以财利要结人心，国家财用不绌，缓急有备，则戢奸回之逆志。

12. 边疆起衅，每因争夺银币而然，今易以钞，彼此无所觊觎，则弭边界生衅。

13. 天下有银若干，悉来易钞，则供器皿之鼓铸。

14. 用银有白纹、云丝、洋钱之不同，钞则归于画一，则同天下之风俗。

15. 富家间以土窖藏银，历久不用，一闻变法，悉出易钞，则去壅滞之恶习。

16. 钞式宜变从前，分为几等，大小钞皆书印格言，俾民识字，则寓教民之微意。

17. 货物壅滞之处，以钞收之，物价必平，则致百物之流通。

18. 造钞有局，办钞有人；且因财足而兴水利，务开垦，则广谋生之途径。

19. 每遇赈恤兴筑，不假富户捐输，则杜官吏之勒捐。

20. 国计大裕，捐例永停，则清仕途之拥挤。

21. 凡漕务、河务、盐务，皆有积弊之当厘而不敢议者，恐经费不足耳，行钞可无虑此，则除万事之积弊。

22. 一切取民者从薄，于民者从厚，则行千载之仁政。

把行钞法视为"除万事之积弊"的万灵药方，王鎏无疑过于书生气十足和幼稚可笑。他所提出的钞币发行方案实际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技术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参见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下),第610—613页)正因为如此,许楣兄弟才得以专著《钞币论》遂一反驳王鎏的论点。更为重要的是,正如胡寄窗先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所指出的:"一种货币理论以及据此拟定的货币方案,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收到预期效果的。"在晚清官僚统治极端败坏的情势下,"王鎏的钞币主张如果实行的话,即使能遏止白银外流的趋势,其后来可能产生的恶果也许比白银外流还要对人民有害。"(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第613页)

然而,王鎏的行钞法毕竟包含有关于19世纪货币问题的若干合理性思考,作为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思潮的产物,也具有一定的经世价值,故"林(则徐)公欲行之,以粤行而止,其余名人达士如同县顾通政莼、武进李进士兆洛、泾县包大令世臣咸许为可行。……中朝言事之臣,颇采用君书以进"(张履:《王君亮生传》,《续碑传集》卷77)。由于王鎏的《钱币刍言》大量地、系统地搜集了前人关于钞币的议论和当时讨论钞币问题的意见,因此它不仅在开阔时人货币问题研究的视野上具有积极作用,更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货币思想提供了弥为珍贵的资料。

**二、包世臣"以钱为币"的主张**

张履在《王君亮生传》中说,包世臣是王鎏纸币说的支持者和热烈赞同者,然而,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就钞币观点而言,据包世臣自称,早在王鎏著作刊行前20余年,他即主张发行钞币,只是未写成专书而已。(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答族子孟开书》)随着银贵钱贱的现象日益严重,包世臣"日夜思维",认为除了行钞法外,"实无他术"。"钞法上利国而下便民",乃"救弊之良策"。正因为如此,当王鎏提出纸币说,包世臣深以为然,认为可付诸施行。

但是,和王鎏不同,包世臣从骨子里是一位制钱本位论者,

他所主张的是“惟有以钱为币，一切公事皆以钱起数”(《安吴四种》卷26，《再答王亮生书》)。因此，他关于发行钞币的见解实际上与王鎏之说是貌合神离。

包世臣的钞币主张在《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中有一段简扼概述：

> 以钱为币，使银从钱，以夺银之权归之于钱，而广钱之用，操之于钞。(《安吴四种》卷26，《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

如上论说，包含着包世臣关于货币的基本思想。

首先，包世臣虽然有“缓急之时，钞或不行，而银则未有不行者”(《安吴四种》卷26，《再答王亮生书》)的说法，但他对白银作为重要流通手段始终持否定立场。他多方扬铜(钱)抑(白)银，其理由甚为苍白、荒谬。如他宣称：“民间称富室曰有钱，下至博徒，勿论大小摊场皆曰赌钱，从未闻有以银为说者。”他又说：《汉书》中有“黄金一斤值得钱万”的说法，这说明黄金固然贵重，但“仍以钱起数”，以钱为本位。因此，铜钱是天经地义的国家本位币。基于此种观点，包世臣大力主张弱化银币的流通职能，“不以银起数”，“不以银为币”，“夺银之权以归于钱”。银币仅仅作为辅币而存在，“长落听之市人”。

包世臣关于“夺银之权以归于钱”的主张，自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清代中叶以降，国家在币制上注重白银，人民缴纳赋税概以白银为计算单位，而白银对制钱的比价又日趋上升，人民的实际负担大大加重。如江浙两省额征地丁银六百零三万有奇，以嘉庆十年前钱估计，约合制钱六百零三万串许，“今则合八百十四万二千八百八十余串”，“其实于地丁银两并未丝毫增益，而民间暗中贴耗，已以一年四月之粮，完一年之赋”。包世臣企图统一价值尺度，使人民不受银贵钱贱之苦，这无疑是合理的，但他要“以钱为币”，通过排挤、削弱白银在流通领域中的作用来一劳永

逸地解决钱贱银贵的危机，这无疑是昧于经济大势的守旧见解，因为，贵重金属代替不贵重金属而成为主要流通手段，乃是货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包世臣对白银的排斥暴露出他经济思想中的陈旧一面。

其次，包世臣虽然赞同王鎏发行钞币的主张，但他只是将这一手段作为权宜之计。因此，他对王鎏把行钞视为"理财之大经"的观点"未敢附合"，以为假若在"行钞之外别有良法，可以减银价复旧规，则自当从长计议"。(《安吴四种》卷 26，《答族子孟开书》)在王鎏那里，行钞的作用被过于夸大，包世臣对此持不同看法是正确的，但是，他把钞币的作用缩小到应付财政支出的"救弊之良策"又显示出目光的短浅。

当然，在钞币问题上，包世臣也有若干有价值的见解。如王鎏说"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则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对于这种认为纸币可以不兑换地无限制发行的观点，包世臣加以批评。他在《再答王亮生书》中指出："尊意云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是操不涸之源云云。从来钞法难行而易败，正坐此耳。"他强调纸币发行数额必须有一定的限制，即不超过市场流通的需要，"循环出入，足利民用，即止"。这无疑是正确的见解。

包世臣货币观点的陈旧和混乱充分显示了处于裂变时代的中国社会的错综复杂性，在这特殊的历史阶段，思想家们为了解决民族生存问题而仓促上阵，在不知不觉向新思想彼岸跨进的同时，他们的身体有时还大半停留在旧范畴内。因此，包世臣尽管在漕船商运与开放食盐自由贸易上有值得称道的见解，但在货币问题上却失之迂旧。与他和其它货币论者比较起来，魏源、林则徐的货币思想则要远远地高出一筹。

### 三、魏源、林则徐的银币论

道咸间经世派关于货币的主张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曰“铸银币”、一曰“铸大钱”、一曰“行钞法”，其争议的中心问题在于采取怎样的货币本位制才能缓解乃至解决现实的银贵钱贱的矛盾，魏源与林则徐的意见即属于第一种。

俗称“洋钱”的外国银铸币自明中叶流入中国，迅即在东南沿海地区广为流行，至清道光年间，有些交易甚至规定非洋银支付不可。由于供不应求，洋钱的流通价格超出了它的实际含量，并仍有上浮趋势。有鉴于此，禁止洋钱流通、废银用钱的主张流行一时，有人甚至建议以谷帛为币。魏源与林则徐则从西方银币的流行中得到启示，提出颇具经济眼光的“以银为币”说。

魏源的“银币说”包括两个方面：(1)用银为统一的等价物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他指出：“货币者，圣人所以权衡万物之轻重，而时为之制。”既要用它来“衡量万物之轻重”，那它就必须是“五行百产之精华”，必须是价值昂贵、持久不弊的物品，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情况下尤应如此，而金或银便具有这些特性。(2)行铸币以利流通。既以银为币，就要使它方便流通，中国使用的纹银、块银极不方便，以致使行用方便的洋银占领中国市场。虽然每枚银元的实际银数“仅仅六钱六分，而值纹银八钱有奇”，但老百姓还是“趋若鹜”。针对大众心理与社会需求，官府应作出决断，“铸银钱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饼。”(魏源：《军储篇三》，《圣武记》卷14)

林则徐和魏源相似，也看到了称量货币向计量货币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

> 民情图省图便，寻常交接，应用银一两者，易而用洋钱一枚，自觉节省，而且无须弹兑，又便取携，是以不胫而走，价虽浮而人乐用，……长落听其自然，恬不为怪。(《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宜折》，《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34

页）

鉴于洋钱“久已通行”闾阎市肆，使用上又比衡量的纹银方便，民间对其比价长落亦“恬不为怪”，具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林则徐大力反对强禁洋钱流通或骤抑银钱比价，他指出，“一旦勒令平价”，“先以贵价收入洋钱”的“生意营运之人”将以贱价抛售洋钱，其结果是“每洋钱一枚，折耗百数十文，合计千枚，即折耗百数十千文”。“民间生计，因而日绌，非穷蹙停闭，即抗阻不行”。那些将积蓄多年的工资“易得洋钱数枚，存贮待用”的“佣趁工人”，“一旦价值亏折”，损失更为惨重。显而易见，林则徐的上述见解是清醒冷静的，并具有较高水平。

对于洋钱价格浮于白银的现状，林则徐提出了两点建议：

首先，银钱比价固然不可人为地骤然加以抑制，但也不能放任自流，洋钱的成色与重量应参照纹银作价，使洋钱和纹银的比价“不致过于轩轾”。与此同时，努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海关外汇收入，藉以抑制洋钱比价。

其次，自铸银币，以此作为“抑洋银”的重要手段。为此，林则徐就铸银币问题提出具体意见，他说：

> 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枚以纹银五两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其经费比铸铜钱省至什倍。先于兵饷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即照纹银时价兑换，而藩库之耗羡杂款，亦准以此上兑。计银钱两枚即合纹银一两，与耗银倾成小锞者，不甚参差，库中收放，并无失体。……初行之时，洋钱并不必禁，俟试行数月，察看民间采用此钱，再为斟酌定制。（《查纹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林则徐·奏稿》（上），第134页）

尽管林则徐反复申明“自铸银币”只是“推广制钱之式”，“并非仿

洋钱而行之”，但是，无法掩盖其改良币制主张中的商业资本思想色彩。在围绕货币问题的论争中，林、魏两人关于建立本国银本位货币制度的主张与具有新时代气息的货币理论是第一次提出。

与自铸银币的主张相联系，林则徐建议采用积极手段开采银矿。他指出，官办开矿的方式积弊甚多，因为，“地方官经营事多，安能亲驻厂中胼胝手足？势必假手于幕丁胥役，弊窦愈多”。更好的方法“似仍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摺》，《林则徐集·奏稿》）。林则徐所说的“朋资伙办”开矿的方式实际上已是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组织的雏形，而“成则加奖，歇亦不追”的政策则意味着鼓励、奖掖而不是桎梏、剥夺。假如说，在盐、漕等经济问题上林则徐无多少引人注目的新见解，那么，在货币问题上，他的思想要先行一步。

林则徐关于自铸银币的建议上奏后，被道光帝怒不可遏地驳回：

> 官局议请改铸银钱，太变成法，不成事体，且洋钱方禁之不暇，岂有内地亦铸银钱之理？（《清宣宗实录》卷235）

固守祖宗成法的腐朽，不明大局的愚顽，在这道宣谕中暴露无遗。

林则徐改革币制的主张虽然被道光帝否决，他还是大胆地在江苏试铸银币，据说“其形如棋，面刊足银七钱三分”（佚名：《平贼记略》）。然而，由于技术问题，“其制渺小，全无法度”，“未几而伪者、低者日出，遂使良法美德，废而不行”（郑观应：《盛世危言》卷5，《铸银》）。尽管如此，林则徐所作的这一努力仍然具有深远意义，它开中国近代币制改革运动的先河，透露出历史前进的心声。

## 第五节　农事研究与建策

林则徐与其他经世派虽然经济思想上各有突破旧范畴之处，但就总体思想架构而言，大都属于传统的重农主义。如包世臣虽然十分注重河工、漕运、盐法诸政，但又认为它们都算不上“大政”。有人问包世臣：“吾子谓河、漕、盐非大政，然则大政在兵乎？”包世臣的答复是：“兵者暂事也，虽重要不足当大，必言大政，其唯农乎！”（范麟：《安吴四种书后》）和包世臣的思想一脉相通，道光前后经世派倡导的实学，多带有重农的倾向。

### 一、包世臣的重农思想

包世臣对农事的关注始于艰难困顿的青少年时代。在《安吴四种总目叙》中，他记叙此段经历说：

> 壬子先君子病甚，归里无生计，蔬蔬以易药饵，因究农家利病。

壬子年为乾隆五十七年，亦即 1792 年，是年包世臣 17 岁。在其后的生涯中，包世臣始终注重农业问题研究，“言农事至详具”。（范麟：《安吴四种书后》）

包世臣论农业，执著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第一等的重要性。虽然，包世臣有农工商“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的说法，但在他的观念中，农工商三者的关系决非平起平坐。他再三申明道：“握金珠、枕钱币，餐之而不能饱也，衣之而不能温也，然则天下之富在农而已。”（《中衢一勺》卷 7，《说储上篇序》）坚信农业是天下财富的本源，包世臣认为“天下之土，养天下之民，至给也”。农业有坚挺的实力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自晚明徐光

启以来，屡有学者对人口增长过快深怀忧虑，他们认为，“地之所生”是个定数，“生齿日繁”则是个变数，在一定的社会财富极限内，人口急剧增长，势必出现“不敷口食”的危机。包世臣把此种观点斥为“不达事理之言”，在他看来，“人多则生(财)者愈众，庶为富基，岂有反以致贫者哉?”不承认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人口相对过剩的现象，否认人口相对过剩在现实生活中所带来的财富匮乏的后果，这无疑是包世臣社会经济思想中的重大失误。

对于乾隆以来日益加剧的农业危机，包世臣探究根源，以为弊病有三：首先，“一二言利之臣，方与搜括锱铢”。“为其上者，莫不以渔夺牟侵为务”。“农无所劝，相率为游惰”，失去生产积极性。其次，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力作率不如法”。例如，西北地区种植农作物讲求“广种薄收”，但是，“广种则粪力不给，薄收则无以偿本”，终导致农业的萧条。再次，许多地区广种烤烟一类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的耕作面积随之缩小，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因此，包世臣认为，要改善农业不景气的状况，就必须澄清吏治，“劝本厚生”(《安吴四种》卷 8，第 18 页)，与此同时，要普及先进的农业生产知识和农业技术，推进农业的发展。有鉴于此，包世臣一反士人“鄙弃农事，不加研究”(《安吴四种》，《庚辰杂著二》)的风气，展开了大量的农事研究，并撰成《郡县农政》一书。

《郡县农政》一书包括辨谷、任土、养种、作力、蚕桑、树植、畜牧等七节，书中详尽的介绍了各种粮食、蔬菜、瓜果等农作物和种植经验，并着重指出了选择良种、深耕土地、多施肥料以及兴修水利等环节对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根据历代累积的生产经验和广泛的农事考察，包世臣制定了一个不误农时的农副业生产计划，如“立春”以后，应“修农具、浴蚕、锄麦、织草帽、织箔、芟剪诸木枝烧树植地”。“雨水”以后，应“芟松竹、修篱、移桑、出牛粪、掐菜苔”等等。他阐述自己撰写《郡县农政》一书的动机

说：

> 窃谓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裒集农说，断以今宜，条畅旨趣，务在易晓。其有验而不可切日用者，则从芟除。言必切实，法可举行，无迂阔而远事，别为《郡县农政》……士君子或有所采择焉。（《安吴四种》卷25）

验之《郡县农政》所载，包世臣所说并非虚言。“言必切实”、“务在易晓”的《郡县农政》一书既是包世臣研究农事的重要产品，也生动地指示出这位学者务实的经世风格。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危机，包世臣设计了一个使民能“着业”也能“归农”的方案，这就是实行州县屯田。

屯田之议历代皆有提出与实际施行，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形形色色的屯田方案具有各自不同的意义。包世臣所设想的屯田，乃是每家每人分配荒地四亩，单丁八亩，由政府酌量给予农具和耕牛，帮助垦户解决生产上遇到的困难。垦出的荒地准如世业，不得典当，也不再属封建国家所有。与此同时，屯户对国家有出丁当兵的义务。

新垦荒地准如世业、不准典当意味着土地不准买卖，也意味着农民终生束缚于土地。屯户对国家有出丁当兵义务的规定则颇有古代兵农合一制的味道。在土地日益广泛地卷入流通领域，自由劳动日趋活跃、扩展的新经济形势下，包世臣的屯田方案可谓大大地不合时宜，其固守自然经济体系的文化本性在这里有充分的显现。

**二、龚自珍的《农宗》**

“语带锋芒”，随处刺戟专制政治的龚自珍也十分关注农业问题。早在青年时代，龚自珍就着意考察农业生产情况，并对不注意下情民隐的士大夫持批评态度：

> 田夫、野老、驺卒之所习熟，今学士大夫谢之，以为不屑

之，自珍知之，而以为创闻。（《龚自珍全集》，第 10 页）

嘉庆十八年（1812）华北大旱，龚自珍在外出途中特意向一位山东老人请教北方稍遇干旱农作物即大减产的原因，老人从北方土壤与南方土壤的区别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龚深受启发。后来，他读邸钞，发现乾隆初年即有人读到“东南之土肌理横，故宜水，西北之土肌理直，故不宜水”的道理，“积数年之疑豁然矣。”（《龚自珍全集》第 10 页）可见，龚自珍的眼光是向着生产实际、自然界实际的，并能把向民间学习和向书本学习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当时一般士人难以达到的知识水平。

对于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的农业及水利，作为浙江人的龚自珍更十分关注，他一方面赞扬清初以来的农业政策，“圣清田赋薄东南，民乐其田”。“大凡起江滨，尽浙以西，东际海，千里无旷土。”一方面又指出，由于超量垦荒，“水之故道，皆已为田”，东南水患正酝酿其间。龚自珍引用汉代之法，认为要想治水，“必遗地让水”。但现在地已尽垦为田，由官田还是由私田来徙地，已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处置不当便会引起变乱。龚自珍力主“乘无事之年”认真筹划解决。他晚年路过苏州，又向布政使裕谦陈吴中（江苏）水利之策。

对于北方农业，龚自珍也有诸多建议。他曾倡导北方种水稻，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著《最录邦畿水利图说》，研讨北京附近诸河流的水利问题；称赞元、明两代文士“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希望今人对西北与东南土壤土质异同加以具体研究；提议在北直隶（今河北）种植桑树，发展养蚕业。他在一首诗中说：“我观畿辅间，民贫非土贫，何不课以桑，治织纤纰训。”（《龚自珍全集》，第 507 页）龚自珍对农业生产的倾心关注，真可谓“无时不拳拳也。”（《龚自珍全集》第 624 页）

然而，真正能代表龚自珍农地改革思想的还是他于道光三

年(1823)撰写的《农宗》一文。

所谓"农宗"即借助于土地所有权把"农"(农地)与"宗"(宗法)结合起来,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一种按血缘关系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其设想大致如下:农业中的全体社会成员分为大宗、小宗、群宗及闲民四个等级。小宗及群宗又合称为余夫。开初各农户均为田百亩,之后长子为大宗继承这百亩土地;次子为小宗另分二十五亩土地,三子及四子为群宗也各分二十五亩土地;五子以上均为闲民,不能受田,须为同宗或别宗耕种。开始立宗时的大宗长子仍为大宗,以后各代大宗的长子也世为大宗。余子则依次为小宗、群宗及闲民。小宗之长仍为小宗,继承二十五亩土地;次子为群宗,另分二十五亩土地;三子以上为闲民。群宗之长子仍为群宗,继承二十五亩土地;次子以上为闲民,不分土地。闲民因无地而只能受雇于拥有土地的大宗及余夫等户。

大宗有地百亩,余夫有地二十五亩,对这些土地的经营,龚自珍也有详细规划,他的安排是:大宗有十口人,并役使闲民五人,除以十亩充宅地及生产场地,下余九十亩土地所产物品中,以十亩付所雇闲民,以三十亩充本族口粮,另以十亩生产桑、棉、果、蔬,再用三十亩所产作为商品,以出售所得来换取生产及生活资料等,而上缴的赋税也相当于十亩地所产。余夫家五口,雇用一人,宅院等占地五亩,生产口粮需地十亩,下余十亩各以其四分之一即二亩半地的产品分别充作税、圃、粢、佃之需。

龚自珍的农宗说是一个一揽子解决农地危机及其它社会问题的方案。

首先,龚自珍早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所著的《平均篇》中即指出社会动乱、人民流离的根本原因是贫富"大不相齐"。他认为,"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基于此种想法,龚自珍企图通过《农宗》中设计的农地分配方案,在承认"小不相齐"的前提

下，克服财富分配占有“大不相齐”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尖锐剧烈的社会矛盾。

其次，清中叶以来，闲民阶层日趋扩大，所谓“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龚自珍企图通过农宗组织，把闲民纳入宗法秩序和生产中，清除这一阶层扰乱社会秩序的隐患。

再次，官僚贵族的渔夺牟侵、兼并土地是危及农业稳定的一大祸害，龚自珍企望通过农宗组织的建立，造成“贵不夺宗祭，不以朝政乱田政”的大势，从而杜绝权贵兼并土地，确保大宗及余夫依靠宗法关系所取得的地位。（以上均见《龚自珍全集》中的《农宗》一节）

假如说，龚自珍的《平均篇》揭示了封建制度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贫富不均，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的话，那么，在农宗组织的设计中，龚自珍便陷入了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想。而产生这一空想的前提有二：首先，他把农业组织视为整个社会构造的模式，他所谓的“先由下而渐有上”即指由占有土地为农而逐渐形成上层建筑。其次，他将宗法制看作思想文化理想样式以及挽救封建经济于危亡的有力手段。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运动的趋向上观看，龚自珍的农宗说都是幼稚而荒唐的想法，这一事实颇为生动地表明，龚自珍纵然有批判封建专制的无畏勇气以及“感慨为苍生”的热情，但他在经济理论上大不及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经世派人士。胡寄窗在论龚自珍经济思想时有一段形象比喻：经济思想是“极不平坦的抽象思维的猎场”，骑着公羊学这样“一匹驾车笨马”去打猎，是不会有多少收获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下），第659页）这或许是关于龚自珍经济思想失误的重要解释。

### 三、林则徐发展农业生产的努力

在农业问题上，林则徐一如以往风格，乏于理论上的论述，

却富于务实的活动。

深信"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之本务"(林则徐：《开治水田有益国计民生》，《畿辅水利议》)的林则徐，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热切关注。嘉庆二十四年(1819)，初登仕途的林则徐派充云南乡试正考官，在由北京至昆明的旅途中，他对各地农业情形甚为注意。五月十三日，林则徐至定州(今河北定县)，在日记中，他记载道："自定兴至此皆苦旱，黍苗出土不及寸，望雨甚切。"五月十九日，林则徐经磁州(今河北磁县)，对州官蒋擢在此地开凿的水渠大感兴趣。日记中，他描述"双渠夹道，其清如镜"、"至今稻田，资其沾溉"的情景，并感叹道："噫！何地不可兴利，顾司牧奚如耳！"六月二十一日，辰州(今湖南沅陵)降大雨，持续已久的旱情缓和，林则徐心情振奋地在日记中记叙道："是晚雷雨大作，滂沱达旦。此地已旱四十余日，得此喜雨，交相庆也。"(《林则徐集·日记》第70—76页)如上记录，无不渗透着林则徐对农业的真诚关心。

为了推进农业生产发展，林则徐在多年仕宦生涯中致力于新生产技术与新生产工具的推广，实绩累累。

道光七年(1827)林则徐北上路过苏州，林则徐的友人潘曾沂其时在本乡所设丰豫义庄试行区田法颇有成效。区田法的大旨是"深耕早种，稀种多收"。林则徐甚为赞赏此种农耕方法，他特作《区田歌为潘功甫舍人作》一诗，向农民推广、介绍，歌中写道：

> 田父尔勿喧，听我区田歌。区田所种少为贵，收获乃倍常田多。……一区尺五寸，撒种但喜疏罗罗，及其渐挺出茎叶，畅茂皆分科，六度壅泥固其本，重重厚护如深窝，疾风不偃旱不槁，那有禾头生耳谷化螺，此术尔不信，但看丰豫庄中稻熟千牛驮。(《云左山房诗钞》卷2)

歌中，林则徐以浅显的语言以及对于农业生产的娴熟知识向农夫介绍了区田法的优越性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法，其拳拳之意溢于言表。道光十三年(1833)，潘曾沂在《齐(彦槐)新制龙尾车甚宜于区田且合二水入田之梦喜赋此诗并简林(则徐)、陈(銮)》一诗的注中说："近年丰豫庄农书(指潘氏所撰《区田书》)渐行于他省而浙之宁绍两郡人信者独众。林中丞在河南时教种有验"。可见林则徐对区田法不仅大力支持，而且亲自"教种"推广。

道光十三年，算学家齐彦槐参照泰西水法制成新式水车——龙尾车。龙尾车"一车当五人当十，用力甚少成功多。八家同井办一具，旱涝不患田无禾"，其功效与"翻车一架五人踏"的老式水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得悉龙尾车制成，亲到现场观看试用。齐彦槐在《龙尾车歌》中记叙当时的情景说：

侯臣中丞今大贤，讲求水利筹农田。
闻余述作亟欲睹，二龙跃上荆溪船。
草桥试车日卓午，倾城士女观如堵。
云蒸雾涌喷薄来，欢呼动地声如雷。
塘宽十亩深二尺，车乾七寸才三刻。
中丞大笑与我言，此利不止关田园。
迩来洪湖拍天际，怀襄往往为民厉。
千车倒挽刷黄流，两坝三河可长闭。
浏河淤塞久欲疏，车水迟迟恐糜费。
伐轮百部寘河滨，畚锸兴工日可计。

从齐彦槐诗中可见，林则徐在观看龙尾车试用时考虑得十分广远，不仅想到它抗旱的功用，而且意欲将它运用于治水。齐彦槐在《龙尾车歌》后注曰："林少穆中丞一见(龙尾车)大喜，欲奏而广行之。"这正是林则徐当时心情的写照。

在提高粮食产量，积极推行双季稻的种植方面，林则徐也做了大量工作。

江南素来不种早稻，人们观念根深蒂固。林则徐深知一般性地宣传早稻可种植于江南，“庶民弗信，有难于口舌争者”（林则徐：《江南催耕课稻编叙》，见李彦章《榕园文钞》卷3）。于是，他“就官廨前后赁民田数亩，具耦锄褥”，试种水稻，以实际成效来打消人们头脑中的疑虑。和那些“弗躬弗亲”、不接触生产劳动的官僚贵族相比较，林则徐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

道光十三年，林则徐的同年友李彦章署江苏按察使。李彦章曾在广西思恩府“劝民广垦水田，试栽早稻。是岁两种两熟，民始以为可行”（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序》、《榕园文钞》卷3）。林则徐即登门拜访，了解李彦章在广西劝种早稻的情形。“彦章既举向之所知，及在粤东劝早稻之法以对”。“日谋所以早种早收之法”的林则徐大为高兴，请李彦章“辑取古今早稻品类、时地及一熟再熟之种”，汇编为《江南催耕课稻编》。全书共十条：“曰国朝劝早稻之令，曰春耕以顺天时，曰早种以因地利，曰早稻原始，曰早稻之时，曰早稻之法，曰各种早稻之种，曰江南早稻之种，曰各省再熟之种，曰江南再熟之稻。”书成，林则徐亲为之序，并在序中力驳江南不宜种植早稻的保守论调，表现出一位经世致用人士对国计民生的热忱关怀。

在经理农务的多年实践中，林则徐深知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水利有着密切联系，他指出：

> 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林则徐集·奏稿四》（上），第238页）
>
> 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为农田之本不可失修。（《林则徐集·奏稿四》（上），第238页）

有鉴于此，林则徐在江苏任上与陶澍相与配合，主持了一系列水

利工程，如治理刘河、白茆河，疏浚徒阳运河、练湖，建筑闸坝。修建宝山、华亭两县临海海塘，改善镇江一带运河河道的疏通。这些工程完成后，迅即发挥防洪抗涝的功效。道光十四年七月，“苏、淞一带，大雨倾盆。太湖附近诸山，陡发蛟水，处处盛涨，拍岸盈堤”，“林公急檄太仓州决刘河、白茆大坝，不二日水退数尺，岁仍大稔”（《魏源集》上册，第39页）。桂超万《娄水春》记叙林则徐兴修水利的积极作用说：

> 娄江泥，昔齐堤。娄江水，今成溪。昔愁霖，良亩沉，今有尾闾沧溟深。昔苦旱，嘉禾燋，今有巨泽水田满。洞开泻雨，洞闭屯云，河伯顺轨，潮神回轮。

在陶澍、林则徐的水利兴修中“咸沾其得”的江苏民众对陶、林二人深为崇敬。他们称陶澍为“陶青天”，林则徐为“林青天”。当林则徐“阅视两河”，“村民多设香案，欢迎于道。”（陈銮：《祝少穆中丞五十寿重次千文》）其虔诚感激心情溢于言表。

值得指出的是，陶澍与林则徐在江苏兴修水利，“其经费则皆拮据于财赋劳瘁之余”。面临重重困难，“非大府恫心民瘼，断莫之举也”（《魏源集》上册，第397页）。在水利兴修过程中，林则徐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实干家风格。他查勘水利工程，“凡树石、桥梁、步头，皆予锲暗记”，“其尺寸符合或过深者，而一览而得，或奖或斥，人人惊服”（黄冕：《书林文忠公逸事》）。钱宝琛《壬癸志稿》卷一《名宦·大仓州》描述说：

> 则徐每坐小舟，数往来河中，察勤惰，测浅深，与役人相劳苦，不烦供亿。

在历朝历代的官僚大员中，此种务实的精神是罕见的，亦是令人赞叹的。

道光前后经世派孜孜不倦于农事研究与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固然出之于传统重农思想，未脱自然经济思想体系，但是，他们

对国计民生的真切关怀以及为振兴农业、发展农业所作的种种努力却令人尊敬。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威胁日益加剧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拯救积贫积弱、改变农业一蹶不振面貌的努力，客观上具有维护民族经济的进步意义。

# 第三十七章　道咸年间经世派的史地学

清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派雄踞学坛。大多史学家热衷于旧史的辨伪、校注、考订、辑佚以及补正改作。地理学家也多局限于古地理考证，正如梁启超所说："（乾嘉时）一切学问皆倾向于考古，地理亦难逃例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初史地学的经世致用风格被大大淡化。

嘉、道以还，史地学一味考古的风习发生急剧转化。伴随着经世派议政之风的勃兴，一股具有活泼生命力的史地学卓然崛起。如果说，嘉、道、咸年间经世派研讨漕、河、盐、农诸大政是为着解除"内忧"，那么，经世派的史地学则主要是应对"外患"的产物。姚莹在论及《康辖纪行》的写作时说，他之所以"喋血饮恨而为此书"，是为了"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蜮"。（《东溟文后集》卷8）这一言论颇能代表道咸间经世派史地学的主要精神。

## 第一节　探究西北史地，以筹边防

道咸经世派史地学的重要方面，乃是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异军突起，"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以致赫然成为当

时的“显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道咸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崛起,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清代康、雍、乾三朝,清政府大力经营西北边疆,经过平定准部、回部的多年征战,清政府终于有效地实现了对包括新疆、内蒙、西藏、青海等地区在内的西北边疆的管理。由于西北边疆“道里迢遥,非前代兵力所能至,即或偶涉其地,而终弗能有”。故从来的边疆史地研究中,西北史地研究是一薄弱环节。“记载者依稀影响,无由核其实”(《四库全书总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提要》)。清王朝开拓边疆,将西北地区“咸隶版图”,“列戍开屯,画疆置郡”,不仅建立起一个疆域空前辽阔的大帝国,而且开扩了学者的眼界,孕育了西北边疆史地学。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钱大昕利用乾隆年间在《永乐大典》一书中发现的《元秘史》和《皇元圣武亲征录》以及他在苏州玄妙观发现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书研究元蒙史,便是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滥觞。由于边疆史地学对认识中国边疆民族的历史和地理极具重要意义,故这门学科本身就是经世致用之学。

然而,西北史地研究在道咸间蔚为“显学”,最为根本的原因乃是中国边疆危机的尖锐刺激。

嘉庆以降,清王朝走向衰败。其江河日下之势引起“负经世之志”的士大夫们的极大忧虑。由于历史上每当中央政权衰微之际,边疆少数民族往往会对中原地区形成威胁,发生严重的边患,加之势力已伸入中亚细亚的沙俄和英国对中国西北地区虎视眈眈,造成日趋严重的边疆危机,故“道咸而后,下逮同光”,经世学者注目于多事的边陲,其涉及的地域既包括从东北至西北的边疆地带如黑龙江、内外蒙古、新疆、宁夏、甘肃、青海、西藏等区域,又包括中国版图以外与中国西北边疆相接壤的俄国、中

亚、印度等国家与地区。其研究内容则有“〈1〉考订与研究这一地区的高山、河流、沙漠、草原、都会、城址与边界；〈2〉研究与记录这一区域内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沿革、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及物产；〈3〉注释与勘误历代学者关于西北史地著作；〈4〉就清政府边疆政策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有人统计，自清入关到清帝逊位不到三百年的时向内，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文章达300余种，作者达200多人，而其中80%的著作产生于道光以后（参见王记录：《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述论》，《兰州学刊》1989年第6期）。其阵容与成果皆可称得上洋洋大观。

道咸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大致可以鸦片战争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研究主要着眼于开发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其代表人物有祁韵士、徐松、沈垚、龚自珍、张穆，后期研究意在巩固边防，抵御外侮，其代表人物为何秋涛。

**一、祁韵士、徐松的边疆史地研究**

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开先路者是山西寿阳的祁韵士。祁韵士（1751—1815）字鹤皋，乾隆后期进士，任国史馆纂修期间，留心西域文献，并预修《蒙古王公表传》。此书之撰修是因为“内札萨克四十九旗，外札萨克喀尔喀等二百余旗，以至西藏及回部纠纷杂乱，皆无文献可征据”。祁韵士“乃悉发库贮红本，寻其端绪，每于灰尘坌积中忽有所得，如获异闻。各按部落之传，要以见诸实录、红本为准，又取《皇舆全图》以定地界方向，其王公支派源流，则核以理藩院所存世谱”，最后成书。（《清史稿·祁韵士传》）。嘉庆十年（1805），祁韵士坐事戍伊犁，本来就对西北边疆史地深感兴趣的祁韵士由此而“亲履其地，多所周历，得自目睹”。“而昔年备员史职，又尝伏读御制、文集、诗及平定准噶尔回部方略二书，故于新疆旧事知之最详，颇堪自信。”（祁韵士：《新疆要略·自叙》）在此基础上，祁韵士著成《新疆要略》、《西域译

地》、《西陲总统事略》、《万里行程》等书。这一系列著作的诞生标志着系统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开始。祁韵士在谈到西北史地研究时说："近年士大夫于役西陲，率携琐谈、闻见录等书为枕中秘，惜所载不免附会失实。又于开辟新疆之始末，仅就传闻耳食为之演叙，讹舛尤多。夫记载地理之书，体裁近史，贵乎简要。倘不足以信今而证古，是无益之书，可以不作。"（祁韵士：《西陲要略》序）足见其治西北史地学带有明显的经世意图。

徐松（1781—1848），字星伯，浙江上虞人，嘉庆十年进士，初官编修，后任湖南学政。徐松"生前仕宦极其蹭蹬，身后并无传铭"（缪荃孙：《星伯先生小集》，《烟画东堂小品》第7册）。但他在舆地之学方面的造诣却深为同时代的学者钦佩。左宗棠的哥哥左宗植曾称赞道："道光中徐君星伯精于西域舆地水道之学。当时所与往还者多海内高才博闻，如李君申耆、魏君默深，其表表者。"（左宗植：《慎庵文钞》卷下，《书罗研生所藏徐星伯家书札》）吴昌绶在《定庵先生年谱》中也记叙道："大兴徐星伯舍人精于西北地理，先成哈萨克、布鲁特二表，先生（即龚自珍）叹为当代奇作，遂沿用之。"由此可见，徐松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

徐松与祁韵士关系甚密，其命运也与祁氏相似。嘉庆十七年（1812）亦即祁韵士坐事戍伊犁七年后，徐松亦获罪遣戍伊犁。徐松抵新疆后，伊犁将军松筠嘱徐松续修、扩撰祁韵士创纂的《伊犁总统事略》，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徐松遍历南北疆，行程逾万里，"即览其山川城邑，考其建官设屯，旁及和阗、乌什、塔尔巴哈台诸城之舆图，回部哈萨克布鲁特种人之流派。"（徐松：《新疆赋·赋序》）书成后，以松筠名奏上，钦定武英殿刊本，称为《新疆识略》。这部被龚自珍誉为"当代奇作"的西北地理专书，为徐松毕生功力所萃。

在遣戍伊犁六年期间，徐松广为考察新疆舆地，他"携开方

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乃遍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之为记"(徐松：《西域水道记序》)。在此基础上，徐松撰成《西域水道记》、《新疆事略》、《西域水道记校补》、《汉书·西域传补注》，并有《新疆赋》2卷。《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城水道记》三书被称为《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简称《西域三种》，一时为留心新疆事务者争相诵阅。

徐松研究西北史地，意在通过测其道里，明其险要，察其风土，为边疆开发与边地安堵提供丰富的资料。预感到俄国将为西北边疆的大患，徐松对著作中凡涉及中俄边界之处，皆一再说明与考订，其塞防思想溢于言表。徐松的同年知友彭邦畴对徐松深为钦佩，他说："自来放逐之徒，其发为文章，大都反复以辨其诬，愤激以行志，即或寓忧危之旨，写劳苦之词，亦令观者读不终篇，愀然掩卷"，但徐松却"才不为世用，乃著经世书"。"足迹周寰区"，"下笔思济物"(《西域水道记·水道记题词》)。此种浑忘个人命运困厄而唯以边圉安危、国运盛衰为念的意趣，正是道咸经世实学的真精神。

祁韵士、徐松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奠定了清代边疆史地学的基础，后来治西北史地的学者，无不以祁、徐两人的研究成果为前行基地。

## 二、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

开晚清经世风气的龚自珍，不仅是一位"讥切时政，诋诽专制"的健将，而且"于史长西北舆地"。(《魏源集》上册，第239页)著名的《西域置行省议》即龚自珍研究西北史地的代表作。

龚自珍少年时便对舆地学有强烈的兴趣，成年后他追忆道："幼有志，欲编览皇朝舆地，铭颂其山大川"(《龚自珍全集》第415页)，气魄颇为远大。嘉庆二十五年(1820)，天山南路喀什喀

尔回族首领张格尔叛乱，朝野为之震动。此间，龚自珍以举人任内阁中书职。有感于张格尔叛乱所造成的震荡，龚自珍决计用内阁典藏，广泛钻研西北舆地，作《西域置行省议》，就西北问题提出全方位的治理建策。

《西域置行省议》是龚自珍"筹之两年而成"(《龚自珍全集》第111页)的力作。文中，龚自珍首先追溯清代庞大版图形成的经过，界定"西域"的概念，并特别称赞乾隆帝"承祖宗之兵力，兼用东南北之众，开拓西边"(《龚自珍全集》第105页)的历史功绩。鉴于清初以来西域尚未设省，只是行政松散的藩部，龚自珍力主中央加强对边疆的管理，在天山南北两路亦即准部和回部所在区域，仿各省之例，设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其下又置知府、知州、知县。龚自珍还运用他渊博的舆地知识，对西域府州县的划分提出了具体意见。

为了增强西北边疆的防务实力，龚自珍力主迁徙内地百姓到西北垦荒戍边。对这一战略计划，龚自珍从多方面加以论证并设计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他指出，中国内地"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龚自珍全集》第106页)反之，西北则人烟稀少，"地纵数千里"。因此，在人口政策上，"应请大募京师游食非士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徙"。南方各省因情形不一，所采取迁徙政策亦相应不同。如江浙之民，"筋力柔弱，道路险远，易以生怨，毋庸议"。"四川地广人稀，不宜再徙"。江西、福建两省种鸦片者多，"大为害中国"，应大量西迁。龚自珍还特别提到，"各省驻防旗人，生齿日繁，南漕不给"，理应西徙(《龚自珍全集》，第106—107页)，这更是大胆之议。

对于西迁之民的安置问题，龚自珍也有周详的设计，他建

议，“当行者，官给每户盘费若干”。“到西，分插南北两路后，官给蒙古帐房一间，牛犁具、籽种备。”(《龚自珍全集》第107页)

龚自珍指出，西域设行省以及徙民屯边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虽然“现在所费极厚，所建极繁，所更张极大”，但是，“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龚自珍全集》第111页)。虽然，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未被当局采纳，但他自信他的设想“五十年中言定验”(《龚自珍全集》第516页)。果然，六十年后的光绪十年(1884)，新疆设为行省。李鸿章对龚自珍的远见卓识十分钦佩，他说：

> 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轫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实写于嘉庆末年——引者)，而卒大设施于今日。(《黑龙江述略序》)

除被赞誉为“经画边陲至计”的《西域置行省议》之外，龚自珍关于西北边疆问题还多有议论和著述。道光元年(1821)，龚自珍上书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兴，备论天山南路事宜，对吐鲁番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分析得极为透彻。他说：

> 吐鲁番为南路建首地，一王归然，有仆三千户，皆以吐鲁番为望。……故吐鲁番安，而四大城皆安；四大城安，而天山南路举安；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天山北路安，而安西南路北路举安。伊犁将军无内顾之忧，兰州总督无外顾之忧。(《龚自珍全集》第311页)

此外，龚自珍在《北路安插议》中探讨西北立行省后，如何安排土尔扈特人的问题。(见《龚自珍全集》第112页)在《上国史馆总裁提纲总纂书》中论西北塞外诸部世系源流、山川形势，并就西北诸地的经纬度数订正《清一统志》之疏漏。(见《龚自珍全集》第312—318页)在《御试安边绥远疏》中批评以往的“安边之略，不过羁縻之，控制之”，其结果不仅不能长保边疆安定，而且边防军

全赖内地供应给养，经济上不划算，军事上也存在极大的危险性。龚自珍认为边防的长治久安之策是“以边安边”，即在天山南路开垦农田，保证供应，在天山北路训练精兵，达到“足食足兵”的效应，“常则不仰饷于内地十七省，变则不仰兵于东三省”(《龚自珍全集》第113页)，从而操稳胜之券。龚自珍还著《对策》一文，分析清代的西北国防形势与汉唐的差别：“皇朝先平准部，后平回部，为古未有，而中外一家，情形与古大不同”，故清代的边疆政策不能照搬汉唐。由此，龚自珍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思想：

> 经史之言，譬方书也，施诸后世之孰缓、孰亟，譬用药也。……至夫展布有次第，取舍有异同，则不必泥乎经、史。(《龚自珍全集》第117页)

这种从当代实际出发决定当代政策的思想，正是龚自珍经世思想的精髓所在。

由于龚自珍对西北史地颇有研究，程同文修纂《清会典》时，“其《理藩院》一门及青海、西藏各图”专请龚自珍校理(《龚自珍全集》第514页，《己亥杂诗》附注)。龚自珍又曾规划编撰《蒙古图志》、为此，他搜辑了大量资料，并著有《蒙古像教志类》、《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台卡志序》、《蒙古声类表序》、《蒙古寄爵表序》等文。后因书楼失火，“此书稿本之半，及为此书而收聚之档册图志，世所弗恒见者，尽毁。遂辍业弗为”(《龚自珍全集》第308页)。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龚自珍注意边疆国防问题，其视线并不限于西北和北方。由于海防的需要，龚自珍对东南沿海一带的形势、山川、风土等等都十分重视。在《书番禺许君》一文中，龚自珍曾专议广东、广西二省的文化地理特征：“粤之东，维帝南服，而天下之雄也。其山怪，其土阻，其水大壑，其物产英诡，其人沉雄多大略。其大政三：

曰榷盐、曰舟师，曰互市；三者恒有联，事相倚也。”（《龚自珍全集》第178页）足见龚自珍对东南海疆也有一定的研究。此外，龚自珍还有《东南罢番舶议》一文，其文重点在于讨论如何对付西方殖民者在东南沿海活动的问题。龚自珍在《己亥杂诗》的按语中说，曾有人拟将此文与《西域署行省议》“合刊”（见《龚自珍全集》第516页），可见二文的主旨有内在联系，而这种联系实际上体现出龚自珍国防思想的系统性以及目光的锐利和广阔。

**三、张穆与《蒙古游牧记》**

清末民初政论家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一书在论及道咸间史地学的兴盛时，有如下一段议论：

> 谈辽、金、元史地者，京师以张穆为滥觞。论东南、西南海史地者，以魏默深为先河。

在道咸史地学领域与魏源并驾齐驱的张穆确是晚清西北史地研究中的健将。假如说，19世纪初期“边徼地理之研究，大率由好学之谪宦或流寓发其端”（祁俊藻：《蒙古游牧记序》），带有一定的机遇性，那么，张穆的研究标志着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入和自觉。

出生于山西平定的张穆（1805—1849）初名瀛暹，字诵风，又字石州、石舟、硕州，别署季翘、自斋。道光十九年（1839）他参加顺天乡试，携带瓶酒入考场，结果与监考人员发生冲突，被摈斥于考场之外，从此张穆不求仕进，长期住在北京宣武门外，一意作学问。

张穆治学，力主经世致用。他有一段名言：

> 当今天下多故，农桑盐铁、河工海防、民风土习，何一事不当讲求?!（《自斋文集》卷首《祁隽藻序》）

此种面向社会和国计民生的治学精神，正是道咸经世实学的突出性格。以经世为学术目标，张穆对兵制、农政、水利、海运、钱法

都有精湛研究，而西北史更是他擅长的领域。《落帆楼稿序》说，张穆与徐松、沈垚等人交好，常在一起“剧谈西北边外地理”，可见当时的京师已形成一个专门讲求西北舆地学的学者群，而张穆便是其中成员之一，那本“致力十年，稿凡屡易”的《蒙古游牧记》便是他苦心孤诣研究西北史地的代表作①。

《蒙古游牧记》凡16卷，该书按蒙古历史上各盟旗，分记内外蒙、青海、新疆等地的蒙古各部落历史、王公系谱事迹、游牧所在、道里四至、盟旗沿革、山川城堡、古迹庙宇、长伦驿站、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以及清时各部封建领主的封爵功勋和与清朝的会盟臣贡关系。无论是研究蒙古各部落盟旗的历史还是研究满蒙统治者的政治关系史以及内外蒙、青海、新疆等地区的历史地理，该书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有两大特点：

一是广征博引、资料翔实。张穆虽然没有亲往西北考察，但他广泛参考了历代正史（特别是辽金元史）以及各种稗史、碑碣方志、官修方略等，清代学者的考证论著亦被广泛纳入视野。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张穆精心选择史料，对于实地考察所得和第一手原始材料尤为重视，其用力之勤令人叹服。

二是着意于经世致用。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固然记叙详备，但却不是纯粹的资料汇集，而是具有明确的“致用”目的。张穆自述撰《蒙古游牧记》的动机有二，首先，蒙古“部落强盛，关系中国盛衰”（《蒙古游牧记》卷首祁隽藻序）。但长期以来，沿边各地区如西藏、新疆、云南、吉林等地区皆有专书，唯独蒙古“未有专书”。“《钦定一统志》、《会典》虽亦兼及藩部，而卷帙重大，流传匪易，学古之士，尚多憾其方域，疲于考察。”（张穆：《自斋文集》卷

① 张穆虽“致力十年”于《蒙古游牧记》一书，但逝世时尚未完稿，经过他的朋友何秋涛校订，并排比补辑末四卷，才得以最后成书。

1,《蒙古游牧记·自序》)这种情形与多民族统一国家显然是不相适应的,《蒙古游牧记》的撰写就是要填补这一空白,揭示蒙古真实的历史和现状,使朝野上下对蒙古有较为真切和全面的了解。其次,内外蒙古浩瀚千里,是我国北部的边防屏藩,《蒙古游牧记》中关于这一地区山川城堡的详细记载,有助于清王朝"明边防",加强边疆防守。再次,蒙古与中原自清代以来具有紧密联系,巩固 这种联系,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需要。张穆在《蒙古游牧记》中通过"缀古通今",盛赞祖国的辽阔和统一,强调中央和内、外蒙的统属关系,正是意在国家的大一统。作为一位"有心经世者",张穆还十分关注蒙古地区自然经济环境。他在《蒙古游牧记》中每述一地,必详引前人有关记载,记其水道泉源流向,指出何处有水草宜稼穑畜牧,何处水咸不可食,从而为蒙古地区农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汉学的缜密与经世致用精神的结合,使《蒙古游牧记》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祁隽藻在论《蒙古游牧记》时说:

> 陈古文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

读者因此从此书中得到双重收益,诚所谓:"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之益。"(祁隽藻:《蒙古游牧记·序》)这正是经世学者张穆在晚清边疆史地研究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四、何秋涛与《朔方备乘》**

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虽然修撰于鸦片战争前后,但其着眼点主要还是在于开发边疆、维护国家统一。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则受鸦片战争后时代巨变的刺激,目光转向巩固边防、抵御外侮,从而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

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人,道光进士,授刑

部主事。他自幼对天下地理感兴趣，黄彭年《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说，何秋涛"自为儿时，能举天下府厅州县名，数其四至"(《续碑传集》卷20)。其后，何秋涛虽"专精汉学"，但决不沉溺于鱼虫考辨，而是"益究经世之务"，"于经史百家之词，事物之理，考证钩折，务穷其源委，较其异同，而要归诸实用"。对于西北地理研究，他更有浓酣兴趣。咸丰三年(1853)，何秋涛撰《北徼汇编》，并于八年将是书进奏于咸丰帝。咸丰帝阅后，称"此书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具见学有根柢"，并赐名《朔方备乘》。

何秋涛《朔方备乘》之作，乃是有感于沙俄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造成北部边疆的巨大危机。为此，他将目光投向历史上的中俄关系以及北部边境的防守，"尝谓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乃采官私载籍"，撰《朔方备乘》(黄彭年：《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续碑传集》卷20)。他在该书凡例中明确阐明著书目的说：

> 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

其经世致用意旨溢于言表。

从以上旨趣出发，《朔方备乘》在研究的空间范围上突破西北地区，将目光投向北徼与俄罗斯关联者，其范围远及俄国西伯利亚、中亚及东欧。在时间纵轴线上，《朔方备乘》"自汉晋隋唐迄于明季，又自国朝康熙、乾隆迄于道光"，其范围涉及历代北徼用兵、清代中俄交涉以及中、俄两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其宏大规模超过祁韵士、徐松、张穆等人的西北史地研究。在这部关于北徼边防的专书中，何秋涛"考疆域而辨形势"，对中俄边界进行了系统研究，其意义甚为重大。在研究中，何秋涛发现以往关于中俄

边界的一些记载有失误之处，他详加论述，加以纠正。如“近人著述，或以为黑龙江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始入版图”，何秋涛认为，这一说法“失考订矣”。他证诸史实指出，早在唐时，黑龙江地区便已入我国版图，皇太极于天聪八年(1634)十二月派遣大将征服黑龙江全境后，“远近部落，相率来归，皆号新满洲”。俄罗斯是在清统一黑龙江地区以后，“始来临雅克萨地，筑城以居，侵掠赫哲、费雅喀诸部，皆清顺治二年(1645)以后之事，则黑龙江先属于我朝，而俄罗斯之兵争在后，年月班班可考”(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 1)。他还明确指出：根据《尼布楚条约》，划给中俄边界的尼布楚城“本中国蒙古属地，初非罗刹所有，亦非瓯脱之区”(《朔方备乘》卷 15)。这些关于中俄边界模糊问题的考察，是何秋涛对边疆史地的一大贡献。

在深入研究北部边疆现状与俄罗斯扩张态势的基础上，何秋涛于《朔方备乘》中就边境防务问题提出了若干具有战略眼光的见解。他指出，俄罗斯虽在哈萨克以外，距我边地卡伦尚有千数百里之途，但由于哈萨克诸部无城廓，迁徙不常，是以俄罗斯人每每可直至卡伦之外，因而，何秋涛认为，“北徼喀伦(即卡伦)之设，即伊犁等处亦不容或略矣”，否则，俄罗斯便可能乘虚而入，实现侵吞中国疆土的野心。以后事态发展印证了何秋涛眼力的准确，就在何秋涛去世后两年，沙俄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南北 44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去。此外，在东北边防上，何秋涛认为，吉林东北原东海诸部属地是防御俄罗斯入侵的战略要地。他指出：“吉林东北隅三姓副都统地，与俄罗斯密迩，三姓所属打牲、采捕诸部属，即旧时东海诸部，慕德向化，久为编氓，是则为盛京屏障者吉林也，为吉林根本者东海诸部也。”因此，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以专篇记东海事迹，并着意向清政府强调：“北徼

边防，不可不留意于东海矣。”（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何秋涛关于边境防务的建策，流溢出其拳拳爱国之心以及富于远见的战略眼光，其价值弥足珍贵。

在《朔方备乘》中，何秋涛还提出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为了有效地对付外国侵略，必须放开眼光，“集夷务以烛情伪”，打破昧于外情的陋习。为此，他努力搜求有关俄国的资料，对俄国的历史、地理、政区、户口、文化、宗教、民族、习俗和物产进行了较为系统完整的介绍。《朔方备乘》一书因而不仅仅是一部西北史地研究专书，而且具有开眼看世界的深邃意味。

何秋涛“专精汉学”，治学严谨，他在《朔方备乘》中对自明末以迄道光朝的十八部涉及北方边疆史地的著述加以精审考订，并广采博取有关资料，“务求详备”。他曾自述《朔方备乘》一书在取材上的四个特点：“一曰本钦定之书，以正传伪；二曰据历代正史，以证古迹；三曰汇中外舆图，以订山川；四曰搜稗官外纪，以资考核”。《朔方备乘》因此成为一部北方边疆史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梁启超曾盛赞《朔方备乘》“有组织，有别裁，虽今日读之，尚不失为一名著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是对《朔方备乘》一书学术价值的恰当评价。

## 第二节　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

与探究西北史地潮流相并行，道咸间的中国史学界兴起了“谈瀛海故实”的研究域外史地的热潮，一股“开眼看世界”的新风勃然而起。

### 一、从茫昧自安到“开眼看世界”

道咸经世派以较为开放的心态关注、研究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称“泰西”)，是一件超越前人习惯性思维定势的事情，囿于中华文化中心主义与盲目的文化优越感，中国人向来是从“广异闻”的角度对待关于外域的报道和消息，而无意认真加以“询问考求”，其认识自然模糊、肤浅乃至无知。

定稿于雍正十三年(1735)，刊行于乾隆四年(1739)的《明史·外国传》，反映了自明末迄于清中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水平，这就是仍然以“天朝上国”俯视“夷狄蛮貊”的态度，看待开始走向近代社会的欧洲列国。尽管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殖民者在明朝时即已相继东来，并与中国有战争、贸易等交往，但是，《明史·外国传》却把西班牙、葡萄牙笼统称为“佛朗机”，并说“佛郎机，近满剌加(麻六甲)”，这显系错误观念。晚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首次将“五大洲”之说与新的世界知识向中国人介绍，《明史》却以为利玛窦“所言风俗物产多夸”，“其说荒渺莫考”。此种情形至乾隆朝依然如故。乾隆年间撰修的《大清一统志》沿《明史》之误，称“葡萄牙近满剌加，信佛教”。《清朝文献通考》袭《明史》之说，斥“意达里亚人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谈海’之说，……彼所称五大洲之说，语涉狂诞”。修撰于同一时期的《皇朝通典》则记载道：“法兰西占据澳门，土产象犀”。对于西班牙，中国人亦“不审所在”，“以其商船皆自吕宋转市来，又以其国强越吕宋，故称之曰‘大吕宋’以别”(王芝：《海客日谭》卷3。英国取代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之后，中国人又把英国与荷兰等国混为一团。成书于乾隆年间的《澳门纪略》在谈到荷兰时便说，“(荷兰)今又析其名为英吉利”，这无疑是谬以千里。夏燮《欧罗巴洲考》指出：“盖自佛兰西屡犯边境，朝廷加意防守，诸番之至者，悉疑为佛郎机假托。”其荒谬可以想见。以后，美国人来到广州，清政府又将美国人和英国人

"牵混一气","莫悉其离合",以致两国商人都向两广总督提出强烈要求,希望"不要把我们与他们混在一起"。至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的"言世界地理"的"西人之书",士大夫们或"以西洋人外之,莫有究其说者"(姚莹:《康辖纪行》卷16),或"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之"(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此而来,乾隆进士杨复吉把加里曼丹岛与菲律宾群岛当作南北美洲;嘉道间的大学问家阮元、梁廷枏等人则把美洲和非洲混为一团,称美洲在非洲境内。林则徐到广东一段时间后,也还认为土耳其是美国的一部分。朝野上下的世界知识一片混乱,无知而又可悲。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坚船利炮无情地撼摇着帝国大厦,然而,此时的国人仍然是"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该年十月,伊里布家人张喜赴定海与英军商议释俘及退兵事。张喜屡屡向英人发问:"英国在中国之何方?""鸦片产于何处?""英国与中国相通始于何时?""英国之王果系女人?多少年纪?何名?"假如说,张喜只是一介家人,其茫昧无知尚有可恕之处,那么,最高决策者的同样无知便令人不得不惊讶万分了。道光二十二年亦即中英开战后两年,道光皇帝下谕,著奕经、达洪阿等官员向"夷俘"了解:"该国地方周围几许?""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该国制造鸦片卖给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或另有诡谋?"与此同时,关于英国军事力量的种种荒谬情报也纷至沓来。英军腿缠绑腿,林则徐深信他们"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英军作战持用望远镜,方东树以为他们"目不能远视,故不能挽强命中"。一位名叫黄惠田的福建举人呈交给道光皇帝的《平英策略》更是一派梦呓之言:"逆夷由安海放桅而来,日食干粮,不敢燃火,其地黑暗,须半月日始出口。"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可悲的莫过于在复杂险恶的国际环境中丧失对周围世界的判断能力和自我意识，而当时的中国，文化偏见与狭隘的视野使人们的观念、判断、决策、理解与国际现实之间的悖离达到荒谬绝伦的程度，从而陷入种种错觉。弥漫于朝野的孤陋寡闻而又妄自尊大的精神气氛，使道咸间经世派人士极为愤慨，魏源指斥道：

> 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

姚莹亦指出：

> 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复光律原书》，《东溟文后集》卷 8）

昧于也不屑于了解包括英国在内的"夷情"，当然并非嘉道一代人的罪孽，而是中国积淀深厚的传统。目光敏锐的姚莹对这一病症有深刻了解。他指出："自来言地理者，皆详中国而略外夷。《史记》、《前后汉书》、凡诸正史外夷列传，多置不观，况外夷书乎？"（《华人著外夷地理书》）姚莹进而分析造成这一情形的各种原因，认为其间奥秘有三：一是"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二是统治者胆心国人视野大开后"移情务远"，思想发生"夷"化，以至"骚中国而事外夷"，动摇传统文化本位，"故深拒夷事不讲。"三是士人眼界狭窄，"习于所见"，默守陈规，"皆以侈谈异域为戒"。一些拘迂之儒甚至抬出司马迁作为他们的行为范式："司马氏之奇伟，第就域内之人事伦理求之，非驰心海外及未来千百年后。"（《复光律原书》，《东溟文后集》卷 8）正因为如此，尽管早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便把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知识介绍给了中国人，但士大夫们"多诬之不信。"（姚莹：《康辅纪行》卷 16）尽管英国气势

汹汹逼近国门并使中国人大吃苦头，但是，“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姚莹：《康辖纪行·自叙》）。

当然，所谓“中国曾无一个焉留心海外事者”毕竟是一种愤激的说法，恰恰是在19世纪中叶的道咸年间，中国知识阶层中崛起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他们没有沉溺于中古迷梦，没有抱残守缺、闭目塞听，而是怀着挽救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高扬“经世致用”旗帜，对内“补偏救弊”、“更法改图”，对外则及时调整鄙夷外人的固有心态，“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竞相“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终于在严密封闭的中古黑屋，打开了一扇窥探外域的窗户。中国人走向近代世界的历程即由此发端。

**二、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道咸间经世派研讨“泰西”的努力，始于林则徐。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抵达广州主持查办鸦片事宜。在同英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林则徐深感“不谙夷情”之苦，于是，他有组织、有计划地大量搜集和翻译外国书刊，广泛了解敌情外事，接触近代世界。在林则徐组织翻译的书报中，属于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类的，有《澳门新闻纸》及据此选编的《澳门月报》，属于外人对华评论类的有《华事夷言》等，属于介绍世界各国历史与现状的有据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译出的《四洲志》，属于国际法的有滑达尔所著《各国律例》选译，属于军事技术类的则包括造船、制炮、演炮等方面的译作。林则徐的译书活动，引起中外人士的密切注意，他们报导：

> 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魏源：《圣武记》卷10）
>
> 当他（指林则徐）在穿鼻港时，他指挥他的幕僚、随员和

许多聪明的人，搜集英国的情报，将英方商业政策、各部门的详情，特别是他们执行的政策可能的后果，如何赔偿鸦片所有者的损失，都一一记录。……这些情报，每日都先交钦差阅览，当他离开广州时，已搜集了一厚帙了。（《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五，第36页）

广东省城，有许多大人握大权，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林行事全与上相反，他自己先准备几个最善翻译之本地人，他就指点奸细打听事件法子。这些奸细、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皆是有些才能之人，将打听出来之事，写在日记上，按日期呈递登于簿上。有几个夷人，甘心情愿广中国之知识，将英吉利好书卖与中国，俾有翻译人译出大概之事情，有如此考究，并添许多知识。（《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412页）

1839年7月，林钦差通过第三者要求伯驾将当时欧洲外交家广泛使用的一部标准的国际法手册——埃尔默里克·德·滑达尔撰著的《各国律例》——一书中的某些章节译成中文。林的兴趣集中在战争及伴随的诸如封锁、禁运等敌对措施之类的有关章节上面。

（[美]爱德华·V·古利克：《鸦片与战争迫切眉睫》，转引自《林则徐年谱》第245页）

作为清王朝高级官吏的林则徐，如此积极主动地探求域外新知，这在自我闭塞的清代中叶，确实是一种惊人之举。它表明林则徐的思想认识超乎同时代人之上，这使他获得“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殊荣。

林则徐探求域外情事并非出自好奇心，而是从中探求“制夷之策”。例如，林则徐“购其新闻纸，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蜒户，于是招募丁壮五千”（魏源：《圣武记》卷10），

以人民游击方式打击英国侵略者。再例如，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只长于海战而不善陆战，因而对英作战应当“不与水战，而专与陆守”，林则徐初入广州也持此说。在深入调查“夷情”以后，林则徐及时改变战术，决定建立水军，“尾追”英夷，以改变被动挨打局面（见《致姚春木王东寿书》，《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卷1）。由于林则徐对外域“夷情”有较详尽的了解和把握，因此，他能够应付自如地综理对英作战、外交、商务诸事宜，其战略眼光与具体策略亦高出朝野诸人一筹。

林则徐在对西方各国情况及其“长技”有所了解的情况下，又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改革家的胆识，把向西方学习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提出“师敌长技以制敌”的口号，并在一定范围内付诸实行。由于林则徐最初认识到的西方长技是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因此，他亟亟于向西方购入新式武器，并引入有关军工技术，如他购买美、葡等国制造的大炮，又从美国人手中购买了一艘货船改装为兵船，并配置英制大炮和新式炮车。他捐资仿造两艘欧式双桅战船，并搜集、绘制八种战船图式。从西方海军建设中受到启发，林则徐还提出一个建设一支拥有大船百只、中小船五十、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的新式海军的主张。这些活动与构想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都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影响相当深远。由于林则徐以开创者的气魄，冲破封闭保守的传统，“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广州一时“海外图说毕集”（姚莹：《康辖纪行》卷16），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中心。以林则徐为先导，知识阶层中研究外域史地的热潮也随之勃兴。陈汉章的《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后叙》说：

> 自林文忠公译西人《四洲志》。邵阳魏默深、光泽何愿船，因以考订列史外国传及佛国、西游、西使诸记为《海国图

志》，并及《异域录》、《宁古塔记略》诸书为《朔方备乘》。

近代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也推崇道：

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四，第 408 页）

嘉庆中林少穆督两广，命人译《四洲志》，实为新地志之嚆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323 页）

这一评说是对林则徐开启域外史地研究功绩的中肯评价。

**三、魏源的《海国图志》**

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接踵而来的严厉惩处，打断了林则徐研究域外情事的进程，继之而起的魏源以《海国图志》的编撰，将“开眼看世界”的旗帜举得更高。

《海国图志》最初编撰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是年六月，从重发往伊犁的林则徐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会晤魏源，将自己主持编译的《四州志》及其它有关外国资料交他，嘱续为编纂。魏源欣然允诺，并随即动笔。次年冬，《海国图志》50 卷成，道光二十六年到二十七年，魏源将《海国图志》增补为 60 卷。咸丰三年（1852）又增补为 100 卷。在《海国图志》编撰过程中，魏源广为搜辑资料。他曾自述其资料来源：“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据统计，《海国图志》的百卷本除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历代史志 14 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 70 多种、各种奏折 30 多种，此外还有一些亲自调查获得的材料（收入《海国图志》的《英吉利小记》一文，便是魏源依据在鸦片战争中亲审英俘所得材料以及其它英俘口供撰成）。如上多方面材料汇聚起来，给魏源提供的外部世界信息的丰富程度和真实程度，是以往任何人所无法企及的。值得指出的是，魏源采用材料虽然广泛，却特别注意征引外国人的直接记载，“以西洋

人谈西洋”,“以夷人谈夷地”,避免中国典籍依据传闻杂录论述域外情事的不实之弊。魏源一再指出,《海国图志》“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魏源集》下册,第207页)。这是《海国图志》能为中国人提供全新的世界观念和基本可信的世界知识的前提条件。《海国图志》的100卷本,共80余万言,有地图75幅,西洋船炮器艺图式57页,是19世纪中叶中国以至东亚内容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

然而,《海国图志》决不仅仅只是一部知识性读物,它更是一部中国爱国者探究抗击外国侵略、谋求祖国独立富强的经世著作。

首先,针对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侵略日益加剧的形势,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以大量篇幅向国人揭示英国在世界各地的扩张态势,以唤起朝野上下的高度警觉。他指出:“英吉利本国地形褊小而生齿最繁,可耕之土不足供食之什一。北亚墨利加未分割之前,英民无业者,率西渡谋食。迨米利坚割据之后,英所余北境之土,寒不可耕”,因此,英国“急急于寻新地”(《海国图志》卷52),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英国的侵略性。正是在内部经济力的驱动下,英国殖民者“西得亚墨利加”,又“灭孟加拉,乘胜蚕食印度诸部”。(《海国图志》卷52)“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睃削其精华”(《海国图志》卷52)。对中国的侵略因此成必然之势。魏源向国人描述了英国威迫中国的情势:

> 英人既得五印度,渐拓而东南印度海之岸,遍置铺头。阿喀剌达图取之,缅甸、麻喇甲息力易之,荷兰、小西洋利权归掌握者八九矣。再东则中国之南洋诸岛国。(《海国图志》卷52)

魏源接着指出，西方侵略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危机决不会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赔款割地而消弭，因为，通过此次战败，“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野心将更为膨胀。在《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揭示英国侵略者无可改易的扩张本性，并发出“严戒备”的疾呼，敲响了时代警钟。

其次，魏源在介绍世界各国情况时，始终从英国扩张态势以及中国抵御英国的战略需要来组织材料。他指出，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志南洋实所以志西洋也。”“中、南、东三印度，并据于西洋”，其地理位置至关紧要：“东印度为英夷驻防重镇，凡用兵各国，皆调诸孟加腊”。与此同时，东印度“又与我属国缅甸、廓尔喀（尼泊尔）邻近世仇”。“故英夷之逼中国，与中国之筹制英夷，其枢纽皆在东印度”。南印度“有佛兰西、弥利坚、葡萄亚、荷兰、吕宋各国市埠环列”，“故我联络佛兰西、弥利坚及购买船炮，其枢纽皆在澳门与南印度”。至于中印度“为英夷与俄罗斯相距之所，我之联络俄罗斯，其枢纽在中印度”。故“志西南洋实所以志西洋也”。非洲（时称小西洋或利未亚洲）“为大西洋商舶必绕过之地，亦英吉利、荷兰兵城守之，皆据海口，立炮台，设市埠，而土人供其驱使”，“今志小西洋，实所以志大西洋也”。北洋俄罗斯是英国劲敌，利用英俄矛盾有利于抵制英国，“志北洋亦所以志西洋也”。外大西洋的美国，原是英国属地，“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逐走强敌，尽复故疆”，“志外大西洋亦所以志英吉利也”。西洋是《海国图志》研讨的重心所在，而“详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由此可见，《海国图志》的结构决非单纯的技术性处理，而是鲜明地体现了魏源反侵略的经世意图。

再次，在叙东南洋各国史地时，魏源处处从御侮图强着眼，

注意介绍其间的亡国教训与反侵略经验。他在谈到印度诸部陷落时，总结英国侵略得逞的原因是："诸部散弱，不能抗，遂大半为其所役属"。这正是在警告国人，只有加强民族团结，方有抗御外来侵略的实力，分裂散弱，将不可免被奴役的命运。对于越南"下令严禁(鸦片)"，"犯者死无赦，一国卒不受害"的情事，魏源极加称赞，并由衷感叹道："咄咄岛邦，尚能令止而禁行"，其锋芒所指正是在禁烟中手足无措的腐朽的清统治者。研究东南洋各国抗击英军入侵的史实，魏源对缅甸以大木立栅自环打败英国和安南把英舰引入内河聚歼的成功战例深感兴趣，以为可引为中国对付外来侵略者的借鉴。他说："观之缅栅之足拒夷兵，而知我之所以守；观于安南之足慑夷艇，则知我之所以攻"。(《海国图志》卷10)他更以缅甸、安南战胜英军的事例来鼓舞中国朝野：

> 彼谓西洋水犀弋船无敌海内外者，抑知五行迭相克，阴阳迭相胜，天下有不可制之物耶？(《海国图志》卷6)

对于刚刚在鸦片战争中遭受奇耻大辱的中国人来说，打破侵略者不可战胜的神话无疑是必要和及时的。《海国图志·叙》说："夷教夷烟，毋能入界，嗟我属藩，尚堪敌忾，志东南洋海岸各国第三。吕宋爪哇，屿埒日本，或噬或骁，前车不远，志东南洋各岛第四"。这种从正反两方面向中国反侵略斗争提供借鉴的史地研究，包含着丰富的经世意蕴。

依据对外域情事的周密考察以及丰富的经世之学，魏源于《海国图志·筹海篇》中研讨抗御英国侵略的方略与中国富强之术，"其要归于'以守为攻'、'以守为款'、'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语重心长"。(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第13页)其间反响最为强烈者又当是"以夷攻夷"与"师夷长技以制夷"。

所谓"以夷制夷"即利用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达到消弭英国侵略的目的。与魏源近似的谋略思想，林则徐早已提

出，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对英国和其他国家间的矛盾有敏锐觉察，并于《复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中提出："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诚而内向"的对策。魏源在林则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的原则，在《海国图志》中，他详细分析了英国在世界范围内与其它国家之间的矛盾。提出，"英所惮之仇国三：俄罗斯、佛兰西、弥利坚"，对西南洋（即印度洋）地区的"廓尔喀、缅甸、暹罗、安南"也存惧戒之心。据此，魏源设想在陆上利用英俄、英廓的矛盾，"使廓夷扰其东，俄罗斯搏其西，则印度有瓦解之势，（英）寇有内顾之虞"。使"（廓夷）扰彼腴疆（即印度南部），捣其空虚，牵其内顾，使西夷（即英国）失富强之业，成狼狈之势"。（魏源：《圣武记》卷5）与"廓夷、鄂（俄）夷攻印度之策并行"，中国与缅甸、安南、暹罗等国相联络，共同钳制英国，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对于英国与法、美两国之间的矛盾，魏源也深加注意，他指出，法美两国过去在美洲和印度积下了宿怨。鸦片战争又使法、美对华通商中断，因此，利用法、美"贪市舶之利"的心理，将使"我收爪牙之助"。他具体设计道，如果能"集其众长以成一长"，"合众国以制一国"，使"各国回国调兵艘与之讲理"，就能使英国"兵舶不敢舍其境而远犯中国"（魏源：《圣武记》卷5）。

对魏源"以夷制夷"的谋略加以评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以夷制夷"或"借夷制夷"是中国古老的一个外交谋略。早在东汉班超那里，就有"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的说法，但是，这一谋略的成功，不在谋略本身，而取决于实施这一谋略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自身力量强大，有实力作后盾；国际形势有利于实行这一谋略；拥有杰出的外交家。从道咸间国际国内的情势来看，魏源的"以夷制夷"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因为，清王朝此时衰败至极，无实力可言；国内官僚长期昧于外部事态，更不具备近代外

交家的素质。国际殖民主义势力固然有"相间相睽"的矛盾的一面，但它们在侵略中国、瓜分中国上有共同的愿望与相互勾结的必要性。在此种情形下，所谓"以夷制夷"无异于天方夜谭。

"以夷制夷"思想的提出，其根柢在于根深蒂固的天朝情结。在魏源的观念中，中国似乎还是天朝上国，可以绰绰有余地玩"夷"于股掌之上，这无疑是一厢情愿。魏源的友人、岭南学者陈澧便对魏源"以夷制夷"说有尖锐批评：

> 魏君之为此说，直因廓尔喀一稟而起，遂欲令俄罗斯、米利坚、佛兰西皆助攻英吉利。不知廓尔喀素服中国兵强，又误闻英逆犯顺以来，屡为中国击败，故欲乘势助攻，自雪仇怨。……此其未喻一也。俄罗斯本非朝贡之国，乾隆中天威远播，令其缚献阿睦尔撒纳，彼犹为之隐匿，何况今日使受驱策？此其未喻二也。当英逆犯顺，米利坚、佛兰西出为调人，不过恐英逆在广骚扰，阻彼贸易，彼但劝和，何遽欲使助讨？二夷果能攻取印度，自获厚利，亦何待中国驱策？……此其未喻三也。……且四国果肯助攻，尤有后灾。夫胜负者不可必之事也。假令四国出兵失利，则英逆之气愈扬，我之气愈挫，其不可一也。又令四国一战而胜，则是为我复仇，为我敌忾，必自谓大有造于中国，其骄抗要求必为我之所不堪，不满所欲，必且启衅。唐之回纥，是其覆辙，其不可二也。（陈澧：《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东塾集》卷2）

这些具体分析相当中肯，颇有见地。

当然，撇开魏源"以夷制夷"说中包含的文化中心主义以及对实际外域情事的判断失误不论，"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外交谋略以及一种经世方案，自具有一定的意义，不可予以忽视。

与魏源"以夷制夷"的构思比较起来，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意义要深远得多，在这口号中，闪烁着思想的灵

光，鸣响着时代前行的隆隆步伐声。

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酝酿已久。早在道光十七年前后着手编纂《圣武记》时，魏源就提出了“以彼长技，御彼长技”的主张。他进而强调指出，“师夷技”原是祖先采用过的有效制敌方法，为今之计，只是“扩而推之”，以御外侮。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魏源又有“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的说法。在《海国图志》50卷本中，他更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完整主张。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其爱国主义热忱自不待言，它在文化史上还具有特别价值。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在他们从来瞧不起的“夷狄”面前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有不足之处，并拜师学习，这无异是大丢面子之事，因此，对于魏源的口号，不仅顽固派坚决反对，许多思想较开明的经世派人士也无法接受。林则徐的朋友梁廷枏就说：“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舟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梁廷枏：《夷氛闻记》）津津乐道于“天朝全盛”、恩被四夷的盛景，执著于“西学中源”的幻想，视学习外域是“失体”与悖背“古今之理”，这就是华夏中心主义的要害。魏源把此类见解称之为夏虫、井蛙之见，他说：

> 今日之事，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糜费，及一旦糜费十倍于此，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足惜；苟有议翻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而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

英夷何路可通回部。(《海国图志·议战》)

总之,拒绝向西方学习,拒绝开眼看世界,其结果是自受其害,诚所谓"不善师从夷者,外夷制之"。要避免此种"受制"于外夷的命运,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向西方学习:"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魏源深信,沿着"师夷"路径前进,中国将"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魏源集》下册,第874页)。

魏源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而这三方面都是中国亟需学习之处。

关于造船,魏源最初主张"造舟不如购舟"(《圣武记》卷14)。在《海国图志》中他一改昔日想法,建议在广东虎门口外的大角、沙角地方设造船厂一,火药局一。请美、法两国工匠技师教造船只、炮械及行船、演炮之法,同时选送粤闽两省巧匠、精兵学习洋匠的铸造、驾驶、作战等技术。通过外国技师指导与中国工匠留洋学习,由中国人制成战船百艘、火炮十艘,估计"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从此,"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技巧,一二岁后,不必仰给于外夷"。(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总结广东过去仿造战船失败的教训,魏源指出,这些试制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未延夷匠指授之故"。"倘肯出赀延夷匠为师",则"不旬日而可成"(奕山:《进呈演炮图说疏》魏源按语,《海国图志》卷89)。

关于火器,魏源也主张设局直接向西洋工匠学习制造。为了传播西洋军事器械制造技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收载了诸多有关论述,如丁拱辰所撰《铸造洋炮图说》,黄冕的《地雷图说》,潘仕成的《攻船水雷图说》,以及《作远镜法说略》、《西洋用炮测量说》等,而这些内容都属于魏源"师夷"规划中的一部分。

对于西方"养兵练兵之法",魏源也十分重视。他敏锐地觉察

到，英军在战争中的胜利并非专恃船炮坚利，而且与其优良的“养兵练兵之法”分不开，这就是“赡之厚，选之精，练之勤”。因此，对于中国军事力量来说，仅仅引入军事机械是远远不够的。假如对兵员“无其节制，即仅有其船械，犹无有也”（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英人“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治之药”。（魏源：《海国图志》卷37，《大西洋欧罗巴各国总叙》）。他主张粤省水师“汰其冗滥，补其精锐”，加以整顿，“精训练而严节制之”。有了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还必须有干练的指挥官。若“调度不得其人，虽谋之期年，亦溃之一日”（《海国图志》卷1）。有鉴于此，魏源主张从实践中选拔军事人才，“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他还建议传统武试“在粤闽二省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魏源：《海国图志》卷2）。这种注重实际才干的思路显然来自魏源一以贯之的实学思想。

《海国图志》的“师夷”内容，虽然主要限于军事技术方面，但魏源作为一个眼光向着社会实际和外部世界的实学家，充分意识到“西夷”之所长并不限于技艺。他探究英国致富的原因，认为英国的强大是因为“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魏源：《海国图志》卷37）。由此，魏源要求中国也努力发展工商业，“缓本急标”。这显然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肯定和欣羡。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魏源也有由衷称颂。他介绍美国的民主政治说：

> （全国）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

举，可不谓周乎？（《海国图志》卷 59）

魏源还看到了美国的富强与它的民主政治之间的联系。他说："数百年来，育奈士迭遽成富强之国，足见国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海国图志》卷 60）他高度赞扬美国的联邦制和民主选举制，"其章程垂奕世而无弊"（《海国图志·后叙》）。对于不设君位、不立王侯，实行民主共和制的瑞士，魏源也交口称赞，他引述徐继畬的语言，称瑞士为"西土之桃花源"。魏源还在《海国图志》中介绍英国议会制度：英王即位必须先通过巴厘满衙门（英语 Parliament 即议会的译音），国家大事必须经国会会议通过。"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由巴厘满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罚"，"凡新改条例，新设职官，增减税饷及行楮币，皆王颁巴厘满，转行甘文好司，而分布之。唯除授大臣及刑官，则权在国王。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岁终会核于巴厘满而行其黜徙"（《海国图志》卷 50）。一种向往之意溢于言表。虽然，魏源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认识尚只限于表象上，其见识也有理想化倾向，但其时代价值却十分深远。魏源的友人曹懋坚曾赋诗赞叹魏源放眼世界的阔大胸襟：

胸中何止四大洲，神光往来鞭赤虬。直走龙堂割龙石，红轮不尽海西头。（转引自李柏荣《魏源师友记》第 103 页）

从林则徐到魏源，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迈出了突破中古樊篱的第一步，其"前驱先路"的功绩灼灼然不可磨灭。

《海国图志》一经问世，便以崭新的观念、广阔的视野、紧扣时代脉搏的现实感和激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激起广泛的回响。陈澧得张维屏的介绍，读了《海国图志》的初版本。尽管他对魏源在

《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若干战略战术思想有不同意见，但他关于《海国图志》与魏源的评价却是积极的。在《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一文中，陈澧感慨"魏君可谓有志之士矣！非毅然以振国威、安边疆为己任，何其编录之周详，议论之激切如此哉？"（《东塾集》卷 2）姚莹盛赞魏源的成就，他指出《海国图志》一书"通中外之异言，订地名之沿革。……无不详载言之，如指诸掌，皆有依据"。《海国图志》的问世标志着"起自汉代，以迄今时"的历代舆地图终于"首末具备"，"而中外地舆形势以全，可谓盛矣"（《康辖纪行》附《中外四海地图说》）。自法显《佛国志》以来的中国人所著"外夷地理书"，也是"及魏默深《海国图志》六十卷出，而海夷之说，乃得其全焉"（《康辖纪行》卷 9）姚莹还一再表示，《海国图志》之作，"可谓先得我心！""大获我心。""余数十年之所欲言、所欲究者，得默深此书，可以释无憾矣！""余可辍业矣。"（《康辖纪行·自序》，《康辖纪行》卷 5）这些言论充分表达了姚莹的欣慰之情以及与魏源心心相通的情谊。19 世纪以后的洋务派、改良派，更是从《海国图志》中充分汲取营养。曾国藩有"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之说。康有为以《海国图志》为"讲西学的基础"（《康南海自编年谱》）。王韬称魏源"师长一说，实倡先声"（王韬：《扶桑游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无论在以学习西方军事"长技"为中心的洋务运动中还是在移植西方立宪制的维新变法运动中，魏源的思想影响既深又广，并发挥积极的效应。

《海国图志》在国内刊行不久，便传入日本，1854 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 卷本，此后，至 1858 年间，日本的各类翻刻本达 20 余种。日本之所以出现《海国图志》热，是因为此时日本面临的问题同中国十分类似，《海国图志》所提供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正是日本社会迫切需要的，故"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读之而愤排焉，攘臂而起"，从而

酿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魏氏铁闻》卷1)。梁启超说:《海国图志》“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这是关于《海国图志》影响近代日本文化的有力说明。

**四、徐继畬的《瀛环志略》**

作为一种时代性文化思潮,“开眼看世界”在道咸间经世派中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徐继畬所撰《瀛环志略》便是那一时期与《海国图志》并驾齐驱的另一部杰出著作。

作为长期任职粤闽的地方官,徐继畬与外国人士多有接触。“究时务”的经世抱负,“了然于世界大势”(《山西献徵·京卿徐松龛先生事略》)的开阔眼界与敏锐思想,促使徐继畬充分利用这种接触获取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道光二十三年末(1844年1月),徐继畬在厦门结识了一位美国传教士雅裨理。雅裨理博学多识,徐继畬称他为“西方多闻之士”。在与雅裨理的多次见面中,徐继畬了解有关外部世界的消息。雅裨理称徐为“迄今遇见的最喜欢提问的一位中国高级官吏”。“他了解尘世间各国的状况,比聆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雅裨理的描述充分展示了以徐继畬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出文化封闭藩篱,面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精神风貌。

雅裨理向徐继畬所介绍的世界地理、历史和政治知识,大大开阔了徐继畬的眼界,以新获取的知识与中国以往的文献记载相映照,徐继畬深感中国典籍关于外部世界的纪录“其说恢谲,其文瑰异,考之事实,或不尽然”。对于处理“夷务”的官员来说,这些资料已过于陈旧。为了使国人了解海外国家“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等真实情形,不再昧于外情,徐继畬着手编纂世界地理志《瀛环考略》以供“任远事者”处理外部事务作参考。这部

《瀛环考略》即后来的《瀛环志略》的雏形。徐继畬虽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完成《瀛环考略》，却未将此书刊行，而是继续广泛搜罗有关域外史地的资料，并对《瀛环考略》反复增补。《瀛环志略·序》描写了徐继畬致力于域外知识探索的热情和艰辛：

> 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以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

道光二十八年(1848)，在《瀛环考略》基础上增补扩充而成的《瀛环志略》付梓刊行。《瀛环志略》成书的艰巨过程一如《海国图志》从50卷扩增到60卷、100卷一样，充分展示了道咸经世派为探求新知而作出的巨大努力。

作为一部以经世为宗旨的域外史地专著，《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心绪相通。

与魏源一样，徐继畬注视外部世界，对于中国所面临的被侵吞的危机而深怀忧虑。在《瀛环志略》中，他展示了英国殖民者在沿海与内陆包围中国的态势：

> 英人自得五印度，榷税养兵，日益富强。其陆地与西藏之南界、滇省之西界……壤地几于相接。……水程则自孟加拉至粤东，兼旬可达。
>
> 昔日之五印度，求疏通而不得；今日之五印度，求隔绝而不能。
>
> 昔之南洋，为侏儒之窟宅；今之南洋，乃欧罗之逆旅。……自泰西据南洋群岛，……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于此。

欧洲的扩张，打破了中古"求疏通而不得"的世界格局，邻近中国的印度与南洋群岛，皆已成为列强觊觎中国的根据地，这是一个

多么险恶的国际环境。而对来自西方列强的“非意料所及”的胁迫。徐继畬呼吁中国不能再“愦愦”并“不察萌芽”，而应奋起迎接西方的挑战。

徐继畬虽然充分意识到时局的危急性，但他未像魏源那样，直接为对付西方列强提出战略性方略，而是将种种见解寄寓在他关于域外史地的述评中。

和魏源意绪相通，徐继畬在观看外域世界时，十分注意弱小国家抗击殖民侵略的得失成败。和魏源不同的是，徐继畬对安南人“没水而钉船底”，“故红毛畏之”的说法抱怀疑态度，以为“事涉杳茫”。他更感兴趣的是一个民族的自强精神。因此，当他介绍苏禄人抵御荷兰的胜利时，意味深长的赞叹：

> 当西班牙、荷兰虎视南洋，诸番国咸遭吞噬。苏禄以拳石小岛，奋力抗拒，数百年来，安然自保，殆番族之能自强者哉！

他又赞扬西里伯斯岛南部慓悍的马加撒人，当“诸番”在荷兰侵略者的强大压力下“皆奉命惟谨”，他们“独能独流退师，可云铮佼”。（《瀛环志略》卷2）这种不屈的民族精神以及自强的气概，无疑正是在鸦片战争中遭受屈辱与失败的中华民族所亟需。环顾在西方殖民扩张中被鲸吞的国家，徐继畬指出，噶罗巴虽“俨然海外雄藩”，但因“贪饵酿祸”，以至“为荷兰所，门庭户牖，悉兹他族”（《瀛环志略》卷2）。印度对西方侵略扩张的种种迹象“不察萌芽”，遂使“英吉利渐于各海口建立炮台，调设兵戍，养锐蓄谋，待时而动”。在后来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印度诸部，又“心力不齐”，缺乏一个统一的抵抗运动，终在“纷纷溃败”中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徐继畬对噶罗巴与印度败亡原因的论析虽然未必正确，但他着意强调的防微杜渐思想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饶有意味的是，徐继畬虽然呼吁民族自强，全力抗击以英国

为首的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但他却未像那些顽愚士大夫，一味以咒骂“英夷”为能事，而是以一种开明的胸怀，对中国的敌手——英国以及其它遥远的欧洲国家，进行缜密、客观的研究。

在徐继畬的笔下，英国是一个“强且富”的国家。它的首都伦敦：“居民一百四十余万，殿阁巍峨，规模宏钜，离宫别苑，绵亘相属，……街衢纵横穿贯，百货山积，景象之繁华、人户之凑密为西国第一大都会”。法国的巴黎也精妙绝伦，“城垣方广，居民九十余万。王居殿阙巍峨，层楼复阁相望。文彩精丽，西土殆无其比。……其街衢盘绕环匝，列肆密如蜂房，往来者毂击肩摩，昼夜不绝。……城内有大书院，藏印本书三十六万册，钞本书七万册。游学之士，许住院借读。又设医院十四所，选名医居之，每岁收疗病者一万四千人。各国医学者皆裹粮赴巴勒，三年或五年，学成然后归。又有繁术院，居各项艺术之师，如学兵法，开河道，造器物之类，学者各就所愿”。对于长期以来视中国为天下文明中心的中国人来说，这些介绍具有极大的震憾力。

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中，欧洲人是所谓文明水平低下的“西夷”。徐继畬却更正性地介绍道：

> 其人性情缜密，善於远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其妙，篷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瀛环志略》卷 4）

这些描绘有力地向中国人沿袭的虚骄观念提出挑战，它指出，中国人并非一脉单传的“天之骄子”。活动于地球另一面的欧罗巴人“善于远思，长于制器”，其聪明才智不仅不亚于中国人，而且在某些领域远远超过了中国人。将这一批人视为未开化的“蛮夷”，未免荒谬可笑。

"英吉力本系西洋微贱之国，为各国所役使，迨至国初，始渐富强"。（裕谦：《制夷乃当舍水就陆折》）为了解英国乃至整个欧罗巴强大富强的原因，徐继畬将目光投向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社会运转的深层机制。

徐继畬指出，欧洲经济模式大不同于中国：

> 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瀛环志略》卷4）

徐继畬的上述议论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诸国普遍地以商业贸易作为国本，与中国以农立国不同。第二，欧洲的富裕和强盛有赖于贸易和税收。尽管徐继畬以及他同时代经世人士关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经济生活的论述[①]，尚处于十分粗浅的水平，远远谈不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深入堂奥的认识，但是，他们毕竟客观地描述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外在样式，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一经济体制的积极功能。对于沉溺于重本抑末经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无疑具有振聋启聩的意义。

在论及欧罗巴人以商业贸易"求赢"时，目光敏锐的徐继畬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在《瀛环志略》中叙述了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制度，并系统地对欧美民主制度的形式、职能以及议事程序加以详尽记载。如卷七"英吉利三岛"中论及英国两院议会制：

> 英国之制……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即

① 关于欧洲以商业立国问题，道咸间学人多有论述。如魏源说，英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林则徐说，英国"不务本富，专以贸易求赢"。颜师综说，英国人"首务商贾"。他们所说的虽然只是英国，但亦是关于整个欧洲经济方式的概观。

上议院），一曰乡绅房（即下议院）。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人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之王，否则报罢。……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

他又于卷九“米利坚合众国”一节中，介绍了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

米利坚政最简易，榷税亦轻，户口十年一编，每二年于四万七千七百人之中，选才识出众者一人，居于京城，参议国政。总统领所居京城，众国设有公会，各选贤士二人，居于公会，参决大政，如会盟、战守、通商、税饷之类，以六年为秩满。每国设刑官六人，主谳狱，亦以推选充补。有偏私不公者，群议废之。

议会制与“三权分立”是欧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核心内容，徐继畬上述详尽介绍，标志着中国人认识西方社会的一个新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徐继畬关于欧美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介绍，并非是一种客观性的描述，而是渗透了由衷的赞叹之情。“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的瑞士，在徐继畬那儿被描绘成“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淳良，数百年不见兵事”的“西土之桃花源”。谈到美国总统选举制时，徐继畬引述华盛顿“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的议论，并在“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这一句话下面，加以浓圈密点，以示强调。美国的总统以“天下为公”，既不终身留任，更不得搞世袭制，全由百姓选举产

生，限年退位，“退位之统领，仍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这一近代民主制度，与“家天下”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形成鲜明的对照。思绪至此，徐继畬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慨。他高度评价华盛顿说：

>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异国异。
>
> 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在《瀛环考略》中，“华盛顿，异人也”[①]一段按语，作者均加以浓圈密点，而“几于天下为公”六字则是写了圈，圈了再写的，从中可以看出徐继畬的思索过程。

无庸讳言的是，徐继畬在介绍欧美近代民主政治与评价华盛顿时，往往渗入传统观念与传统语言，以至上述描述有时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封建专制时代，徐继畬敢于提出“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敢于称赞“公器付之公论”，这实在是了不起的胆识。就近代民主意识而言，徐继畬的水平要高出同时代人一头。

《瀛环志略》一经刊刻问世，“即腾谤议”，遭到正统守旧势力的反对，他们指斥《瀛环志略》“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史策先：《梦余偶钞》卷1）。抨击徐继畬“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丙辰一月二十八日）。“颇张大英夷”。（曾国藩：《致左丘高》，《曾文正公·书札》卷6）。与此同时，经世派人士对《瀛环志略》加以热烈注意。魏源增订百卷本

① 在《瀛环考略》中“华盛顿”作“几兴腾”。

《海国图志》时，从该书中辑取了大量材料，计达33处之多，约4万字，为《瀛环志略》总篇幅的四分之一左右，仅欧洲部分就摘引了13000多字。王韬对《瀛环志略》推崇备至，他说：

> 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中丞之《瀛环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也。……此诚当今有用之书，而吾人所宜盱衡而瞩远者也。
>
> 中丞莅官闽峤，膺方面之寄，蒿目时艰，无所措手，即欲有所展布，以上答主知而下扶时局，而拘牵义者动以成法为不可喻，旧章为不可改，稍有更张，辄多掣肘。中丞内感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9）

戊戌变法前后，《瀛环志略》的流传达到了高峰。康有为"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础"（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于光绪十六年（1890）入京会试途中路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此后，他在《读书每日课程》中把《瀛环志略》列为"西学书"一栏中的第二本必读书。曾任民国教育总长的张一麟也因读《瀛环志略》而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油然向往。他在《汤济武为梁伯强尊人震三先生墓碑文稿题词》中写道：

> 余年十六岁时，得五台徐松龛先生《瀛环志略》，读至华盛顿故事，辄为心醉，自忖民主政体安得及吾身而亲见之。（《心太平室集》卷2）

读华盛顿故事而使人厌恶专制、心醉共和，这正是《瀛环志略》积极的文化效应。

和《海国图志》远播日本的情势相似，当清王朝朝野上下抨击《瀛环志略》之议腾起时，《瀛环志略》在日本受到意外的欢迎

和好评。日本文久元年(1861)《瀛环志略》在日本刊刻，随后又翻印了数次，该刻本即"对峭阁本"，无论是印刷和装帧质量均超过同时期中国版本。日本当代史家评论《瀛环志略》的文化影响时说："如果说，幕府末期日本的地理学，特别是有关南洋的知识，是出于《志略》之赐，那也并非过甚其词"(大谷敏夫：《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中国近代的始刊启蒙地理书》中文摘译，载《求索》1985年第5期)。

值得指出的是在中美关系史上，《瀛环志略》也具有颇为重要的地位。1867年，即《瀛环志略》问世后不到20年，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美国政府，把一幅华盛顿肖像赠送给徐继畬，中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特地为此举行了赠接仪式。蒲安臣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徐继畬对华盛顿的介绍和称颂，致辞中说："你这样做将使所有的民族感到高兴，因为华盛顿不仅属于我们两国，而且属于全世界"。徐继畬在答辞中则再次重申了他对华盛顿的高度赞扬。他说，华盛顿"对人类来说，已成为楷模和向导，因而他的业绩成为联系古代圣贤和后代人们之间的一种纽带"(见德雷克：《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任复兴译，文津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47页)。作为对徐继畬介绍美国功绩的"永久性礼赞"。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们向华盛顿国家纪念馆赠送了一块花岗岩纪念碑。石碑上，用汉字雕刻着从《瀛环志略》中摘录出的徐继畬对华盛顿的颂扬文字。这块石碑至今仍镶嵌在华盛顿纪念塔第十级的内壁，它不仅是中美两大民族相互了解的历史纪录，而且鲜活地昭示着晚清经世派徐继畬"开眼看世界"的卓著功绩。

**五、梁廷枏与《海国四说》**

道咸年间研究域外史地的名著，除了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尚有梁廷枏的《海国四

说》。

梁廷枏(1796—1861),广东顺德人,在广东经世派人士中,他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道光十九年,林则徐"自两湖移节来粤,耳其名,下车拜访,询以筹防战守事宜。廷枏为规画形势,绘海防图以进"。(《梁廷枏传》,《续碑传集》卷38)以后,祁埙、徐广缙督两广,"并聘(廷枏)入幕中,襄办团练"。道光二十九年(1849),广州人民掀起反侵略者入城的斗争。梁廷枏是其中积极的参与者与支持者。如上种种活动,充分显示了梁廷枏的经世热情。梁廷枏学识广博。"道光中叶,夷氛不靖",两广总督聘请他入海防书局修纂《广东海防汇览》。梁廷枏利用此机会,致力采集各种中外资料,探究西方国家"岛屿强弱,古今分合之由"。(梁廷枏:《海国四说》)道光二十四年(1844)后,陆续撰成《耶苏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3卷、《兰仑偶说》4卷,《粤道贡国说》6卷,于二十六年合刊为《海国四说》。

和《瀛环志略》的风格几相一致,《海国四说》既不是《四洲志》式的译作,也不同于《海国图志》式的资料汇编,而是一家撰述之作。在叙事上,《海国四说》虽未脱传统史体,但受西人著作启发,有时也采用以年为经、史事为纬,穿插政治、地理、经济的叙述法,从而开创了近代中国人编写外国通史的先河。

梁廷枏研究域外史地,其意一如魏源、徐继畬,欲以其研究成果为抵御外国侵略提供服务。因此,他在《海国四说》中对英国侵略者灭印度、攻缅甸、占领南洋群岛等侵略活动一一加以揭露,向国人昭示西方列强贪得无厌的侵略本性。作为一位眼光开阔的学者,梁廷枏的《海国四说》除介绍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情况外,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尤其是美国民主共和制着墨甚多。其《合省国说·序》云:

(美利坚)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

> 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持乡举里选之意，择无可争夺、无可拥戴之人，置之不能作威、不能久据之地，而群听命焉。盖取所谓'视听自民'之茫无可据者，至是乃彰明较著而行之，实事求是而证之。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刚亦唯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后思，而无使覆当前之辙。斯已耳，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梁廷枏：《海国四说·合省国说》）

在如上论说中，梁廷枏指出了美国新型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民主——一切大政皆由"民定其议"，统领由民选举，不可"久据"，更不得"世袭"；法治——"未有统领，先有国法。"即使为统领者，"亦唯有力守其法"。这些认识在当时是具有较高水平的。

梁廷枏还在《合省国说》中，从地理环境、政治、民情三方面探讨美国民主共和制得以建立的原因。他认为，美国地处荒穹，非英吉利所固有，去国既远，鞭长莫及；其地之人自理自治，时日已久；其人喜谋利，"往往耗智巧于制器成物"。"三者相乘，夫是以创一开辟未有之局，而俨然无恙以迄于今也。"（梁廷枏：《海国四说·合省国说》）虽然，如上解说没有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壮大和民主意识深入人心的历史考察中去揭示真正的答案，但如此深入探讨欧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成的原因，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在关于英国的介绍中，梁廷枏也多有目光敏锐之处。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制定，是英国近代民主政治确立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但是，这一史实在中国鲜为人知。梁廷枏在《兰仑偶

说》中介绍说："至若翰(即约翰)性暴戾，虐遇其众。教师因民情不忍，聚众困迫之，国内旧受封爵者亦群起围所居，不得已与民约，凡事听民自专不问，沿为风俗"。这对君主专制长期压迫下的中国人来说，无疑具有新鲜的刺激力。此外，梁廷枏还指出，英国之所以国力强盛，"实以贸易为本务，所入视农工远甚，统领之所劝奖者固在此。盖税之所出，国用攸资也"。英国政府所采取的农器进口免税和国内矿藏"听民自开采而征其税"等政策，对生产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这些介绍对当时的思想界皆是新鲜知识。

从林则徐到梁廷枏别开生面的域外史地研究，不仅为抵御外来侵略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而且首次向国人报道了关于外部世界的新鲜信息，从而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诱发新思想产生。这是道咸经世派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创立的不朽伟绩。

## 第三节　研治当代史，以求济世

道咸经世派孜孜不倦从事的经世史学，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注目于当代史的研究。

中国传统史学虽不乏留心现实和研治当代史的史家，但是，就总趋向而言，史家更醉心的是古史研究而讳言本朝史事。梁廷枏说："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又不惟正史而已，即各体莫不皆然"。这确是鞭辟入里之论。

然而，传统的"重古略今"的治史风习在道咸间被有力突破，与现实政治、经济、军事密切相关的历史课题一时成为经世学者研究的中心，生气勃勃的当代史研究勃然兴起。

## 一、魏源的当代史研究

道咸学人中，研究当代史最有成绩者首推魏源。他所编纂的《圣武记》与《道光洋舰征抚记》是当时关于当代史研究的史学名著。

魏源于道光九年(1829)捐官内阁中书，得以阅读内阁典藏。他利用此有利条件，着手于当朝史研究，对清代前中期的武功文治有较深入的探讨。鸦片战争的爆发、失败和南京条约签定的刺激，使魏源"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撰成14卷，40多万字的《圣武记》。由此可见，《圣武记》既是一部筹之有素、准备多年的著作，又是一部"有感而发"，直面当代时政的经世之作。

《圣武记》是一部清代军事政治史著。前十卷为记事本末体，叙述从后金(清)崛起直至清道光间的主要战事，如平定三藩之乱，勘定蒙古、回疆及大小金川，西南苗瑶的改土归流，扫平民变、兵变、农民起义，并叙西藏战事与中俄关系、中朝关系、中缅关系和中越关系。后四卷综述清代兵制兵饷，并对历次内外战争的经验教训作纵横谈。其《武事余记》所辑"议武五篇"(议城守、议军守、议坊苗、议军政、议军储)，是颇有特色的五篇军事学专论，显示了魏源在军事战略和战术学方面的造诣。

《圣武记》的写作意图是总结清朝开国以来军事、政治的经验教训，为面对"英夷"进犯的朝廷提供历史借鉴。书中方方面面的内容，皆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例如，《圣武记》以较大的篇幅述清初武功之盛，乃是企图以清初赫赫武功来振奋国人斗志，刷清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昏庸无能、调度无方、兵将溃败的耻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魏源提出"师前圣前王"的口号，期望当权者从清初"圣明武功"中汲取经验，整武备、雪国耻。针对鸦片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战和不定、军纪败坏、兵悍将骄、兵饷不足、文恬武

嬉、水陆废弛，决策专制、投降逃命等腐败现象，魏源在叙述史事时，着力分析每次战事胜败的原因，以期清统治者从中获得借鉴。如在对比明清两代用兵区别时，魏源说："前代方略专恃本兵，我朝悉禀庙算。羽檄交驰，立时批答，虽午夜必起披览，召见军机大臣，指示曲折，万里如禁闼。加以赏罚分明，无滥功，无枉罪，无中使监军之弊，故所向有功"。魏源所述康、雍、乾三帝决胜庙堂的业绩便是意图以此救正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战守不定，浪战浪款、指挥无能等重大失误。其现实感极为强烈。

作为一位思想深刻、视野开阔的史学家，魏源在总结前代史事之际，还就清王朝现实政治、经济、军事诸问题提出了诸多有见地的看法。例如，面对鸦片战争中中国方面暴露出来的军事技术上的落后，魏源明确提出，"不师外洋之长技，使兵威远见轻岛夷，近见轻属国，不可也"。这是"师夷长技"口号的首次提出，在后来所撰的《海国图志》中，这一口号有了更为具体的阐述。再例如，在西北边防问题上，魏源力主慎重处理中央政府与边疆各族的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与统一，使"中外一家，老死不见兵革"。与此同时，积极开发大西北，进一步发展边疆屯田、开矿等事业，从内地移民边疆。这都是着眼于巩固边防与国家统一的有价值的建议。此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魏源还提出"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的主张，明确希望清王朝重视人材，以天下之人材整军、备武、理财，致国家于富强。对于一个欲振弱扶衰的民族来说，这无疑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思考。

《圣武记》一经刊行，便以其强烈的现实感受到广大士人的热烈欢迎，以致"随作随刊"(《圣武记序》)，供不应求。影响所及，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几十年间其势不衰。梁启超说："史学以记述现代为重。故清人关于清史方面之著作，为吾侪所乐闻。……最著者有魏默深之《圣武记》。"曾国藩也曾多次读过《圣武

记》，如他在《求阙斋日记》丁卯12月条记载道："《圣武记》又阅一篇毕。中有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篇未阅，以昔年在京阅过。"陈岱霖《云石诗集》称颂《圣武记》说："惊人每忆纵谈初，柱腹撑肠万卷书，直与乾坤开奥窔，岂徒笺注到虫鱼。"孔宪彝《对岳楼诗话》也说："百年官凤池，频年卧江浒。读书期有用，削札记圣武。"读者从《圣武记》中亟亟汲取的正是热情洋溢的爱国精神与经世致用思想。

《圣武记》自道光三十年(1850)传到日本，便以三种以上版本先后刊行。倒幕维新的政治活动家吉田松阴在与家兄、叔叔的通信中都谈及读到《圣武记》，由此可见《圣武记》在日本的影响。

《圣武记》的问世，打破了官方对修纂当代史的垄断，为清人治清史开拓了一条广阔路径，其筚路蓝缕开创之功十分可贵。

本着面向现实的经世精神，魏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前后，又编撰了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鸦片战争史——《道光洋舰征抚记》。

《道光洋舰征抚记》的重要史料价值在于它系统完整地记述了从林则徐广州禁烟至南京条约签订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全过程，由于该书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其真实性非同一般。

《道光洋舰征抚记》的另一特色在于它贯穿着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主义精神。魏源在《征抚记》中对英国侵略者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贪欲和狡诈行为，特别是对中国人民奸淫掳掠、残酷杀害等种种暴行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谴责，并深刻总结了鸦片战争中中国人民抗英斗争失败的教训。

魏源认为，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道光帝负有不可推卸之责。这一责任表现在任贤不专，用奸不疑；心志不坚，主意不定；内政不修，外事不明。如他最初支持虎门销烟，鼓励林则徐、邓廷桢等抗战。一旦英船开到天津海口，他就革林则徐、邓廷桢之职，

把他们发配新疆。在鸦片战争中，道光帝初谕林则徐等“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后却一味指斥林则徐禁烟启衅。初闻三元里等地义民杀敌壮举，即下诏痛责“诸将调集各省官兵，反不如区区义勇”，要把他们“一切交部议处”。后又“降旨不许进兵，并不许擒杀洋人”。初誓“烟价一毫不许，土地一寸不给。”后则“敕耆英便宜从事”，割地赔款，在所不计。如此种种描述，活画出道光帝虚骄昏聩的面目、萎葸无能的丑态。其惊人胆识令人油然起敬。

其次，魏源指出，穆彰阿、琦善一类握有大权的腐恶势力在鸦片战争中畏敌、媚敌、降敌，给鸦片战争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他在《征抚记》中记载道：琦善一到广东，即一反林则徐之所为，“尽屏广东文武，专用汉奸鲍鹏，往来传信”。“有报缉汉奸者，则诃曰：‘汝即汉奸！’有探报洋情者，则拒曰：‘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一切力反前任所为，谓可得外洋欢心”。炮台守将密请增兵，琦善坚决不许，反而拔暗桩、撤守兵，约义律往来虎门会谈，使其尽窥清兵虚实。这些尖锐的揭露，把琦善一类国贼民蠹无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再次，魏源认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方在战略上也存在诸多根本性的失误。概括起来有三点：其一为不战于可战之日，而偏战于不可战之日。如奕山甫抵广州，“以不战则军饷无可开销，功赏无由保奏，急欲侥幸一试”。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盲目对英军开战，导致清军大败；再如大宝山战役中，清军初大获胜利，“时洋兵离其船数十里，深入死地。使得一队伏兵截其后，可获全胜”。可由于指挥将领无能，援兵不至，致使这一战役功败垂成。这是不战于可战之日的战例之一。其二为不守于可守之地，而守于不可守之地。如“定海孤悬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可“有攘寇之志而无攘寇之才”的裕谦却依据地图指挥，不是捐定

海、守海岸，而去筑定海外城。结果英军攻陷定海，裕谦身死。其三为不款于可款之时，而专款于必不可款之时。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侵略军头目伯麦、义律对朝廷多所求索，但此时英军和军舰"并未北上，志在求款通商，尚未决裂"，正是所谓可款之时。但清廷却放过了这一时机。再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给予英国侵略者沉重一击，"是时讲和银尚止送去四分之一，又福建水勇是日亦至，倘令围歼洋兵、生获洋人，挟以为质，……而后徐以讲款，可一切惟我所欲"，但当时在广州的清廷官吏却放过了此可款之机，魏源为此深感遗憾。魏源是林则徐禁烟斗争的坚决支持者，在《征抚记》中，魏源对林则徐又多所赞颂，以为要取得战争胜利，"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但是，他认为，林则徐在禁烟和对英交涉中，有所谓过分操切之处。无论魏源对林则徐的这一批评是否准确，它所表现的是一位经世学者的高度历史责任感。

为了从根本上使中国富强起来，拥有抗御侵略者的坚实力量，魏源在《征抚记》中再次提出"师夷"的主张——"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他具体建议道："仿钦天监用西洋历官之例，行取弥利坚、佛兰西、葡萄牙三国各遣头目一二人，赴粤司造船局，而择内地巧匠精兵以传习之"。"其有洋船、洋炮、火箭、火药，愿售者听，不惟以货易货，而且以货易船，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药抵茶叶、湖丝之税"。他深信，一旦"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相与结合，中国将创"千年水师未有之盛"。

《道光洋舰征抚记》的问世，映现出魏源史学思想中极其可贵的一面，这就是直面现实，敢于写"当前的活的历史"。而此种"史学经世"正是道咸经世实学中的有机组成。尤为值得称道的是，《道光洋舰征抚记》撰写之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拉下历史

帷幕，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来得及从硝烟、炮声以及城下之盟的刺激里清醒过来去回味它的意蕴，而魏源却以相当详尽的文字忠实地记述了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发轫的这一重大事件的始末，由此可见魏源思想的敏捷以及真挚的爱国心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魏源"史学经世"的宗旨不仅体现在着眼于当朝历史，写"当前活的历史"，而且为着救治当世之弊，"质之往古"，他的元史、明史研究皆本着这一精神展开。

魏源研讨明史，重在典章制度、军国要政。其原因在于清代的"中外官制、律例、赋税、兵额，大都因明制而损益之，故其流极、变迁、得失、切劘之故，莫近于明"(《明代兵食二政录叙》，《魏源集》上册，第161页)。早在辑《皇朝经世文编》之后，魏源就计划搜集"有明三百年文章论议言食政之类十有三：曰理财，曰养民，曰赋役，曰税课，曰屯政，曰仓储，曰荒政，曰盐法，曰宗禄，曰水利，曰运河，曰河防；兵政之类二十有四：曰兵制，曰兵营，曰亲军招募，曰战车，曰屯饷，曰茶马，曰防守九边形势，曰蓟镇、宣、大边防，曰辽东边防，曰西番，曰西南土司，曰朝鲜御倭，曰款贡，曰盗贼，凡为卷七十有八"。魏源辑录如上诸方面的经世文章，为的是"立乎今日以指往昔，异同黑白，病药相发，亦一代得失之林哉！"(《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魏源集》上册，第163页)

与研究明史的旨趣相近，魏源还致力于元史的重新撰述。这一方面是由于明初宋濂主纂的《元史》十分粗率，史法多蔽，史实多误，故自明代起，立志续补元史者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清中叶社会矛盾尖锐化，国防危机日趋剧烈，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面临分崩离析的危局，与元帝国崩溃前的情形颇有类似之处。这种"风会所趋"也促成富于经世观念的士大夫研究元史。魏源继龚自珍筹作《蒙古图志》之后，编《西北疆域沿革图》，著《元代征西域

考》、《元代西北疆域考》。晚年，他又广为采用正史材料，并征引《元朝秘史》、《蒙古源流》、《元典章》和元人文集，撰写《元史新编》。魏源曾希望将这部史著上呈朝廷刊布，以为国人之借鉴。他在《拟进呈元史新编表》中说："前事者后事之师。元起塞外有中原，远非辽金之比，其始终得失，固为代之殷鉴也哉！"为了给清廷提供"殷鉴"，魏源在《元史新编》中剖析了元代"内北外南"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弊端，告诫清统治者加强满汉联合，调整民族关系，以集中国力对付日益加剧的内忧外患。与此同时，他斥责奸臣叛将，主张改革吏治，着意总结元代治河、钞法等方面的经验，其用心之深不言而喻。魏源在考察元朝灭金的教训时，发感叹道："自古无不亡之国，而亡国亦从无不可挽之机"。（《太宗纪》，《元史新编》卷 3）这显然是在劝导清朝统治者不要失去"可挽之机"，不要重蹈金、元亡国之覆辙。

综观魏源的史学实践，无论是撰写当朝史书还是探究前朝史事，都是本着学术与政事两位一体的宗旨，以学术致用，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这就是经世实学大师魏源思想的精髓所在。

**二、梁廷枏的《夷氛闻记》与夏燮的《中西纪事》**

道咸间关于鸦片战争史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除了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尚有记载鸦片战争中英军入侵广州情形的《英夷入粤纪略》、《广东军务记》，记载浙江乍浦战役的《壬寅乍浦殉难录》（沈筠），记载江苏上海、镇江一带战争的《夷患备尝记》（曹晟），华亭野史的《壬寅闻见纪略》、隐园居士的《京口偾城录》、朱士云的《草间日记》甦庵道人的《出围城记》，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当推梁廷枏的《夷氛闻记》与夏燮的《中西纪事》。

综观《夷氛闻记》与《中西纪事》，其间若干特色颇引人注目。

**（一）探讨鸦片战争的起因**

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其失败，无论对老大的清帝国还是对中

华民族来说，都无异是一场奇耻大辱。观念的封闭、思想的狭隘，使清廷朝野上下将这场战争视为飞来横祸，并直认林则徐广州禁烟是招惹这场大祸的根本性原因。梁廷枏与夏燮却以经世史学家的深邃眼光对这一问题作出了不同于流俗的回答。

梁廷枏探讨鸦片战争的起因，发现这场战争与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具有紧密的联系。他指出，“英夷狡焉，思逞志于内地久矣”。由于他们在鸦片贸易中得利甚厚，因而，他们不但不会因中国单方面的禁烟而放弃鸦片贸易，反而会在“争市牟利”的总目标下，“倾国以求尝试”。在如此情势下，任何手段亦无法根绝英国侵略者的贪婪祸心。“纵设法不令入虎门，而自老万山外、蔓延诸省，输内地者，安所底止？”即使将鸦片“缴烧净尽”，鸦片贩子“不转盼而航至”。纵然鸦片贩子作出不夹带鸦片的具结“亦不过虚应故事耳”。由此可见，英国侵略者发动乃至扩大鸦片战争乃势所必然，这确实是关于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本质的切中要害的揭露。

关于鸦片战争发生的缘由，夏燮也有深刻见解。他在《中西纪事》中指出：“今载考前后，乃知衅端之原在市而非起于鸦片也。夫互市者，实中西交争之利”。外商来华贸易，本为求利，但因受到关税的限制和“关胥市侩”的勒索，遂由失望而“怨谤沸腾”，“乃回诉于本国，于是带兵船讲论而干戈之衅以起”。他的结论是“即使鸦片不入中国，亦未能保外洋之终于安靖而隐忍也”。如上所论，已涉及到隐藏在这场战争背后的经济利益，并径直指出了英国侵略者发动对华战争的必然性，其认识高出同时代人一头。

（二）真实记述鸦片战争史实

鸦片战争的失败，固然在于中国军事力量的落后，更在于清王朝的昏聩腐败。为了掩饰、洗刷自己丑恶的行径，清廷投降派

官僚力图用自己的权势钳制舆论，并以种种颠倒黑白的记载扰乱视听，篡改历史。黄恩彤的《道光抚夷记略》和赘漫野叟的《庚申夷氛纪略》便是肆意歪曲鸦片战争史实的代表性作品。

然而，梁廷枏与夏燮却在他们的作品中对鸦片战争的真实情形如实加以纪录。

《夷氛闻纪》与《中西纪事》对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姚莹等抵抗派深为推崇，在纪录爱国将士抗击侵略军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时，更倾注一片爱国挚情。如《夷氛闻记》叙陈连升在沙角、大角炮台英勇御敌，由于"我兵无药，炮不复发，发者又以省局掺杂炭屑，力弱无济，贼弹箭迸落如雨，身无完肤"，"其子方在侧，见父死状，挺戟大呼，左右跃杀数夷，袍皆血染，与千总张清龄等同时死"。悲壮的记载，令人百余年后读之，仍热血沸腾，血脉贲张。广大民众在鸦片战争中的英勇斗争亦在梁廷枏和夏燮的笔下有充分展示。如《中西纪事》列《粤民义师》为专章，其中既有"一朝啸聚者，百有三乡"的三元里之役，又有"众议汹汹，不藉官饷，亦不受地方官约束，……浸浸乎与官为仇"的声势浩大的反英军入广州城的斗争。《夷氛闻纪》不仅对三元里之役以及广州民众"火烧夷馆"、反英入城等反侵略事件有生动、真实的记载，而且记叙了人民群众爱国的精神品质。如"火烧夷馆"时，"夷货迁出，尽为百姓推掷地上，无丝毫夺归己者"。在反对英人入城斗争中，人民群众"不假召募，不领经费，旬日之内如响斯应，如辙斯合，得十万人"。此种高涨的爱国热情令人深为感佩。

面对卖国的投降派，《夷氛闻纪》与《中西纪事》的抨击与揭露决不容情，如梁廷枏叙琦善一到广州，"首诘开炮肇衅者，将罪副将以谢夷，兵心由是解体"。奉旨"大申天讨"的天潢贵胄奕山一战即败，"面无人色"，最后竟对英军勒索600万军饷的要求"一切允之，城上改树白旗"。《中西纪事》记咸丰八年(1858)前后

大沽口两次战役，由于“夷使倨怯无能，首先溃逃”，导致了战争的失败；“既败之后”，清廷贵族官僚又一心议和，“塞港之舟不整，未占之炮台无备”，“此岂堪再战乎？”在表彰抗英殉难志士时，夏燮又尖锐指出，关天培等人的牺牲，清廷投降派官吏不能脱其咎，“关军门之死也，琦相实杀之。裕帅之死也，余步云实杀之。陈军门之死也，牛督实杀之”。这些关于投降派活动的记载与揭露，客观上暴露了清廷腐败不堪的本质，揭示了鸦片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三）寻求抵御外侮之策

梁廷枏与夏燮在记叙、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之际，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严重关注。寻求抵御外侮之策成为他们著作中的主题之一。

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问题上，梁廷枏显然持较为保守的态度。他对魏源“师夷长技”的说法颇不以为然，认为“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他又指认外国先进器物的发明皆“得诸中国”。若中国“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与此同时，梁廷枏对“以夷攻夷”之说也持不同意见。他指出：“西夷同一气类”，相互勾结，他们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但“万不肯为中国用也”。“就令乐为我用，而一舟之费，内地可调兵数千，败必索偿，胜更求无底止，终难以善其后”。这一认识又比魏源来得高明。

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梁廷枏认为，御侮之策的基本立足点是自强，亦即以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他建议发展铸炮造船等军事工业，从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四省水师中选拔精锐，组成国防海军以与英军坚船利炮相对抗。与此同时，在战略上注意刺探洋情，力求在“知夷”的情况下制定“制驭准备之方”。在战术上则避长击短，采取“人自为战，战不择地”，“水乘风潮，陆匿丛

莽”的游击战术，以配合国防海军的海上作战。梁廷枏的上述构想，具有一定的军事改革倾向，其意义是积极的。

与梁廷枏比较起来，夏燮所提出的御侮方略颇为苍白。他的所谓“以夷服夷”、“以毒攻毒”、“远交近攻”之说乏于强烈要求改革的思想倾向，只是泛泛而论，几无实际意义可言。

《夷氛闻纪》与《中西纪事》向世之际，清统治者正加强舆论控制，禁止任何有关鸦片战争真相的史著出版。《软尘私议》叙当时情形是：“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喜，大有雨忘志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间，亦大书‘免谈国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在如此情势下，《夷氛闻纪》“以叙述时事，恐涉嫌讳，不著姓名”，以至数十年间人们“不知谁何手笔”（傅以礼：《华延室题跋》）。《中西纪事》成书后，夏燮亦因“两相（即穆彰河和耆英）枋国，防口綦严”，“窃怀挟书之惧”，不敢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其书也深藏不露，至同治年间方流传于世。此种情形固然映现出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强固，却也从反面表明经世派“留心时务”的当代史研究是一股挣脱官方严密控制的新鲜史学潮流，这一潮流与经世派的其它种种实学活动相呼应，构筑起道咸经世实学的宏大殿庑。

# 第三十八章　近代洋务派的经世观念

自19世纪60年代起，一场由清廷中主张兴办“洋务”的官员发起的，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近代化浪潮在中国大地兴起。“采西学”、“制洋器”，发展近代企业与培养西学人才，是洋务大吏们亟亟以求的事项。洋务大吏的实践活动，颇有西方色彩，然而其内在思想体系却是相当中国化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决不抛弃纲常名教，而且表现在推动他们经办洋务的思想渊源仍然是古老的“经世致用”传统，因而从学术史角度考查，洋务派仍未脱出经世实学轨范。如果说，道咸间的龚自珍、魏源、陶澍、林则徐是晚清经世派的第一代主将，那么，同光间的洋务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便是晚清经世派的第二代核心人物，从曾、张等洋务大吏起，学脉悠久的经世实学走到了终结点。

## 第一节　曾国藩的经世思想

出生湖南湘乡的曾国藩(1811--1872)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的主帅，因而被清王朝推尊为“中兴第一名臣”，同时他又是洋务运动的前驱人物。曾国藩服膺程、朱，又全力研习经世之学，在咸丰、同治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成为一位思想驳杂，颇富特色的理

学经世派。

湖南自宋代以来，号称理学之乡。周濂溪是湖湘子弟尊崇的第一位理学乡贤，继起的理学家代有传人，书院讲学蔚然成风。在浓重的理学文化氛围中，曾国藩自青少年时代起便深受理学浸染。考上进士、入居翰苑后，他又拜理学家唐鉴为师，向其请教"检身之要"与"读书之法"。在唐鉴指导下，曾国藩"以《朱子全书》为宗"，致力于程朱理学，并为自己立下严格的课程表，日日反躬自省，痛自剖责，并与倭仁等人经常研讨、切磋养性工夫。在理学的陶冶下，曾国藩"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薛福成：《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迹疏》，《庸庵文编》卷上）。这种对理学精神境界的追求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直至去世前一月，曾国藩"犹取《宋元学案》、《理学宗传》等书披览"，"自谓身心一日不能间也"。（《曾文正公年谱》、同治十一年）在他身后，清廷《御制碑文》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见《曾文正公全集》卷首附录）。

然而，湖湘学风对义理之学的关注从未与经世致用传统割裂开来。从胡宏、张栻等人创立"湖湘学派"起，就十分"留心经济之学"，不尚空谈，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人伦中去探求富国强兵之道。王船山更是"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创立起一个"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思想体系，从而使"即事穷理"的实学思潮盛行于湖南。到了近代，湖南成为经世派的大本营。湖南近代第一代经世派群体，是以两江总督陶澍为宗主，在他周围聚集有一大批湖南经世学者如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罗绕典等，他们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时务之学"，对中国近代实学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继第一代经世派群体而起，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组成了湖南第二代经世派的核心。钱基博描述这一群体的阵势说："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

焘，一代名臣，声施四海；王闿运、阎镇珩，老儒暗修，独抱遗经。遭际不同，出处攸异。然学不仅占毕，志在匡俗；通经欲以致用，文章蕲以经国，则固不同而同。"（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54页）

湖南第二代经世派群体的领袖无疑是曾国藩，他虽然一心浸淫于理学，却不像一般理学家那样，热衷于坐而论道，玄谈性理，而是一方面讲求修身、节欲，追求内在道德的完善。另一方面孜孜不倦"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年谱》、道光十一年）。他在道光二十一年致贺长龄的信中说："今日而言治术，则莫如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复贺耦耕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表现出讲求实际、注重实践的价值取向。他特别强调经济"在孔门为政事之科"，与义理、词章、考据并列，而"经济"的位置则为四科之首。他又指出：

>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如上十四个方面正是传统"经世之学"的重要内容。在"经世之学"的研究方法上，曾国藩亦提出颇有价值的见解，这就是"皆以本朝为主而上溯前代之沿革本末"，由此而使"前代之未及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之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湘乡曾氏文集》，第6册，第3369—3370页）。其现实意识颇为强烈。在经世实学的钻研中，曾国藩十分重视魏源的著作。在其家书和日记中，留下了他读魏源著作的记载，如"七月初九彭山屺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经世文编》一部"（《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1）。"《圣武记》又阅一编毕，昔年在京阅过。"（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抄》卷下）他曾声称："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

《皇朝经世文编》。"(《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辛亥年七月)道咸经世之学成为他经世思想的源泉之一。曾国藩的门人评价曾国蕃一生事业时说:

(曾国藩)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14)

盖自公始于朝,即侃侃言天下事。如议大礼,议军政,议所以奖植人才,皆关经世之务甚钜。(薛福成:《曾文正公奏疏序》,《庸庵文编》卷3)

如上议论,是关于曾国藩学术特色的剀切说明。

必须指出的是,理学就其思想路线而言,从未抛弃儒学经世传统,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都一再申明学术"经世致用"的宗旨,只不过在如何经世上,他们不同于直接着力于外在事功的经世派,力主通过"内圣"之径达到经世目的。由于理学诸子关注的重心在个体人格的完善,救世风格自然淡化,其末流更热衷于性理空谈,从而流于空疏一途。曾国藩的学术路径实际上着意摒弃"宿腐之义理",恢复理学之原旨,充分发挥理学原具有的经世精神,为此,他一再强调道:

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辛丑闰三月)

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其中矣。(《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杂著》、《曾国藩全集·诗文》

总之,经济之学并非旁门别派,而是理学应有之题。换言之,理学既是一种"克己"、"进德"之道,又是一种治国之方,"外圣"、"内王"在这一学术体系内不是分割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融洽。

最能体现曾国藩理学与经世之学相统一观念的莫过于他对"礼"的强调。

儒家传统中的"礼"是一种社会法度、一种现实的规范秩序。

但是，在儒学不同流派那里，“礼”含有不同意味。孔子释“礼”为仁，把这种古老的外在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孟子发展这一线索而成为内在论的人性哲学。荀子则重新强调“礼”本有的外在的社会强制性的规范功能，发展成独具特色的“礼学”。宋明理学从思孟一路而来，固然从未忽视“礼”的重要性，但其重心毕竟是天人性命之学，故“礼学”地位并不突出。至清初王夫之出，荀子“礼学”精神才被高扬。王夫之极重“礼”，视“礼”为“修己治人之大纲，而治乱之准”。在他的理论逻辑中，“契纲振天下”亦即“以礼治人”，“礼”的整体纲纪性得到重新强调。王夫之以后，蔚然成风的汉学对“礼学”予以异乎寻常的重视。这是因为荀子重知、重学、重客观规范，而汉学恰与“荀学”多有贴近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宣称：“古圣王经世之道，莫切于礼”，正表明了汉学家的共同思路。

道光二十八年(1848)，曾国藩接触到乾隆朝汉学家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在此书中，秦蕙田以理学为指导，用汉学家的治学方法，考证经史，结合社会实际，将天文、地理、军政、官制等等皆网罗一书，使治国大政、各项设施皆有本可依，有“礼”可循。曾国藩对《五礼通考》深感兴趣，他潜心研读是书，恍然醒悟到“礼”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而且还可涵盖各种制度，由此，他不仅把秦氏列为清朝第二大“圣哲”，把《五礼通考》列为经世学者的必读之书，而且还立志步秦氏之后尘。他运用汉学家的一些治学方法，考核经史与当代《会典》、续补秦书所缺的食货一门，“集盐、漕、赋税，国用之径，别为一编，傅于秦书之次”，综之以“礼”，从而着力表现“先圣制礼之体无所不赅”(《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1)这一伦理学主题。

道咸之际，曾国藩又接触到陈宏谋的《五种遗规》一书。陈宏谋是乾隆间名臣，他“治宋五子之学，宗薛瑄、高攀龙”，“及入

仕，本所学以为设施，莅政必计久远，规模宏大，措置审详"；又"辑古今嘉言懿行，为《五种遗规》，尚名教，厚风俗，亲切而详备"（《清史稿·陈宏谋传》。曾国藩从《五种遗规》中体悟到理学可以通过具体的道德规制——"礼"，落实到修身、齐家、居官、教化、训俗等事事物物上，他因此将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政沅弟》，《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6）。对于陈宏谋的《五种遗规》他更是推崇，一再指示"诸弟与儿侄辈皆宜常常阅看。"（《求阙斋弟子记》卷20）

汲收前人关于"礼学"的思想资料，曾国藩揭橥"以礼经世"的口号，他反复强调：

> 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诗文》）
>
> 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礼·杂著》、《曾国藩全集·诗文》）

在曾国藩这里，理学家奉为世界本源的抽象的"理"具体化为具有实践意义，可以落实社会事事物物的"礼"。"礼"上承理学"义理"，下则通过具体的规制范围天下万事万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所不包，"无所不赅"。"礼"就是"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就是曾国藩的"经世之具"。曾国藩"以礼经世"口号的提出，标志着"理学经世"体系构造的完成。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在船山学大规模传播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而曾国藩对王夫之的推崇与继承又显然与他"理学经世"的致思趋向密切关联。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湖南籍的大思想家。他一方面批判陆王，改造程朱，对理气心性作了细致透辟的论证。另一方面，他高扬中国传统经世意识，"不空谈玄妙"，"言必征实"，意在致用。他所撰的《读通鉴论》与《宋论》便是蕴藏"经世之大略"的名著。深邃

的义理探讨与务实的经世风格，使王夫之的理论体系达到了儒家所一贯向往的“内圣外王”双合璧的完满水平。

曾国藩对王夫之甚为崇拜，他致力于船山著作的研究，并从王夫之博大的思想库中充分汲取营养。李肖聃在《杨怀中先生遗事》一文中指出：

> 自明以来，衡湘学者严于自守，王船山兼采汉、宋而以《正蒙》为宗，及清而李文炤、罗典苦行清修，稍振紫阳之绪。迄于咸同，则罗泽南，刘蓉皆笃守程、朱，而曾、左亦颇张其绪论。（《杨昌济文集》第379页）

李氏之论，清晰揭示了如下真情：从王船山到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其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思想渊源联系。

曾国藩对王夫之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义理之学。曾国藩曾研读过王船山的重要哲学著作《张子正蒙注》，并写了如下心得体会：

> 阅王而农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隋（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燋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曾国藩全集·日记》第814页）

夫之“尽性知命”之说，显然对曾国藩人生哲学有重大启示，这就是高度强调尽自身之性，即发挥主观能动性，把个人进退、荣辱、安危、成败置之度外，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在风云变幻的军政生涯中，曾国藩始终如一地实践这一人生哲学，从而在中国近世文

化中留下了深长印痕。曾国藩对于王夫之义理之学的重视还体现在他所作的《船山遗书序》中，在这篇序里，曾国藩对王夫之有如下评说：

>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为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

这段序文扼要指出了王夫之在孔孟以降，仁、礼并行"道统"的承传中继往开来的地位，也展现出曾国藩"以礼经世"的思想脉络。在这段序文中有所展现。

二是经世之学。曾国藩不仅从王夫之"通于性命之原"的义理之学中汲取营养，而且致力钻研王夫之关于经邦治国、用兵作战的经世论说，他多番研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与《宋论》，对于王夫之史论中观今鉴古、治国行政、制夷平乱、练兵用将、树人立法、兴学育人、钱粮盐铁等有关军国大计、经世大略的宏论十分服膺，湘军的善于作战与曾国藩的杰出政治韬略固然得益于多方面原因，但与船山思想的指导不无关系，其间底蕴正如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在《拟请王夫之从祀文庙折》中所指出的：

> 至（王夫之——引者）所著史论，具于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严于攘斥党援，深切著明，使读者悚然引为法戒，更以师于百世而有余。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于夫之之遗著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

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邗江王氏五修族谱》）

王夫之有关经邦治国的政治、军事理论，第一次找到了实践自身的物质力量，这就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整个湘军集团。

正因为王夫之思想无论在"以礼经世"还是在行政治国、用兵打仗上都具有特殊功效，曾国藩与其弟曾国荃当战火纷飞，百务缠身之际不惜代价大规模刊刻《船山遗书》，而经曾国藩本人亲自校阅过的《船山遗书》便有"《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七十余事"（《船山遗书·序》，《曾国藩全集·诗文》）。在《船山遗书》的刊刻上，曾国藩实实在在下了大功夫。正是在曾氏兄弟的全力支持和亲自参与下，金陵版《船山遗书》以空前规模公开问世，传遍海内。

作为经世思潮中的一大流派，曾国藩倡言的理学经世强调学术面向社会、面向实际，其路向与道咸龚、魏经世派是两相一致的，但是，龚、魏一派经世致用的总目标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实政，曾国藩的理学经世却着意建立"礼治"秩序，盐、漕、赋税，河工等实务仅仅是"经世之礼"的附属物，服从于"礼治"这一中心。龚、魏反对拘守古代经典，大胆主张"不必泥乎经史"，透露出变革、前进的战斗锋芒，曾国藩的理学经世却将"礼"作为社会事务与社会生活中不可动摇的价值体系，人世间所有的人、物、事都必须"一秉乎礼"，其保守性格赫然可见。由此而来，龚、魏一派经世思潮的逻辑发展必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改良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而曾国藩一路虽然有适应"变局"、接受西方长技的一面，但"礼治"本位的价值观念、决定了这一路只可能将西方长技作为纲常名教伦理体系的附着物，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某种

意义上言，便是“理学经世”思潮的逻辑产品。

## 第二节　李鸿章、左宗棠的经世思想

李鸿章与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由于经历、秉性的不尽相同，两人的经世思想各有特色。

李鸿章少年随其父李文安学习，以后又以李仿仙与徐明经为师。李文安、李仿仙与徐明经皆崇尚宋学，“以研寻义理为本”。道光二十五年(1845)春，李鸿 章参加京师会试，未中。时曾国藩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与李鸿章之父李文安为戊戌同年，彼此友善，文安即命李鸿 章受业于曾门。曾国藩“为学研究义理”，与李鸿章少年所习一脉相承。但曾国藩更着意“义理经世”，主张读书要“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匡时”，李鸿章自此发愤攻读经史，“求义理经世之学”。曾国藩对李鸿章甚为器重，以为“才可大用”。道光二十七年(1847)春，李鸿章再次参加京师会试，三场中试后，参加殿试。殿试题目为：“孟子曰：子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李鸿章述曰：“孟子战国中一人而已。今当举世披靡之会，使皆以缄默鸣高，则挽回气运之大权，其将谁属耶！大贤者出不徒辩一身，期其自尽，而当于千载寄其遐思以觉民也。”(引自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 4772 页)答卷以孟子一类圣人为榜样，批评那些处于颓世的文人学士明哲保身、自鸣清高，对“挽回气运之大权”不负责任。与此同时，他抒发自己的抱负，表示要像“大贤者”那样，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由此可见李鸿章经世致用、有用于社会的意向。

咸丰九年(1859)，在仕途上饱经挫折的李鸿章投身湘军幕府，得曾国藩精心训导与潜移默化陶冶，从而成为曾国藩诸门人

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者”。李鸿章贪睡懒散，曾国藩却持身甚严，在曾国藩的严格要求下，李鸿章终对曾氏的生活方式“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逐渐养成“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的习惯。曾国藩十分注意对弟子、幕僚的教育，他每日都与幕僚一起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这一切对李鸿章影响甚大。吴汝纶在《李公神道碑》一文中说：李鸿章“生平严事曾文正公，出治军，持国事，与曾公相首尾。其忠谋英断，能使国重，是非成败，不毫发动心，一秉曾公学”(《李文忠公全集》卷首)。在曾国藩诸门人中，李鸿章确是曾国藩事业的最杰出继承者与发扬者。

李鸿章虽为曾国藩最得意门生，但他在学术上平平，正如他自述那样：“鸿章本不文，从军羁官以来，废学益甚”。(吴汝纶编《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 14)在“理学经世”上缺少学理上的阐发，然而，他一生的洋务活动却始终贯穿着务实精神。在与保守派的数次大论战中，他对理学高论力加驳斥，强调“制胜之实济”远高出道德人心空谈。如同治十三年(1862)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中，以“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的原则，批评守旧派“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并力陈仿效西方的紧迫性和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意义。在同治十三年(1874)的清廷海防讨论中，李鸿章再次引述《易经》变通思想，分析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指出“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只有“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才是唯一出路。作为晚清政坛上的实力派，李鸿章的务实风格对于洋务运动向纵深开展起到颇为重要的作用。

与李鸿章比较，左宗棠无论在经世思想阐述上还是在经世

之学研习上都要高出李鸿章一头。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地缘的机遇使他得以与贺长龄、贺熙龄、陶澍等道咸经世派发生多方面的联系。

左宗棠结识贺长龄时在道光十年(1830)。是年，贺长龄丁母忧返居长沙。左宗棠慕名前往拜访，与贺长龄纵论天下大势，颇为契合。贺长龄对左宗棠深为赞许，称他为"国士"，并悉发所藏官私图史，供左宗棠阅读。左宗棠每次还书时，贺长龄"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 斷 斷 ，无稍厌倦"(左宗棠：《请将前云贵总督贺长龄事迹付史馆并准入祀湖南乡贤祠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7)。在贺长龄的启迪影响下，左宗棠识见大为增长，心胸更为开阔。

道光十一年，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主讲城南书院。贺熙龄讲求"义理经世之学"，与其兄学术路向一致。左宗棠求学城南书院，颇得贺熙龄欣赏。正是在贺家，左宗棠读到了贺长龄、魏源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从就读城南书院直至道光二十六年贺熙龄卒，左宗棠一言一行均受贺熙龄影响。由于贺熙龄卒时，遗命以其小女儿嫁给左宗棠长子，故贺熙龄与左宗棠的关系，既是师生，又是朋友，更是儿女亲家。

左宗棠与陶澍结识是在道光十七年(1837)。时左宗棠主讲醴陵渌江书院。陶澍因任两江总督，阅兵江西，顺便回籍省墓，路过醴陵，醴陵知县为陶澍治馆舍，请左宗棠拟楹联。素来敬仰陶澍的左宗棠奋其才学，拟出楹联如下：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罗文钧：《左文襄公年谱》卷1)

陶澍激赏此联，延请相见，"纵论古今"，目为奇才，"倾谈竟夕，与订交而别"(罗文钧：《左文襄公年谱》卷1)。次年，左宗棠会试落

第，取道南京，再行趋谒陶澍。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病卒，贺熙龄荐左宗棠去陶家当塾师，教其子陶桄，时达八年。在贺熙龄促成下，宗棠长女孝瑜嫁与陶桄，左宗棠遂与陶家成为儿女亲家。在陶家，左宗棠读遍陶澍藏书。他兴奋地说："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与周夫人》(辛丑)，《左宗棠家书》)。胡林翼在谈到左宗棠这段经历时说：

> 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文毅(陶澍)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性，通晓治略，当为今日楚材第一。(《胡文忠公遗集》卷53)

可见左宗棠于陶澍藏书中得益非浅。

左宗棠与魏源未曾谋面，但对这位道咸经世派巨子深为服膺。他在致陶桄书中说：

> 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实则龚博不精，不如魏之切实而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

对于《皇朝经世文编》、左宗棠亦十分推崇。他称"《皇朝经世文编》、《五种遗规》两书，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皇朝经世文编》成为左宗棠钻研经世之学的指导性著作。

左宗棠不仅在精神上追踪湖南籍的经世派，而且对非湖南籍的林则徐亦表现出由衷仰慕之情。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说：

> 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官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答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此种哀乐与共的情感真实透露出左宗棠对林则徐的崇敬。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林则徐"自云南引疾还闽"，道经湘江，与左宗棠在长沙舟中相晤，林则徐对左宗棠深加器重，"诧为绝世奇才"，两人谈论竟夕，"达曙乃别"。在这次相见中，林则徐以不无遗憾的心情谈到"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颇以未竟其事为憾"(《左文襄公书牍》卷17)。林则徐壮志未酬的抱负对左宗棠日后经营西北产生了一定影响。林、左两人的湘江夜话，在左宗棠心中留下深深印痕，多年以后，左宗棠为《林文忠公政书》作叙，还深情提到这次夜话：

> 忆道光己酉，公由滇解组归闽，扁舟迂道访宗棠于星沙旅次，略分倾接，期许良厚。……军事旁午，心绪茫然，刁斗严更，枕戈不寐，展卷数行，犹仿佛湘江夜话时也。

道光三十年，林则徐病逝，左宗棠于无比悲痛之际，写了一副传颂一时的长联：

>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
> 庙堂依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左文襄公全集·联语》)

他同时又以真挚感情，忆往悼今，写了一封极生动的唁函，致慰林汝舟，信中写道：

> 十一月二十一日夜午，在黄南坡长沙寓馆，忽闻宫保尚书捐馆之耗，且骇且痛，相对失声。忆去年此日谒公湘水舟次，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同贤昆季侍公饮，抗谭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何图三百余日便成千古，人之云亡，百身莫赎，悠悠苍天，此恨何极。

深切的哀痛悲伤寄寓着左宗棠对林则徐的崇敬与无限怀念。"江

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的文字则仿佛一幅白描画，生动逼真地传递出林、左之间沁人肺腑的情谊。

在湖湘学风与道咸经世派的直接影响下，左宗棠自青少年时代便“不专重制艺帖括”，而是注重学术的务实性与致用性。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晋京会试，他在答卷上写道：“夫穷经将以致用也，而或泥于章句训诂之学，捃摭遗义，苏索经余，前人所弃，后复拾之，纵华辩之有余，究身心之何补？或好为诡异凿空之论，影射旧闻，创为新学，古人所无，今故矫之，既隐怪之可伤，复源流之不辨。若是者，博士赏之，纯儒羞之，曲学主之，至人辟之，职是之由也”。(《左宗棠会试卷》(誊录本)1833年第一问)其锋芒直指流于空疏的宋学与烦琐细碎的汉学。道光二十四年，他致书张玉夫说：“近人著书，惟择易就而名美者为之，绝无实学可飨后人。弟近阅新书万种，赏心者数种已耳。学问之荒，人才之敝，可见一斑。”(《左宗棠家书》第8页)道光二十六年，他又在与张玉夫书中指出，大多儒生士大夫“博极群书，不知五谷；宁奔走于风尘，而怠荒于稼穑；名为学者，实等游民”。他们不仅“自误误人”，而且“败坏天下士习民风，良非浅鲜”(《左宗棠家书》第8—9页)。在题为《杂感》的组诗中，左宗棠又有“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的诗句，这些尖锐的揭露对于当时脱离社会实际、漠不关心国事的恶劣士风是极为有力的抨击。

与“务为词章取悦庸耳俗目”的陋儒不同，左宗棠毅然以天下为己任，“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左宗棠年谱》第5页)。他十分推崇贾谊、诸葛亮、陈亮一类重视实事实功的历史人物，仰慕他们“功成事就而天下翕然归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并自号“老亮”，以当今诸葛亮自诩。他曾宣称：“吾儒读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9页)又自联云：“身无半亩

心忧天下”，其抱负可见远大。与那些“籍经世为名，……，博声誉为高”(《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2)的俗士不同，左宗棠立意经世，重在实行。他一再表示“天下事总是要干，要于事最是要一片实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2)。“事到无可如何时，不必计较成败利钝与己之堪此与否，且索性去做为宜。”(《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他曾为自家祠堂作联，其中一联云：“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其务实观念灼然可见。

为了实现有用于世的抱负，左宗棠在三度会试不中的情况下，决意仕进并弃词章之学，专心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研究。他在致陶桄书中说：

> 山居无事，正好多读有用之书，讲求世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

又在给大儿子的信中说：

> 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左文襄公家书》上卷第65页)

其学以致用的意向十分明朗。

左宗棠治学，重在如下四大端，这就是舆地学、农学、时务之学、兵学。

**舆地学** 鸦片战争前后，世界格局与边疆形势的变化推动历史地理学一跃而为显学。左宗棠为这一风气浸润，17岁时即于长沙书肆中购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并“昕夕稽究，有所证发，辄手自条记”。他曾评论说，《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虽“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间欠酌”，“然熟于古今成败之迹、彼此之势”。书中“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可见他对顾著的经世特质有深入把握。在潜心阅读顾祖禹、顾炎武的舆地学著作的过程中，左宗棠还“于可见之实行

者另编存录之”。当时的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左宗棠所为，“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但左不为所动(《左宗棠年谱》卷1，第7页)。攻读《读史方舆纪要》与《天下郡国利病书》是左宗棠研习方舆之学的发轫，也是他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的开端。

在顾祖禹、顾炎武的影响下，左宗棠日夕研究历史地理。他认为，古今研习地理者，不是“索象于图”，就是“索理于书”，然而，经过千百年的陵迁谷变，图籍所载与实际情况多不符合，非根据史籍和志书互相参证、重加研究不可。于是，他在多年究心舆地学的基础上，自己编制地图，其方法是：“先作皇舆(清代一统图)一图，计程画方，方以百里，别之以色，色以五物，纵横九尺。……俟其有成，分图各省，又析为府，各为之说。再由明而元，而宋，上至《禹贡》九州。以此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为了实现这一相当规模的设想，左宗棠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每作一图易稿，则授(其妻)周夫人影绘之，历岁乃成。”(《左宗棠年谱》卷1)最后一次会试失败后，他又广泛阅读《畿辅通志》、《西域通志》及其他地理、方志诸书，凡山川、关隘、驿道远近，都分门别类，摘录了数十巨册。钞录方志工作完成后，宗棠又条列历代兵事，“以史印志”。对舆地学的长期勤奋研习，使左宗棠成为一个“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胡林翼：《上张石卿中丞》，《胡文忠公遗集》第55卷)的才智之士。

**农学** 中国素来“以农立国”，农业直接关系政治统治的治乱安危。农学因而成为传统经世之学中的重要内容。左宗棠“少小从事陇亩，于北农、南农诸书，性喜研求、躬验而有所得”(《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三次会试不中后，左宗棠绝意仕进，表示“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杏李”(《与周夫人》(戊戌)，《左宗棠家书》第4页)。并开始致力于农学探讨。他于光绪三年(1875)在致谭钟麟的信中回忆自己学术上的这一转折说：

小弟自戊戌(道光十八年)罢第归来,即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9)

为此,他"买得农书甚多",归家与夫人周贻端"闭门伏读,实地考验"(《左宗棠家书》第4页)。湘阴原不产茶,宗棠主张试种茶树,结果以良好成效首开风气。相传湘阴种茶就是他由安化引入。他又栽培桑竹,以尽地利,增加收益。他特别对古代"区田法"感兴趣,声称"尝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其于区种一事实有阅历"(《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9)并作《广区田图说》"以陈其利"。经从事多种农业试验后,左宗棠开始考虑著书立说,他在致罗研生书中说:

仆近因农家为第一要务,而古近颇少传书,思有所述以诏农圃。志此者数年矣,而尚未得成卷帙,不过十数篇。(《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这十数篇论文经编辑,成《朴农阁农书》。后来,左宗棠成了封疆大吏,所到之处,均特别注意发展农业,而且成效较著,此种情形与他青壮年时期攻研农学有直接关系。

**时务之学** 时务之学涉及广泛,举凡国计民生无不相关。左宗棠早于第一次会试落第便对时务之学表现出浓酣兴趣。他在给乡试主考老师徐法绩的信中写道:

宗棠早年孤贫,失时废学,章句末技,且鲜所窥。……比者春榜既放,点检南归。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恩,与吾夫子平生期许之殷。十余年外,或者其稍有所得乎。(《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以后,他又在陶澍家"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所有这一切,为他论事议政以及后来经营洋务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兵学** 鸦片战争发生后,中国人"震动于其屡败之烈,怵然

以西人兵法为可畏”。兵学研究一时间蔚为热潮。左宗棠在陶澍家阅读藏书时对于往昔海防记载十分留意,“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凡有关系海国故事者,无不涉历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与周夫人》(辛丑),《左宗棠家书》第5—6页)鸦片战争后,左宗棠“日夜思所以自强”,进一步致力于兵学。道光二十八年(1848),他函告二兄左宗植说:

> 年来于兵事颇有所得,自觉倘遭时命,假我斧柯,必能实实做到,绝非纸上之谈。因思古人无不文武兼资,凡所称名将者,大抵习诗礼而知古今。……古人谓‘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弟则谓‘不为名儒,即为名将’,亦可一洗凡庸龌龊之胸襟也。(《与景乔》(戊申),《左宗棠家书》第10页)

舆地学、农学、兵学、荒政及盐、河、漕之学,这便是左宗棠登上政治舞台前主要致力的“经世之学”。由此而来,左宗棠大不同于当时一般沉醉于风花雪月的公子及专习词章举业的士人学子,而以出类拔萃的学识引时人注目。他的老师贺熙龄作诗赞誉他的弟子:

> 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
> 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在诗后,熙龄加注说明:“季高(左宗棠字)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贺熙龄《舟中怀左季高》,《寒香馆诗钞》卷4)由于左宗棠40岁以前在“有用之学”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他初出山即表现出娴熟的经世才干,“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毛鸿宾:《毛尚书奏稿》卷3)。以后更成为名重一时的封疆大吏。其“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历古以来,书生戎马……未有如宗棠者也”(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湘学略》第

35 页)。

## 第三节　张之洞的经世思想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殿军，晚清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其学术是以“经世”、“务实”为指归。

张之洞的经世思想产生于青少年时代。而这一思想趋向与他所生长环境密切相关。张之洞出生于贵州兴义府，20 岁以前，亦大部分居住在贵州他的父亲张锳自道光中叶起一直在贵州任官，从知府到道员，为西南各省抵抗太平天国革命浪潮最尽责的地方官员之一。在危机四伏环境的刺激下，张之洞自青少年时代起便慨然立意经世，其情势正如胡钧《张文襄公年谱》所云：

> 公生长兵间，好阅兵家言及掌故经济之书，慨然有经世志。

在张锳挚友胡林翼、韩超的指导下，张之洞奋发钻研经世之学。《大清畿辅先哲传·张文襄公传》描述其治学情形说：

> (之洞)洽闻强记，淹贯群书，尤究心经世之务，以天下为己任。咸丰二年(1852 年)，年十六，举乡试第一，一时名噪都下，乃益自淬励，精研历代诸儒之学，而以实用为归。

纵观张之洞生平言行，“经世”、“务实”实为最突出特色。他曾反复申言：“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创建尊经书院记》，《张文襄公全集》卷 213)通经当用韩愈“提要钩元之法”，务以“切用”为“要指”(《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他比喻道：

> 书尤谷也，种获春揄，炊之成饭，佐以庶羞，食之而饱，肌肤充悦，筋骸强固，此谷之效也。若终岁勤动，仆仆田间，

劳劳爨下，并不一尝其味，莳谷何为。近人往往以读书明理判为两事，通经致用视为迂谈。浅者为科举，博洽者蒐述，取名耳，与己无與也，于世无與也，亦犹之获而弗食，食而弗肥也。随时读书，随时穷理，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直，从此贯通古今，推求人事，果能平日讲求，无论才识长短，筮仕登朝，大小必有实用。《易》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识，畜德，事本相因。若读书者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不劳读书矣。（《辖轩语》一，《张文襄公全集》卷204）

张之洞鄙薄那些“不知时务”，不切“经济”的士人为“陋儒”。他说：

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宋范文正、明孙文正，并皆身为诸生，志在天下。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柢。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方为切实经济。盖不读书者为俗吏；见近不见远，不知时务者为陋儒。可言不可行，即有大言正论，皆蹈唐史所讥高而不切之病。（《辖轩语》一，《张文襄公全集》卷204）

为纠此之弊，张之洞倡导“读书宜读有用之书”。他解释道：

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唐人崇上词章，多撰璅碎虚诞无理之书。宋人笔繁冗，公私文字多以空论衍成长篇，著书亦然。明人好作应酬文字，喜谈赏鉴清供，又好蓝本陈编，改换敷衍，便成著作，以故累车造屋，眩人耳目，耗人精神，不能专意要籍。唐以后书，除史部各有所用外，其余陈陈相因之经注，无关要道之谱录、庸猥应酬之诗文集，皆宜屏绝廓清，庶几得有日力，以读有用之书耳。（《辖轩语》一，《张文襄公全集》卷204）

张之洞生活的时代，文化积累已至为丰厚，“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为了引导士子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世界中读有用之书，做切实有用的学问，张之洞又提出研习各类学问的“易简”、“切用”之策：

一、经学贵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易》之大义，阴阳消长；《书》之大义，知人安民；《诗》之大义，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春秋》大义，明王道，诛乱贼；《礼》之大义，亲亲，尊尊，贤贤；《周礼》之大义，治国治官治民三事相维。

二、史学考治乱典制。史学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实，(二)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世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

三、诸子知取舍。可以证发经义者，及别出新理而不悖经义者取之，显悖孔孟者弃之。

四、理学看学案，惟读学案可以兼考学行，甄综流派。

五、词章读有实事者。当于史传及专集总集中择其叙事述理之文读之，其他故置不读。

六、政治书读近今者。政治以本朝为妥，百年以内政事，五十年以内奏议，尤为切用。

七、地理考今日有用者。考地理必有图，以今图为主，古图备考。此为中国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诸国，亦须知其方域广狭，程途远近，都会海口，寒暖险易，贫富强弱。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国，其余可缓。

八、算学各随所习之事学之。一切格致制造，莫不有算，各视所业何学即习何学之算，取足应用而止。如是则得实用而有涯涘。

九、小学但通大旨大例。惟百年以来，讲《说文》者终身钻研，汩没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须通其大旨大例，即可应用大旨大例者解六书之区分，通古今韵之隔阂，识古籀篆之源委，知以声类求义类之枢纽，晓部首五百四十字之义例。至名物无关大用，说解间有难明，义例偶有抵牾，则缺之不论。

在这里，张之洞以一位经世学者的身份，苦心孤诣地为士子指明了研习经世之学的路数，其间既凝结着前代经世学者的丰富经验，又包含有他自己"精研历代诸儒之学，而以实用为归"的独到体会。

以经世，务实为价值取向，张之洞论诗，极度推崇深沉凝重、辞警意丰的杜(甫)诗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白(居易)诗。他赞杜诗曰：

稷契寻常便许身，忽侪孔跖等埃尘。
虽高不切轻言语，论定文人有史臣。

又赞白诗曰：

海图题咏见忧思，浪搅天吴悔已迟。
亦有刑天精卫句，千秋独诵白家诗。

(《忆蜀游》十一首之七，《张文襄公全集》卷 226)

与此同时，他对钟惺、谭元春、袁枚等人所倡导的"性灵"说和孤峭诗风深为不满，认为他们轻佻而乏于实在。

张之洞论史学，亦多从切济时用着眼。"读史者贵能详考事迹古人作用言论，推求盛衰之倚伏、政治之沿革、时势之轻重、风气之变迁，为其可以益人神智，遇事见诸设施耳。""诸史中体例文笔虽有高下，而其有益实用处，并无轻重之别。盖一朝自有一朝之事迹，一朝之典制，无可轩轾，且时代愈近者，愈切于用"。(《辅轩语》，《张文襄公全集》卷 204)张之洞认为，"全史浩繁"，

而以“《史记》、《前汉》为尤要。其要如何？语其高则证经义，通史法；语其卑则古来词章无论骈散，凡雅词丽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无待于言。”(《辖轩语》、《张文襄公全集》卷204)。“若意在经济，莫如《文献通考》，详博综贯，尤便于用。”(《辖轩语》，《张文襄公全集》，卷204)这确是十分精到的指点。

“通经致用”的“务实”学风，使张之洞对于诸种学问都从“致用”加以考虑，而不存迂腐的先入之见。即便在“清流”时期，他对于“洋务”、“西学”也不像其他清流党人那样持极端排斥态度，而认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张之洞全集》奏议二)正是从“经世致用”的学术路线出发，张之洞在实用价值上充分肯定西技、西艺、西政的意义，从而揭橥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文化主张并非张之洞首创。早在清乾隆时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便宣称：

> 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

所谓“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正是“中体西用”论的滥觞。

近代以来，从务实致用观念出发，主张在维护封建主义纲常名教的前提下，采用西方实用科技者大有其人。咸丰十一年(1861)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最初提出。以后，洋务思想家和早期维新派在此方面有诸多论述。光绪二十一年(1895)，《万国公报》主笔兼上海中亚书院总教习沈寿康以“南溪赘翁”署名发表《救时策》一文，提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首次作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完整表述。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1896年元月),《万国公报》第84卷发表江苏按察使、江苏候补道吴之榛《上张香帅请设中西学堂书》。吴之榛在上书中说:"职道滞适吴门愿为吴谋,拟设中西学堂一区于苏州省城,教吴人子弟。议者谓,肄业泰西之语言文字,何以中西名?义不难喻。为此,请于大贤者,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冀开海内风气。昔汉家之治,王霸杂揉,今运会而遭,酌中证外,名虽变而实不易,舍是,谋富强,戛戛乎其难之"。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1897年8月),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进一步阐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主张,他说:"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戊戌变法》(二)第426页)

次年,盛宣怀在举荐何嗣焜总理南洋公学事务的奏折中说:"臣与(何)纵论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奏陈开办南洋公学情形疏》)

从冯桂芬到盛宣怀乃至光绪帝①的形形色色的"中体西用"说虽然意蕴并不相同,但以"中学"为体、道、本,以"西学"为用、器、末的思路是一脉相通的,从中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待西方近代文明成果那种既排斥、又汲纳,既怀钦羡之情,又抱虚骄之态的矛盾状况。

在广泛流行的"中体西用"思潮的背景下,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三年作《劝学篇》,全文虽没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字样,

① 光绪帝在戊戌变法期间的上谕说:"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但却对“中体西用”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与全面发挥。

**一、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对“中学为体”的内涵作了更精密诠释。**

对于“中学”，张之洞尤其强调孔儒之学的正宗地位和“经世致用”传统，他极赞“孔子集千圣，等百王”。“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张之洞力奉儒学“经世”之旨，特别注重宏扬孔儒之哲学的兴教化、正人心的现实政治功能。他的“中学为体”既指以儒学维系专制政治秩序，更指以儒学强化纲常名教统率下的人际关系。张之洞最耽心的，并不在列强虎视鹰瞵于外，而在于“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于内，“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劝学篇·序》）《同心》被列于《劝学篇》之首要位置，正表明张之洞“惟此为大”的焦虑急迫之心。

**二、归纳、总结“西学”的丰富内涵，同时严格限制它“为用”的界限。**

在林则徐、魏源时代，“夷之长技”仅指坚船利炮。伴随洋务运动的展开，西方“格致”之学，声光电化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比洋务大吏更激进的改良派思想家则将“设议院”、“通民情”等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内容也列入应予仿效的“西学”范畴。张之洞总结前人，从广泛的意义上概括了“西学”的内容：“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他具体阐释“西政”、“西艺”的涵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除设立议院，张之洞将前此人们提出的中国应该仿效、采纳的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全部内容，统统纳入

"西学为用"的范围。这里面既有科学技术，又有法律制度，还有行政措施。不过，张之洞坚决反对设立议院、推行民权，将民主政治排斥于"西学为用"的极限之外，其目的是为了守住"中体"的最后防线。

**三、以清晰的形式凸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两面锋刃及其中心主旨。**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由隐而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宣称"中体西用"的人，各自目的并不一致，他们对这一思想的理解角度和强调侧面更大相径庭。早期改良派鼓吹"中体西用"，是为了在陈腐、僵化的旧文化的一统天下之中，为新思想的立足打进一个楔子，为的是让"西用"得以在"中体"之中存身。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本意是在以"西用"来捍卫"中体"，这其中既包括采用先进火炮对内镇压民众的反抗，以巩固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又包括用西艺、西技增强朝廷的力量，对列强保全"天朝上国"的虚骄面子。总之，是要在"西学"奔涌而至的形势下，通过革故鼎新之术，保全"中学"的核心地位，亦即它的政治——伦常系统。至于维新派也常言"中体西用"之说，那是他们机敏地将这一现成口号服务于自己的变法活动。

近代各思想流派对于"中体西用"虽有不同理解，各有发挥的重点，但构成"中体西用"论主体的，毕竟是洋务派，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完成这一文化模式，使其功过得失昭然于天下。

就洋务派而言，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说的突出建树，在于从理论上为其"正名"，替这一时代"流行语"核定一个价值基准。《劝学篇》相当充分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并将"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的《同心》列于开篇地位，明言"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

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这一段话，再明白不过地申明了“中体西用”理论的主要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劝学篇》撰成、刊行的1898年春夏之交，正是维新派“托古改制”，推行变法的高潮期，维新派极力鼓吹的兴民权、开议院等“西政”“西用”之说，猛烈地冲击着“中体”的最后防线。张之洞不失时机地推出《劝学篇》，直接目的就在于抵制维新“邪说”，其理论手段则是以平正公允之态，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名”。惟其如此，一度对张之洞颇怀好感的梁启超后来力诋《劝学篇》“是嗫嚅嗫嚅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土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7期）何启、胡礼恒也指责《劝学篇》“不特无益于时，然而大累于世，……深恐似此之说出自大吏，……又害我中国十年”（《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五编，格致新报馆印）。

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论，不惟从理论上详加阐发，他还竭力实现这一主张，使其物化为晚清社会、经济、军事、教育的现实。

较早提出“中体西用”模式的冯桂芬等人，或“坐而论道”，或仅从事某一领域的“洋务”活动（如郑观应之经营工商贸易，王韬之办报纸），因而其实际的社会影响有限；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则全力以赴从事练兵兴学、开矿设厂的具体事物，于“中体西用”理论，未及详加研讨，就学理而言无可深议之处。总之，这两类人物均未能成为“中体西用”论的虚实结合的代表者。张之洞则不同。他主张“中学为体”，不仅于《劝学篇》中具论其详，而且于宦海沉浮中始终以此为立身之本。《劝学篇》讲“新学为用”，应“政艺兼学”，他在两广、湖广总督任内所兴“洋务”，可以说涉及了“西政”（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和“西艺”（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的所有领域，并取得引人注目

的实际成就。总之，张之洞不仅是“中体西用”说集大成式的“力言”者，更是这一思想学说的集大成式的“力行”者。时人与后人将“中体西用”说与张之洞紧密联系起来，言此论则议斯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中体西用”论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其意义是驳杂的。

首先，对于千年来盛行不衰的“夷夏之大防”的传统文化观念来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无可争辩地体现出它开通、明智的一面。从认识水平看，它是思想进步的一大突破；从社会效用看，它又是缓解矛盾、排除障碍，使“西学”得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身立足的“安全岛”、“保护层”。可以说，在戊戌以前，“中体西用”说有它产生的历史必要性与合理性，因而较多地体现出历史作用的积极的一面。作为“过渡时代”的一种“过渡型”文化理论，“中体西用”说的出现，证实近代工业文明诞生以后，世界范围内民族文化的交融，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证明近代新文化的价值，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华民族的开明士人所认可，尽管这种认可附丽于种种现实的、甚至是十分保守的政治功利目的之下，从而或多或少地歪曲、篡改了近代文化的本来面目，但它到底为古老的中华文化走向近代，提供了一种初步模式，提供了一级认识阶梯。如果说种族观的“夷夏之大防”在19世纪40年代已经动摇，那么文化观的“中西之大防”在90年代“中体西用”说定型以后，也趋向瓦解。我们今天有充足理由来论证“中体西用”说的浅薄、机械和似是而非，但却无法否认它在戊戌以前的特定历史阶段，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历史推动作用。无独有偶，与“中体西用”说遥相呼应，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亦曾提出“和魂洋才”的口号，这种惊人的相似显示出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沟通、融汇的历史进程中，以本土

文化为“体”，以外来文化为“用”是一个必经的思想阶段。

戊戌以后，情况发生变化。由于张之洞的苦心经营，洋务事业在湖北地区继续发展，“中体西用”的实验基地并未完全丧失。而且，由于《劝学篇》的刊行以及朝廷的极力推崇，“中体西用”说的社会影响更加扩大。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政治、文化形势的重要转折，作为相对成型的社会思潮的“中体西用”说，其历史作用也发生转折。戊戌维新意识形态领域内，鼓吹“民权”、“共和”，反对君主专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历史已经前进到这样的关口：“西用”事实上的大量采纳，并不能拯救“中体”的病入膏肓，而“中体”走向更新的不可避免的结局，又要求人们从理论上予以透彻的说明。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中体西用”说对抗革命舆论、妨碍思想解放、阻挠社会进步的历史消极面便逐渐上升为其自身社会功用矛盾体系中的主导成份。戊戌以后的张之洞便是此时“中体西用”说历史影响的人物代表，其作用恰如何启、胡礼恒在《〈劝学篇〉书后》中所下之断语：

其论则非，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

就纯理论范畴评析，“中体西用”说也有其根本缺陷。它一开始就违背了体用相关、道器一致的事物本来规律。东晋僧人僧肇（384—441）在《肇论》中指出“即体即用”，道明文化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与形而下的器用制度，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浑然一体。幻想旧“体”能够与新“用”和谐相处，借后者以强化前者，这本来就是一厢情愿。“中体西用”论者割裂道器、本末、体用的有机联系，以机械的方法来处置活泼生动的文化有机体，“塔积木”式地配置中学与西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相互联系，在当时就遇到来自“守旧者‘和’言新者”立场迥异的两方面同基于“体用一致”原理的尖锐批评。《张文襄公治鄂记》披露了张氏所面临的两面夹击的情形：

公之初至鄂也，购机制械，提倡西艺，日不暇给，士大夫之守旧者，以此病公，拟为变法之王安石。及庚子后，朝野倡言变法，异说飚起，言新者又诋公未窥西学途径。故公在鄂二十年，无日不在群疑众谤之中。

这无疑是张之洞的莫大悲剧。

然而，无论如何，从思想史的行程来看，“中体西用”论是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逻辑演绎，而赋予此说以系统阐述并构成理论体系形态的张之洞因此在中国近代实学思潮史上踞有特殊地位。

## 第四节　洋务思想家的经世之学

人们惯常所称的洋务派多半指曾、左、李一类洋务大吏，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完整的。确切说，洋务派包括三部分人，这就是洋务官僚、洋务商人和洋务思想家。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便属于后者行列。

长期以来，人们将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称为早期改良主义者，以示与洋务派的区别。诚然，冯、薛、王、郑等对洋务运动有所批评，但他们正如郭嵩焘一样，批评指责的并不是这个运动本身，而是这个运动的不足，他们的理论与实践实际上与洋务运动息息相关。就思想理论而言，冯桂芬等人力图用传统的道器观念为古老文明应付西方世界的挑战面前寻找生存、发展的理论依据，这就是向西方学其“器艺”，以更好地负载、体现中国亘古不变的“道”。这种思想，正是洋务运动的主导性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咸丰十一年(186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到光绪十九年(1893)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正是“中体西用”

思想产生、发展、成熟的三十年，刚好与洋务运动从开创、发展到终结的社会进程相吻合，而洋务运动便是其产生的社会物质原因。就社会实践而言，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多直接参与洋务活动，成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因此，在文化品性上，冯桂芬、薛福成等人不是洋务派的对立群体，而是洋务大吏的同路人。当然，由于洋务思想家大多到过港澳或出使外国，他们的西学知识远在洋务大吏之上，其思想更富于西化色彩，这种情势使洋务思想家在学习西方问题上往往比洋务大吏走得更远，从而形成与洋务大吏在思想程度上的差异。当维新运动兴起，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终从洋务运动投身于维新运动中，成为在中国鼓吹改良变法的重要人物。

从冯桂芬到郑观应等洋务思想家之所以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在于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深怀忧患意识。冯桂芬将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视为“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并大声疾呼：“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远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郑观应“目击时艰”，痛感民族危机，“每于酒酣耳熟之下，闻可以安内攘外者，感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易言》自序），从而著成著名的《盛世危言》。

在洋务思想家中，以买办起家的郑观应是一位商业资产者。尽管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无论在洋务运动还是在维新变法运动中都有深刻影响，但特定的经历决定了他的洋务活动与变革思想不在本书的视野内。冯桂芬、薛福成、王韬是洋务思想家中的典型人物，亦是封建士大夫以传统经世之学应付时艰的重要代表，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实学史不可忽略的内容。

在洋务思想家这一系列中，冯桂芬出道最早。他生于嘉庆十

四年(1809),比林则徐小25岁,和林则徐、魏源有较密切的往来。

冯桂芬是江苏吴县人,字林一。道光十二年(1832)时为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在苏州考课书院,读到冯桂芬的制举之文,对他颇为赏识,冯桂芬在《显志堂稿》中记叙当时情景说:

> 余之受知侯官林文忠公也,以道光壬辰。时(徐)白舫先生客公署,见余所为制举文,有百年以来仅见之誉。公命余谒之,会北未果。(《关帝觉世真经阐化编序》,《显志堂稿》卷1)
>
> (林则徐至吴)越三日,课书院,荷公首擢,有一时无两之誉,谆勖甚至。(《林少穆督部师小像题辞》,《显志堂稿》卷12)

林则徐遂将冯桂芬招入抚署,校林则徐任京职时所撰北直水利书稿。冯桂芬自称:"受公知最早,所以期之者甚厚,公驰驱绝域,犹手笺酬答无间"(《林文忠公祠记》,《显志堂稿》卷3)。可见两人关系至为深厚。

冯桂芬与魏源亦有深交。"桂芬在京时,曾与默深等修楔慈仁寺,在扬州,尝与默深、刘孟瞻诸子纵言河事,佥谓'非令北流不可'。……默深所撰《海国图志》,桂芬亦草文正其错误,凡四端"(李柏荣:《魏源师友记》,第110页)。

冯桂芬之所以为林则徐赏识并与魏源交好,乃是因为他与林、魏等人在"经世"宗旨上心心相通。《清史稿·冯桂芬传》说他"留意天文、地舆、兵刑、河漕诸政"。左宗棠则称冯氏"著述甚富,堪稗实用"(左宗棠:《中允冯君景庭家传》,《续碑传集》,卷18)。由于冯桂芬致力于经世之学,"故屡登大府荐牍,有'品学兼优,才堪干济;卓识宏议,定裨军国'之语"。(李柏荣:《魏源师友记》,第110页)"未仕时已名重大江南北"(《清史稿·冯桂芬传》)。咸

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陷苏州,冯桂芬避居上海。"时大学士曾国藩治军皖疆,苏州士大夫推钱鼎铭持书乞援,陈沪城危状及用兵机宜数千言,其稿桂芬所手创也"。曾国藩读之感动,于是,遣李鸿章率军队东下,解太平军上海之围,并攻克苏州。冯桂芬于此期间入李鸿章幕,多方出谋画策,其间最重要的功绩之一乃是"设广方言馆求博通西学之才,储以济变"(《清史稿·冯桂芬传》)。在洋务时期西学引入过程中,上海广方言馆与上海机器制造局、上海格致书院是比肩并立的上海三大西学中心。

冯桂芬最重要的著作是《校邠庐抗议》。李柏荣《魏源师友记》称此书"于经国大计,指陈剴切,见者咸叹为通儒",将其视为一部重要的经世之作。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中国不仅在军事方面"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且在内政制度方面也有不如西方的地方。这就是:

> 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在这"四不如"中,人才问题、资源开发问题、名实相符问题都是老问题,而"君民不隔不如夷"则直接触到痛点,指出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根本性差异。针对中国"君民隔阂"的弊端,冯桂芬提出了"公黜陟"、"复乡职"、"复陈诗"等改革措施,这些措施的形式是古老的,但内容却具近代色彩,即强调对民意的重视,例如,"公黜陟"的要害乃是把对官员的考核与百姓的"公论"联系起来,"复乡职"的核心是由选举产生乡官,并规定任期加以限制,其优劣亦由民监督,这显然模仿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代议制度中的一些做法。

直面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冯桂芬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思想:

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收贫民议》，《校邠庐抗议》卷上)

他的具体建议是"采西学"、"制洋器"，这正是洋务运动所遵循前进的路线，而《校邠庐抗议》中所提出来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则在近代首次揭张起"中体西用"的旗帜。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问世后，"见者咸叹为通儒。"然而，它的真实文化效应却在30年后戊戌变法的高潮中，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孙家鼐奏请光绪帝将此书"饬下直隶总督，刷印一二千部，交军机处，再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令各官"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不可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送还军机处，择选"进呈御览"。光绪允其请。李侃《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载《中国近代史散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页)介绍这次全国高层官员的大讨论情况说：当时计有上自大学士、内阁学士、尚书侍郎，下至知州、知县、同知等327名大小官员参加签注，签注的内容形形色色。对于《校邠庐抗议》中流露出的不满封建专制的朦胧的民权思想，签注者竞相提出不同见解。如内阁学士阔普通武写道："其全书精粹最妙者有二语：曰法苟不善，虽古先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御史黄均隆对《公黜陟议》深加赞赏，他的签批是："用人凭公论，固是古法，而西人议院亦是此意。此法行，而徇情纳贿之弊可除"。杨深秀、宋伯鲁的签批对"公黜陟议"持一种谨慎、保留的态度："西国多行此法，然中国在今日变法之初，决不可用。盖士习帖括，通达时务者少，若用此法，诸多窒碍，必待学校兴而民智开，然后用之，方无流弊。"昆冈关于《公黜陟议》的签议则持一种反对派的姿态："庶僚会推，下位保举，流弊滋多，似不可行。考官学政，皆由公举等语，尤为窒碍。"

《校邠庐抗议》中的《广取士议》亦引起众多大吏的注目。徐承煜对此签注道："近来取士之法，屡奉明诏，实力讲求，无庸再议。夫取才不可不广，用人不可不严，且用舍之权，操之自上。冯桂芬谓'荐举之权，宜用众不用独，用下不用上'二语，即是民权说，实属荒谬。"一部《校邠庐抗议》能引起人们如此深广的讨论与思索，这本身就显示了它蕴藏着多方面的认识价值以及经世功用，这便是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在中国近代实学思潮史上的卓越功绩。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稍长，纵览经史，好为经世之学"(夏寅官：《薛福成传》，《碑传集补》卷13)。同治初年，曾国藩北上征剿捻军，行前在无锡张榜招揽贤才。薛福成"于宝应舟中上万言书，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等八策"。"国藩一见，大加奖誉"，"谓剑州李榕曰：吾此行得一学人"，"遂邀入幕，军谋机要，多所赞画，由是声誉隆起，以一书生负天下重望"(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在曾国藩幕中，薛福成得曾氏耳提面命，学识日增，"凡历史掌故山川险要以至兵机、天文、奇遁之书，靡不钩稽、讲贯，洞然于心。遇事立应，略无窒碍"(夏寅官：《薛福成传》，《碑传集补》，卷13)。光绪元年，朝廷下诏求言，"福成上《治平六策》、《海防十议》，一时传诵以为马周、陈亮复出"(钱基博：《薛福成传》，《碑传集补》，卷13)。郭嵩焘、张之洞"皆以贤才密荐"。以后，薛福成又入李鸿章幕，"于时局多所斡旋"。

作为一名积极用世的经世学者，薛福成密切关注时局变幻发展，并直接参与若干重大事件。

同治八年(1869)秋，安得海出京"采办广东"。薛福成正有事过山东，山东巡抚丁宝桢"邀与语天下事"，"福成力劝宝桢执杀"安得海，丁宝桢在薛福成推动下"计决"。"至是斩安得海而籍其赀"。曾国藩知此事后对薛福成说，"吾病目久，闻是事积翳为之

开矣”。(钱基博:《薛福成传》,《碑传集补》卷13)欢欣之意,溢于言表。

光绪二年(1876),英使威妥玛“以旅滇英人被戕多所要索”,与清政府谈判破裂,时“国人恟惧”,担心发生新的战争。薛福成则判断“英自俄德交合,方惴惴顾虑,并不轻用兵中国”,因此,威妥玛的动作并不符合本国政府的利益,他向李鸿章建议:“不妨以拒为迎,一面备战,一面将滇案本末布告各国使臣,宜将威使自办滇案以来,始则多方禁阻,不许详告各国,继则百端要挟,不使及时议结两层反复详述,咨明各国驻使,请其评论,仍密饬海关税务司设法刊布外国新闻纸。”李鸿章采纳薛福成之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外交指施,从而使威妥玛“气沮而事遂”,化解了一次严重的外交危机。(钱基博:《薛福成传》,《碑传集补》卷13)

光绪五年,总理衙门拟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总南北洋海防,“下鸿章议”。李鸿章圆滑,“复书颇瞻徇。”薛福成向李鸿章慨慷陈言:“公自任天下之重,天下安危所系,何得不言?夫赫德为人阴鸷,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外中国,彼既总司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他进而建议道:“若总署已与定议,不能中止,宜告赫德以兵事非可遥制,须亲赴海滨专司练兵,其总税务司一职则别举人代,赫德贪恋利权,必不以彼易此也。”薛福成的进言使李鸿章“耸然”,他依薛福成之计说动总理衙门,“总署遂以专司练兵,开去总务税司一缺之说告赫德”,赫德果然不愿放弃海关总税务司这一美职,以赫德总南北洋海防的提案因此告寝,对于中国近代主权来说,这无疑是一重要事件。

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内乱,日本拟乘机鲸吞朝鲜并进而侵略中国,当此紧要关头,薛福成指出:“事机得失,间不容发”。“请即遣超勇、扬威、威远三兵轮东驶,扼朝鲜之仁川、海口,然后函商

总署，发陆军东渡，直指朝鲜都城，其余泰安、安澜、云登、瀛州、澄庆等船陆续进发，一则迅赴事机，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则使日本、朝鲜见我军络绎不绝，莫测多寡之数”。直隶总督张树声“用其计”，结果清军“先一日至(朝鲜)”，“驶入五京平乱”，日本“无所逞其志”。中国争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东南海疆告急。薛福成时为浙江宁绍台道。他“购器筑垒，布置井井”。“法兵犯镇海，奋力抵御”。在“兵不过数千，兵轮只元凯，超武两轮”的情况下，与法军“相持四五十日”，使法国侵略者“卒不得逞”。“论者谓与镇南关之捷相匹云”。(夏寅官：《薛福成传》)

光绪十五年，薛福成被派任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大大开阔了薛福成的眼界。在任外交官期间，薛福成发现了传统侨民政策的一大弊端，这就是“凡出洋久留者，行文外国，解回正法”。“至是侨民致富者多以官吏讹索不敢回，而侨属国又以中国不保护侨民，因事陵削，告诉无门”。薛福成对此政策予以尖锐批评。他指出：

> 中国有人满之患，遂不得不导佣工以扩生计，开商路以阜财。……且中国贸易每岁与各国出入相准，亏短甚巨，然尚有可周转者，以华民出洋所获之利，足资补苴也，倘此禁不开，此源再塞，则内地财匮民穷，事变丛生，不可不蚤计，不可不熟虑。(钱基博：《薛福成传》，《碑传集补》卷 13)

在此番议论中，薛福成充分肯定了出洋打工与经商的合理性，指出了“华民出洋所获之利”在国民经济总体系中拥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其思想难能可贵。正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清政府“添设南洋各岛领事以保护侨民之在外者”，“除通海旧禁以安侨民之返国者”，“侨民便之”。(钱基博：《薛福成传》，《碑传集补》卷 13)

和洋务时期的其它外交官一样，薛福成出使国外，深为叹羡

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并将自己的感想记录在《出使日记》中，他还“广求亚洲地志及西人游历日记，命随槎诸君分曹纂录，绘图译说”（薛福成：《英法意比志译略》），拟称《续瀛环志略》。其中一部分后来由其子薛莹中编成《英法意比志译略》，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印行，有关亚洲国家的志略亦复刻印出版。

薛福成的《出使日记》不仅对外部世界的情形多有描述，而且于介绍中鲜明地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他赞叹“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并认为西方各国议会中，美国式的民权过重，不如英德等国有君位有议院的政权组织形式，故对英国的议会组成方式介绍尤多，其思路与后来的维新派颇为一致。他还对与议会制度相关的两党制甚为欣赏。认为“公党者主因时变通，裨益公务；保党者主保守旧章，勿使损坏。……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国政适以剂于平。”（《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65—166 页）薛福成关于西方近代政治体制的积极介绍，映现出洋务时期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时代思潮，并成为后世维新思想的先导之一。

作为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十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夏寅官《薛福成传》说他是“勤以率下，俭以奉身，待人接物，一主以诚。……盖得力于文正者深矣。”以如此风格经世、用世，使薛福成在洋务思想家中神采独具夏寅官：《薛福成传》说：

> 近世士大夫谓本理学而谈洋务者，先生一人而已。

作为经世型的洋务思想家，王韬无疑也是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由于他的主要经世活动在西学介绍与域外史地研究上，因此，有关他的论述将在第四十一章中展开。

# 第三十九章　洋务派“师夷智”的经世活动

洋务运动的魂魄是“自强”，而“自强”的路径便是林则徐、魏源所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林、魏的“师夷长技”更多的是一种战略考虑，洋务派则将，“师夷长技”的战略性口号则化为大规模的实践。

## 第一节　“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西方的坚船利炮在中国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有一条胡林翼的事迹，题名《忧臣忧国》，其文曰：

> 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眙形势，……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至是益焉，不数月薨于军中。

胡林翼见外国轮船而忧心呕血，几至坠马，是由于深感中国面对西方长技，无制胜之术，“虽欲不忧而不可得也”。胡林翼的感受为那一时期有识见政治家所共有。奕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以至后来的张之洞对于近代时局的变化有比顽固派

清醒的历史感和明智的现实感，他们大都相信非效法西洋长技不能自强，而造船制炮又是他们全力用心所在。

奕䜣是洋务运动的前驱与领袖性人物。早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他便于《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中提出"自图振兴"的口号。十三天后，他再次上奏折指出，他原来所主张的"审敌防边，以弭后患"，只是"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控源之策，在于自强。"（《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八册）这是"自强"口号的最初提出。对于整个洋务运动，对于中国近代化，这一口号具有深远影响。

奕䜣所鼓吹的"自强"，其关键是军事近代化，而军事近代化的核心又是自制近代军事武器。咸丰十年十月十一日（1860年11月23日），奕䜣在奏请引进俄国武器并借师助剿折内谈到制造枪炮及炸炮、水雷、地雷、火药问题。十二月二十四日（1861年1月24日），奕䜣在总结借师助剿问题的奏折中明确要求曾国藩和薛焕在上海"酌雇夷匠"、"教导制造"洋枪炮。担任议政王后，奕䜣更频催南方学造西洋武器。从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到后来的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等第一批近代军事工厂的创建，无一不是得到奕䜣的全力推动与支持。

曾国藩长期与太平军作战，对洋枪洋炮的威力深有所晓，在湘潭、岳州与太平军的两次战斗中，他"赖洋炮之力"而获胜，这更促使他对西方军事武器的高度重视。最初，曾国藩力主从国外购入枪炮，以为这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曾国藩全集·奏稿》3）。然而，"阿思本舰队"事件的发生，使他深感购买外洋轮船容易受人控制，由此而从购买洋人船炮转为"锐意另求造船之方"，并明确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名言。

曾国藩"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事业，开始于安庆内军械所。朱孔彰评论说："曾公阴有争雄海上之志，设内军械所安庆，仿造火轮船。"(《中兴将帅别传》卷1)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便诞生在这座规模不大的军械所内。同治四年(1865)中国第一个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在上海创建。对于该局经费的筹措、机器设备的购置，管理人员的委派、洋匠的雇用、机构的设立等问题，曾国藩都亲自过问。在江南制造局制造的军工产品上，曾国藩最注重的是轮船，他认为，"制造轮船实为救世要策"(《曾国藩全集·奏稿》卷25)，"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曾国藩全集·书札》卷27)在曾国藩的大力经营下，江南制造局终于造出了近代中国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轮—"恬吉"号。随后又相继制出多艘兵轮，其制作技术"愈讲愈精"。曾国藩在亲自校阅新造兵轮的操演之后，欣喜地说："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4)并且预言，如"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那么，可以"为中国自强之本"(《曾国藩全集·书札》卷33)。

李鸿章亦是学习西方军事长技的热烈鼓吹者，他声称："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海之资，自强之本"。"求洋法习洋器为自主张本"。他批评因循守旧的顽固派说：

> 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折附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他大声疾呼:“今日所急唯在力破成见,以讲究实际而已”。正是本着志在致用的精神,李鸿章积极赢得中枢机构内奕䜣等人的支持,精心筹划建立起以应用机器为工业的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并接手经营天津机器局。虽然,以“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为总方针的沪、宁、津三局在经营与生产上存在着种种弊端,但它们制造的武器装备,比之中国传统的“孤矢”、“风篷”要先进得多。丁韪良《中西见闻录》由沪、宁、津三局的生产情况预言:“不数年间,中国陆路之兵,将舍孤矢之戏,而专恃洋枪之威;水师之船,将舍风篷之笨,而独取火轮之速矣。”

注重实事实功的左宗棠亦是学习西方军事长技的热烈倡导者。他吁请朝野上下注意如下情势:“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蚕食鲸吞之谋,乘虚蹈暇,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学艺说帖》,《左文襄公全集·说帖》)他又指出:“中国之睿智定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为了弥合中西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中国应该弃虚就实,“以艺事为重,”“师远人之长”。在“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的思想(《左宗棠年谱》,第125页)指导下,左宗棠于闽浙总督任上,力排众议,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从同治八年(1869)到光绪十年(1884),该局先后制造了商船、兵舰等24只,船质结构由木质发展到铁胁木壳,铁胁双重木壳,中法战争后又发展到钢壳甲。船舰行驶速率由每小时九浬发展到十五浬,船只装备的大炮亦由前膛炮改装为后膛炮、连珠炮,船的吨位也不断增加。到陕甘后,左宗棠又创立甘肃制造局,抓紧新式武器的制造。他曾预言:

若果经费敷余,增造精习,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

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

此风一开,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人之长……尚何外侮之足虑乎?(《左文襄公全集》,说帖,卷1)

对于自己经营的洋务事业,左宗棠仿佛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觉,这就是继承魏源的遗愿:

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然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与西人等。艺事末也,有迹可寻,有数可推,因者易于创也。器之精光,淬厉愈出,人之心思,专壹则灵,久者进于渐也,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重刻海国图志序》,光绪乙未年上海书局石印本)

张之洞的思路亦与其它洋务大吏一样,将"雇匠购器,设厂自造"视为"自强"的不二法门。在两广总督与湖广总督任上,他创设枪弹厂、枪炮厂,生产了大批近代军械。辜鸿铭在论及张之洞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时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

当甲申一役,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张文襄公幕府纪闻》,第20页)

"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以泛道德主义与军事实力相对抗,"清流党诸贤"实际上遵循的仍然是宋明理学的"内圣"路线,这条路线将"正心诚意"视为"国治民安之本",排弃一切非道德性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从而坠入空谈无用的泥淖,张之洞虽也曾是清流派的一名健将,但他以务实的眼光看到,在国际对抗中,物质的大舰巨炮具有忠信笃敬一类道德伦理所不及的威力,他的"舍理而言势",大力兴办军事工业,正是返虚归实,实践他一切

归于“致用”的学术宗旨。

然而，因循守旧毕竟在中国有太深太久的传统，稍有时机与气候，这样一种思潮便会集合强大的力量向“经世致用”开新风一路发起挑战。同治十二年(1872)，内阁学士宋晋上疏，要求停止制造轮船，其理由有二条：一是糜费太重，二是中外“早经议和”，故不必再有此猜嫌之举。奕䜣以议政王身份，由军机处发廷寄给直隶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闽浙总督文煜、船政大臣沈葆桢，谕令他们通盘筹划，李鸿章在复奏中对宋晋之议痛加驳斥，指出“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乃是“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所以创巨而痛深。”他和左宗棠、沈葆桢一致表示，国家其他经费皆可节省，惟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以立，终不得强矣”。针对清政府财政困难的现实，李鸿章提出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以及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领雇的建议(《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在奕䜣的主持下，这次关于造船问题的辩论以洋务派胜利告终。根据李鸿章等人的提议，清政府强调船炮一类军事制造工业不仅要“精益求精”，“不有进境”，“不可惑于浮言浅尝则止”，而且要向纵深方向发展，这就是：拓宽大机器生产领域，除军事工业外，还要举办民用工业，以民用养军工，以“富国”而致“强兵”；改革企业内部经营方式，在官办之外，实行“官督商办”和商办。以这次辩论为契机，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开始兴办民用企业，并推行官督商办，中国近代化运动呈现出格局一新的发展势头。

“采西学、制洋器”是一个在官方主持下公开引入西方科学技术的过程。西方远较中国先进的动力、制造、纺织、矿冶等方面技术与设备，以相当的规模堂堂正正输入中国。中国留学海外的

先行者容闳最先建议曾国藩购置制造机器之机器，如“各式车床、锥锉等物”，“由此车床、锥锉可造成各种根本机器，由此根本机器，即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它种种机械之物。”（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7页）曾国藩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委派他前往美国购买“制器之器”。容闳所购回的车床、刮床、钻床、锯床等成为江南制造局的奠基性设备。光绪二年（1876）基隆煤矿引进了一批西方开矿机器，用于凿井、采煤、抽水、提车以及通风、截木。光绪十八年湖北汉阳铁厂引进“西门—马丁炼钢法”即平炉炼钢法。此外，洋务大吏还购进了成套的纺织设备和石印的印刷技术。作为“夷智”重要内容的西方科学技术“硬件”的输入为中国近代工矿企业的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其意义十分深远。

## 第二节 “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

洋务派“师夷智”的经世活动，最初以自行制造坚船利炮为目标。制造坚船利器，必须引入“制器之器”；制器之器又与科学技术理论不可割离，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理论又存在着文字上的扞格。于是，翻译问题自然而然提到议事日程。曾国藩对翻译西方科技理论十分重视，他指出：

> 翻译之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

而要明了造器制器之所以然，就必须翻译西方有关工业制造和与之相关联的实用学科的著作。

在曾国藩、李鸿章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专设翻译馆，聘请外国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金楷理、林乐知等，同中国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合作，“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所译书籍有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理、天文、行船、博物、医学、工艺、水陆兵、新闻纸、造船、历史、交涉公法、零件等。翻译馆内，“人各一室，日事撰述，旁为刻书处，乃剞劂者所居。”其译述方法则为西人口译，中国科技人员笔录。英国人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详细记载了当时工作情形：

> 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人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郅斫，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

由此可见，翻译馆的译述方法非常讲究，态度甚为严谨。

江南制造总局自同治六年(1867)设译馆以来，成绩颇为可观，仅译馆开设后一年，便译成“《机器发轫》、《汽机问答》、《运规指约》和《泰西采煤图说》四种。”(《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至光绪六年(1880)，译馆已刊印西方书籍98种，232本，译成未刊的有45种，142本。至光绪二十一年，除宗教书外，各类译书总计约400—500种之多，差不多占全国同期译书数量的一半。据傅兰雅《译书事略》记录，光绪四年前20年间，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所译书主要是实用知识和工程技术——兵法工艺，故水陆兵法、造船、天文、行船、工艺、汽机、零件一类书籍占已刊成诸书的百分之四十一，占未刊成诸书的百分之八十。光绪二十二年以后，电学、声学、光学、化学、数学等有关格致学的书籍大量增加，“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梁启超曾评论说：“制造局首重工

艺，而工艺必求格致，故格致之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736页)这是关于江南制造局翻译概况的真切介绍。

由于江南制造局译馆机构健全并讲究译述方法，承担笔述的中国科学家不仅是科技方面的行家里手，而且具有相当文字工夫，译官所译书因而具有较高质量。同治十年(1871)，翻译馆的首批书出版，《申报》对其褒奖备至，称赞译著“精深微妙，无美不臻，而笔而述之者又复斟酌尽善，……以之为工师之规矩，儒生之图籍，不将其家喻户晓哉！”(《申报》，同治壬申(1872)六月廿七日)当时译馆所译书，不仅中国官绅人士多所购读，就是西人也“书缄频寄，讯此馆之源流，问译书之理法，究察所用各物之名，访求所译西书之目”(《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9页)。日本人柳源前光甚至专程来馆学习，并“购取译本，归国仿行”(《洋务运动》四，第79页)。除输入实用制造技术之外，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还编译有新闻报纸和《西国近事汇编》杂志，对时人了解西方时事、开拓视野大有裨益。

与江南制造总局相先后，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北洋水师学堂、开平矿务局、金陵机器局、北京海关税务司等洋务企业与机构，也都集中人力译书。京师同文馆本为培养外交人才而设，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翻译机构，其教学着重于译书训练，规定：“八年毕业诸生，最末两年都须译书。”(毕乃德《同文馆考》，参见《京师同文馆馆规》，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44页)在馆洋教习，也多有译书成绩，如其英文教习丁韪良先后译公法书数种，为西洋法学东传之始，其影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在林则徐主持翻译的《各国律例》之上。有人统计，同文馆设立30年间，译著了近200部侧重于介绍西方外交、历史、时事等方面的书籍。

从京师同文馆到洋务大吏在各地主办的翻译及教育机构，近代中国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输入西学的系统。鸟瞰从咸丰三年(1853)到光绪末年西方书籍的译介，可见致用性考虑始终占据首位。在西方科技译介工作初期，“中国官局旧译之书，兵学几居其半”，这是因为“中国素未与西人相接，相接者兵而已。于是震动于其屡败之烈，怵然以西人兵法为可畏，谓彼所以驾我者，兵也。吾但能师其长技，他不足敌也。故其所译，专以兵为主。”(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第一册第64页)从震惊西方利器到仿效西法制船制炮，中国人方发现船坚炮利并非仅仅是“奇技淫巧”，而是有一套精密的自然科学为基础，诚所谓：“今近一切西法，无不从格致中出。制造机器，皆由格致为之根柢，非格致无以发明其理。”(王韬《格致书院丙午年课艺序》)于是，算学、重学、以及声、光、电、化一类书籍大量被译入中国，其目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皆将资以制造以为强兵之用。”(《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第一册，第64页)甲午战争后，人们进而发现“徒译兵学医学之书，而政治经济之本，乃不得一二”的译书方针，实际上是未通本源。于是，西方社会科学一类著作乃至哲学论著才开始陆续译入中国。这种从实用技术到自然科学再到社会科学、哲学的译书进程，同时也就是中国人对于“师夷智”的认识过程。尽管洋务大吏以“师夷智”为宗旨进行的翻译活动，被后来的维新派批评为肤浅或本末倒置，但是，由西方科技书籍而产生的知识结构的改变却是中国近代思想演进的不可或缺的一环。从早期维新思想家到康、梁、谭等人思想的进步或升华，从徐寿、华蘅芳到各企业的中国员工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无不受益于这批翻译过来的声、光、化、电之类书籍的启蒙。

## 第三节 “开馆教习，远适肄业，收远大之效”

以“师夷智”的眼光筹划全局，洋务大吏有一个共通的认识，这就是学习西方利器，不仅要输入“制器之器”以及有关科学技术理论，而且还要培养“制器之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达到“师夷智”、“收远大之效”的目的。

洋务大吏培养“制器之人”亦即科技人才，是两条并举的道路：一是立足国内，开馆教习；二是走出国门，留学海外。

最初提出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增加西方科技内容的是洋务派的领袖人物奕䜣。他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1月12日），奏请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即设自然科学专业，令“正途科甲人员”入馆研习。奕䜣的建议一出，立即遭到顽固守旧派的激烈抗议，他们宣称：“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并非谓欲求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8页）又谓：“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21页）对于奕䜣提出的令科甲人士研习天文算学的建议，他们更愤激不已，在他们看来，叫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学，实际上就是使他们“变而从夷”。他们危言耸听地预言道：若采纳此建议，“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中国之众”将“咸归于夷”。对于守旧派的如上论调，奕䜣一一加以驳斥，他指出：“当年内外臣工，不求御制实际，徒以空言塞责，遂酿庚申之变。……此臣等所以鳃鳃过虑不敢以道

学鸣高，只顾眼前而不肯任劳任怨也。”(《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29页)心性道德之说固然“陈义甚高，持论甚正”，但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奕䜣与守旧派展开的“同文馆之争”最终以奕䜣胜利告终，自然科学第一次在中国传统教育中获得堂堂正正的地位。

曾国藩是“开馆教习”西方科技的积极倡导者。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到上海考察，亲赴江南制造局参观，容闳为陪同人员，他引导曾国藩“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曾氏为之兴致勃然，容闳“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给中国青年工人“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文正极赞许。”(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5页)在曾国藩支持下，容闳顺利创设新式机械学校，培养出一批早期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对于曾国藩的支持，容闳深为感激。他在《西学东渐记》中深情地指出：“曾公盖中国之军事家及政治家”，“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因曾而予之教育计划乃得告成；又因予之教育计划告成，而中西学术萃于一堂。”李鼎芳曾评价曾国藩对容闳的支持，指出其意义不仅在设学校本身，而且对于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于西学东来，实辟一途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第61页)这确是深切之论。

李鸿章关于培养“制器之人”的思想也十分明确。早在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便在冯桂芬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于原有科举项目外“专设一科”；此科设置的目的在于引导“聪明智巧之士”“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自造自修自用”西方坚船利炮。同治六年，李鸿章又代呈藩司丁日昌条款，主张变通“文场科举之制”。他指出：

取士兼求实用之才，戚继光云：所用非所学，所习非所

用，最为兵家大害。夫岂独治兵也哉？今之儒者，殚心劳神于八股文字，及出而致用也，闭门造车或不能出门合辙。似应于文场科举之制，略为变通。拟分为八科，以求实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19—20页）

这八科中便有一科曰："考算数格致，以觇其通；问机器制作，以尽其能"。

丁日昌恳祈李鸿章代呈的"条款"，实际上是李鸿章借丁日昌之口表述自己"所欲言而未敢尽情吐露者"。"条款"中"求致用"，"求实济"，"求实用人才"的主体思想，正是李鸿章全力思考之所在。

李鸿章代呈的丁氏"条款"因守旧派顽强反对而被朝廷拒绝采纳，但李鸿章并未就此罢休。同治十三年，海防之议起，李鸿章在议海防问题的同时，再次提出变通科举制度、培养科技人才的问题。在《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指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而中国殊为缺少"练达兵略，精通洋法"之人，究其原因，就在于朝廷坚持以章句取士而堵塞了士大夫趋向西学的门径。然而，与洋人的抗衡终依赖于实力而不是性理空论。"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因此，朝廷应"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际"，以支撑"天下危局"。他具体建议道："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洋务运动》（一），第42、52、53页）凡有海防省份，均应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臣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器学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而通过"洋学局"培养出来的掌握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人才，"与正途出身无异"。

李鸿章关于"另开洋务进取一格"的提议，实希望促进"当路之猛省而自择"，然而，正如奕䜣当年提议在同文馆中增设天文

算学科一样，李鸿章的奏折也遭到守旧派的嗤笑与围攻："其时文相（文祥）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明僚函稿；卷17）他们的理由是："以章句取士，正崇重尧舜周孔之道，……人欲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社稷"。（《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29页）守旧派所论，其实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这就是把"富国强兵"与"社稷"对立起来，由此可见，他们心目中的社稷只是一个"礼义廉耻"的幻影。

李鸿章变通科举制的主张在守旧顽固势力的强大反对下被否决，但是，李鸿章始终为培养科技人才执著努力。据王韬《格致课艺汇编》记载，李鸿章曾于光绪二十四年（1889）以培根、达尔文学说为题考试学生，其识见显然远在一般洋务大吏之上。同治六年与同治十一年，他终奏准效法西方，设立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学习中学、西学、文事、武事。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炮台营垒新法，并操习马队、步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仍兼习经史以充根底。这两个学堂为北洋海陆军培养了一批"文理通畅、博涉西学"（余思贻：《楼船日记》上册）的将佐。此外，李鸿章还效法西方相继设立了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其设立科目与教学方法颇具开创性示范意义。

张之洞举办教育的宗旨亦"专注重实用"（《清史稿》卷170，选举二）。着力培养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他于湖广总督任上，兴办了一系列实业学堂。其中著名者有矿业学堂和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自强学堂初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清末著名数学家华蘅芳曾在算学门任教，张之洞对这四门学科的重要性分别作了叙述："方言学习泰西语言文字，为驭外之要领；格致兼通

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入门；算学乃制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设自强学堂片》，《张文襄公奏稿》卷21)湖北农务学堂以学习西方(尤其是美国)农牧业先进技术为目的，学堂内分农桑、畜牧、森林各门，皆为切实有用之科目。湖北工艺学堂“选募东洋工学教习二人，一教理化学、一教机器学，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商学者入堂学习，并派中国通晓化学制造之士人帮同教导艺徒，讲求制造各事宜”。

在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开馆教习”西方科技的不懈努力下，大批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中国传统科技结构乃至文化结构因之发生变更，“风气为之大开”(《洋务运动》第8册，第30页)。

洋务大吏培养科技人才还有另一条路径，这就是派遣留学生出洋。

派遣留学生出洋的建议最初提出者是容闳。容闳19岁漂洋过海，到美国求学，22岁考入耶鲁大学。在大学期间，他构思了一个救国方案，即通过留学教育，“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6—27页)回国后，容闳托请江苏巡抚丁日昌将自己的“教育计划”转呈清廷，其中第二条说：

>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名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

成以充之。(《西学东渐记》,第 86—87 页)

由于此条陈系请军机大臣文祥转奏清廷,而文祥又恰因"丁忧"奔丧守制,容闳的条陈遂石沉大海而无消息。

正当容闳因条陈受挫而苦闷之际,曾国藩奉命赴天津查办天津教案。作为翻译同行的容闳即利用此时机,通过丁日昌面晤曾国藩重提遣派幼童出国的建议。曾国藩经与丁日昌磋商,采纳了容闳的主张,于是,由曾国藩领衔,李鸿章、丁日昌、容闳等署名的奏折飞递入京。奏折指出:

> 凡西人游学它国,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或谓天津、上海、福州等处,已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入西人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不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唯力有不逮,且此中奥妙苟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曾文正公奏稿》卷 30)

曾国藩等人有力地阐明了一个道理:仅仅购入外国机器并不能真实发展本国工业,只有采取包括海外留学在内的培养科技人才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图振奋之基","收远大之效"。其眼光无疑是远大的。

关于留学海外问题,曾国藩的具体规划是:

> 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

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每年至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驻洋肄业十五年后，每年回华三十名。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

由此可见，用官费派遣留学生出国，不是曾国藩等人一时的兴致所至，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项长远战略规划，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向西方学习迈出的一大步。

曾、李关于派遣赴美幼童留学的奏折，得到清廷中枢奕䜣的有力支持，他兴奋地称此事为"中华创始之举。"同治十年(1871)夏，留学生准备学校在上海设立，次年春，曾国藩病逝，由李鸿章独力支撑派遣留学生计划的实施。同治十二年夏，第一批官费留学生30人在陈兰彬的率领下，东渡太平洋前往美国。到光绪元年(1875)，120名留学生全部按计划派送完毕。这些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中国著名铁路工程专家的詹天佑；有后来出任国家电报局局长的朱宝奎，有回国后派往唐山的我国第一批矿业工程师邝荣光、陈荣贵、陈锡贵、邝景耀、黄耀昌等人。据统计，这批留学生中后来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从事工矿者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从事海军者20人，其中海军将领14人。(转引自李喜所：《中国近代早期留美学生小传》，《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他们各以所学知识为中国近代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鸿章除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外，还相继选派了一些官弁和学生赴欧洲分别学习"陆军技艺"、制造与驾驶轮船技术、水师兵法以及矿学、化学、交涉公法等。他所殷切希望的是"虽未必人人能成，亦可拔十得五，实于海防自强之基，不无裨益。"(《李文

忠公全书》，奏稿，卷 28）

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张之洞成为派遣海外留学生的最积极推动者。张之洞派遣留学生始于 90 年代任湖广总督时。光绪二十四年（1898）日本驻华使臣矢野义雄函请选派中国学生 200 名，陆续前往日本各学堂学习，并允支援经费。御史杨深秀深为赞同，奏请朝廷速议游学日本章程。经议复同意。正在湖广总督任内的张之洞会商选择“聪颖子弟”湖北 100 名、湖南 50 名，前往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诸艺，这是两湖派遣大批学生留日之始。由于日本离中国近，所花费用远较赴欧美少，日文又近于中文，易通晓，故张之洞派遣留学生的总方针是：“西洋不如东洋”。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初叶，在张之洞主持下，数千名湖北留学生游学日本，湖北成为留日学生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其中多有后来成为著名人物者，如吴禄贞、蓝天蔚、刘成禺、张继煦等。

张之洞积极派遣留学生出洋学习，也是基于培养洋务人才的急需。他在《劝学篇·外篇》中说：

>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役也。

以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收西学致用之效，这就是洋务大吏一以贯之的战略思考。然而，留学运动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加强了中国的国力，而且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引起了思想的突破和价值观念的变易，最终导致了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推动清王朝走向覆灭。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所热衷的“开馆教习”、“远适肄业”等洋务活动，实际上应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这就是：“种豆得瓜”。

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西学在经世之学中的比重日益增加。

魏源19世纪20年代为贺长龄编定的《皇朝经世文编》在内容上全系传统儒家治术，而80年代以后出版的《皇朝经世文续编》、《三编》、《新编》等，不但“洋务”专列一类，而且包含的西学内容愈益丰富，中国古代经世之学向近代新学转化的趋势渐益明朗。

# 第四十章　洋务时期的“格致之学”

洋务大吏“师夷智”的经世活动，在传统中国文化结构内引起了深刻变动，其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康熙末年以来中断了100多年的西方科技输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大规模重新展开，从而造成晚清“格致之学”的勃兴。

## 第一节　“格致之学”的兴起

“格致”一词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就本义而言，“格物致知”是一种道德和政治范畴，是“修、齐、治、平”的起点。然而，在朱熹的注释中，“格物”意谓即物而穷其理。所谓“理”，虽然指本体之理，但也有认识事物规律的意思；所谓“物”，则所指极广，“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朱子语类》卷57）。由此而来，“格致”一词包涵了探求事物客观规律的意义，并在晚明被一批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士大夫们用来指科学技术。

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初借用“格致”说法谈论科学技术的，大约是晚明徐光启与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利氏在《几何原本序》中说：“夫儒者之学，亟致其知，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耳。……吾

西陬国虽褊小，而其庠校所业，格物穷理之法，视诸列邦为独备焉。……其所致之知且深且固，则无有若几何一家者矣"(《几何原本》卷首，同治四年金陵刻本)。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则把传入中国的西学分为大、小两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利玛窦与徐光启所说的"格物穷理之法"，实际上即探求客观规律的自然科学。

在徐光启、利玛窦的启示下，近代学者多以"格致"指科学技术。咸丰十年(1860)，冯桂芬到上海，与西学接触，认为西学中"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格致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冯桂芬：《采西学议》)。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奏请于上海设立广方言馆，该馆不仅研习外语，而且颇重数学，其原因在于"西人制器尚象之法，皆以算学出。若不通算学，即精熟西文亦难施诸实用"。故该馆章程规定："凡肄业者算学与西文必须逐日讲习。"为了强调上海广方言馆研习科技的风格，李鸿章为该馆正厅所题匾额即为"格致堂"三字(《万国公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四册，第2139页)。同治五年，传教士、京师同文馆教习傅兰雅为了表示感谢清政府的"知遇"之恩，编纂刊行了一部介绍西方科技的书，全书分为力学、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化学、测算举隅等七卷，其名便为《格物入门》。

总之，晚清"格致"一词无论是涵义还是旨趣，都与传统的"格致"概念迥然相异。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在这方面有重要论述，他指出：

> 惟是设教之法，古今各异，中外不同，而格致之学则一。然中国之所谓格致，所以诚、正、治、平也；外国之所谓格致，所以变化制造也。中国之格致，功近于虚，虚则常伪；外国之格致，功徵诸实，实则皆真也(《拟创建格致书院论》，见《申

报》第574号，同治甲戌正月二十八日，上海书店影印本）。上海格致书院《课艺》亦分辨中西"格致"之不同，指出：

> 中学尊古薄今，不知变通，以身心性命、三纲五常为本原；西人不断探索，喜新厌旧，往往求胜于前人而务求实际，此中西格致之所由分也。

洋务时期兴起的"格致之学"，走的便是"外国之格致"的路数，其概念沿用传统，其魂灵却具有近代意义，强调格致的真谛在"实"又与经世实学存在内在联系。

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洋务大吏和一批中国学者、外国传教士的推动下，"格致之学"有迅猛发展的势头。一批以"格致"为名的科学团体，亦即所谓"格致书院"在上海、宁波、广州等地相继成立。这些格致书院以"兴行格致之学"为宗旨（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涉传教、不习儒家经典，"逐日逐类宣讲格致之学。"以"格致"命名的科技书刊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为了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富自强，浸昌浸炽"，创办了《格致汇编》杂志，该杂志的英文名称是"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中国科学与工艺杂志》），内容涉及数、理、化、生、天文、地理、医药卫生、冶金、采矿、纺织、磨面、机器制造、土木工程、印刷制板、摄影、电镀、水利治河、陆军海军、绘画透视法乃至历史与语言文字。其后，他又陆续出版了一套《格致须知》的普及性小书，全套三集，每集八册，计有地志、地理、地学、化学、气学、声学、算学、天文（以上初集）；量法、电学、代数、画器、三角、微积、曲线、重学（以上二集）；力学、水学、富国（即经济学）、矿学、全体（即生理）、光学、热学、植物（以上三集），共二十四册。19世纪70至80年代，外国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作编译的《格致启蒙》、《格致测算》、《格致举隅》等书相继出版，这些题为"格致"的书籍都是综合性

的科技读物。与此同时，格致书院与洋务派举办的洋务学堂成为研习、讨论格致之学的中心，当时的情况是：

> 四方好事者造诣无虚日，算数、格致、路矿、制造之属，随事指陈，各满其意而去，以致通达者众，风气为之大开（《洋务运动》，第八册，第30页）。

晚清格致之学的兴起，无疑是以社会经济结构的异动为阔大背景，然而曾、李、张等洋务大吏以及诸多经世思想家的大力推动亦在其间起有关键性作用。洋务大吏以及经世思想家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动格致之学的发展，其原因有二：

首先，和晚明徐光启等人的看法如出一辙，洋务大吏与洋务思想家们把格致之学视为一种实学，如郭嵩焘把培根以来的近代科技统而称之为"实学"，诚所谓"英国讲实学者，肇自比耕（Bacon，培根）。"王韬也说，"机器、象纬、舆图、制造、建筑、电气、化学"等学科，皆是"有益于时，有用于世"由于洋务运动本身就是以"务实"为宗旨，大力推进格致之学的发展，自然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次，洋务大吏与洋务思想家有一种共识，这就是欲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求强、求富，格致之学是根本。在这方面，奕䜣、曾国藩等人有诸多论述，其中以王韬的语言最为清晰：

> 窃谓近今一切西法无不从格致中出，制造机器皆由格致为之根柢，非格致无以发明其理而宣泄其间奥。以是言之，格致顾不重哉！（《格致书院课艺·丙辰年王韬序》，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书局石印本，第1页）

随着"师夷智"活动的深入展开，格致之学的引入与研习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其风起云涌之势遂成为洋务运动发展的题中自有之义。

## 第二节 “格致之学”的创获

洋务时期“格致之学”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一批近代科学家脱颖而出，其中著名者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人。他们虽广采博取西方自然科学，其思想的深层结构仍与传统的经世实学保有血肉联系。

### 一、李善兰的实学活动

李善兰(1811—1882)，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他从小喜爱数学，“方年十龄，读书家塾，架上有古九章，窃取阅之，……从此遂好算”。十五岁时，他读到利玛窦、徐光启所译《几何原本》前6卷，尽通其义，并对徐、利二人没有译出后面更艰深的几卷，感到遗憾，常希望有“好事者或航海译归”，使自己得窥全豹。咸丰二年(1852)，他到上海，结识了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与艾约瑟，他们对李善兰的才能颇为欣赏，遂邀请他到墨海书馆共译西方格致之书。

墨海书馆为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所创设，此书馆原为传教而设，其后译书工作从宗教书刊扩张到西方科技领域。郭嵩焘出使英法前路经上海，曾到墨海书馆参观，并在日记中记述道：

> 次至墨海书馆。有麦都思者，西洋传教人也，自号墨海老人。所居前为礼拜祠，后厅置书甚多，东西窗下各设一球，右为天球，左为地球。麦君著书甚勤，其间相与校定者，一为海盐李壬叔(即李善兰)，……李君淹博，习勾股之学。

李善兰到墨海书馆后，率先与伟烈亚力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后9卷，以完成利玛窦、徐光启的未竟之业。《几何原本》一书，在西方各国亦多未全译，英国虽有一部从希腊文译为英文的

完本，但因翻译和校勘粗疏，伪误叠出，“毫厘千里，所失非轻”。伟烈亚力自己也承认，“余愧翦陋，虽生长泰西，而此术未深，不敢妄为勘定”（伟烈亚力：《续译几何原本序》，同治四年金陵刻本《几何原本》）。只能就英译本照本宣科，口译为汉语，而谬误之处全凭李善兰以深广的数学知识加以匡正审定。经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四历寒暑”的努力，《几何原本》中译本终成完璧，而在全书翻译过程中，李善兰用力甚巨。伟烈亚力曾不无谦逊地说：“删芜正讹，反复详审，使其无有疵病，则李君之力居多，余得以借手告成矣。”他同时宣称：“异日西土欲求是书善本，当反求诸中国矣”（李善兰：《续译几何原本序》，同治四年金陵刻本《几何原本》15卷）。《几何原本》全本的翻译是中国数学界的一件大事，诚所谓“自明万历迄今，中国天算家愿见全书久矣。”故李善兰与伟烈亚力的翻译工作引起当时许多科学家的注目和支持。在《几何原本》后9卷续译序中，李善兰语重心长地说：“后之读者勿以是书全本入中国为等闲事也”。其间包容了经历过万般艰辛后的无限感叹。

在《几何原本》后9卷的翻译过程中，艾约瑟又邀请李善兰同译英国人胡威力所著《重学》。所谓“重学”即力学。对于这一学科的重要性，艾约瑟有简明阐述，他说：

> 几何者，度量之学也；重学者，权衡之学也。昔我西国以权衡之学制器，以度量之学考天。今则制器、考天皆用重学矣，故重学不可不知也。

鉴于“今畴人子弟皆能通几何”而“未知重学”，李善兰欣然允诺与艾约瑟同译《重学》。于是，李善兰“朝译《几何》，暮译《重学》”，“阅二年同卒”。李善兰所译《重学》虽然只是原文书的中间部分，但译出的部分已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力学的一般知识。书中的牛顿力学三大定律则是第一次介绍到中国。《几何原本》全本以及

《重学》的翻译出版，为“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提供了重要科技基础理论，因而引起洋务大吏的高度重视。曾国藩大力支持李善兰所译《几何原本》后9卷在金陵重校付印，并命曾纪泽代为序，推荐介绍是书。李鸿章亦大力推动《重学》重刊。对于《重学》一书的实用性，李善兰在《重学》序中指出：

> 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富强，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曾、李二公有见于此，亟以此付梓，上好之，下必有甚焉。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摄奉朝贡，则是书之刻，其功岂浅鲜哉！（诸可宝：《李善兰传》，《碑传集补》，卷43）

由此可见，李善兰等科学家所致力的格致之学，即使是抽象的数学和物理学，亦与这一时期的经世思潮有着密切联系，是这一时期经世实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除了《几何原本》后9卷与《重学》外，李善兰与伟烈亚力还合译了另一本重要的科学理论著作，这就是《谈天》。

《谈天》原名《天文学纲要》，其作者为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该书对太阳系的结构和行星运动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并涉及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彗星轨道理论等方面，对恒星系、如变星、双星、星团、星云等也有一定篇幅的介绍。

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当然并非自李善兰始，而是发端于明末清初，但是，中国士大夫却囿于传统宇宙观念对近代天文学加以抵拒。博学者如阮元指斥哥白尼的地动学说是“违经叛道不可信也”，“设其象为椭圆面积，其实不过假以推步，非真有此象也”。阮元还迂腐地认为，“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面对奥秘无穷的天道，“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这样就会“终古无弊”。

李善兰以一种理性的科学精神来廓清传统宇宙观的荒谬。他在《谈天》序中指出，科学研究绝不能“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而应深究其故，探究其间最深层奥秘。西方科学家便是“善求其故者”。他举例说，“哥白尼求其故，则知地球五星也绕日”。“刻白尔(刻卜勒)求其故，则知五星与月之道皆为椭圆”。“奈顿(牛顿)求其故，则以为皆重学之理也”。李善兰列举如上科学家成绩，其意旨在于指出如下真情：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是科学家不断探索真理，不断“求其故”的结果。这一真知灼见显示了李善兰在思维方式上已走出传统科技的范畴，步入近代科学家的行列。正是依据近代实证科学思想，李善兰宣布，哥白尼的地动学说是“定论如山，不可疑矣”。

由于李善兰等科学家的努力，从哥白尼开始至牛顿完成的建立在牛顿古典力学体系上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开始系统地传入中国，后来的一些著名的改良主义者如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人都曾利用哥白尼地心说和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说等，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在取得攻占安庆的军事胜利的同时，积极着手创办、发展军事工业。为此，他广泛延揽自然科学人才。据容闳回忆，当时荟集于曾国藩安庆大营的，“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专门家无不毕集”(《西学东渐记》，第13章)。李善兰亦被招来至曾幕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此后，李善兰入江南制造局译馆，从事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据傅兰雅说，馆中的西人遇到“西国最深算题”，向李善兰请教，“无不冰解”(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见《格致汇编》第三年夏，第11页)。而李善兰所“撰译诸书”，“‘剖析入微，奥窔尽辟，体大而思精，言简而义赅’，为‘海内外所倾倒’(诸可宝：《李善兰传》，《碑传集补》卷43)。同治七年(1868)，李善兰因郭嵩焘推荐，到北京

任同文馆天文学算馆总教习，在此位置上，他一直工作到病逝。

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李善兰以卓越的数学研究引人瞩目。李善兰数学造诣颇深，“其精到处自谓不让西人，抑且近代罕匹”（诸可宝：《李善兰传》，《碑传集补》卷43）。他编辑刊刻的《则古昔斋算学》中，包括有数学著作13种，其中《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3种，是关于幂级数展开式方面的研究，在尚未接触微积分的情况下，李善兰创造了尖锥求积术，表明了他实际上已具有微积分的初步概念。

李善兰还创造了不少数学名词和术语，例如“代数”、“微积分”、“积分”等等，一直被沿用到今天，而且也流传到日本。他还直接引用了西方的不少数学符号，例如＝、＋、（　　）、√‾、＞、＜等等。

鉴于李善兰在格致学方面的突出成绩，光绪三年（1877），《格致汇编》夏季卷特别印出李善兰的大幅照片，并附刊《李壬叔先生像序》一文。丁韪良在该文中写道：他对李善兰“知之深而慕之切”，其敬慕之情溢于言表。梁启超对李善兰也评价甚高，称其“学有根柢”，“成绩可比明之徐（光启）、李（之藻）”（《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九》）。

**二、华蘅芳、徐寿的经世实学倾向**

洋务时期，与李善兰齐名的科学家还有华蘅芳与徐寿。傅兰雅曾说，当时的无锡，“士人多以为诗书经史几若难果其腹，必将究察物理，推考格致，始觉惬心。如是者凡数人，而徐、华二君好之尤甚”（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见《格致汇编》，第三年夏，第11页）。这里所说的“徐”，就是徐寿；“华”就是华蘅芳。

徐寿（1818—1884），字雪村。少年时“娴帖括，习举业”，走的是传统科举老路。然而，“道、咸间，东南兵事起”，给予徐寿极大

刺激，他“一应童子试”后，便“思（举业）以为无裨实用，弃之，”乃“讲求经世有用之学”（华世芳：《记徐雪村先生轶事》，《碑传集补》，卷43），“专究乎致知格物之学，潜心经济”。“凡与格致有涉者如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产、医学、靡不穷源竟委”（程培芳《徐雪村先生传》，《碑传集补》卷43）。徐寿在潜心格致之学的同时，还对制造技术也有浓酣兴趣。他认为，“格致之学必藉器以显，而制造之学原以格致为旨归”。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因此，他不仅长于科学理论，而且“于制器之学为尤精”（程培芳：《徐雪村先生传》，《碑传集补》卷43）。家居时，他“手制器械甚多，若指南针、象限仪等，皆自制之”（华世芳：《记徐雪村先生轶事》，《碑传集补》卷43）。他还“仿制墨西哥银元”，“虽老于贾者不能辨其非也，只见花样崭新，咸以新板目之”。英人韦廉臣曾专门要去数十枚徐制墨西哥银元，“置伦敦博物馆中，今犹存也”（钱基博：《徐寿传》，《碑传集补》卷43）。徐寿“浑然敦朴”，“自奉俭约”，但是，购备格致器物却“多金不惜”。作为一名科学家，徐寿“毋谈星命风水，毋谈巫觋谶纬”。婚嫁丧娶不用僧道懺醮以及乐工鼓吹，营葬不用堪舆家言，所有五行生克之说、理气肤浅之言，绝口不道。如此风格生动地表现了科学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

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自幼酷爱数学。14岁时，华蘅芳得到一本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残帙，“读而好之”。书中所列“飞归”等题，“皆世俗所谓难能者”，蘅芳却“不数日而通其术”。其父翼纶“喜其早慧，因购求《数理精蕴》及《九章算术》等书相授，由是所学益进”。以后，华蘅芳从同县岁贡生邹安鬯处读到秦九韶、李冶、朱世杰诸家之书，“豁然通天元、四元之术”。他曾“校补《数书》、《九章》凡数百字，皆宋景昌校勘记未详者”。坚实的数学基础，成为他深入研究格致之学的利器。

徐寿与华蘅芳俱为无锡县人，一居“邑城之东”，一居“邑城之西”，相距“一日程时”。徐寿与华蘅芳初不相识，亦不相闻，后华蘅芳之父听说“西乡有一人能作古乐器，皆协律。”遂往访徐寿，“而得订交”。以后，华父每赴徐寿处，“必与偕长子蘅芳”。徐寿比华蘅芳大18岁，但两人情愫相通，情谊遂笃。由于徐寿与华蘅芳对格致之学有同样兴趣，学理上的探究成为他们友谊中的重要内容。钱基博《华蘅芳传》记述说：

> 咸丰初，西人开墨海书馆于上海，代数、几何、微积、重学、博物之书，次第译出。是时西学初入中国，士大夫故见自封，率鄙不措意，独蘅芳与徐寿能以是相砥砺，目验手营然无所得，机械实试偶有疑难，两人龂龂日夜不休，必求涣然冰释而后已。

此种执著追求真理的精神以及开放的文化心态令人十分感佩。

徐寿与华蘅芳科学精神的一大特色，在于他们十分重视实验。“目验手营然无所得”，遂进行“机械实试”。为了实验光的色散现象，他们克服缺少三棱镜的困难，“用水晶印章磨成三角以验之”。他们学到了枪弹轨迹呈抛物线的知识，为了验证仰攻与俯攻是否一致，“乃设立远近多鹄，射击以测视之”（钱基博：《华蘅芳传》，《碑传集补》卷43）。此种一切付诸实验的实证精神正是近代科学家的实学品格。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为此广为延揽自然科学人才。徐寿与华蘅芳因“研精器数，博涉多通”亦属网罗之列。在安庆内军械所，徐、华密切合作，在既无实际经验，又缺乏详细资料的条件下，他们“潜心研究，造器制机，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于外”（徐珂：《清稗类钞·工艺类》第6页）。于咸丰十二年秋，首先试制出火轮船蒸汽机，其结构与当时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往

复式蒸汽机"相差无几。曾国藩在日记中以无比喜悦之情记录下轮机试演的情形：

> 中饭后，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演一时。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66页）

无论对于"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还是对于中国工业的近代化，蒸汽机的制造成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成功试制中国第一台轮机的基础上，徐寿与华蘅芳又造出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该船"长五十余尺，每一时行四十余里"。曾国藩"登船试行江面"，亲自命名为"黄鹄"（《曾文正公年谱》，同治二年）。《徐寿传》与《华蘅芳传》的作者钱基博在谈到"黄鹄"号制造成功时说，"中国之能造轮船，盖自寿始也"。"寿之造'黄鹄'轮船也，一切绘图测算、推求动力，盖蘅芳之力居多"，高度肯定了徐、华二人卓著的功绩。

同治四年秋，曾国藩奏设江南制造局于上海，"遂委蘅芳佐徐寿经始其事"。徐寿赴任后，"条呈四事：一为译书，二为开煤炼铁，三为自造大炮，四为操练轮船水师"，显示出战略家的眼光。曾国藩采纳徐寿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内设翻译馆，由徐寿主其事。与此同时，徐寿负责化学、气机方面的翻译工作，华蘅芳则负责数学、地质方面的科技书籍翻译。徐寿与华蘅芳皆具有第一流的翻译水平。徐寿所译书，人们"服其精审"。"日本闻之，派柳原前光等赴局考访，购载寿译本以归"（钱基博：《徐寿传》，《碑传集补》卷43）。"蘅芳译本，文辞朗畅，论者谓足兼信、达、雅三者之

长”(钱基博:《华蘅芳传》,《碑传集补》卷43)。

在江南制造局,徐寿编译的书籍共有13种近120卷,它们是《汽机发轫》(9卷),《化学鉴原》(6卷),《化学鉴原续编》(24卷),《化学鉴原补编》(7卷),《化学考质》(8卷),《化学求数》(8卷),《物体遇热改易记》(4卷),《西艺新知》(6册),《西艺新知续刻》(9册),《宝藏兴焉》(16卷),《营阵发轫》(卷册不明),《测地绘图》(4册),《法律医学》(26卷)。在徐寿所译化学著作中,《化学鉴原》一书最为重要,它包括了一般化学教科书的内容,概略地论述了化学的基本理论和各种重要元素的性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此书声名卓著,风行一时,对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起有重要作用。此外,徐寿所译《化学鉴原续编》介绍了有机化学方面的知识;《化学鉴原补编》一书专论无机化合物,书中介绍了1875年发现的新元素镓(Ga);《化学考质》论述化学研究中的定性分析;《化学求数》介绍化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理论;《物体遇热改易记》是关于物理化学初步知识的著作。如上化学译著,再加上徐寿儿子徐建寅所译《化学分原》、汪振声所译《化学工艺》,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西方近代化学知识体系,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化学的勃兴。

徐寿在翻译《化学鉴原》等著作时,接触到化学元素名称翻译问题。他首创取西文名字第一音节造新字的原则,并运用于《化学鉴原》一书的翻译中,今天人们熟知的钠、锰、镍、钴、锌、钙、镁等化学元素名称,便是徐寿依据这一原则而命名。徐寿创立的以西文第一音节造字的原则,不仅被后来的中国化学界所接纳沿用,而且影响到日本,“今日本所译化学名词,大率仍袭寿本者为多”(钱基博:《徐寿传》,《碑传集补》卷43)。

徐寿在制器方面亦卓有成就,“船炮枪弹多所发明,自制强水、棉花(即硝棉)、药汞(雷汞)、爆药等”(《清史稿·徐寿传》),

显示了出色的技术制作水平。

华蘅芳在译馆的工作也颇有成绩。他“译述成书十二种百六十卷”，其中有涉及达尔文进化学说的《地学浅释》，有介绍代数、微积分、概率论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决疑数学》。华蘅芳的数学译著与李善兰的数学译著相与推引，为中国近代数学的崛兴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江南制造局工作期间，华蘅芳两次被邀请往天津，协助解决技术上的疑难问题。天津东局邀请华蘅芳，是因为“驻德使署购归新出试弹速率电机一具，见者莫知其用，蘅芳以微分之理解之，理明而用亦明”。天津武备学堂邀请他，是因为“德教习购得法越战时所用行军了望轻气废球一具，主者欲新之以授学生演放，而教习居奇久之，而功不就。蘅芳乃督工别制径五尺小球，用强水发轻气以实其中，演放飞升，观者赞叹”（钱基博：《华蘅芳传》，《碑传集补》卷43）。时人评论华蘅芳的治学风格说：

> 论物理、尚实验似英之培根；讲算术、发明新理新例似英之奈瑞；至著书惟恐人不解，则又似宣城之梅文鼎。（钱基博：《华蘅芳传》，《碑传集补》卷43）

徐寿、华蘅芳“力穷格致之学”，是为了振兴民族，求强求富。因而，在完成大批西方近代科技书籍的翻译后，他们亟亟思考的是“虽译有成书，尤恐学者难寻门径”（程培芳：《徐雪村先生传》，《碑传集补》卷43）。为此，徐寿与傅兰雅开始筹建格致书院。光绪二年，上海格致书院在今北海路格致中学处落成开学。关于格致书院建立的宗旨，徐寿在同治十三年（1874）上南北洋大臣的第一次呈文中有明白阐述，他说：

> 欲使人人通晓（西学），不虞日久废弛，则必有会集讲论之所，招集深思好学之人，随会学习，讲求参考，以冀将来艺学振兴，准备人材，施诸实用。卑职等筹议及此。拟于上海

设立格致书院，使风气渐开，以收致用之效。（《万国公报》，第 314 卷，第 79 页）

傅兰雅也在《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中指出："本书院之设，原欲兴行格致之学"（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第 41 页，香港中文大学 1981 年出版）。可见，格致书院主要为宣传、普及、研习西方科学技术而设。为此，书院有讲论理法、演示仪器需要的格致大讲堂；有藏有中外各种新旧书报杂志和经、史、子、集、丛书、东西学书目等六类书籍的藏书楼。有"搜藏各国瑰器，资诸生考镜"的博物院。博物院中，陈列着各种工艺机械、实验器具、动植物标本、化石，摄影绘画器材，以及天文、地理、交通、枪炮、工业、农业产品等样品模型。

书院开办后，徐寿与华蘅芳均出任书院董事，并亲自为学生授课。华蘅芳不仅在院内主讲十余年，而且曾赴湖北自强学堂、两湖书院及无锡佚实学堂"宣讲格致之学"。在讲学中，华蘅芳："诱掖奖劝，口讲指画，务以浅显易明之语，达精奥之思"。"一时承学之士，闻风兴起"（钱基博：《华蘅芳传》，《碑传集补》卷 43）。

此处值得一提的还有另一位格致学者，这就是徐寿的儿子徐建寅。徐建寅 18 岁时便随父亲赴曾国藩兴办的安庆内军械所，从事制器工作。在徐寿、华蘅芳主持的"黄鹄"号轮船建造过程中，"建寅累出奇思佐之"。其后，徐建寅又随徐寿到江南制造局，"助父寿成惠吉、操江、测海、澄庆、驭远等船"。"时父寿方与西士傅兰雅等译西书，建寅亦昕夕从事"。"成《器象显真》附图三册，《轮船布阵（阵）》两册，《汽机必以》一册"。此外，他还与傅兰雅合译了《声学》、《电学》、《运规约指》与《化学分原》等书，补充续译了李善兰于早些年翻译出版的《谈天》。曾国藩曾将他译的《运规约指》与其他三部译书（《汽机发轫》、《汽机问答》、《泰西采煤图说》）合称为"新译四书"，递呈同治帝阅览（《曾文正公全

集》，奏稿，卷 27）。

同治十三年（1874），“徐建寅奉调天津制造局创造强水，所费视外国购者价三之一耳，厥为中国能制造强水之权舆。是年，总理衙门下书征求人才，江苏巡抚丁日昌命建寅论时局，建寅遂上万言书，总署得书称善，时建寅已官郎中，因奏保堪充使才，奉旨以出使大臣记名简放。”（钱基博：《徐建寅传》，《碑传集补》卷 43）。次年，徐建寅调山东机械局任总办，“建寅躬自营度，未尝延用西人，三年有成”。山东巡抚丁葆桢称赞徐建寅“心思慎密，条理精强”。

光绪五年（1879），徐建寅因杰出才干，“奏派驻德参赞，往西洋考求一切，遂周游英法诸国”。徐建寅此次出国有两项任务：是订购铁甲军舰，二是考察西欧工业发展情况。在订购铁甲船的过程中，徐建寅以慎密的态度检验军舰质量。北洋舰队的主力“镇远”和“定远”号便是经他手而购置。在 1894 年甲午战争大东沟战争中，北洋舰队大多船只均被击坏，“独先生所购钢面铁甲船两艘，价廉而坚固，各受弹数百，仅成深凹未穿成空，绝无所损”（张罗澄：《兵学新书·序》）。作为第一位系统考察西欧近代工业的中国科学家，徐建寅考察了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有关工厂、矿山、作坊及八十多个科研单位，涉及西欧先进工业技术 200 多项。对于考察情况，他一一作了详细记载，并就其中若干问题撰写了专论 10 篇，寄回国内，由《格致汇编》刊登。在“游历各处”期间，徐建寅“留心暗访水雷之法，记录积成一帙”，成《水雷录要》一书，回国后，他又将旅欧见闻整理成《欧游杂录》，自刻刊行，成为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又一部重要著作。

徐建寅回国后，继续参予各种制器活动。光绪十二年（1886），他会办金陵机器局，督炼钢铁和制造后膛枪。其后又督办保安火药。“是时外洋火药不入口，谋国者心忧而无所为计”。

有鉴于此，徐建寅决定自制火药，他“指授众工自造机器仿西制，三月而药成，其燃放比验与外洋舶来者等”。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在汉阳钢药厂自制棉花火药成功。然而，当他视察工厂时，“工人配药，卒然炸发”，徐建寅身死这场爆炸事故中。钱基博赞颂徐建寅：

> 以身殉所学，舍命不渝，此尤可以厉世磨钝，而立天下懦夫之志焉。(钱基博：《徐建寅传》，《碑传集补》卷43)

这正是徐建寅经世精神的有力实践和具体表现。

从李善兰到徐氏父子再到华蘅芳，格致学者“辟西学门户”，“阐发器数之理为天下倡”，使“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不仅冲击了中国传统学术观念，造成思想界的深层革命，而且也推动了传统经世之学发生质变，逐步过渡为近代新学。

# 第四十一章　洋务时期域外史地研究的新拓展

洋务运动是一场以民族自强为宗旨，以学习西方长技为自强手段的历史运动，对域外（主要是西方与日本）史地与现状的研究因而成为这一时期经世实学中至关重要的内容。与近代研究域外史地的先驱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相比，洋务时期的士子开眼看世界的幅度更为广大。除了以外国教会组织和洋务出版机构翻译过来的西书为媒介了解世界外，他们中的某些人还与来华的洋学士朝夕过从、切磋知识，更有相当一部分士子亲历西方，足践欧土，对于大千世界的了解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超过19世纪40—50年代的经世派，这一时期的域外史地研究因而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 第一节　郭嵩焘对西方的考察与研究

洋务时期中国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途径乃是遣使出洋办理外交，总理衙门在一份文件中说："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1卷，第27页）可见出洋使节不仅负有外交使命，而且负有考察与研究外国情事的

重要任务。为此，总理衙门明确规定，出国使臣必须以日记形式将所见所闻一一详记，定期寄回国内使国人读后能逐渐洞悉各国事机。这样，就产生了一大批洋务大臣的星轺日记，如志钢的《初使泰西记》、郭嵩焘的《使西纪程》、陈兰彬《使美述略》、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李凤苞的《使德日记》、曾纪泽的《使西日记》、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张荫桓的《三洲日记》。这些出使日记，不仅详书外交事宜，而且记录了近代中国人对外国的直接见闻和观感，成为全面考察外国史地之先导。

在洋务时期的出使日记中，最为著名者当属《郭嵩焘日记》，他的作者便是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山，湖南湘乡人。地域上的特殊性，使郭嵩焘自青少年时代起便深受湖湘学派经世精神的熏染。

郭嵩焘经世思想的最初形成，大约是在就读于岳麓书院期间。岳麓书院是湖湘学派的中心，素来注重讲求经世之学。在岳麓书院，郭嵩焘与曾国藩、刘蓉结为至交。是年，曾国藩26岁，刘蓉21岁，郭嵩焘19岁，“均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7页)。“其志终不在温饱”(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第34页)。以后，郭嵩焘在“馆辰州”期间又得张晓峰太守启示，“恍然悟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措，无可易者”。“嗣是读书观史”，在经世之学上用功甚勤。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在会试中一再受挫的郭嵩焘投到浙江学政罗文俊幕下，开始了他的艰难曲折的经世之旅。

在罗文俊幕下，郭嵩焘对浙江防务多所陈献。他“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郭

嵩焘:《罪言存略小引》,《养知书屋文集》第3卷)。他甚至以一文弱书生之身,冒着"矢石"、"锋镝"之危,亲临战场杀敌,表现出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鸦片战争失败后,郭嵩焘悲愤万分,他长歌当哭,以"老将云间歌敕勒,宗臣江畔泣离骚。杜陵偃蹇干时策,泪洒将军大食刀"(《丰乐镇书壁六首》,《养知书屋诗集》第2卷)的诗句,表述他的一腔忧愤。

咸丰初年,郭嵩焘避乱山中,得读王夫之著作,深受王夫之思想的影响。他服膺王夫之的经世之学,以为"船山王氏《通鉴论》、《宋论》,通古今之变,尽事理之宜,其论事与人,务穷析其精微,而其言不过平则"。又说:"国朝王船山先生《通鉴论》出,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通德类情,易简以知险阻,指论明确,粹然一出于正,使后人无复可置议。故尝以谓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他一度欲踵王夫之足迹,"综论元、明二代之史,以附船山之后,而未敢遽也"(《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第67页)。

19世纪50年代,湘系军政集团崛起,郭嵩焘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当太平军入湘,湖南全境处于危急之时,郭嵩焘先后劝说正任塾师的左宗棠以及守制在家的曾国藩出山,并把曾与胡、左串联起来。以后,曾、李发生矛盾,李鸿章愤然辞幕,郭嵩焘致函劝说李鸿章回到曾国藩身边,使李鸿章"读之怦然有动于心,"终于重投曾幕。郭嵩焘晚年忆及这段历史,常常不无得意地说,清廷"中兴"四位名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中有三位(曾、左、李)"一由嵩焘为之枢纽"出任将相(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虽然,郭氏之言不免于自夸,但在曾、左、李等人出山的过程中,他确实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次,曾国藩初建的湘军虽然勇猛强悍,但只能陆上作战,

无力对付太平军的水师，郭嵩焘倡议建立水师，不仅“成肃清江面之功”，而且极大地加强了湘军的战斗力。

再次，为了解决湘军军费问题，郭嵩焘创办湖南厘金，为曾国藩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郭嵩焘在《玉池老人自叙》中说：“湖南筹兵筹饷，一皆发端自鄙人，曾文正公始出，提用经费，支绌百端。……黄南坡（冕）任铸炮，私设厘局常德，嵩焘以为此筹饷之一大端，言之骆文忠公（秉章），开办通省厘捐。”“曾文正公办理军务，终赖此三项（湘省厘捐及粤、淮盐厘）、以济军食，而湖南亦恃此以为富强之基，支柱湖南数省。”

郭嵩焘在湘军建设中的业绩，是他“经世之学”的重要实践活动。在曾幕中，他“于经营国计，保卫地方，无敢稍释于心，始终末一任事”，并和刘蓉、曾氏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第44页）。其经世精神十分明朗。

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被委派为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两年后，又受命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作为思想敏锐的士子，郭嵩焘很早就觉察到西方的强大在“朝廷政教”，在全社会文化水准的普遍提高，而不仅仅是依赖船坚炮利。他在光绪元年（1875）给总理衙门上的条陈中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西方）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福建按察使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洋务运动》（一），第136—144页）因此，中国学习西方，不应仅仅着眼于一般船政、铁路、制造，而应潜心研究西方政教制度并加以吸收，其见解超越同时代的士大夫。光绪二年间的出使英法，给予郭嵩焘一个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的机会，他充分把握这一时机，参观了议院、监狱、市政厅、邮政局、银行、工厂、报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

天文台、美术馆、军队及100多处重点企业，接触到电话、留声机、彩色照相、天文、地质、光学、声学、生物学及工业区位等一系列科技尖端成就与近代科学，他还以极大的兴趣了解并钻研古希腊哲学、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培根、伽里略、牛顿、笛卡尔、莱布尼茨的哲学科学思想。与西方文明的广泛接触，使郭嵩焘对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他在日记中，以睿智的洞察力，揭示西方文化的精髓，并以"惕然内自怀愧"的心情展开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郭嵩焘通过考察西方文化，发现科学知识是西方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他一再指出："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英国富强之业，一出于学问"(《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年四月二十日)。科学与国家兴旺发达紧密相联，而科学又来不得半点虚骄，郭嵩焘因此把西方近代科学称为"实学"。他赞叹"西人立志之专，百挫不惩，遇事必一穷究其底蕴。即北海冰雪之区，涂径日辟，天地之秘，亦有不能深闭固拒者。"(《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五月十二日)，更指出"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在"考览其学校"的过程中，郭嵩焘发现"西洋专以教养人才为急务。"(《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其教课之方，一皆文武实用"。(《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六月初六日)而西方社会"通国男妇"皆对科学技术有热切的关心，以致"泰西格致之理，人人能言之"。(《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再三感叹说："此邦学问日新不已，实因勤求而乐施以告人，鼓舞振兴，使人不倦。"(《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六月初九日)

以英法两国"制造学问，穷极推求"的态势与中国传统教育路径相比，郭嵩焘不禁忧心如焚，他犀利揭示道："西洋以智力相

胜”，“中国乃一以虚骄之大言当之”。“各国人材政教如此之盛，而勤勤考求，集思广益，不遗余力，中国漠然处之。”“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中国召收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三月初八日）在此种情况下，“西洋安得而不日盛，中国安得而不日蹙也欤！”（《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为此，他致书国内“衮衮诸公”，建议开设博物馆，建议“先就通商口岸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行之有效，渐次推广至各省以达县乡”（《致沈幼丹制军》，《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11—14页）。

考察西方社会，郭嵩焘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深感兴趣。他曾亲自“赴下议院听会议事件”，观察两党辩论，赞赏“西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以求一是，用意至美”。在日记中，他记载西方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是：

> 西方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辩，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所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所行或有违忤，议院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恣意妄为者。（《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正是这样一种行政、立法分权与言论自由的民主制度，保证了西方政教体制的活力，推动其“气象日新”。反观中国传统德治主义，郭嵩焘不禁深有感触地说：

> 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身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已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

有穷于自立之势矣。(《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五月二十日)

在这里,郭嵩焘相当敏锐地发现了中西政治的一大歧异点,这就是"德治"与"法治"。"德治"是中国宗法伦理文化的产物,其核心在于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以君主的个人表率来治理天下,然而,正如郭嵩焘所说:"德有盛衰","圣德不能常",整个社会便随之治乱,造成极大损伤。西方社会实行法治,杜绝了个人的随意性,为社会稳态运行提供了有力机制。一方实行法治,一方实行德治,两者社会发展的差距日益扩大。"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在中国文化史上,对法治与德治进行如此深入比较研究的,或以郭嵩焘为第一人。郭嵩焘关于法治、德治的见解与日本近代福泽谕吉颇为一致。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程度高的原因在于实行法治,东方君主专制国家文明程度低则是由于实行德治,但是,"事实证明数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从没有过由于遵行孔孟之道天下大治的事例"。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曾三次提到郭嵩焘,把郭氏列为中国新思想界的第一批人物,他自己和康有为、严复则位列为第二批。由此可见梁启超对郭嵩焘深为服膺。

郭嵩焘考察英、法社会,还十分注意求实求真的社会风气:"其民人周旋,一从其实,不为谦退辞让之虚文。国家设立科条,尤务禁欺去伪。自幼受学,即以此立之程,使践履一归诚实……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深矣。"(《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相比之下,他对中国"以粉饰为固有之常规"(《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二月初七日),"专以大言自欺"(《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的陋习,痛心疾首。郭嵩焘又指出,西方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游历交接""已成风俗","各国互相款

接，不为异也”。中国却是“不许民人私行出入，无至外国游历者”，以至一见到与华人不同的洋人，中国人便“相与惊骇”，“万不能容”。(《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对于此种“闭门自尊大”的“最害事”(《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郭嵩焘至为痛切。

“泰西人最喜奇迹”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也使郭嵩焘欣羡不已。相较之下，他对因循守旧的“中国人心”深恶痛绝。在一封致李鸿章的信中，郭嵩焘十分感慨地说：

> 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劼刚以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3页)

他进而追索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严加拒绝的文化根性，指出，自南宋以来，士大夫就高倡“夷夏大防”，以致于“七八百年来，尽士大夫之心相率趋于愚妄，而莫知其所以然”。“西洋之局，非复金元之旧矣，而(士大夫)相与祖述南宋诸儒之议论，以劫持朝廷，流极败坏，至于今日而不悟”(《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面对西方日益强大的严峻局势与中国被淘汰的险恶命运，郭嵩焘发出震聋发聩的呼喊：

> 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铁路议》，《养知书屋文集》，卷28)

郭嵩焘欲以国外实地考察的真情惊醒国人，推动人们走出封闭的世界，去呼吸新鲜空气，然而，他却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围攻。在朝官中，李慈铭声称读郭嵩焘《日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越缦堂国事日记》，光绪三年六月十八日)编修何金寿弹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666页)。王

闯运则叹息郭嵩焘"殆已中洋毒",(《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回乡后,人们以冷眼相视,街头巷尾流言屡出,连他关起门做体操,也被人讥为"打洋拳"。在"尘秽湖湘","骂名穷极九州四海"的大围攻中,郭嵩焘倍感孤独。光绪十四年十二日初一日,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几句话:"大势所趋,万事敝坏,人心从之而靡,无可与共语者。"伴随着这种孤独和凄凉,郭嵩焘默默地走向了人生的最后归宿。

当郭嵩焘遭到朝野上下讨伐之时,一位目光敏锐的洋务大吏从郭嵩焘的命运中看到了中国的命运,他就是李鸿章。在《复周筱棠京卿》函中,李鸿章说:

> 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不)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册像函稿》卷 17,第 15 页)

他的不祥预感在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幸得以证实。足见他的目光之。

## 第二节　王韬对普鲁士、法国和日本史的研究

郭嵩焘对西方文化的考察与研究,得益于出使英、法,王韬则是应传教士理雅谷之邀请而出洋考察。

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字兰卿,江苏甫里人。王韬少年时便对八股时文不感兴趣,而致力于经世之学研究。"偶与客谈,辩析毫芒如肉贯穿经史,尤精地理,凡遇山川厄塞及古今用兵争战之处,辄能言其胜败,了如指掌。"(《天南遁叟》,《遁窟谰言》卷 1)鸦片战争后,他到上海,入墨海书馆参与科技书籍的翻译,与艾约瑟合译《格致西学提纲》、《光学图说》,与伟烈亚力合

译《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西周天学源流》，并撰《泰西著述考》1卷，此6种书后来称为《弢园西学辑存六种》。

同治六年(1867)，英国传教士理雅谷回国省亲，王韬与之共事多年，朝夕相处，“以文章学问相契”，私交甚笃。理雅谷回国后，来信邀王韬到苏格兰去翻译《春秋左氏经》、《易经》、《礼经》。王韬久存漫游世界之心，遂欣然接受了理雅谷的邀请。他旅英近三年，两次游览伦敦，三次游览苏格兰都城爱丁堡，并两次经过法国，从而“眼界顿开”，“几若”进入“别一世宙。”(王韬：《改罗小驻》，《漫游随录》)

在欧洲，他乘坐了火车，切切实实地为火车的高速所慑服；参观了电报局，对“电线之妙用”有至为真切的体会；他又参观议会，广泛考 察文化设施，留意市政建设与公用设施，感触甚深。

与后来的郭嵩焘一样，王韬对西方文明感受最深的是高度发达的科技文化。他在《漫游随录》中有一节专门介绍西方现代科学，他说：

> 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而弗尚诗赋词章。其用可由小而大。如由天文知日月五星距地之远近，行动之迟速，日月之合璧，日月交食，彗星、行星何时伏见，以及风云雷电何所由来；由地理知万物之所由生，山水起伏，邦国大小；由电学知天地间何物生电，何物可以防电；由火学金木之类知何以生火，何以无火，何以防火；由气学知各气之轻重，因而创气球、造气钟，上可凌空，下可入海，以之察物、救人、观山、探海；由光学知日月五星本有光耀，及他杂光之力，因而创灯戏，变光彩，辨何物之光最明；由化学、重学辨五金之气，识珍宝之苗，分析各物体质。又知水火之力，因而创火机，制轮船火车，以省人力，日行千里，工比万人。穿山、航海、掘地、渡河、陶冶、制造以及

耕织，无往而非火机，诚利器也。

在访问了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等地后，王韬对英国注重科学文化教育的体制赞叹不已，他说：

> 所考非止一材一艺而已也，历算、兵法、天文、地理、书画、音乐，又有专习各国语言文字者，如此，庶非囿于一隅者可比。故其英国学问之士，皆有实际。其所学武备、文艺，均可实见诸措施。坐可行者，可以起而行也。（《漫游随录·制造精巧》）

两刃相较，利钝互见，对西方科技文化的实地考察，使王韬对中国传统学问从根本上产生怀疑和动摇。他回国后，大力鼓吹格致之学，倡导近代科学，其思想基础便奠基于此。

在英国，王韬还深为英国"君民共主"的政体所吸引，他多次旁听英国下议院开会，目睹人们在议院中公开讨论"大政重务"，"参酌可否，剖析是非"，大有耳目一新之感。在《漫游随录·游亨得利》中，他颇有感触地说："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然后举行。如有军旅之政，则必遍询于国中，众欲战则战，众欲止则止，故兵非妄动，而众心成城也。"这种"众心成城"的局面正为当时中国亟亟需要的。虽然，王韬此时还未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政治的主张，但他已对西方政治尤其是君主立宪制表现出不胜羡慕之心，这对他以后力主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有直接的影响。

王韬此次游欧，历"五洲四洋，百数国家"，对世界史地产生了强烈兴趣。从英国回到香港后，他即着手撰写世界史地著述，颇具影响的《普法战纪》与《法国史略》便撰于这一时期。

王韬撰写《普法战纪》并非一时兴之所至，而是包含着深刻的经世意图。他在该书《前序》中说：

> 余之志《普法战纪》，岂独志普法哉？欧洲全局之枢机，

> 总括于此矣。普强法弱，此欧洲变局之所由来也。普中欧洲而立国，西有法而东有俄，皆强邻也。曩者为法所制，几于一步不可复西。日耳曼南北列邦势涣而不聚，虽推奥为盟主，亦仅拥虚名而已。以春秋列国之大势例之欧洲，普仅等宋、卫焉耳。英、法、俄、奥则晋、楚、齐、秦也。近十余年间普国势日尊，……坐成强大，而法方晏然于其间，犹复自恃雄盛，轻启衅端，此法之所以几复也。昔普兴而奥丧，论者遂以普、法、英、俄为四大，今普强而法弱，论者乃举英、普、俄为三雄，然而法国之兴衰强弱，实为欧洲变局一大关键。何则？以地当冲要也。

王韬一再强调普法战争是"欧洲全局之枢机"，而欧洲的新形势必然对亚洲特别是中国产生影响，研究普法战史，将有助于中国人了解世界形势，并在通观世界形势的前提下，制订出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针，这就是王韬撰写《普法战纪》的根本意旨。

作为一部经世之作，《普法战纪》不仅史料丰富，叙述详尽完备，而且于描述间多有精当评议，指出此次战争过程中足以提取为"史鉴"的经验教训。

王韬认为，这场关系欧洲大变局的普法战争，至少提供了四方面的经验教训：

(一)人才是决定国家兴亡之关键。"有国家者得人则兴，失人则亡；得人则弱可以为强，小可以为大"。普鲁士国王起用了出身低微的毛奇、士颠密士、福竖士、田蛮雕、飞窝等人才，使之"折衡行阵"，"左右辅弼若心膂"，再加上长于智谋的俾斯麦与乐尚书，"能不兴乎？"法国则不然，"任人唯亲，文恬武嬉，军队晏然，将不将，兵不兵，终致师熸君虏。"(《普法战纪》卷3)

(二)知己知彼，洞悉敌情，是战守必胜的基本前提。普鲁士在普法战争前多方侦察法国守备情况，其总参谋长毛奇早在

1868年数次潜入法国，“相度形势，窥察险隘，每至一处，则以笔绘图，曲尽纤微。因是绘有法国舆图”，由此得以“筹变守御之方，布置周密殆无遗算”，“而法方晏然于其际，犹复自恃雄盛，转启衅端。”有鉴于此，王韬一针见血地指出：“法之所以蹶，普之所以兴者，无他，在有备与无备而已”。如果夜郎自大，不加守备，不增强国力，其结果必然是国亡家败。

（三）武器的精良，科技的发达，对于战争的胜负具有重要影响。法军武器落后，枪炮陈旧，而“普所用火器，专恃墨迭儿鲁士炮……四周有八轮，皆可旋转，每轮纳弹三十七枚”，“能不百战百殆乎？”（《普法战纪》卷14）

（四）两国交战，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的角力，而且也与民心向背密切相关。法国人民受高压统治，拿破仑三世骄横淫逸，不得人心，以致“兵败师丹”。普鲁士人民当普鲁士向法国宣战时，“群歌爱国之诗”，“环立宫门，静俟王命”。朝野上下同仇敌忾，因而得以获胜。

王韬就普法战争所总结的如上四方面经验教训，不仅是关于普胜法败原因的精当分析，而且对于危机中的中国不无启示意义。

在《普法战纪》中，王韬还就普胜法败后的欧洲形势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强大的法国以前是俄国的牵制力量，法国失败后，英法联盟解体，西欧力量大大削弱，俄国所受牵制大大松弛，从而有力量西侵欧洲或东侵中国。王韬的天才预见，在19世纪末俄国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日俄战争中得以验证，从而显示出其目光的敏锐。

与《普法战纪》一样，王韬作《法国史略》，也是具有明确的经世意图。

王韬初至法国，便被法国的灿烂文化所征服，他以“眼界顿

开，几若别一世宙”之语来表达他当时的感觉。在他看来，法国社会制度之美，为泰西诸国之冠，“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因此，他在《法国志略》中详细地介绍了法国人口户籍、都邑疆界、国用度支、兵船火器、交通邮驿、学术文化，以期打开国人眼界，进而“自奋”、“自立”。

王韬著《法国史略》的目的，就是“探本求源”，“求法之所以衰，俾便为中国之殷鉴”（王韬：《扶桑游记》，冈千仞跋，第1页）。作为一位君主立宪派，王韬既不赞同君主制，又不赞同民主共和制。他对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猛烈抨击，认为路易十六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杀乃“咎由自取”，指出“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积，足以亡身”，“然则为人君者可逞欲而妄为哉？”（《重订法国志略》，卷5，《波旁氏纪》）对于民主共和之政，王韬亦有尖锐批评，认为此种政体“酿民人凌上之风”，“流弊过甚”。“高卑易位，冠履倒置，纪纲紊乱”的法国大革命便是其恶果之一。“共和之政其为祸之烈乃一至于斯。”（《重订法国志略》，卷5）他最为欣赏的还是英国式的“君民共治”的立宪制。他认为在这种体制下，“人君之所以不敢挟其威虐，其民者以国宪限其权也。国民之所以不敢负其力凌其君者，以国宪定其分也。”“故欲其国之永安久治，以制国宪定君民权限为第一要义也。”（《重订法国志略·原序》）

在《法国史略》中，王韬多处流露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欣羡之情。他十分赞赏资本主义政治的国会和议院制度，认为“议会为张治化之基本也。”“国会之设，唯其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即有雄才大略之主崛起于其间，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变乱旧章也。如是则上下相安，君民共治。”（《重订法国志略·凡例》）对于法律在资本主义政治中的功

能，王韬也十分注重。在《法国志略》中，他引述日本冈千仞的有关论述说："所有法律皆成于国会，国会所定故其为法，以护人民权利为主。人民权利日益增加而国家元气日愈充厚矣，上下之情通，君民之交固，国家有大事，千万人之心为一心，近世欧洲列国雄视宇内，职是之由"。以法国乃至欧洲的法律制度观照中国，王韬不禁感慨万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的法律是"保民以辅君"，中国的法律却是"尊君以卑民"。"君尊民卑则必以张政府威权为主，政治威权日益隆盛而人民生气日益凋丧，"这是中国之所以积弱衰败的原因。他大声疾呼："世之论政体得失者，宜鉴于此。"(《重订法国志略·凡例》)其改良中国传统政治的倾向跃然于字里行间。

如果说，《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是近代启发人们开眼看世界的最初著作，那么，王韬的《普法战纪》与《法国志略》就是引导人们深入观察西方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的重要作品。当时思想界对这两部书"皆誉之不容口。"《普法战纪》一书未及付印，就已是不胫而走，"钞本流传，南北殆遍"(陈桂士：《普法战纪·序》)。"于是谈泰西掌故者，可以为鉴。"(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1)洋务派文武官员和维新派人士十分重视这两部书，将它们视为认识世界和学习西法的必读书。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和《史学书目提要》中对王韬的史著大力推荐。唐才常在《湘学报》亦将《法国志略》作为必读书介绍给广大读者。

与《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当初在日本大受欢迎的情形相似，有"合金文化"之称的日本对王韬史著中所蕴藏的丰富信息甚为敏感，并以热烈的姿态拥抱《普法战纪》与《法国史略》。日本"深通泰西之事的先觉"粟本锄云在谈到他接触王韬史著的情形时说：

昔家儿贞次郎陪同岩仓大使从欧洲还，于上海购得数

部新刊之书，在展示中，内有《普法战纪》。余披览未到半册，窃以为，此书不独行阵之事，交战之迹写活了，其中所杂议论也不陈腐，能脱汉人常见之俗套，实为无与伦比之珍籍。然辗转贷借之人甚多，乃未窥其全豹，至以为憾。恰横滨华商有携来者，则得之。且读且句，遇会心之处，漫加朱批圈点。（转引自忻平：《王韬评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 年 4 月第 1 版）

其后，锄云的友人应日本陆军省命，句读此书，不久，"日本陆军文库别为刊板，行于国中，"王韬史著因而在日本"风炽一时"。

《普法战纪》与《法国史略》在日本的广为流传，使王韬名声大振。日本近代文学泰斗、天皇府宫内侍读重野安绎对王韬十分敬仰，他说："余观先生所著书，羡其文藻，爱慕其襟度通侻，不规规乎绳墨，欲一相见请教。"（《扶桑游记·重野安绎序》）。为王韬《扶桑游记》作跋的冈千仞亦说：

《普法战纪》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紫铨王先生；（先生）之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痹，实为当世伟人矣。

在如此心境下，日本学者开始酝酿邀请王韬访日。日本文学家龟谷省轩在为《扶桑游记》所写的跋中回忆道：

戊寅（1878 年）之春，余与栗本匏庵、佐田白茅探梅于龟井户，归途饮于柳岛。匏庵曰："吾闻有弢园王先生者，今寓粤东，学博而材伟，足迹殆遍海外。曾读其《普法战纪》，行文雄奇，其人可想。若得飘然来游，愿为东道主"。白茅曰：'善矣！'余友寺田士弧曾至南海，与先生善，乃有东游之约。

于是，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九日（1879 年 4 月 23 日），应寺田望南邀请，王韬"摒挡行李作东瀛之游"。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锐意进取，生气勃勃，王韬对此感受良深。回国后，他以日记体裁撰成《扶桑游记》一书。

《扶桑游记》是中国文人第一次以实地观察所得材料而撰写的关于日本社会生活的著作。该书记录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同时记述了王韬与日本学术界的交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王韬的《扶桑游记》，包含着从明治维新的成功中觅取治国良方的强烈意向，时时发出警世之论。

在《扶桑游记》中，王韬指出，日本"维新以来，崇尚西学，一变其积习，而焕然一新"，这种"焕然一新"是根本的而不是表层的。他以皮毛与肺腑来比喻一个国家的改革深度，根本性的改革即"肺腑之变"，指的是国家政治体制、学术思想的变化；表层的改革亦即所谓"皮毛之变"，指的是经济、军事、技艺制造方面的改革。"肺腑之变"与"皮毛之变"是一个本末的关系。凡是改革，只有集中全力于"肺腑之变"，才能使"皮毛之变"为之一新。

基于这种认识，王韬在《扶桑游记》中，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加以重新评说：

> 重野谓予曰：或序先生之文，谓为今日之魏默深。默深所著《海国图志》等书，仆亦尝一再读之，其忧国之心深矣。然于海外情形，未能洞若蓍龟；于先生所言，不免大有径庭。窃谓默深未足以比先生也。余曰：当默深先生之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徒袭皮毛也。

在这里，王韬指出，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增强国力，抵御侵略，其"先声"之功不可泯灭。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魏源眼力不够，未能看到西方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更根本的社会变革的政治内容。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见解。王韬进而对国内洋务派的"自强运动"加以剖析说："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

皮毛"(《扶桑游记》上册,第20—21页)。

王韬的如上论说,揭示了洋务运动仅在物质层次上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严重缺陷,预告洋务派的"自强新政"必然为更深刻的社会政治革新所替代,这在当时确是真知灼见。与此同时,王韬还指出中国向西方学习,首先要学习西方之"体",进行深层次的"肺腑之变",其目标是"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的君主立宪政体。他的呼唤资产阶级"西体西用"改良运动的先声。

## 第三节　黄遵宪的日本维新史研究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其高祖黄润经营当铺致富,父亲黄鸿藻为清末举人,做过知府。黄遵宪10岁入蒙馆,学习中国传统旧学。黄遵宪所生活的中国华南地区,是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主义侵袭中国的要冲之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民族国家的危厄命运,使黄遵宪矢志经世之学。在《感怀》一诗中,他辛辣讥讽当时的俗儒说:

> 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咀。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上言三代隆,下言百世俟。中言今日乱,痛哭继流涕。摹写车战图,胼胝过百纸。手持井田谱,画地期一试。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

如上诗句,道明了经世实学的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以实事程实功",即依据变化了的时势与当今现实来筹划经世方案,而不能脱离实际,热衷于以古方治今病。黄遵宪又在《感怀》诗中直斥津津乐道于性理高论的宋儒:

> 宋儒千载后,勃窣探理窟。

自诩不传学，乃剿思孟说。

讲道稍僻违，论事颇迂阔。

（《人境庐诗草笺注》第8页）

在万事待变的历史紧要关头，性理之谈无疑流于迂阔而不切时用。黄遵宪批评理学的迂腐无用，其真精神正在于倡导经世有用之学。

黄遵宪不仅将批判锋芒直指宋儒的无用之学，而且对培养无用之才的科举制也有尖锐批评。黄遵宪指出，科举制自"宋之始萌蘖，明制皇朝沿"，"今盖六百年"。然而，这一体制只能产生唯唯诺诺、不思进取的"学究"、"策士"，而培养不出真才实学的人才，他呼吁道：

到此法不变，终难兴英贤，

中兴名世者，岂不出其间。

（《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人境庐诗草笺注》，第178页）

只有改革传统科举制，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中国才有振奋一新的希望。

黄遵宪对理学空论与科举制弊端的批判，显示了他与经世实学的深刻联系，而他的日本明治维新史的研究是在道咸经世派域外史地学研究的基础上，开拓一个新境界。

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史的研究，得益于出使日本的外交使命。光绪二年(1876)，何如璋出使日本，任黄遵宪为参赞。是时，黄遵宪虽已中举人，但他感怀时局，以为海禁大开，外国侵略势力直趋中国腹地，"非留心外交，恐难安内"，遂放弃举业，于次年乘槎东渡，并在日本中国驻日使馆任参赞达五年之久。

黄遵宪出使日本期间，明治维新运动正深入开展。"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兴产业"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措施，推动

着日本迅速走向强盛。耳闻目睹日本政局的巨大变化，黄遵宪深有感触，他“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黄遵宪：《改定日本杂事诗序》，《日本杂事诗》卷首）。遂收集资料，从事日本历史研究，并撰写《日本国志》。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意图有二：一是希望通过这部书打开国人视界，增进对域外情况的了解。在《日本国志·序》中，黄遵宪揭示中国士大夫眼界狭隘的致命弱点说：

> 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雾。以余视日本士大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大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及。……可谓不狭隘矣。

他再三强调：“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而观人之国则阁”。只有广泛接触外部世界，积极汲纳新知，才能真正打开眼界。黄遵宪撰《日本国志》的另一意图是希望把日本明治维新后“百务更新，气象一新”的情况介绍到国内，“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其所取法”，推进国内的自强变法。由此可见，黄遵宪作《日本国志》决非为撰史而撰史，而是将它作为一种“匡时之策”即一种经世方案呈现于世。

需要指出的是，以“导引国人，知其所取法”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史并非黄遵宪独有的思考。由于“日本地势近我，政俗近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卷10），与黄遵宪同时代的一些中国学者也十分注意关于日本明治维新史的研究，并从不同角度得出不同结论。如洋务派顾厚焜撰《日本新政考》，着重强调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成功在于向西方“师习各艺”，“购制器之器”。他以此批评保守派

的言论说："处今日而必谓西法可屏而不用者，岂笃论者？"他进而从日本经验中总结道："海陆军之电扫风驰；枪炮制之日新月异；邮简万里，藉电线以飞驰；地宝五金，赖矿师之辨别，是诚可用者也"。对于日本推翻幕府，改革政治，推行一整套旨在清除封建制度的有力措施，顾厚焜则大有异议，斥为"好异矜奇，竟一变而无不变也，是诚何道也？"显然，顾厚焜的明治维新史研究是服从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路线，并为这一政治路线寻求合理性论证。在学术上颇有成就但在政治上殊为保守的王先谦，也研究过日本明治维新史。他认为，明治维新后之所以"不数年，屹然为东方强国"，其原因在于维护了天皇"万世一系"。这显然也是在为其政治主张张目。洋务思想家郑观应、王韬亦对日本明治维新史甚感兴趣，他们的结论是学习西方不可只移植"坚船利炮"，更为重要的内容在于体制上的改革。黄遵宪的明治维新史研究便基本上沿袭的是郑观应、王韬的路数。由于黄遵宪对日本有多年详尽的考察，"与日本维新诸大臣交谊甚笃"，有"当时最谙明治维新条理者。"（高维廉：《黄公度先生就任新加坡总领事考》）的称誉，《日本国志》因而具有特殊文化价值。

《日本国志》正式出版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共40卷，全书除卷首年表外，分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志、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凡十二类，50多万字。作者从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的实际出发，根据"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涉西法，尤加详备"（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的原则，探究"维新变政之由"，研究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以为中国变法自强的借鉴，从而表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性格。

黄遵宪总结明治维新的成功，以为其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推行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黄遵宪在《日本国

志》中详细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立宪制"设立的情况，他谈到日本于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就设议政官、行政官、刑法官等类机构，议政官负责立法，行政官担负政策的执行任务，司法权则属于刑法官，在黄遵宪看来，这种"君民共主"的"三权分立"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国应效法实行。以后他在湖南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便曾仿行日本"府县会议"形式设"南学会"，意欲使它成为省级基层会议。在介绍日本议会组织形式时，黄遵宪不仅描述甚详，而且赞美议会制"以公国是，而伸民权，意甚美也。"其意向甚为明确。

（二）"易米以钱"与"定相当地价以收税"，推行"地税改革"。在详实记载日本"地税改革"内容与效应的同时，黄遵宪就中国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他指出，无论是西方还是日本，在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后，均"凿山通海，废阡毁陌"，在土地所有制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兴自古未兴之利"。中国的土地制度在昔日是"势不极法不变"，但"今日值多事之秋，履至艰之会，则不变其何待"（《日本国志》，卷16）。他批评中国古代"均田画井以授民"的传统土地改革是"三代以下既万不可行，逮今为尤甚"。要谋"经久之大利"，就必须"参用西法"，制定出崭新的土地改革方案。而所谓"西法"即英国在美洲、澳大利亚实行的"移民垦辟"、兴办农场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黄遵宪进而在《日本国志》中具体建议道："中国东南之沙滩，西北之荒地，未及升科者，随在而有。……仿照西法，择要而试行之"。其方法为"召集农工为之垦辟，即以其垦辟所得之利，以养农工，农工也与分其利。"此种经营方式显然已是资本主义性质，而不再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三）高度注重科学技术，诚所谓"举一切光学、气学、化学、力学，咸以资工艺之用，富强也以此，强兵也以此。"黄遵宪和郭

嵩焘、王韬一样，十分注意日本注重“实学”的教育体制，他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介绍道：“明治四年，设立文部省，寻颁学制于各大学区，分设诸 校。有外国语学校，以英语为则。有小学校，其学科曰读书、曰习字、曰算术、曰地理、曰历史、曰修身”。“观其学校分门分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他批评中国传统教育“喜言空理”，轻视工艺之学，主张把日本着重“智力资源开发”的学制推行于中国，以取代中国的“帖括八股”无用之学。

黄遵宪对明治政府开放的外交也甚为注意。他盛赞日本“近世贤豪，志高意广，竞事外交，骎骎乎进开明之域”，从而推动日本进入世界强国行列。黄遵宪进而指出，开放外交不仅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走向强盛的必经路径。“西人欧洲之兴也，正以诸国鼎峙，各不相让，艺术以相摩而日善，武备以相竞而强，物产以有无相通。邻交日盛而日势日强。”(《日本国志》，卷 4)对于中国外交来说，黄遵宪的这一论断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黄遵宪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史，还有一个重要体会，这就是当今之世是“弱肉强食”，“以力服人”，所有的国家都被卷入竞争角逐之中，凡是老朽腐败而又不知改革求新者，如衰草枯叶骤临秋风之肃杀；奄奄病躯徒遇烈暑苦寒之侵袭；破舟漏船惨遭狂涛之覆没，最终逃脱不了亡国亡种的命运，“印度则亡矣，埃及则弱矣，土耳其则危矣”。凡是振作进取，求实求强者，则如猛兽，如强人，如山洪，如烈风，横扫天际，吞噬弱者，在世界上赢得生存地位，日本的超人之处便在于当列强“兵船劫盟”、“迫订草约”、“开港互市”的危急关头，能够奋起变法，从而挣脱悲惨处境。他大声疾呼中国向日本学习，矢志维新变法，以应世界大势之变，以求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其爱国之心与经世之意灼然可见。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广泛运用史表，汇集了很多调查资

料和日本政府公布的有关统计数字，为中国人了解和研究日本提供了具体可靠的依据。梁启超对《日本国志》评价甚高，认为此书“在旧体史中实为创作”。“其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若入其闺闼而数米盐，别黑白，而颂昭穆也。”（《日本国志·后序》）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黄遵宪不仅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飞速发展加以肯定，呼吁国人向日本学习，推行维新变法，而且洞若观火地觉察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潜在威胁，他就日本掠夺琉球一事向中国当权者发出警告说：

> 日本今日得琉球矣，明日且及朝鲜，欲必未厌也。其势且将及我。
>
> 日本维新之效或则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梁启超：《嘉应黄先生墓志铭》、《碑传集补》卷13）

他还再三强调朝鲜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说：

> 朝鲜一土，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势之所必争。

事态的发展，充分验证了黄遵宪眼光的准确性。就在黄遵宪提出《琉球三策》与《朝鲜策略》后不久，日本入侵朝鲜，酿起祸端，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由于缺乏充足的思想准备与物质准备，惨遭失败，割地丧权，一蹶不振。梁启超对黄遵宪的真知远见十分叹服，他说：

> 日本方据我琉球，且觊及朝鲜，先生告使者，乘彼谋未定，先发制之，具牍数千言，陈利害甚悉。……而当事不省，不二十年，二属遂相继不保。
>
> 吾国二十年以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日本国志》）则已言。……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梁启超：《嘉应黄先生墓志铭》，《续碑传集补》卷13）

黄遵宪关于日本“其势且将及我”的先见与林则徐先期预言俄国“终为中国之患”的情形颇为相似，此种洞察未来国际形势发展

的深邃眼光无疑来自于经世学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致关切。李鸿章在谈到龚自珍关于西域设行省的远见卓识时，有一段颇为精辟的论断：

> 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轫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黑龙江述略序》)

这正是经世精神的内在效应力。

《日本国志》刊行后，在中国思想界引起深刻反响。梁启超说："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日本国志·后序》)康有为说："黄遵宪参日使何子峨幕，读日本维新掌故，考于中外之政，及著《日本国志》，于政治裨益尤深。"由于康有为"于维新条理，究无直接之体会"，因此，他在修改旧作《日本变政考》时，大量参考了《日本国志》中提供的关于明治维新的资料。立意改革变法，走明治天皇道路的光绪帝也对《日本国志》深感兴趣。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命枢臣进《日本国志》，继再索一部"(钟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据英国学者米尔纳考证，百日维新诏令中"关于经济方面的、行政方面的、文化教育和军事方面的改革，而其中以经济改革尤为明显，与黄氏之《日本国志》一般无异(《黄公度先生传稿》第371页，引米尔纳：《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的维新思想及其对戊戌变法之影响》)。

从郭嵩焘到黄遵宪，洋务运动时期的外国史地考察与研究，标志着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尽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的域外史地研究主要反映的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时代主流，洋务运动时期的世界史地研究更多地表现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历史课题，两者之间仍存在着一脉贯通的精神，这就是经世致用、济时救世，其精髓正如顾炎武所扼要指出的：

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与人书》（八）《亭林文集》卷4）

## 第四节　传统实学通往近代新学的桥梁

近代经世实学是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定文化形态。它既承袭有儒学经世的传统，又孕育着近代新学的某些启蒙因子。正因为近代经世实学具有这种双重性格，所以，它才能够扮演从中国传统实学通往近代新学的桥梁的角色。

近代中国的敏感人物梁启超，曾以鲜明的语言对近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区别作了如下概括：

> 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洲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十九世纪狂飚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穷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梁启超：《过渡时代》，《清议报》第82期）

从道咸经世派到后来的洋务派就是为寻求“过渡之道”而艰苦跋涉的一批历史人物。他们所致力的经世实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于“过渡时代”所作出的最初的积极反应。近代经世实学派以挽救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出发，高扬中国古代实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在揭露近代社会弊端、改造中国近代社会上作了大量的工作，表现了中国传统实学试图应付世变的一种积极努力。

然而，近代经世实学固然在推动中国人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发挥了无可争议的积极作用，但是就其文化品性而言，它仍然属于中国古学（或曰旧学）的历史范畴。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推

移，“实学”这一概念，已开始从传统实学向近代新学转化。

所谓近代新学，是指“五四”以前由西方传入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其基本范畴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郭嵩焘、王韬在谈到所谓“泰西实学”时，以声、光、化、电为其基本内容，这已经贴近了近代新学的主要内涵。

从古代传统实学向近代新学的转化，存在着两大基本前提。

首先，面对近代急剧变化的时势，以土地、赋税、荒政、礼治、盐政、河工、治兵、漕运等实政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经世之学早已不敷时用，以近代新学来应付时艰自然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对于这一历史趋势，梁启超指出：

> 居今日而言经世，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又稍异。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册一）

而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的渗入，必然日渐扩大其地盘，排挤“旧学”并最终取而代之。

其次，洋务时期勃起的一批先进学者，如郑观应、王韬等人，虽然早年大都受过旧学的熏陶，但经学的根柢不深，真正称得上“通经致用”的人寥寥无几，对“史学经世”有研究者亦不多，即使精通儒家经典的康有为，虽然“既以新时代的精神阐释儒学旧传统”，“又以旧学问的立场论析现实问题”，并有“融通新旧、兼摄中外”的经世之作问世，但“他和王韬、郑观应等人一样，是在了解和实践西学的基础上，以西学诠释中学（旧学），而不象魏源等

人那样是在研究和实践经世之学的基础上吸收西学，以促进经世之学的演变。"（陈振江：《近代经世思潮的演变》，《历史研究》1991 年第 3 期）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甲午战后，由于西方科学技术得到更深广引进，西方政教制度和人文社会科学也广泛引入中国，传统经世致用之学已经失去昔日光辉而急剧衰落与泯灭，新学从此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世"的有力器具。

当然，"经世致用"之学的沉寂并不意味着"经世"精神的泯灭，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经世致用"的致思趋向深入中国文化人的骨髓。

戊戌变法的主将康有为力主"博稽而通其变，务致之用"。不论通经、读史，还是讲求西学，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不论学术研究还是教育弟子，都力求联系当前实际问题，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讲求沿革得失。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曾描述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时的情形：

>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

正是在康有为的指导下，梁启超"决然舍去旧学"，投身于维新变法事业，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界的一代宗师。至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更是"借经术以纹饰其政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一代经世名作。

"五四"后勃然兴起的实用主义思潮也与中国传统"经世致用"思想有着密切联系。诚然，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哲学思潮能够为当时知识分子所普遍接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它自身具有的价值能够满足五四时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科学与

民主的要求。但是，实用主义哲学在致思趋向上与中国经世致用传统的一致性，无疑大大强化了这一学说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蔡元培认定实用主义哲学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冯友兰承认：“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贺麟说：“(实用主义哲学)在五四运动后十年支配整个思想界，尤其是当时的青年思想，直接间接都受此思潮的影响，而所谓新文化运动，更是这个思想的高潮。”(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4集，第58页)如上学者的描述，确是当时思想界的历史真实。此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实用主义思潮的领袖人物胡适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固然得力于杜威的启迪，但是，在杜威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经验与自然》、《哲学的改造》等还没有问世之前，胡适已在强调“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今日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他十分关注的问题有三：“一、泰西考据学；二，致用哲学；三、天赋人权说之沿革”。(《胡适留学日记》，第3集，第167—168页)由此可见，由于中国“经世致用”传统的思想影响，胡适在正式接受实用主义之前，其学术思想已经十分接近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了。此种情形。同样也适用于解释蔡元培、冯友兰等人对实用主义哲学服膺的原因。

在毛泽东身上，也同样深刻映现着“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青年毛泽东曾称道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风和王船山的“履践笃实”精神，服膺颜元的讲求习行的哲学。具有源远流长的“经世”传统的湖湘学派的务实学风使青年毛泽东“不重言谈，重在实行”(《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3页)。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实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当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毛泽东也是从“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的积极

意义上来理解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毛泽东于1919年9月1日在长沙发起的“问题研究会”，便是受胡适的影响，“注重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青年毛泽东还十分崇拜曾国藩的“义理经世之学”，称赞他是中国近代的“巨夫伟人”，并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青年时期即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远大抱负，显然受到从王夫之到曾国藩等经世派的影响。

# 第四编

# 中国实学在日本、朝鲜的传播及历史影响

# 引　论

中国实学通过各种文化交流渠道，在日本和朝鲜的广泛传播及其历史影响，从一定意义上，是中国实学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大。

本编所述内容虽不全面，但仅就明代罗钦顺的实学对日本安东守约、贝原益轩的影响，吴廷翰的元气实体论对伊藤仁斋、中江岷山、山片蟠桃的思想影响，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日本本草学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方以智、游艺对三浦梅园实测之学的影响，陈元赟对日本文学改革、柔道创编和制陶术等多种实用技艺的传授，以及清初实测之学对朝鲜朴齐家实学思想的影响，清代考据实学对朝鲜金正喜实学思想的影响，清初经世实学对朝鲜实学集大成者丁若镛的思想影响，都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实学不但善于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对自己进行改铸，而且也能适时地将自己推广于世界，并不是一个封闭性的，而是一个具有开放精神的思想体系。同时，它也具体地解剖了中国实学对于日本实学和朝鲜实学所产生的深远的历史影响。这是中国与日本、中国与朝鲜之间进行文化学术交流的思想结晶，是中日、中朝人民之间传统友谊的象征。

中国与日本、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实学交流与融合，并不是单向施动，而是双向互补的。无论是日本还是朝鲜，在明清时期，依

据本土文化传统和立足于本国国情，固然从中国实学中吸取了思想营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他们的实学思想，同时中国实学思想在传播过程中也从日本、朝鲜实学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内容，来补充和完善自己的实学思想体系。这种双向互补结构是完全平等的，也是同步进行的。例如，在日本、朝鲜引进中国实学对本国实学进行改铸的同时，中国洋务派实学家王韬在深入考察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之后所写的《扶桑游记》一书中，对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有了重新的认识，认为这只是"皮毛之变"，要想从根本上挽救中国，就必须如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以"肺腑之变"代替"皮毛之变"，即以深刻的社会政治改革来代替单纯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亦即主张以"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的君主立宪政体来代替专制主义的君主制。这较之魏源的思想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实学思想。黄遵宪出使日本期间，深受日本明治维新社会变革的影响，撰写《日本国志》，将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内容和成功经验及时地介绍给中国人，以便寻求出一种"匡时之策"，从而丰富与发展了中国晚清洋务派的实学思想。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双向互补结构，不仅打破了中、日、朝各自的封闭格局与孤立状态，而且通过这种互补结构促进了东方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无论是日本还是朝鲜，对中国实学思想的引进与吸收，并不是简单地将中国实学移植到日本或朝鲜，而是根据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实际需要，是有选择性和创造性的。他们总是基于本国文化传统，善于吸收与接纳中国实学思想，巧妙地进行改铸，从而建立起适合于他们国情的新结构的实学思想，从而为东方实学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如日本著名实学家伊藤仁斋在创立日本古学堀川学派时，虽然深受中国明代吴廷翰的实学影响，但是他所提倡的元气实体论较之吴氏，又有新的发展。他认为"圣人

以天地为活物”，就是“以其有一元气也”。这种“天地一大活物”的思想，把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显然是源于吴氏而又高于吴氏。日本实学家贝原益轩著的《大和本草》，虽然受到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只局限于对李氏思想的注解，而是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和经验，着重地描写了日本本草学的特色，反映了日本本草学由单纯模仿到自立创造的发展趋势。小野兰山所著的《本草纲目启蒙》也无疑受到了李时珍实学思想的影响，但是他在对日本动植物的广泛调查、采集和实验的基础上，着重地对日本本草学的特征进行描绘，从而丰富了李时珍的思想，为东方实测之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以饭沼欲斋为代表的美浓藩的本草学，在吸收《本草纲目》思想的同时，善于吸收从西方传入的兰学思想，并且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和实验仪器，在广泛对日本动植物的培育、观察和整理的基础上，摒弃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繁琐考证和某些无根据的传闻，开始将日本本草学建立在近代的科学精神之上。这种近代的科学精神与西方的科技思想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所不具有的。明清之际客寓于日本的陈元赟虽是日本柔道的鼻祖，但是他在创编日本柔道时，除了吸取中国少林拳法和明代衙役的擒捕术外，还吸收了日本固有的拳法，将三者综合而成蜚声中外的柔道。又如朝鲜实学集大成者丁若镛在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时，虽然吸取了清初实学家王源的“惟农为有田”的思想，但是他根据李氏王朝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农民集体所有制、共同耕作、按劳分配的“闾田制”。这种“闾田制”同王源的农民土地个体所有制是有原则区别的。这是对王源实学思想的进一步发挥。这一切都说明，日本和朝鲜实学虽然通过不同方式受到过中国实学思想的影响，但是这种思想影响总是以日本、朝鲜的本土文化传统为逻辑起点，而建立起来的适合他们国情的独具特点的实学思想，是有所发展、

有所创造的。

从中日、中朝实学思想的互补结构看，说明中日、中朝之间的文化学术交往源渊流长，共同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东方实学思想，从而为人类的精神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说明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改造、发展、超越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决不能把外来文化拒之门外而采取封闭式的内省方式。没有各国与各民族不同文明形式之间的互渗、互补，要实现本国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是不可能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明的对立互补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

# 第四十二章　明代元气实体论与日本德川时代的实学

我国自宋代至明清约700余年间，思想论坛占支配地位的是程朱理学。明代中期王阳明接踵陆九渊继起心学，只是改变了唯心论形式。与理学、心学鼎立的还有张载开创的气学唯物论。气学唯物论发展到明代中期，进入一个重要阶段，代表人物有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朱之瑜等。他们以气学为理论基础，在社会政治上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虚寡实之谈，倡导实体实理，实功实用和实事实风之学。他们这种崇实之学，不但为中国的元气实体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且也影响了一大批日本德川时代的学者与朱子学决裂，形成以气学为特征的实学。尔后，日本实学的发展，又为强国富民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明代的元气实体论对日本实学产生过重大影响。

## 第一节　罗钦顺的实学对安东守约、贝原益轩的影响

### 一、罗钦顺及其实学思想

罗钦顺是我国明代中期首倡张载气学唯物论者，并且在王阳明心学刚刚兴起时第一个起来批判其理论体系和揭示其禅学

思想渊源的。他主张“经世宰物”之实学，影响了日本德川时代的学者安东守约和贝原益轩。

罗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泰和县(今属江西)人。明弘治六年(1493)登进士甲榜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弘治十五年(1502)以后近三十年期间，曾先后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南京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摄部事)、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宦官刘瑾专权时，被夺职为民。刘瑾被诛后恢复原职。嘉靖六年(1527)耻与逢迎世宗朱厚熜的张璁、桂萼同列而致仕还乡。从嘉靖七年至二十五年(1528—1546)前后用了约19年时间完成他的实学著作《困知记》6卷及附录1卷。在《整庵自志》中自述撰写该书过程及其心境说：辞官还乡后，“谢绝尘绊，静坐山阁，风雨晦冥，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记》”，它非一部泛讲虚清静空之书，“固知实理之不容易”，“盖无所不用其诚”以求，目的是“所以继续垂微之绪，明斥似是之非”(《困知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99页)。又说，此书“乃平生力学所得，而成于晚年者也”(《存稿题辞》)。又著有《整庵存稿》，乃是一部各体诗文集。他于嘉靖十三年(1534)，对于早年有涉浮夸之辞章文稿尽焚之，“择其可观者，以类相从，题曰《整庵存稿》”(同上)。罗钦顺上述两部著作均是他的实学思想的结晶。

罗钦顺的学术思想，经历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思想上逐步摈弃不着实际之谈，认识上不断得到提高才完成了实学之转变。早年为科举仕进，从事于章句之学，接受的是程朱理学。中年又出入于禅学。后来他在回忆这段从学历程时说：从事章句，那“不过为利禄谋尔”(《困知记序》)。这无疑是与过去决裂的自我批判。以追求利禄为目的从事学问，不过视之为猎取富贵的手段，何能有解决国计民生实际的学问。清人张伯行(1651—1725)在为其所撰之传中说：罗钦顺“先生尝追悔早年受学”，指

的是他年约四十岁前后，时已从禅学中摆脱出来，还“追悔”早年所受程朱理学之影响。28岁至37岁，即从弘治六年到十五年(1493—1502)任翰林编修期，是他学术历程的第二阶段，“尝驰纵于释氏”，但他“识见超拔”，究“不为彼所诱而去”(张伯行：《困知记序》)，及“大悟禅学之非而尽弃之，非徒弃之，而又力排痛辟”(张伯行：《罗整庵先生传》)。在认识到章句之学和禅学都是“凌空驾虚”之谈后，罗钦顺提出了“经世宰物”(《困知记》，第46页)的实学主张。

罗钦顺从一个受过程朱理学影响，而后又笃信禅学，转变为元气实在论者，其间没有师承，也非受他人启导，他自己说“独学无朋”(《困知记序》)，完全是他自己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而完成的。据明人董其昌(1555—1636)说：罗钦顺在出入禅学多年后，“见所谓法净洁身者，乃知无善无恶之旨，果与《诗》之‘秉彝’，《书》之‘恒性’，辨在毫芒，灼然不能混”(《罗整庵先生存稿序》、《困知记》第197页)。“秉彝”见于《诗·大雅·蒸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意为人心有持执之常性，无不有此美德。“恒性”见于《尚书·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言人有上天赋于之常性，为君主者在于立道顺以教之，才是为君之道。在罗钦顺看来，“秉彝”、“恒性”思想“体用皆实”(黄芳：《困知记序》、《困知记》第178页)。他在批判“禅家所见只是一片虚空旷荡境界”时说：“盖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则殊。必有察乎其分之殊然后理之一者可见。既有见矣，必从而固守之，然后应酬之际无或差谬。此博约所以为吾儒之实学也。”(《困知记》，第84页)他把“理”在分殊上“无或差谬”，理论上博而能约，能从实际出发认作实学。可见，他转变为主实学者正是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探索领悟而来。

在了解罗钦顺是怎样成为实学者之后，有必要先了解一下

他的实学思想的主要方面，这是进而了解其实学在日本影响的前提。

追寻一下罗钦顺学术思想转变之轨迹，可以看出，他是先完成元气一元论，提出“理须就气上认取”的实理观，并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经世宰物”之实学。

（一）考察一下罗钦顺的理气观。他肯定气的实在性和客观性，而“理”则不能离气而有。他说：

> 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不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辐，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困知记》，第4—5页）

> 人呼吸之气，即天地之气。自形体而观，若有内外之分，其实一气之往来尔。（《困知己》，第43页）

> 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只就气认理”与“认气为理”，两言明有分别，若于此看不透，多说亦无用也。（《困知记》，第32页）

上引数段，足以证明罗钦顺已是元气一元论者。他在肯定气是世界之根本前提下，回答了什么是理，理与气的关系及其存在形式。又在批评离气言理的同时，指出混理气为一也不对。

说“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这是承认气在空间、时间上无限性。宇宙万物，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飞潜动植，皆本于一气，气是根本性的，不能离气言理，它们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说动静、往来、阖阖、升降、著微是气之运动变化形式，虽“千条万绪，纷纭胶辐，而卒不可乱”，这既肯定世界统一于气，又肯定运动变化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说“理须就气上认取”，不承认离气有

理，这样，此“理”就不是非物质的抽象，而是有实际内容的。它概括了自然界之温凉寒暑，万物生长收藏，社会上民之日用彝伦，人事之得失，如此等等，不仅其中有“理”，还受“理”的支配。这就是说，理是实理，只是“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困知记》，第5页），而非真有一物使之然。

从肯定气、理的客观性和实在性出发，罗钦顺对朱熹“终身认理气为二物”，“未敢以为然”（《困知记》，第29页）。朱熹在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的“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时，认为“太极”是理与气合。罗钦顺指出，“凡物必两后可以言合”。又批评朱熹“气强理弱”说，一弱一强，再次证明认理气为二物。这就有力地揭示了朱熹的二元论。正是上述对朱熹理气的批判，影响了日本的一些朱子学派。

（二）以理气的客观性、实在性以及世界统一于气的观点为基础，罗钦顺提出“经世宰物”的主张，这是他的实学在社会政治上的贯彻和应用。

罗钦顺的“经世宰物”的主张是在批判佛教禅宗中提出的。他指出佛教生死轮回说，禅宗见性成佛论，只能导致“教衰而俗败”，“无以达经世宰物之用”（《困知记》，第46页）。就是说，他主张的是，经世宰物之实学。

罗钦顺提出，经世宰物之学是有社会背景的。明代中期，封建统治者在经济上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当时，皇室贵族和官僚地主贪婪地进行土地兼并。明初，有税田850万顷，到弘治时，降至440万余顷，在约100年多点时间内，减少了百分之五十。税田减少，是大量耕地并入可以不纳税的特权统治者手中，负担却转嫁到劳动农民身上，横征暴敛的结果，使广大农民日益赤贫。在贪官污吏侵削下，走头无路的农民，被迫铤而走险，举行武装起义。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也极腐败，宦官屡有专权乱政，矛

盾加剧，先后出现了寘锜和宸濠之叛乱，统治者中有识之士要想继续维持下去，非实行改革不可。就在这种形势下，罗钦顺提出了“变法致治”的主张。他说：

> 法有当变者，不可不变，不变即无由致治。然欲变法，须是得人。诚使知道者多，尚德者众，无彼无己，唯善是从，则于法之当变也，相与议之必精，既变也，相与守之必固，近则为之数十年之利，远则数百年之利亦可致也。……诚得其人以为表率，熏陶鼓舞，自然月异而岁不同，近则五年，远则十年，真才必当接踵而出矣。且谈道与议法，两不相悖而实相资，三五年间，亦何事之不可举耶！（《困知记》，第15页）

罗钦顺强调，当变之法不可不变，不可固守过时之陈规旧法。变法的目的是国家社会得到治理和发展。他大概是总结了历史上多次变法成败得失的经验和教训，要使变法有成效，必有一支好的骨干队伍，这支队伍好就好在“知道”和“尚德”，而又“无彼无己”，不朋比，不谋私利，唯善是从。这样，才能周密地讨论变法，推行之后又能坚持下去，不致于人存政举，人去政废。更可贵的是他提到“谈道与议法”相资，主张道、法相辅相行，在“道”的原则指导下变法。这是很深刻的见解。

罗钦顺的变法政治的实政具体主张是什么呢？

（一）政治上，主张认真贯彻民本思想，举用贤才。他说：“《传》曰：民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官匪其人，民心未有不伤也。伤心及本，而邦且安赖耶？”（《整庵存稿·送参议周君之广东序》）可见，他的民本德治体现在政治廉洁清明，官吏不贪脏枉法。贪脏聚敛则伤民，民伤而乱作，这就斲丧国本，就会动摇封建统治。为不如此，就要君正相贤。君要“修德”、“勤政”。临民之为政者，要贤而能“修其身”又能“正君（《困知记》，第16页）。临民不靠严刑峻法而靠德治，德治又靠为政者是贤相贤才。为此，

得贤是“为治之急务”，得贤用才不能“取决一二人之言”和“循资”，打破官僚升迁制度，“破常格拔真材”（《整庵存稿·上献纳愚忠疏》）。

（二）经济上，主张“宽征”、“裕民”。针对横征暴敛，他提出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与人民休养生息，说“爱民莫切于宽征”（《罗整庵先生存稿》卷2，《送太守曹君之任临江序》）。他看到农民贫穷根本原因及被逼为“盗”在于朝廷上下横征亟行。“今太仓之粟，化为月课以入权门者，不可胜计；内库之出内，司国计者不复预闻，谓有政事可乎？经费不足，则横敛亟行，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困知记》，第17页）！他以京师储仓被各种编造的名目化为权门豪贵私产这一事实为例，加重人民负担，人民是在走投无路情况下，被逼上梁山的。他主张按《大学》提的理财之道，要“足民”、“裕民”。要做到这点，就要实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制度立，然后可以阜俗而丰财。”（《困知记》，第16页）还要节省开支，减少军费，使无“坐食之兵”，他自认这是可行的改革好措施，“非簸弄笔舌之空谈”（《困知记》，第18页）。

罗钦顺的“宽征”、“裕民”主张有两点值得申述一下：其一，把裕民看成培壅国家的根本。他以栽培树木作喻说：“夫民，犹树也。合抱之木，百年培之而不足，一日伐之而有余。如使在山，常有培而无伐，则其枝叶之峻茂，……”（《整庵存稿·送何徽州序》）。这里说的“伐”，指对人民敲骨吸髓的搜括，所说的“培”，即使民“裕”。这也说明他同情人民疾苦。其二，“裕民”主张体现了他肯定人欲的合理性。他说：“夫人之有欲，固出于天，盖有必然不容已，且有当然不可易者。于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当然之则，夫安往而非善乎”（《困知记》，第28页）？在哲学上肯定人欲合理性，是他经济上主张“裕民”的理论基础。

就罗钦顺实学全体看，他反对凌空驾虚，谈空说幻，反对有

如“水上葫芦”的心学和禅学，以及为追逐利禄谋的程朱章句之学，主张体用皆实，变法致治，经世宰物之实学，他的“变法致治”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来看，都不很丰富，还未形成一个系统的改革方案。然而却体现了向前看的发展观。

**二、对安东守约实学思想的影响**

罗钦顺所作《困知记》，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首次刊刻行世，其后罗氏后人又曾多次翻刻，大约在明万历年间传播到日本。它在日本学术界如注入一股活水，特别是对日本的朱子学派发生过重大影响，使一些学者由理一元论或理气二元论转变为元气实体论，其代表人物有安东守约和贝原益轩等。

日本的朱子学在德川时代兴盛，其代表人物有藤原惺窝(1561—1619)，其后分京师、大阪、海南、海西等朱子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林罗山(1583—1657)、中井履轩(1732—1816)、山崎闇斋(1618—1682)，安东守约和贝原益轩原属具有独立的自成系统的海西朱子学派。

安东守约(1622—1701，日元和八年--日元禄十四年)，字鲁默，号省庵。筑后(今日本福冈县南)人。曾仕于柳河侯，年俸二百担。为人好学尚德。年踰四十而未娶。著有《初学问答》、《耻斋漫录》、《省庵遗集》等。《朱舜水集》保存其上朱(之瑜)先生书二十四通及祭文四篇。青少年时曾随松永尺五(1592—1657)学习儒学。松永尺五是藤原惺窝五大弟子之一，属京师朱子学派。日庆安元年(1648)，天皇昭赐禁阙南数十弓地，为其建讲习堂，讲习汉学，培养了许多人才。其中就有安东守约和木下顺庵(1621—1698)等。木下有诗比喻其师讲学堂如董仲舒之讲帷，朱熹之白鹿洞，“门人聚若云”。木下顺庵亦有诗称其同窗友安东守约“千里从师烦桂玉，三年学道见羹墙。术兼俞扁功常伙，诗逐曹刘名益彰。”赞其诚心钦慕松永之学，术可比俞柎、扁鹊，诗可追

三曹、刘禹锡。松永尺五卒后，日万治二年，朱之瑜至长崎，安东守约“见舜，请业，于是学益富，行益修。”（原念斋：《先哲丛谈》）。朱之瑜（1600—1682）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诸生。明亡后抗清，失败后先后逃亡安南、日本。1659年（日万治二年）至日，时日本实行锁国政策，朱之瑜在《与孙男毓仁书》中说：“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至长崎，十九富商，连名具呈恳留，累次俱不准。我故无意于此，乃安东省庵苦苦恳留，转展央人，故留驻在此，是特为我一人开此厉禁也。既留之后，乃分半俸供给我。省庵薄俸二百石，实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年两次到崎省我，一次费银五十两，二次共一百两。苜蓿先生之俸尽于此矣。又土仪时物，络绎差人送来，其自奉，做衣、粝饭、菜羹而已，或时丰腆，则鱼鳓数枚耳。家止一唐锅，经时无物烹调，尘封铁锈，其宗亲朋友咸共非笑之，谏沮之，省庵恬然不顾，惟日夜读书乐道而已。”“此等人中原亦自少有”（转引自《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页）。日本另一学者伊藤仁斋在请求安东守约转达师事朱之瑜之请求信中也谈到：“承闻明国大儒越中朱先生，躬怀不帝秦之义，来止长崎。台下急执弟子礼，师事之；且不蓄妻子，不恤衣食，奉廪禄之半，以为留师计。其志道之高，其行义之洁，非不待文王而兴者，岂能然乎。”（《答安东省庵书》，见《朱舜水集》第781页）分俸二百石事，又见安东守约《悼朱先生文》中亦有载“乃分禄之半以给日夕”（《答安东省庵书》，见《朱舜水集》，第736页）。自奉刻苦廉薄，而分食于尊之为师之朱之瑜，此堪称高谊，也体现了两国人民深厚的友情和传统文化的交融。朱子瑜教之“木豆、瓦登、布帛、菽、粟”（《答安东省庵书》，见《朱舜水集》，第162页）。主张为学要讲实功、实用，旨在“经邦弘化，康济艰难”（《答安东省庵书》，见《朱舜水集》，第406页）之学，又教导他说：“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答安

东省庵书》，见《朱舜水集》，第 369 页）。安东守约师事朱之瑜二十馀年，深受朱之瑜实理实学之影响。朱子瑜亦赞"其立志更有人不可及者"（《答安东省庵书》，见《朱舜水集》，第 411 页）。

安东守约还曾一定程度上受到明末另一学者的影响，这就是比朱之瑜略早流寓日本的陈元赟（1587—1671）。陈元赟系浙江馀杭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至日，在日本创编和传授至今享誉世界的柔道，传授制陶术、书法，第一次把以袁宏道为代表的主性灵说的公安派文学传播到日本，在日本公认为与朱之瑜同样有学识者之一。他先后与松永尺五、安东守约师生互为师友。松永尺五曾有诗赞陈元赟"诗夸曹植捷，文角马迁雄"（《卒呈大明人元赟》，转引自日籍小松原涛《陈元赟研究》第 73 页）。安东守约曾在亀川恕水讲习堂聆听过陈元赟讲授诗法。后亦有赞陈元赟"诗律元于唐律细，盆池须拟习池回"（《春日芝山卧隐两子见访》，转引自日籍小松原涛《陈元赟研究》，第 78 页），以及"醵酒兴犹在，好 辞觉有神"（《谢陈芝山见访》，转引自日籍小松原涛《陈元赟研究》，第 77 页）。松永尺五和安东守约均是从诗文方面赞颂陈元赟，都是赞颂他传播的公安派文学，推动日本文学之革新。

看来，安东守约在思想和文风上先后受到松永尺五、朱之瑜和陈元赟之影响，其中影响最大最深的无疑是朱之瑜。值得注意的是，朱之瑜虽然不赞成理学和心学，曾经批判理学脱离实际，虚伪浮夸是"纯弄虚脾，捕风捉影"（《朱舜水集》，第 275 页），并对安东守约说理学家"终不曾做得一事，况又于其屋下架屋哉！"（《朱舜水集》，第 160 页）"俨然泥塑木雕，岂复可行于世！"（《朱舜水集》，第 190 页）。又批判心学家王阳明的主观唯心论"立异"、"伪学"，"高视阔步，优孟衣冠"，"杂佛书语"。然而，朱之瑜对宋明理学和心学哲学重要范畴并未涉及，或者说直接涉及

不多。为此，在这点上，安东守约也很难从其师思想中受益，而罗钦顺的《困知记》却使之转变为元气实体论起了关键作用。

在哲学上，安东守约从罗钦顺的《困知记》中受到什么影响呢？

日本的朱子学，有信奉理一元论者，有推信理气二元论者。安东守约属海西朱子学派，在藤原惺窝系统之外独立倡导朱子学，这一派从批判理气二元论走向理气合一说，而批判的理论武器就是罗钦顺在《困知记》中所阐述的元气实体论。

安东守约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 天地之间，唯理与气，以为二不是，以为一亦不是。先儒之论，未能归一，岂管窥之所及哉？罗整庵曰："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处间不容发，最为难言，要之人善观而默识之。'只就气认理'与'认气为理'，两言明有分别，若于此看不透，多说亦无用也。"又曰："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即所以有理之名。'《易》有太极'，即谓此也。若于转折之处看得分明，自然头头皆合。"此说极明，要须省悟。（转引自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207 页又见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 1964 年版，第 38 页）

安东守约引用的两段论述，分别见于《困知记》卷下和续卷上。要说明的是，第二段引文在"来而往"与"不知其所以然"之间，漏了"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来，来而不能往，有莫"十九字。许或当时传到日本之版本不同。安东守约在引述罗钦顺言论之前，指出"先儒之论，未能归一"，此先儒既包括中国部分理学家，当然也有日本的朱子学派。安东守约在肯定"天地之间，唯理与气"前提下，指出把理、气截然分之为二不对，同时又指出混同理

气为一也是错误的。这样，既批评了理一元论，又与理气二元论划清了界限。这里依据的哲学思想，显然是罗钦顺的气一元论。所以日本近代哲学家井上哲次郎(1855—1944)说安东守约这一种理气合一论是以气为基础，与气一元论甚为接近的(见《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由此可见，安东守约借助罗钦顺从朱子学派走向了元气实体论。

正是安东守约转变为元气实体论后，才开阔了眼界和胸怀，使之超越于偏狭某一流派学术领域，不株守一家之说，而取殊途同归自由之学风。他把朱陆异同比作水流，源出于一，只分流有异，所至亦同："天下之水一，其支分派别不同，流之然也，其源未尝不一，圣贤之道亦然，其立教或由本达末，或溯末探本，其所入不同，其所至一也。"

总之，安东守约受到罗钦顺《困知记》影响后，使他从世界观上转变成元气实体论者，使他从朱之瑜那里接受的实学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德川时代讲实学的巨儒。

**三、对贝原益轩实学思想的影响**

按日本古学派堀川学派主要传人伊藤东涯(1670—1736)评说，海西有两大巨儒，除安东守约外，另一个就是贝原益轩。贝原益轩与安东守约一样，也深受罗钦顺的实学思想影响。

贝原益轩(1630—1714，日宽永七年至正德四年)，名笃信，字子诚，其号益轩，又号损轩。筑前(今日本福冈县)人。其父贝原宽斋是藩主家侍医。家贫，村居无师，又无书读。14岁读医书，略通药方，中年开始游学各地。"博学强记，和汉之书，无不穷综，其著作之富，与(林)罗山、(新井)白石相颉颃"(板仓胜明《贝原先生传》)。贝原益轩是日本公认的哲学家、博物学家。著书很多，有《慎思录》、《大疑录》、《初学知要》、《自娱集》、《益轩十训》，涉及树艺、文学、医学、制造等许多方面。其所著《大和本草》，为日

本草药学和植物学奠立了基础。《筑前土产志》，从化石研究地壳变化，很有价值。从学门弟子著名者有竹田青庵、香月牛仙、贝原好古等。

与罗钦顺所走的学术道路有共同点的是，贝原益轩从学也有三度变化，思想发展可分三个时期。

青少年时代，除读医书外，还读佛书，甚至吃斋礼佛。后"仲兄告之浮屠之非，一旦悟其过，而终身不好佛"（贝原好古：《益轩先生年谱》）。于是又阅读陆九渊王阳明学派书，开始信仰心学。直至36岁，读了明代陈建的《学蔀通辨》，"遂悟陆氏之非，尽弃其旧学，""益信濂洛关闽之正学"（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由此可见，他是通过陈建的《学蔀通辨》而成为程朱理学信徒的。一度对朱熹崇拜至极，称颂朱熹"诚是真儒，可谓振古豪杰"，"后之学者，讲习经义，讨论于道理，而所以为学者，皆是依朱子开导之功，故古今天下之学者，无不以朱子为阶梯"（《异学诽朱子辨》，转引自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第212页）。

然贝原益轩又善于独立思考，在作为程朱理学信徒时，也不是全然盲从盲信，读书感到其中有不妥或可商榷之论，不轻易苟同，必推究再三，一时不可解者，取存疑态度。晚年，对周敦颐、二程和朱熹皆有所疑，在罗钦顺《困知记》影响下，思想为之一变，由对程朱理学怀疑转向批判，从而进一步走向唯物论。《慎思录》和《大疑录》可算是他的晚年定论。在《大疑录》中，他引述《困知记》说：

> 明王阳明是天下之英才，一时之人迷溺于彼学者，滔滔皆是，比之晋人清谈其害太过。罗整庵与王阳明同时之人，以阳明为非，而与彼论辨，可谓聪明英俊之人也。罗钦顺之学，其说不阿于宋儒，其言曰，"理只是气之理"。又曰，"理须就气上认取。"窃谓宋儒分开理气为二物，其后诸儒阿谀于

宋儒，而不能论辨，只罗氏师尊程朱，而不阿所好，其所论最为正当，宋季以下元明之诸儒所不言及也，可为豪杰之士也。如薛瑄、胡居仁二子，虽为明儒之首称，然其所见不及钦顺远矣。(《大疑录》卷上。转引自北京大学东方哲学史教研组编《日本哲学·德川时代之部》，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2页)

从上引可以看到，贝原益轩既批判程朱及其明代后学薛瑄、胡居仁之理气观，又批判了心学王阳明清谈为害，对罗钦顺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与王阳明由所谓《大学古本》和《朱子晚年定论》所引起的一场"格物致知"等涉及哲学认识论的辩论，赞同罗钦顺的观点，称其"聪明英俊"、"豪杰之士"，所见远远超过"明儒之首称"的薛瑄、胡居仁。

贝原益轩这一观点是公允的。薛瑄(1389—1464)是明初理学代表人物。他曾修正朱熹"理在气先"论，一方面说"理只在气中"(《读书录》卷1)，同时又以日光和飞鸟比喻理气，说"理乘气机而动，如日光载鸟背而飞。鸟飞而日光不离其背，实未尝与之俱往。"(《读书录》，卷5)显然视理气可分离而存在，偏于从理气二元修正程朱理一元论。胡居仁(1434—1484)是江西崇仁理学家吴与弼的学生，他一则说："有此理则有此气"(《居业录》卷6)，又说"心与理本一"(《居业录》，卷1)，偏于从心学修正程朱理一元论。而罗钦顺指出"理只是气之理"，这就肯定了气为根本；"理须就气上认取"，这就否定了理离气独立存在。贝原益轩引述此二点，表明接受了罗钦顺的元气实体论。

贝原益轩又从罗钦顺"理一分殊"说得到启发，认识到程朱和张载分天地(程颐提天命)气质之性的错误。他说：

……张子谓天地之性，是以理言。故程子曰："性即理也"；盖本然之性，天命之所在也。有以气禀言者，人有生之

初，禀阴阳之气，有清浊厚薄纯驳偏正之不同，人之所禀受，偶然各异如此也。……是张程二子所谓气质之性也是，其所禀万殊也。盖性字从心从生，故以生质言者，便性字之正训，是性之本义。以性为理者，言其本然而已，非性字之正训也。罗整庵以理一分殊说性，而不分天地气质，虽与先正之说稍异，可谓有所发明也。盖本然者理一也，天下之人所禀受皆一也。气质者分殊也，众人所禀各不同。罗氏此说后出者，可谓巧也，天下之事，以渐开者，此类也。（《慎思录》卷6，转引自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第216—217页）

又说：

罗整庵立理一分殊说，是简要之言，不要分析而发明性字。愚谓性者一而已矣，不可分天地气质之性为二。其理一者，言性之本然，其理一也；同是一也，性之杂糅，其分殊也，人皆可以为尧舜。其分殊者，禀二气之生质各殊也。……气质者性之本义，以所受天而言之。天地之性亦是所禀受之本然，非有二性；然立二名者，恐嫌有二性，不如以理一分殊说之，易简而无疑也。盖本然者，则是气质之本然也，气质亦是天之所命，非有二性。譬诸水，其流动盈溢且滋润者，水之质也；其清者，水之本然也，其质与清者，非有二也。（《慎思录》卷6，转引自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第217页）

从上述两段引文看，贝原益轩以罗钦顺的“理一分殊”理论分析了张载程颐的人性论。正如不同意把理气截然分之为二一样，贝原益轩在人性上也反对人有二性之说。罗钦顺在人性问题上，虽不反对程颐、张载分天命气质之性，却不赞同他们说天命之性纯粹至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把天命气质“对言”之，即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天命气质不是对立的，只是“一性而两名”。“且夫命之性，固已就气质而言之矣。曰气质之性，非天命之谓乎！”

(《困知记》,第7页)用"理一分殊"来考察"自不须立天命气质之两名"(《困知记》,第9页)。贝原益轩正是受到罗钦顺这种从对立统一观点把握人性论的思想影响,故得出结论说:"盖本然者理一也,天下之人所禀受皆一也。气质者分殊也,众人所禀各不同。"罗钦顺以"理一分殊"论人性见之《困知记》卷上:"窃以性命之妙,无出理一分殊四字,简而尽,约而无所不通,初不假牵合安排,自确乎其不可易也。盖人物之生,受气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后,其分则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为性命之妙也。语其一,故人皆可以为尧舜,语其殊,故上智与下愚不移。"(《困知记》,第7页)又以水为喻说,"盖以就下之与在山,清之与浊,同一物也。"(《困知记》,第20页)贝原益轩认为罗钦顺的观点,"虽与先正之说稍异,可谓有所发明"。认为阐发了自己独立的创见,字里行间,充满服膺和钦慕感情。

罗钦顺独立的创见在于他改造了"理一分殊"说,并把它用于分析人性。为什么说罗钦顺对"理一分殊"做过改造呢?"理一分殊"本出于佛教华严宗的"理事说"。理学家吸取之后,提出"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二程集·遗书卷二上》)。朱熹借用"月印万川"解释"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朱子语类》卷18)。程朱观点虽然也含有个别与一般辩证思想,但他的"理一分殊"是用以说明"理"的最高存在,是具体事物的根据。通过具体事物"分殊",证明最高存在的"理一"。

罗钦顺用"气上认理"观点重新解释"理一分殊"说。"盖人物之生,受气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后,其分则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人,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为性命之妙也。"这就说明,罗钦顺的"理一",不是独立于具体事物之上的绝对存

在的精神实体。人和万物都禀受物质性的气而生，就这点说，理是一气变化之理，“其理惟一”，故“理一”。而成形之后，每一事物存在形式、特性等各方面均不同，此则“分殊”。在此，无论“理一”还是“分殊”，均未离气。又说“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中。”肯定一般规律在具体事物之中。正是用上述观点，分析天地气质之性，得出与张载、程颐相反的人性无二的结论。

从上述可以看到，贝原益轩从理气世界观到人性论上都受到罗钦顺《困知记》的影响。这样就使他变成较彻底的元气实体论者，从而使他的医学、树艺、制造和博物学等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作为研究我国明代元气实体论对日本实学的影响，有一个问题很值得重视，这就是安东守约、贝原益轩的转变都是接受了罗钦顺的影响而完成的，这与日本另一学者林罗山(1583—1657)不同。林罗山虽为朱子学派，但却是从接受王阳明的“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王文公全书·答陆原静书》)而来。王阳明讲理气问题不多，在这里他认为“理”只是气的条理，并非比气更根本。他认为“心”才是根本。林罗山却从王阳明的论述得出理气不二观点。思想渊源不同，这大概是安东守约、贝原益轩能成为唯物论者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林罗山则最终未能摆脱朱子学派的唯心论。

## 第二节　吴廷翰的实学对伊藤仁斋、中江岷山、山片蟠桃的影响

吴廷翰是我国明代晚于罗钦顺的元气实体论者。他以元气实体论为理论基础，提倡实理真知之实学，对日本古学派堀川学

派产生过重大影响。100余年以后又影响了日本著名学者山片蟠桃的思想。

## 一、吴廷翰及其实学思想

吴廷翰(1491—1559),字崧伯,号苏原,安徽无为县人。明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历官至山西参议,因得罪权贵,于明嘉靖十四年(1533)致仕归里,埋头著述至终。著有《吉斋漫录》、《丛言》、《棲记》、《瓮记》及《湖山小稿》、《苏原诗文集》、《洞云清响》、《志略考》(佚)等,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吴廷翰集》。

吴廷翰一生大致可分三个阶段,考中进士以前是从学时期,这时得力于外祖父张伦(1440—1506)之教导。张伦是一位"孤介绝俗,性复峭直","诸子百家靡不殚究"又"不为举子业"(《吴廷翰集》,第293—294页)终身布衣之寒士。常以天下为念,思有益于世。著有《林泉随笔》,今存。29岁以后至44岁出仕时期。吴廷翰先后任过户部主事,主管浙江漕运,吏部文选郎、广东佥事兼岭南学政、浙江参议、山西参议。在出仕12年期间,改革弊政和施行许多惠民措举,涉及漕运、税收、驿递、赈济、兵卫制度,"监兑时,有请复囊运及兑船下坝之疏;监督时,有请正税例及平正故兑收放则例之文;分守时,有请驿递夫应榜文;如广如浙如山西,则各有乡社义仓等条约及赈济等处置方略;广东有禁止采珠之议,梧州有立卫之议。"(《吴廷翰行实》,《古籍研究》(安徽)1988年第1期)又恤抚孤老,提携后进。由于吴廷翰为官"亢直"、"廉谨",拒绝请托和贿赂,又弹治时贵,往往与权要杵,如"在山西,则坚持取盐银赈济,犯巡盐怒";"署提学,则不私乡宦之子弟;审刑狱,则平反访察充军之冤枉;守巡二道,则以去贪残、黜庸鄙为己任,不少姑息,则犯嘱者之怒。"(《吴廷翰行实》)无法继续下去,只好辞官归隐,埋头著述。在吴廷翰出仕和归隐期间,罗钦顺(1465—1547)完成并刊刻了《困知记》,王廷相

(1474—1544)完成了《慎言》(1527)、《雅述》(1538),特别是王廷相的著作对吴廷翰有较大影响。

吴廷翰的实学,除了体现在他出仕期间一些实政上外,最突出的是在日本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实理真知论。

吴廷翰继承和阐发的主要是王廷相的实学思想。在世界观、认识论和人性论方面都具有独到的精辟的见解。他的实学理论,可概括为实理真知论。

在世界方面,吴廷翰提出"理即气之条理"这一命题,表达了他对理气关系的基本观点。肯定气是根本,不承认离开气而有理,气是实在的,离气言理是虚理,不离气的理才是实理。他说:

> 天地之间,一气而已矣,非有所谓道者别为一物,以并出其间也。气之混沦,为天地万物之祖,至尊而无上,至极而无以加,则谓之太极。(《吴廷翰集》,第1页)

上段引文首先论述什么是气,从何而来,以何种形式存在。他认为气是天地万物之祖,即一切存在的本根。他曾说"盖上天之事,只是气","盖此气出于天赋"(《吴廷翰集》,第8页)。所谓"天赋",指自然界本来就存在的。他所说的天是自然的天,"积气"的天(《吴廷翰集》,第178页)。气自己就是始初者,没有任何别的什么产生它。又指出气是有质的实在。"气未成质,不过阴阳二者","其曰水、火、金、木,则皆已成质之名"(《吴廷翰集》,第9页),所以"阴阳真实无妄"(《吴廷翰集》,第12页),即气是实有、存在。这种实有的气又以运动变化形式存在,"阴阳者,此气之有动静而言。"(《吴廷翰集》,第5页)这样,吴廷翰就回答了气的根本性、实在性和运动变化的属性,从而为论证离气无理建立了基础。

在理气关系上,他的基本论点是:

> 理即气之条理,用即气之妙用。(《吴廷翰集》,第8页)

阴阳即道，盖指气得其理而言。（《吴廷翰集》，第17页）

理也者，气得其理之名。（《吴廷翰集》，第5页）

上引可见，吴廷翰以名实、体用关系论证理气关系。名不离实而存在，用不离体而有，气是实，是体，理是名，是用，前者是根本，后者是作用、表现。针对程朱理学的"超然一物立于天地之先"的虚幻之理，提出"物上见得理，才方是实"（《吴廷翰集》，第34、45页）。这就是说，吴廷翰所说"理"是气上之实理。

在认识论方面，吴廷翰首先肯定认识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指出"物上见得理，才方是实"，认识要"验之以物得之于心，乃为真知"（《吴廷翰集》，第45页）。又指出，张载之德性之知，"必实以闻见，乃为真知"（《吴廷翰集》，第60页）。肯定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基础。在知行关系上，批判了程朱的"先知后行"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既承认知与行是两项工夫，各有作用，又肯定"知行常在一处"知行不离，就是"知至行即次之"（《吴廷翰集》，第54页）。

在人性论方面，吴廷翰主张人性即气、即生，说"生者，人之性也。性者，人之所生也。盖人之有生，一气而已"（《吴廷翰集》，第27页）。与程朱把性说成理相反，这里肯定性即气，不承认有先天的性，"性之名生于人之有生"（《吴廷翰集》，第28页）。在理欲问题上，吴廷翰不承认二者对立，认为"人欲之本，即是天理"，"天理之中，即是人欲"（《吴廷翰集》，第32页）。

总之，从吴廷翰一生来看，他为官亢直清廉，改革弊政，济民正俗，所为皆实政。他的思想，不受理学和心学束缚，摆脱虚寂空幻之谈，继承中国元气实体论传统特别是王廷相的学说，阐发的是气的实在性和客观性，强调"物上见得才方是实"。他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是实理真知论，对日本的实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 二、对伊藤仁斋的影响

伊藤仁斋是日本德川时代著名唯物论学者和教育家，古学派堀川学派的创始人，吴廷翰的著作曾是他借以创立自己学派的思想渊源。

伊藤仁斋(1627—1705。日本宽永四年——宝永二年)，名维桢、诚修，字助源，号仁斋、古义堂。他青少年时代宗信程朱理学，受朱熹与其师李侗的《延平答问》影响较深，著《心学原论》、《太极论》、《性善论》等，阐发程朱理学。“及年三十七八，始出己见”(〔日〕原念斋：《先哲丛谈》)，即由一名程朱信徒转变为元气唯物论者，其转变的契机得力于吴廷翰著作。转变后的代表著作有：《语孟字义》、《童子问》、《论语古义》、《孟子古义》、《中庸发挥》、《大学定本》以及《古学先生诗文集》等。

由于伊藤仁斋在他的著作中并未明言受过吴廷翰的影响，致使后来的日本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古学派萱园学派传人山县周南(1687—1752)在其《书〈吉斋漫录〉后言》中持怀疑态度：“或有言者，仁斋先生倡学，本有帐中之书，诸弟子辈不得与见，曰《吉斋漫录》，曰《瓮记》、曰《楱记》。余甚不信，……夫述不作，君子之道，仁斋何有窃珠还楱之陋。”伊藤仁斋的弟子林景范也持同样看法：“先师古学先生，不由师传，深造于邹鲁之阃奥也。”(井上哲次郎：《日本古学派之哲学》，第207页)然而，日本还有许多学者与山县周南、林景范的看法不同。荻山徂徕的高足太宰春台(1680—1734)在《圣学答问》中说：“明末吴廷翰者著《吉斋漫录》、《瓮记》、《楱记》等书，辟程朱之道，豪杰也。闻日本伊藤仁斋读吴廷翰书而开悟。”山县周南、太宰春台均属萱园学派，此学派与堀川学派本有门户之见，二人一说伊藤仁斋未有“窃珠还楱之陋”，一则说是读吴廷翰书而“开悟”。可见，肯定与否定均与门户之争无直接关系。

日本还有许多学者与太宰春台有同样看法。三浦兴卫在《原学编》中说："近来有伊藤仁斋者，实海内之英杰也；不啻海内，天下之英杰也。而其有所见于古，盛非居敬穷理之学，可谓壮也。然余疑之，其起见也，必萌蘖于吴氏，而其放论与同者不为不多"。然而，伊藤仁斋本人为何未有一言及吴廷翰呢？三浦认为，仁斋"操气之锐，自负山斗之望，而称引古人为耻"，"而以独立大言自出为愉快"。这显然是揣测。然此种揣测也是比较了吴廷翰与伊藤仁斋许多观点相同之后得出"萌蘖于吴氏"结论的。那波活所在《学问源流》中说："仁斋父子之学，本诸明之吴廷翰的观点，……《吉斋漫录》上下卷，其见解为仁斋、东涯之学术渊源。"尾藤二洲在《正学指掌》中，多田义俊在《秋斋闲话》中，均作了同样的肯定。（以上均见井上哲次郎：《日本古学派之哲学》，第197—213页《学统》一节。又见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和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9—31页）太田锦城（1765—1825）在其名著《九经考》（卷1）中说："我邦唱古学者，以伊藤仁斋先生为祖师矣。先生负英迈之资，抱卓绝之智，于天下滔滔沦胥濂洛之中，撑起麾之，海内靡风，关左唱古学者，其兴起于先生之风，而先生为之嚆矢也。且其行义确苦不耻古之贤士。朱舜水称言学问文章贵国之翘楚，盖非虚称也。唯其学半出吴廷翰《吉斋漫录》。"太田锦城肯定仁斋作为古学派创始人的学问渊博，品行高尚，又为关左荻生徂徕萱园学派创立之"嚆矢"。对其学术思想渊源，说半出于吴廷翰，较为公正，这既承认了吴廷翰之学是其思想渊源，又肯定伊藤仁斋在创立古学中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日本近代学者井上哲次郎认为，伊藤仁斋确是受到吴廷翰思想启发，他把二人理论观点作了比较，指出五点：其一，《吉斋漫录》中开头就用"天地之初，一元气而已矣"来解释世界，仁斋也是如此。在主张气一元论，反对理气二元论上，二人完全相同。

其二，吴廷翰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又说“太极一也，在天为阴阳，在人为仁义”。仁斋也以仁义为道，说“道者何？仁义是也”。其三，吴廷翰说“道者，此气之为天地人物所由于出而言也，非有二者也，然又以其变易则谓之易，生生谓易是也。”仁斋也认为生生不已为天地之道。其四，吴廷翰说，“理也者，气得其理之名”，“非气之外别有理也”。仁斋也主“非有理而后生斯气，所谓理者反是气中之条理而已。二人均反对朱熹的“理先气后”说。其五，吴廷翰说，“夫论道之书，以《易》为宗，而言以孔子为准，反而求以吾心自信者为实”。仁斋也排宋儒，倡古学，吴实为仁斋之先驱。(见《日本古学派之哲学》，富山房大正十三年版，第202—207页)井上哲次郎从理论比较来说他们之间渊源关系。比从“听闻”而来，比疑之推断而更有说服力。日本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永田广志(1904—1947)说，日本的儒学在认识论上，无论朱子学派还是阳明学派都没有什么创造性的见解。独“仁斋学在这一点上尽管有几分值得注意的东西，那正如一部分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是从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吴廷翰那里贩卖来的，它同后者的学说是类似的。”(《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6页)永田广志在此虽转述的是“一部分批评家所说”，但他也偏于同意说伊藤仁斋学说渊源于吴廷翰的。永田广志把吴廷翰和伊藤仁斋说成同时代人，这是沿袭他的前人如太宰春台等之误。其实，时间上，二人相差百年之久，并非同时代人，吴廷翰非明末人。又太宰春台说吴廷翰“辟程朱之道”，三浦瓶山说“盛排居敬穷理之学”，也不全面，吴廷翰不仅批判程朱理学，还更多更严厉地批判了王阳明心学。

我国学者朱谦之(1899—1972)教授也认为，日本“古学派创始者伊藤仁斋接受了明代吴苏原的影响”(《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65页)。在另一本著作《日本的古学及阳明

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中说:"《吉斋漫录》即曾给伊藤仁斋的唯物主义思想以绝大的影响"。在该书中,朱谦之先生并引述了二人理论对照,论证有力。还有可印证的是,日人原念斋在《先哲丛谈》中说,伊藤仁斋原宗信程朱理学,年到三十七八始出己见。这与仁斋在《读予旧稿》中所记相同。他自述:"予自十六七岁,深好宋儒之学,尊信《近思录》、《性理大全》等。"发挥程朱观点的《太极论》、《性善论》、《心学原论》等,都是在三十岁前后所著。"其后三十七八岁,始觉明镜止水之旨非是,渐渐类推,要之实理,衅隙百出,而及读《语》、《孟》二书,明白端的,殆若逢旧相识矣。心中欢喜,不可言喻,顾视旧学,若将误一生。"(《伊藤仁斋·伊藤东涯》,岩波书店 1980 年版,第 294—295 页)。这是伊藤仁斋自述"学问次第"变化过程。这里说的"明镜止水之旨",指朱熹的"读书法",朱熹说:"心不定故见理不得,今且要读书须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镜,暗镜如何照物。"(《朱子语类》卷11)否定朱熹的读书法,表明他从程朱理学转而要出己见了。他在三十七八岁时,吴廷翰的《苏原全集》已刊刻行世六七十年之久了。在此期间,它流传到了日本是可能的,现在保存日本的《苏原全集》,系明万历年间刻本,说明伊藤仁斋出生前吴廷翰著作在日本已有流传。

还必须说明的是,伊藤仁斋固因吸取了吴廷翰思想从程朱信徒转而创立具有鲜明的实学特点的古学堀川学派,然不可否认,他在吴廷翰的思想基础上对气一元论又有自己的发展。他提出"天地一大活物"论。说:"天地生生化之妙,盖圣人以天地为活物"。天地所以为一大活物,"以其有一元气也,一元之气,犹人有元阳也。若元阳一绝,忽为异物,为木石无异。唯天地一大活物,生物而不生于物,悠久无穷,不比人物之有生死也。""既无所生,亦无所不生,万古独立"(《童子问》)。又提出宇宙时间上无终始

空间无穷尽论，批判“开辟说”。“知六合之无穷，则知古今之无穷。今日之天地，即万古之天地，万古之天地，即今日之天地。何有终始，何有开辟。”(《语孟字义·天道》)

伊藤仁斋接受和发展元气实体论，创立古学堀川学派，在朱子学以外立了新学说，为日本哲学界注入新的活水，也改变了德川时代旧哲学界格局，这是吴廷翰实学在日本的发展和所结之硕果。

### 三、对中江岷山的影响

中江岷山是堀川学派主要传人之一，他不讳避承认公开接受吴廷翰的理论，还以吴廷翰之理论作武器，捍卫师说。从中江岷山接受吴廷翰理论看，堀川学派与吴廷翰思想渊源是深远的。

中江岷山(1655—1726；日本明历元年—享保十一年)，名一贯，字平八，岷山其号。伊贺人。在伊藤仁斋门下四十年。日宝永初年在大阪讲学，著有《理气辨论》二卷，《四书辨论》12卷，批驳朱子学派的攻击，捍卫其师说，成为伊藤仁斋学派重要传人。

伊藤仁斋之后，海南朱子学派浅见絅斋(1652—1722)和三宅尚斋(1662—1741)等人强调朱熹名分论和理本论。据东耕子藏在《先哲丛谈后编》中说，“岷山平生以唱古学，研钻往圣，发挥仁斋成说为己任，攻击宋学，与浅见絅斋、三宅尚斋辈门户相挤，强敌以视，相互纷呶。尝著《理气辨论》2卷，《四书辨论》12卷，疏其所见，辨析痛快，诋谤驳议，不少假借，自是而后，显著于世。”浅见著有《圣学图讲义》等，三宅著有《狼疐录》等。贬抑元气实体论，宣扬理一元论。如尚斋说：“天地之间，只是一气流行而已，其间清明升动者为阳，其昏浊下静者为阴，就二气上复分之为木火金水，宇宙间二气五行外，更无别物。”但在气之上之前还有一个“理”，气由理而生，气有聚散，其聚散率循于理，理无聚散而永存不泯。所以“理无声色，以气为体，故气是理之形体，理是气之无

体也。”(转引自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第284页)理是一切之本体,气是理之外形。浅见则把朱熹理本论说成万古不变之真理。

为捍卫师说,中江岷山引述《吉斋漫录》四则言论为理论武器。

其一:“吴苏原曰:何谓道?‘一阴一阳之谓道’。何谓气?一阴一阳之谓气。然则阴阳何物乎?曰气。然则何以谓道?曰气即道,道即气。天地之初,一气而已矣,非有所谓道者别为一物,以并出乎其间也。气之混沦,为天地万物之祖,至尊而无上,至极而无以加,则谓之太极。及其分也,谓之阴阳,阴阳既分,万化由此出,故谓之道,非有二也。”

其二:“然则何以有理气之别?曰:理也者,气得其理之名,亦犹变易之谓易,不测之谓神之类,非气之外别有理也。先儒以阴阳为气,以道为理,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之义而他求之过也。”

其三:“气之为理,殊无可疑。盖一气之始,混沌而已。无气之名,又安有理之名乎?及其分为两仪,为四象、为五行、四时、人物、男女、古今以至于万变万化,秩序井然,各有条理,所谓脉络分明是已。此气之所以又名理也。”

其四:“朱子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有此理’;又曰:‘当初元无一物,只是有此理’;《太极解》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亦是此意。盖‘上天之载’指理。而‘造化’、‘品汇’指气也。《老子》‘道生天地’之说,意亦若此。此愚所以断然敢以理气为一物,而‘一阴一阳之谓道’,不必添注而自明也。不然,则夫子论不若老子之直截矣。”

中江岷山在摘引吴廷翰上述言论后指出,这“与圣人论天人之旨相合”。

吴廷翰上述四则论述,突出地阐述了气为世界万物之实体

的思想。中江岷山引之以批驳浅见絅斋、三宅尚斋等分理气为二和理为气本的思想。中江岷山说：

> 故天地之道，宇宙之间，惟一元气而已。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四时行，百物生，是天道之全体也，故人物之生亦惟一元气而已矣，此上所谓理者本无之矣。
>
> 宇宙之间，根源惟一元气而已矣。天地本一元气而成，万物皆一元气而生。（《理气辨论》，转引自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第117页）

可以看出，在论述宇宙本原上，中江岷山发挥的也完全是吴廷翰上引四则的观点。他在批判分理气为二和理为气本的观点甚为精辟。

> 分理分气，则自不能不为二；已分为二，则自有先后，有缝隙；故此后复理一分殊之说兴焉。
>
> 宋儒虽曰理气无先后，然亦分明把作二物，奚得无先后缝隙乎哉？（《理气辨论》，转引自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第117页）

中江岷山对分理气为二和理先气后说的批判是很有力的。其理论根据也来源于吴廷翰的“气即道，道即气”和对“理气为二物”的批判。倘若说，伊藤仁斋在提出“天地一大活物”发展吴廷翰气一元论作出了贡献，那末，中江岷山在反对分理气为二，捍卫吴廷翰的元气实体论也是很突出的，他们师生二人各有独到之处．这是应予肯定的。

**四、对山片蟠桃的影响**

山片蟠桃（1746—1821；日本延享3年—文政4年）日本德川时代末期实学家。本姓长谷川，名芳秀，字子兰。称升屋小右卫门。大阪人，幼好学，受业于中井竹山，还从麻田刚立学天文。又接受荷兰传来的西方学术，有启蒙思想。山片蟠桃既是大学

者，又是大商人。晚年用19年(1802—1820)时间完成巨著《梦之代》12卷，其中包括天文、地理、神代、历代、制度、经济、经论、杂书、异端、无鬼、杂论等实学理论。

吴廷翰著作，对山片蟠桃的实学思想也发生过影响。这从其著作《梦之代》第十、十一卷《无鬼》中可以证明。《无鬼》一书是德川时代无神论思想的代表作。它对于当时关于鬼神、幽灵、狐怪、卜筮之类迷信，均列举前人论述和事实加以驳斥。它附录一歌，表达了山片蟠桃鲜明的无神论思想："无地狱，无极乐，无我，所有者只是人和万物"；"在世间，没有神、佛、化物，也没有奇妙不可思议的事。"在《无鬼》上卷中，引述儒家经籍《论语》以及其他书籍从理论上驳有神论。其中还引述吴廷翰《椟记》中发挥自己的无神论思想。吴廷翰在《河图、洛书》一则中说："《河图》、《洛书》之说，纷纷不同。龙马神龟，固不足信，而授羲锡禹，方圆、九十，亦未足凭。大抵只以《易》孔子之言为准耳。'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孔子之言。观此，则《图》、《书》皆出伏羲之世无疑。但孔子未尝言马龟，亦未尝分九十、方圆，后人何从而知之？"(《吴廷翰集》，第132页)"皆后人附《易》而作者"(《吴廷翰集》，第129页)。山片蟠桃在引述吴廷翰上一段议论后说，"此一言可以挫折和、汉古书虚妄之说。"(《无鬼》，《日本哲学思想全书·唯物论篇》，平凡社昭和31年版)认为此论可以破除日本和中国古书上宣扬虚妄不经之谈。山片蟠桃是在伊藤仁斋之后100多年著《无鬼》的，吴廷翰著作一直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仍在日本发生影响，成为山片蟠桃这样著名日本学者阐发实学思想的理论依据，这一确实无误的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吴廷翰的实学思想在日本影响之深远。

在论述吴廷翰的实学对伊藤仁斋、中江岷山和山片蟠桃的影响之后，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许多学者读过《吉斋漫录》，然是否为他们学术思想渊源之一或立论之依据，可以进一步探讨，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过其影响是可以肯定的。如三浦瓶山

在《吉斋漫录》之后写道:"《漫录》所谓,凿凿乎有据,至破程朱之偏颇,脱然非陆王二家之所企及也。"山县周南在《书〈吉斋漫录〉后言》:"既而得见《漫录》,其言凿凿有味,所谓理气性命,宋学谬误,举既发挥,实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转引自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和阳明学》,第29—30页)三浦和山县均非崛川学派,读了《吉斋漫录》之后,一个说"凿凿乎有据",认为所论非徒空虚之谈,赞赏其辟程朱、陆王之偏颇无愧实理实学。另一个则说,"其言凿凿有味",既符合自己口味,引起思想共鸣,就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山县有论心形关系:"形有长短则心随之长短;形病则心亦病;形尽则心亦尽;离气血无所谓心,心者血气之精灵也"(《日本哲学·德川时代之部》,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2页)。这里说的"心"实指精神,形则为形体。即认为形体决定精神,精神由形体而来,形体是本。显然是唯物论观点。这一观点虽未说明来源于《吉斋漫录》,但却十分接近。《吉斋漫录》说:"人之初生,得气以为生之本,纯粹精一,其名曰性,性为之本,而外焉为形,内焉为心,皆从此生。是形与心皆从性生。但心之得气为先,其虚灵知觉,又性之所以神明,……"(《吴廷翰集》,第23页)"夫天地生人,一气而已。……气以成性,而内焉则为人之心,外焉则为人之体。体者气之充,而心者气之灵,岂有二乎哉?"(《吴廷翰集》,第39页)。

总之,罗钦顺、吴廷翰的元气实体论为安东守约、贝原益轩、伊藤仁斋、中江岷山、山片蟠桃等吸取后,他们在日本倡导唯物论和无神论,后来明治维新时期推动社会改革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西周、中江兆民等人的观点与之一脉相承。罗钦顺、吴廷翰的实学通过贝原益轩、伊藤仁斋等又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今日,我们应把罗钦顺、吴廷翰、伊藤仁斋、中江岷山、山片蟠桃等人的实学思想视为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 第四十三章　明清实测之学对日本实学的影响

在明清实学思潮中，实测之学即科学实学占有重要地位。它东传到日本后，对于日本实学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启迪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日实学思想的历史联系。我们在这里仅就李时珍、方以智的实测之学对日本实学的影响，作一扼要说明。

## 第一节　《本草纲目》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本草纲目》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实测实学家李时珍的医学名著。

李时珍(1518—1593)，湖北蕲春人。出身世医，父亲是个很懂药物学的医生。在这样的家庭文化背景下，使他从小就立志于医学，与本草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草纲目》是李时珍一生从事药物学实践的结晶。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对花草格外留心，常常跑到父亲栽种的花盆旁，耐心地观察花木的抽条、吐芽、开花，有时还跟随父亲到附近的山里去采药草。等他长大成人后，开始阅读大量的本草书，其中包括汉朝人编写的《本草》以及晋朝、唐朝、宋朝人增修的各种《本草》书目。凡是能找到的他都找来如饥

似渴地精读。后又在长期的行医实践中增加了许多实际知识，从中发现许多药物是古书上不曾记载的，也有许多记载有明显的错误，于是他在实践的基础上萌生了撰写一部新《本草》的念头。为实现这一理想，他曾应聘楚王府，又转太医院，结果他想靠官府的力量重修《本草》的愿望破灭了，他只好回到家乡从医。他在家乡行医实践中，以科学的实测精神为指导，更加留心一切和《本草》有关的材料，随时都把它们记录下来。翻过千重山，行过万里路，书考八百余家，访问了成千上万的有医学经验的人，做了不知多少次的科学实验。在经过近 30 年的不断实验和实践，终于写出了旷古未有的本草学巨著——《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全书 52 卷，约 190 万字，载药 1892 种，其中新增药物 374 种，附图 1109 幅，附方 11096 首，列 16 部为纲，分 60 类为目，纲目详明，体例严谨，医药兼备，重点突出。这部书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格物穷理"的实践精神，在对所有的药物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集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和前人的经验，全面地总结了 16 世纪以前我国本草学的成就而成。它是明清实学思潮在医学上的必然产物，充分反映了重实践，重实测的科学精神。

《本草纲目》问世后，不久就传入了日本，并在日本流传 400 多年。在这 400 多年中，日本实学家把《本草纲目》当作希世珍宝，多次将它翻刻、注释，并进行广泛宣传。他们还根据日本本草学的特点，移植《本草纲目》，并创造了符合日本国情的本草学药书。

《本草纲目》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一、传播时期；二、分派鼎盛期；三、全面展开兴盛期。

**一、传播时期**

《本草纲目》于 1596 年在金陵（南京）首次出版后不久，日本

即于庆长十二年(1609)经商埠长崎传入日本。日本官方朱子学的始祖林罗山(名道春)在长崎得到《本草纲目》后,将它献于幕府首脑德川家康(1542—1612)。家康得此书后非常珍视,常将它置幕府座右备查,致使日本人皆称之为"神君御前本"。这是《本草纲目》传入日本之始。此后,江西夏刻本、杭州钱刻本以及其它各种版本也陆续传入日本各地。直到今天,在日本的各地图书馆以及私人藏书家中还收藏有明清刻本的《本草纲目》。

为了方便日本人阅读和研究《本草纲目》,日本名医曲直濑玄朔(号东井,1549—1631)在1608年撰写出版了《药性能毒》,稍后,林罗山于1612年也撰写了《多识篇》,并于1630年在京都出版。这是日本学者研究《本草纲目》的早期著作。《本草纲目》金陵本东传日本后,野田弥次右卫门于1637年又翻刻了江西夏刻本《本草纲目》。尔后的80年间,共出版和刻的校订、点校《本草纲目》达8种之多,其中有著名本草学家松下见林(号秀山,1637—1703)的《重订本草纲目》(1669年刊);贝原笃信(号益轩1630—1714)的《校正本草纲目》(京都,1672年)等。

《本草纲目》在日本的传播期,取得的最大科学成果是贝原益轩的《大和本草》16卷(1709年刊行)。此书是日本中草药学和植物学的奠基之作。它把天然物1362种(包括日产358种)分为水、火、金、玉、土、石、谷、造酿、疏菜、药、民用、果木、药术、河鱼、海鱼、水虫、陆虫、水鸟、山鸟等37类,这种分类和《本草纲目》的分类相比虽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它比《本草纲目》更富有实用的价值。在内容上也不是局限在《纲目》的单纯解释上,而是根据益轩自己的实地调查和经验,依据《纲目》描绘了日本本草学的特色,反映了日本本草学的逐步自立的趋势。从《大和本草诸品图》附图,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点。《诸品图》二卷(1715年刊)将动植物331种,用白笔描绘,比较简略,比金陵本的附图更具有实

践性和实用性。

益轩的《大和本草》的实学特征是与当时日本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益轩学术活动的德川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町人势力开始迅猛兴起，町人意识也明显形成。町人意识的形成给日本的传统思想文化带来了冲击，其显著表现是在思想领域里出现了古学派及阳明学派，与官方朱子学相抗衡。就是朱子学内部，也产生了从盲目崇拜朱子学到开始怀疑甚至批判朱子学的趋向。益轩就是在这种历史文化条件下，从崇信朱子学开始怀疑朱子学，再到批判朱子学，最终倾心于张载和李时珍等人的思想而走上了气一元论的实学之路。

## 二、分派鼎盛时期

《本草纲目》东传日本以后，经过八十年的传播期，出现了本草学各派互相争鸣的鼎盛局面。主要形成了京都、江户两大学派，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本草学专家，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本草学专著也相继问世。

### （一）京都学派

京都学派的创始人是稻生若水（1655—1715）。稻生若水倾注毕生的心血从事《本草纲目》研究，并以它为教材教育学生。他的博物学巨著《庶物类纂》也是以《本草纲目》为重要参考书而撰成的。书中摘录了中国古代直到清代的广泛的本草书、农书，地方志、随笔、文集等中国典籍，从而为他的本草学研究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庶物类纂》原计划是1000卷，但因若水早年夭折而只写出362卷。后来，由若水的门人丹羽正伯（1691—1756）继承其业，完成了共1054卷的巨著《庶物类纂》。但是，由于卷数浩瀚而未能得到刊行，秘藏于官库里，几乎无人问津。然而，在《类纂》继修过程中，在幕府的支持下，进行了全国性的物产调查，拟定了《诸国产物帐》。

若水是拜福山德顺为师学习本草学的。德顺是长崎的医学家卢草硕的门人。草硕的祖父卢君玉是中国明朝福建人。他于庆长十二年(1612)赴日本,并定居于长崎。可见,京都学派的学统是通过中国人草硕、德顺与中国本草学联系的。

若水于元禄六年(1693)在加贺藩作为儒家代表人物,被允许住居京都,在京都开塾培养了众多的本草学门徒。

若水还在校刻中国《救荒本草》的基础上,自著《用药须知》一书,凡九卷(1726、1759 年刊),大大推进了药物学的研究。他还出版了《樱品》、《梅品》、《兰品》、《竹品》、《果品》、《菜品》等多种通俗易懂的单科植物书籍。

若水的第一门人松冈恕庵(1668—1746),将若水的名产学又向前推进一步,迎来了日本本草学全面展开的局面。但是他的研究和若水一样,局限在文献考证上,尚未超出中国本草学传入阶段水平。尽管如此,在他门下还涌现出了如津岛如兰(1701—1754),小野兰山和江村如玉等著名本草学家。

京都本草学派,可以说是日本本草学研究的正统学派。他们几乎未受西方兰学的影响,关起门来专门研究中国文献,比较日本自然物和中国文献等等。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对中国本草学几乎未进行任何批判,甚至还带有把本草学绝对化的倾向。但是,历来自主性很强的日本民族,以《本草纲目》的实学精神为镜子仿照《本草纲目》的方法,对日本本国自然物进行调查,采集和实验,从中积累了丰富的日本本草学知识,其中典型人物就是小野兰山(1729—1810)。兰山是日本正统派权威主义的本草学的象征。

兰山的突出成绩有两个方面:第一,他开塾近 50 年,培养了众多的门徒,兰山除给门人讲授《尔雅》、《本草纲目》、《救荒本草》、《秘传花镜》等中国典籍外,还讲授益轩的《大和本草》、香月

牛山的《卷怀食镜》、江村如圭的《诗经名物辨解》等日本本草学，其门人达一千余人。第二，他出版了很多书，如：《花汇》8卷（合著）、《校正救荒本草》、《常野采药记》、《甲骏豆相采药记》、《纪州采药记》、《骏州、势州、志州采药记》、《上州武州采药记》、《本草纲目启蒙》48卷（1803—1806年刊）。其中《本草纲目启蒙》是他的代表著作。日本学者北村四郎评道："《启蒙》对植物记载非常详细，并且很好地抓着了植物的特征，因而，可以说名物同定的能力，赶上了李时珍，甚至超过了李时珍。"（《明清科学技术史》日文版，第192页），这本书反映了兰山卓越的科研能力和实学精神，也反映了他在日本物产调查方面的丰硕成果。

兰山去世后，其学统由其子孙和门人所继承。兰山的孙子蕙敏，除在"医学馆"里讲授本草，还编了《本草启蒙名疏》7卷，《救荒本草启蒙》四册，《救荒野谱启蒙》一册等，继承和发展了兰山的本草学说。蕙敏去世后，其长子和三子继承父业，尤其是三子职懋在医学馆从事工作，明治维新后，在文部省博物局与田中芳男一起对博物学启蒙研究发挥了主要作用，致使在明治维新初期为止兰山学统显示出了自己的生命力。但是在幕末的"医学馆"，兰山的本草学研究并未得到真正充分的发展，甚至还出现了非难兰山学说的人。

同时，兰山门人在京都以"物产会"为据点，开展了兰山在世时不曾见到的开放性本草学研究，其代表人物是山本亡羊（1778—1859）。山本亡羊主持的"读书室物产会"从1808年到1863年的55年间，先后召开了48次"物产会"。

兰山逝世后，他的门人逐渐分化：一是向本草学的药物学方向发展；二是向忠于兰山的博物学方向发展；三是向竞相收集珍品、名品的华贵方向发展。山本亡羊则代表了忠实于兰山的博物学方向。他吸收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中的合理因素，编著《格知

类编》125 卷，后又增加 2 卷。《格知类编》是对 5216 种动、植、矿物通过查找汉籍，找出它的正名、产地、形状、由来、性质、用途等方法编纂而成的本草书。他还编纂了《百品考》(1838—1853 年刊)。《百品考》记述了亡羊对 295 种动、植、矿物的新考证，其内容完全是属于博物学性质的。

亡羊去世后，他的儿子继承父业，在“读书室”继续讲授本草学。“读书室”的学术活动一直持续到明治中期，亡羊著作里没有图谱，其子六男章夫留下了《本草写生图谱》9 集(1888 年刊)。

(二)江户本草学派

针对所谓正统的京都本草学派，作为在野学派，在江户出现了江户本草学派。江户本草学派起源于日本享保期(1716—1735)，是由以将军吉宗所提拔、培养的本草学学者为核心。他们在幕府殖产兴业政策的感召下，开展了实用性的本草学研究。这一学派的开山祖为采药士阿部将翁。他广泛地开展了物产学方面的研究，成功地栽培出当时在中国也未曾培育成的朝鲜人参，这一成果是这个学派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

栽培成功朝鲜人参的第一人是将翁的门人田村蓝水(1718—1776)。蓝水作为江户的町医，继承和发展将翁的本草学思想，很早就开始研究朝鲜人参。20 岁时，他受命于吉宗将军，得到 20 粒朝鲜人参籽，并把它们栽到自己的园地里。尔后他为栽培朝鲜人参，周游了澳洲各地，巡访了全国 38 州，经过精心研究和培育，终于将朝鲜人参培养成功。31 岁时，他出版了《人参耕作记》使他一举而成为著名的物产家，被提拔为幕府医官，成为幕府执行人参栽培的实际负责人。他重视实地实验，远不限于人参，还对甘蔗、仙茅、芒硝等也进行了广泛的实地实验。晚年，他编写了《硫球产物志》13 卷，也充满了科学的实测精神。

蓝水的突出成绩是举办了从宝历七年(1759)开始的“东都

药品会”。“东都药品会”是以开发国产药品为目标，收集和陈列全国各地动、植、矿物的会议，这对本草学研究的群众化起了促进作用。在“东都药品会”的影响下，全国各地也举办了同样的“药品会”。

“东都药品会”是蓝水的门人平贺源内(1728—1779)策划的。平贺源内是江户本草学的集大成者。他与松田长元一起，先后举办了五次药品会。其中四次会议的产品是由源内收集整理并以《物类品骘》为题刊行。《物类品骘》将2000种产品中的357种，按照《本草纲目》的分类法进行解释，又举出很多外国产品和矿物，显示对国产开发的意向和对兰学的关心以及受其影响的一面。其内容作为富有独创性的博物志倾向而受到高度评价。源内对本草学的研究，虽然由于他的矿山开发事业的失败而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他为日本本草学研究转向采用近代科学方法起到了桥梁作用。

源内之后，蓝水长子田村西湖继承其学统，也举办了多次“药品会”。这时，著名的兰方医中川淳庵、宇田川玄等人也加入了“药品会”，“药品会”遂变成汉、兰本草学家学术交流的场所，西湖采药伊豆诸岛撰写了《豆州诸岛产物图说》7卷。他去世后，他的次弟栗本丹洲、门人曾上春等人，继承其学派，创造性地开展了对本草学的研究。

### 三、全面鼎盛时期

经过京都、江户本草学派影响，在幕府管辖的各藩中也兴起了本草学研究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尾张藩和美浓藩等。

#### (一)尾张藩的本草学

尾张藩忠实地推行幕府的殖产兴业政策，由藩经营药园和大规模栽培朝鲜人参，藩士之间盛行园艺，涌现出众多的本草学家、园艺家和画家。其中著名的有：松平君山(1697—1783)的《本

草正伪》(1776 年刊),镜岛仲益的《药草略谱》(1793 年刊),柴田洞元的《日用药品考》(1810 年刊);舍人重巨的《草木性谱》、《有毒草木图说》(1827 年刊)等。这些人的经历虽然不详,但从其著作的内容看,几乎都受到了京都本草学派的影响。江户后期在尾张藩出现了兰山学统的本草研究团体"當白社",广泛地开展了本草研究及其启蒙活动,其代表人物有水谷丰文(1779—1833)。水谷丰文年轻时入门于兰山,又跟随野村立荣学兰学。27 岁担任药园官,直到晚年担任藩药园的实际经营者。他每年都在藩内各地采药,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物品识名》2 卷(1809 年刊)、《物品识名拾遗》2 卷(1825 年刊)。该书是收录和产或者有和名品种 4000 种的辞典,它打破了以前的本草书的常例,开创了先排和名的划时代的实用辞典之先例。他作为幕末本草学家的必读书,广传于全国各地。

丰文给门人讲授本草的讲稿,遂成《本草纲目讲稿》60 卷。他的《记闻》以笔记形式,带有实地观察的风格。多采用出色的线画,彩色植物画和印叶画,还载有荷兰语和拉丁语的名称。与兰山的《启蒙》一书内容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后来,其门人伊藤圭介,大窪昌章,吉田雀巢庵等人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

伊藤圭介是兰方医,一方面学西方博物学,另一方面学丰文的《物品识名》等,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泰西本草名疏》4 卷(1829 年刊),详细介绍了西方林耐的二十四纲分类法,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植物学著作。圭介在明治维新后还担任了东京大学理学部的客员教授,作为博物学家、植物学家,对实学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代学者杉本勲等人详细地论述了圭介的实学性格。

大窪昌章和吉田雀巢庵均是尾张藩的中级藩士,他们忠实地继承了丰文的求实学风。昌章撰写了与《物品识名》相应的印

叶图集《大窪先生真影本草》15卷，雀巢庵以增订《物品识名》形式编纂了《物殊品名》2卷，还撰写了《禽谱》、《虫谱》等书。

他们的本草研究与京都学派一样，其活动时间持续到明治中期。他们最早受到兰学的影响，努力将日本本草学和西方博物学加以折衷融合，但是尚未完成向近代自然科学的飞跃。

(二)美浓藩的本草学

尾张的邻地美浓是本草学的后进地方，但是兰山的门人都争先恐后地接近兰学，并在兰学的影响下，他们最早离开本草学的轨道，展开了独自的临床生药学的研究，开拓了适合于近代科学的道路，其代表人物有：饭诏长显、饭沼欲斋，江马活堂，神田柳溪等人。

美浓本草学家的代表人物饭沼欲斋(1783—1865)开始学于其父长显之塾，后学于蓝山。50岁时隐居故乡，专攻本草学，后来逐渐转为批判本草学，他认为提倡本草学的人多半是以识汉名为长外，与他所指望的植物学家大不相同，遂开始撰写新的植物图说。他的《本草图说》(草部20卷，1856—1862年出版；木部10卷，由北村四郎编注 1856—1862年出版)，是日本最初的近代科学的植物图鉴。

《草本图说》排除了本草书的考证和传闻，根据亲自观察，收集进口产品和日本产草类1204种，木类600种，以瑞典植物学家林耐(Linne 1707—1778)的24纲分类法分类，配列了图说。其特点一是将已述植物名用日语统一起来，并附拉丁语的学名和兰语俗名，部分植物名只加一个汉名，排除名产学考证；二是非常详细和准确地记载了亲自栽培、观察的植物的叶、枝、花、实的结构和生态，尤其是在观察花时，进行解剖，并用显微镜弄清最细微部分，他所作的植物标本中现存有1355种，可以用于现今的研究；三是他亲自描绘写生图；写生图除整体图外，还附上

了花枝果实的扩大图，显微镜图和解剖图。可以说，饭沼欲斋的《草木图说》是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与实践，展示出近代注重实测的科学精神的一次尝试。

除了尾张、美浓藩外，能登，纪伊，丰后等地方也纷纷采用近代实测方法研究本草学，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

综上所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问世后不久即传入日本，给日本本草学研究带来一场革命。《本草纲目》的思想内容，研究方法，它所包括的植物、动物、矿物等诸多领域，都深深地启发了日本学者，使他们在《本草纲目》的启迪下，创造出了符合自己国情的本草学。《本草纲目》的这种影响，不仅支配了整个江户、明治时代，而且在现代医药学发达的今天，它的影响也渗透在日本学者的著作和日本人民的意识中。白井光太郎、木村博照等于1934年翻译出版的《头柱国译本草纲目》，1979年出版的《新注国译本草纲目》第二版等，对当前日本自然药物的开发与研究，仍有参考价值。可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是长久不衰的，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 第二节　方以智的“质测之学”与三浦梅园的实测之学

方以智(1611—1671)，是明末清初卓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天崩地解”的大动荡时代，同时又是“西学东渐”的开放时代。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从澳门进入广州，在传播天主教神学理论的同时，也传授了西方科学技术。以利玛窦为前导，其它西方的传教士接踵而至。方以智的实测之学的形成，正是明清之际社会矛盾的激化与“西学东渐”的产物。

日本三浦梅园(1723—1789)比中国的方以智晚100多年。三浦梅园活动的江户时代中期,日本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封建地主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日益便利的交通运输促进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商业发展。但是,商业资本的活跃和城市消费经济的发展,从反面又带来了幕藩财政的恶化。于是,作为官学的朱子学的传统理念与幕藩体制的现实发生了矛盾,不少学者由开始怀疑宋儒,最后达到批判宋儒的地步,这说明占正统地位的朱子学已趋于衰颓之势。同时,从德川第八代将军吉宗解除禁书以来,通过日本长崎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给近代日本的实学思想以巨大影响。三浦梅园批判地吸取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并以此为动力摆脱以往的以伦理学为主体的东方传统哲学的束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创立了以元气实体论和"反观合一"为主要内容的实学体系,从而为日本实学开辟了科学世界观的道路。他在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中,直接受到明末清初方以智所著《东西均》、《物理小识》和方以智的门生游艺所著《天经或问》等自然哲学书籍的影响。日本学者高桥正和指出:"梅园的哲学受到明末清初游艺所著《天经或问》和游艺之师方以智的自然科学书《东西均》中反映的以"通几"的"一即二"为中心范畴的存在论和认识论的本质影响。因此从这一点上看,梅园的哲学并不是我国自生的独立体系"。(《日本思想史的基础知识》日文版,407页)由此可见,游艺的《天经或问》和方以智的《东西均》《物理小识》等自然哲学书籍,在三浦梅园实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天经或问》这部书如实地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的基本内容及其优越性。三浦梅园最早是通过这部书学到了西方天文学,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自己的自然哲学思想体系的。方以智的《东西均》《物理小识》在三浦梅园实学形成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方以智的

《物理小识》是一部批判地吸收西方天文学的自然科学书。三浦梅园的《赘语》中竟引用《物理小识》近 20 次。三浦梅园在其读书笔记《浦子手记》中提到了《天经或问》，现在三浦梅园家族尚遗留梅园亲自批注的《天经或问》。可见三浦梅园受到方以智实测之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方以智和三浦梅园的实测之学都是以他们的气实体论为基础的。方以智提出"盈天地间，皆万物也"的命题，肯定了宇宙是统一的物质存在。他说："盈天地间，皆物也。人受其中以生，生富于身，身富于世，所见所用，无非事也，事一物也。圣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因表里以治其心，器固无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一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物理小识·自序》)在这里他把天地间的一切存在的现象都归结于物，强调物的客观实在性，从根本上否定了理学的空谈心性之说，继承与发展了元气实体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他还着重发挥了"虚实皆气"的唯物论宇宙观，指出："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物理小识》卷 1)

方以智在传统的元气实体论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气"所以能动变不息而化生万物的内在根源。他根据前辈自然科学家的观点，认为"火"就是天地万物所以运行不息的内在根源。他转引中国金元四大医学家之一的朱震亨的话："天恒动，人生命恒动，皆火之为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自生。"(转引自《物理小识》卷 1)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火运水火"的观点。他说："天道以阳气为主，人身亦以阳气为主。阳统阴阳，火运水火也。生以火，死以火，病生于火，而养生者亦此火。"(《物理小识》卷 1)

方以智认为"火"并非存在于气之外，火乃气的根本属性。他说："火弥两间，体物乃见。"(《药地炮庄·大宗师》)"火无体而因

物为体，人心亦然。”(《物理小识》卷1)

方以智把标志物质实体的“气”与标志物质运动的“火”统一起来，创立了他的“火一气”一元的“质测之学”，为元气实体论补充了新的科学的内容。

相隔100年之后，日本出现的三浦梅园的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方以智的“一切物皆气所为”的自然哲学思想，并展开了自己独创的“气一元论”。三浦梅园实学思想出发点是以天文学为核心的西方自然科学和中国的元气实体论哲学。他认为宇宙间充满着物质性的永恒不变的“一元气”。宇宙间的一切可见与不可见的东西都是由元气构成的。他说：“不易言，易言违玄；不易名，易名岂玄。姑且谓之一元气。一元气，充满宇宙而不遗秋毫之末。”(转引自田中正治：《三浦梅园研究》日文版，268页)“大地者，唯是一气物，气之外无物，物之外无气，一条妙理，贯彻宇宙、玄界无际，神化莫测。”(《孛山先生墓表》)，这就是说，宇宙间一切东西的质料都是“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基础，万物只是由“气”凝成的具体形态。“宇宙，气也；天地，物也。气剖天机，物分性体。天机已分，而宇宙转持相成；性体已成；而天地水火并立。于是虚实之天地，水火之阴阳，时处之宇宙，动止之转持，偶偶相合，成一天地焉。”(《玄语·天地》)他还认为“气”有精粗之分，“精设而为天，粗露而为地。”“气”虽有精粗之分但从根本上来说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

方以智基于他的物质和运动相统一的原理，进一步探讨了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动因。他说：“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因二以济。”(《东西均》)他又说：“吾尝言天地间之至理，凡相因者皆相反。……所谓相反相因者，相救、相胜而相成也。昼夜、水火、生死、男女、生克、刚柔、清浊、明暗……之类，无非两端。”(《东西均·反因》)在这里，他列

举了一系列的对立范畴，指出它们之间是相救相胜相成的辨证关系。这无疑是对中国古代辨证法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三浦梅园在方以智的“一而二，二而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反观合一”的命题。他说：“条理者，一一也，分而反焉，合而一焉，是以反观合一，依征于正，非可以私调停也。”(《去语》例旨第六条)。三浦梅园进一步把“一而二，二而一”的思想改造成为“一一本一，一即一一”的命题。他说：“夫条理者，一一也。一一之为阴阳，一一者，阴阳之未有名也；阴阳者，一一之各有定名也。一一本一，一即一一，合无罅隙，分有条理。”(《赘语》)“条理者一有二，二开一。为二，故粲立而示条理；为一，故混成而超越罅缝。”(《多贺墨卿君书》)即认为一元气其有阴阳二气，二气的存在，又显示出一元气的存在，被概括为“一有二，二开一，”正如用剪刀剪一张纸“一拗一突一倾一欹，合之则混一无间。”(《玄语》例旨第六条)这与方以智的辨证法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方以智在中国实学史上的突出贡献之一，是他自觉地提出了“质测即藏通几”的理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他一方面致力于从自然科学新成果中概括出哲学的新结论，发展朴素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另一方面，又从面向自然，“考查物理”的自然哲学出发，否定“舍物言理”和“扫物尊心”的宋明理学，推进了明清之际的“崇实黜虚”的实学学风。

他把整个学术按其对象不同区分为“质测”“宰理”和“通几”三大类。“质测”是研究“物理”的，即自然科学；“宰理”是研究“治教”的，即社会政治学说；“通几”是研究“所以为物之至理”的，即哲学。

关于“质测”和“通几”的关系，方以智以为“质测即藏通几也”(《物理小识》)，即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通几护质测之穷”(《物理小识》)，哲学又对自然科学起指导作用；“或质测，或

通几，不相坏也”(《物理小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根据这一理论，他批评西方自然科学是“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彼之质测，犹未备也。”(《物理小识》)他还批评理学是“有意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遗物”(《物理小识》)。

三浦梅园根据方以智的理论，也阐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他说：“两人用意于实测，如人之脏腑筋骨，屡剥而验真，故最精详。盖天地有条理，未得条理，虽曰实测，仿佛得是，但犹远于真”(《价原》)，这与方以智的“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的观点基本相似。对于这一点，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在《三浦梅园的哲学》中明确指出：“毋庸说，西洋天文学(这里所谓西洋天文学，具体地讲，我相信是指《天经或问》，该著中的天体论，大略是奇科伯拉埃的学说)不能认为没有条理，它们应该有他们的条理，但他感到它只是事实而缺乏条理。这恐怕是说缺乏梅园教养所要求的那种条理。这与方以智既承认那苏会士所传的天文学的长处而吸取其种种知识，又批评它只审于质测而拙于通几，是相同的。”

方以智在驳斥理学末流时提出了：“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主张。他认为理学和禅学，都是空谈心性，脱离实际，排斥技艺的虚伪之学。因此主张“物有其故，实考究之”(《东西均·道艺》)的实学。在他看来“或虚或实，或实或虚，虚实有无之不二，犹阴阳之本不二也。”(《东西均·扩信》)二者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对立的。他既反对“逃虚”，又反对“滞实”。主张以实征虚，虚实并济，以矫正明末王学末流和释家尚虚弃实的偏弊。

如前所述，三浦梅园“岁踰三十，始悟天地有条理”，而寻找其“条理”的方法则是“反观合一，舍心之所执，而依征于正”(《与净园律师书》)。所谓“反观”，是指人们抛弃自己的主观猜测而客观地观察事物，做到主观与客观合一。在他看来，必须舍己之主观，才能知人知天。他说：“欲知天，则须舍己，以入天境。欲识物，

则舍己以入物境。于是智通天地，通万物。万物与我并立，而我居其一，以知天之公，以知人之私，可以始言人之道也，谓之开人之镜也。”(《与麻田刚立书》)为了知天，知人，就必须在治学中坚持“师天友人”的态度，反对盲目崇拜圣人，为圣贤之书所拘泥。我们由此不难发现，三浦梅园的“舍心之所执，依征于正”的思想中与方以智的“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

# 第四十四章　陈元赟的实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我国明清之际有一位杰出的实学家曾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他就是与朱之瑜同期流寓日本的陈元赟。他力倡实学，反对虚言空谈，崇尚实功实用。曾把主张文学革新的明代公安派启蒙文学传播到日本、创编和传授柔道以及在日本传播诸多实用技艺，对于日本实学的发展有着重大作用。陈元赟在日本传播了些什么实学，产生过何种影响呢？

## 第一节　陈元赟及其在日本形成的学派

年来蓬鬓叹飘零，秋夜悲鸣月下铃。鸿雁不传乡国恨，杵砧长动旅魂惊。窗前皓魄樽前看，曲里关山笛里听。潦倒孤踪徒菀结，扶疏桂影任冥冥。

这是陈元赟与日僧元政唱酬的一首诗，题名《对月思乡》。诗中感叹自己半生潦倒，飘零异国，无限乡愁国恨，此诗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深情。

陈元赟，原名 珣，字义都，号芝山，别署義都甫、士升、既白山人、升庵，又因居住在名古屋九十四町，又署谐音菊秀轩。生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卒于日本宽文十一年(清康熙十年，

1671)。浙江余杭人。在许多题款中自署"大明武林"或"大明虎林"人。"武林"、"虎林"为杭州别称。明代,余杭属杭州府。陈元赟在《升庵诗话》中又自称"仆余杭人"。余杭县现有陈家桥村,疑为其出生地。又所号"芝山"、"既白山人",二山均系余杭县境内之山岳一在城西北二十余里处,产灵芝而得名,一座落在南北苕溪分流处。

陈元赟在国内时,场屋运乖,一生未曾步入仕途。日人山边松在整理《升庵诗话》时,于后跋记其父言,陈元赟"自言落第之后,委身商客而来于我长崎"。山边松之父,生前曾与陈元赟为友,说他科举受挫,可能是事实。据他在《升庵诗话》中说,少年时曾辑前人诗文,题名《珊瑚枕》,署名崆峒子,后为人盗去。又据我国学者梁容若说,陈元赟"年二十七,入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习武术和制陶术,年余退出"(《陈元赟评传》)。大概也是在此前后,受到公安派诗文的影响。这是目前所知他在渡日前的一段历史。

陈元赟于何时渡日,日籍有载"及其国乱,逃来此邦"(《先哲丛谈》),指的是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朱明王朝,清军入关统治全中国之时。又有根据日本学者林罗山(1587—1657)《与大明人沈茂人》书信中提到陈元赟而推定其渡日时间。沈茂人为福建总兵使节单凤翔的随行译员,他们是在明天启元年(1621)赴日商讨倭寇事宜的,从而认定他于此时渡日定居。然陈元赟只是临时充任译员,并非与沈茂人那样的随行译员,所以也不是此时渡日。我国学者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中,于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日本万治二年)栏载:"明人朱之瑜、陈元赟来归(日本)。"按1659年是朱之瑜定居日本的时间,也是陈元赟定居日本后多年与僧元政始榉溯之年。说陈元赟也于此年定居日本,大概是根据近代日本学者木宫泰彦

说“与朱舜水同时来日本而仕于尾张德川侯者，有陈元赟”（见陈锡年译《中日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704 页）。明天启、崇祯年间或清顺治年间等渡日说均不确。事实上是在此之前他已到了日本。日人山边松在《升庵诗话》中说，陈元赟“自言落第之后委身商客而来于长崎，患痢日久，腰钞皆尽，卒不得还”。山边松校辑《升庵诗话》是在日元禄四年，距陈元赟去世只 20 年，所记只说明陈元赟因何流落东瀛，而未注明渡日时间。陈元赟在明天启三年（1623，日元和九年）曾为日本毛利辉元藩主撰《长门国志》，于序言中说，“余自万历己未秋，渡瀛海涉鲸波，入扶桑之故墟”，综合山边松之说，可知他是在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为生计随商客到日本的，时陈元赟 33 岁，自此一直未归，在日流寓 52 年，于日宽文十一年（1671）逝世。他一生著作都是在日本撰成的，除《虎林诗文集》、《既白山人集》亡佚外，现存于日本的还有：《老子经通考》、《元元唱和集》、《升庵诗话》、《长门国志》、《朱子家训抄》、《陈元赟书牍》等。这些著作阐述了他的实学理论，如在《老子经通考》，虽发挥的是道家《河上公章句》观点，但陈元赟着重在“证实理”（《老子经通考序》），《长门国志》则把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方志学传播到了东瀛，《升庵诗话》、《元元唱和集》则阐发公安派文学理论和创作。这些著作对日本实学都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原念斋说陈元赟“能娴此邦语”（《先哲丛谈》），这是他一优越条件，故自登彼东土，即开始传播中国实学和技艺，虽也是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但却把自己的生活和事业追求紧紧捆束在一起。他先后寄居长崎、江户、名古屋等地，纵横交往于当时日本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结交之人，上至藩主、文士，下至僧侣、傭工、浪人，或为其幕宾，或为其诗文友，或任其艺师，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学派。陈元赟擅长书法，篆、隶、行、草各体无一不

精，尤工赵孟頫书画，其墨迹至今被日人珍藏。登岸长崎之初，就有书法家渡边梅峰等从之学。日宽文三至四年(1626—1627)在江户，居国昌寺创编柔道，传授给浪人福野正胜、三浦义辰、矶贝次郎，以后三人各形成流派，柔道始传遍全国，至今日人奉之为柔道鼻祖。日宽文十五年，得尾张藩儒臣武野安斋之荐，先后被藩主德川义直及其子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聘为幕宾，年俸六十担，教授诗文、书法。继而主持、传授烧窑制陶技艺，影响名古屋成为历史上产陶名城。这期间望门拜师甚众，主要弟子有：龟川恕水(原为藤原惺窝著名大弟子松永五之弟子)、穗积元庵、本多道虎(1622—1683)、伊藤固庵(1641—1711)、佐佐木津摩(1619—1695)、胜野延政以及以后的元政。这些弟子，有的向其学书法，有的学诗文，其中学有所成者不乏其人，如龟川恕水通过向陈元赟学习后，就著有《诗集》。佐佐木志津摩后成为日本著名书法家，他向陈元赟学得赵孟頫体，在日本传续数代。日万治二年(1659)，结交元政，向其传播公安派文学，影响了日本文学革新。

陈元赟不仅有如上述众多的及门弟子，还有许多实学同调，诸如当时日本著名学者林罗山(1583—1657)亦通过陈元赟传播公安派文学，受到性灵说影响。松永尺五(1592—1657)是藤原惺窝著名弟子，曾有《卒呈大明人元赟》诗："相遇异乡客，仪容心自融。诗夸曹植捷，文角马迁雄。贵国儒弥显，吾民道不隆。蒹葭连玉树，目击百无草。"字里行间洋溢对陈元赟的佩赞。藤原惺窝另一大弟子那波活所(1595—1698)亦盛赞陈元赟才学。陈元赟也肯定其"诗工"(《升庵诗话》)。还有朱之瑜弟子安东守约(1622—1700)与陈元赟过从甚密，曾有诗赞陈元赟"诗律元于唐律细"。又有《谢陈芝山见访》诗："爱闲谢杂宾，拥彗迎文人。酿酒兴犹在，好辞觉有神。剧谭须卜夜，幽趣不嫌贫。喜挹温和

酒，寒窗顿漏春。”（转引自小松原涛《陈元赟研究》，东京雄山阁出版昭和三十七年版。）

陈元赟与兴日水户学派之朱之瑜（1600—1682）和创日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的隐元（1592—1673）亦有交往，现《朱舜水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还保存《答陈元赟书》。陈元赟于日万治元年有诗赠隐元，时其已 72 岁，故诗中有：“二纪两遭灰劫变，七旬重晤故人稀”句。

通过陈元赟一生的活动以及他与门弟子之授受，我们可以说实际上已形成了以陈元赟为核心的芝山学派。他们的交往完全具有学派特色：他们有陈元赟这样杰出的宗师，有一批登堂入室，学有所成，不愧师门的弟子；陈元赟传授的科系和领域有文学、武术和技艺。文学科系内有公安派诗文、书法以及方志学；武术科系是柔道；技艺科系有烧窑制陶、茶道等。在这些实用领域中，陈元赟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和综合日本固有文化基础上，加以创新，从社会效果来说，且影响数代。

芝山学派的形成，是陈元赟传播实学的结晶，同时它又推动了日本以后的实学发展。

## 第二节　传播公安派文学及其对日本文学革新的影响

以袁宏道（1568—1617）为代表的公安派文学，反对文学复古，崇尚自我，主张文学革新，具有批判精神、启蒙意识。它主张文学革新，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

陈元赟第一个把公安派文学传播到日本，并且和他的诗友、弟子一道效法公安派创作，使之广为流传，推动了日本文学革新运动。

明代初期从永乐到天顺年间，是一个社会比较安定时期，此时文坛上文人，大多数是位高爵显的官僚，他们政治上志得意满，生活上骄奢安逸，文学作品成为歌颂和维护阶级利益或描绘闲情逸趣、优裕生活的工具，文风上讲究雍容典雅，绮丽浮泛辞藻，形成了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派”。“台阁派”作品内容空乏，篇章冗赘，文风萎弱，千篇一律，给文学带来严重危机。于是，明成化到隆庆年间有以何景明（1483—1521）、李梦阳（1473—1530）、王世贞（1526—1590）、李攀龙（1514—1570）为代表的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复古派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从篇章结构到句法、词汇都只应摹拟和尚古，因而缺乏自身的风格。它反对“台阁派”，从历史发展看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没有能够提出新的主张，只刻意模仿，却束缚了自己，在内容上更谈不上创新。于是，嘉靖以后，先有以王慎中（1509—1559）、归有光（1506—1571）为代表的唐宋派起来反对复古派。继而更有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倡导文学革新。

公安派尖锐抨击复古派，辛辣讽嘲为诗为文剿袭步趋是“顺口接屁”（《袁宏道集笺校·与张幼于书》。以下只注篇名。）决心“扫时文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答李元善》），认为“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叙小修诗》）。袁宏道兄弟从啊万历十八年（1590）至二十一年（1594）曾四次拜访“异端”思想家李贽（1527—1602），李贽极赞其兄弟为“天下名士”，宏道“英特”，“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并赠予自己著作《焚书》。三袁尊李贽为师，在其《童心说》影响下，提出“独抒灵性，不拘格套”（《叙小修诗》）的“性灵派”文学主张。“性灵”说强调的至情真性，“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识张幼于箴铭》）“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叙小修诗》）。从李贽到袁宏道，其文学主张，

均尊重自我，不受拘束，具有较强烈的追求个性解放倾向。袁宏道的诗作，摆脱字句和平仄清浊限制，抛弃空调，融古诗、乐府、僧偈、寒山拾得调、语录、套曲于一体，有三字句、九字句，三言、五言、十句、十二句均自由运用，可以说我国最早的自由体诗。我国古代哲学大家王夫之(1619—1692)对公安派文学主张和创作有公允的评价："王(世贞)、李(攀龙)笼罩天下，无一好手敢于立异，中郎以天姿迥出，不受弹压，一时俗目骇所未见，遂推为廓清之主"。又评其诗作"洒落出卸，如白鸥浴水，才一振羽，即丝毫不挂"(《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3 页)。可见公安派文学主张和创作，无论从内容或形式来说，都可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文学革新。

正是陈元赟把这一具有进步性的文学第一个传播到日本的。据日人原念斋在《先哲丛谈》中说：

> 初，万治二年于名古屋城中，(陈元赟)与僧元政始相识，契分尤厚，其生平所唱酬者，汇为《元元唱和集》，刊行于世。元政诗文慕袁中郎，此邦奉中郎，盖以元政为首，而政本因元赟知有中郎也。元政(致陈元赟)书曰："数日前探市得《袁中郎集》，乐府妙绝，不可复言，《广庄》诸篇识地高，《瓶史》风流，可见其人。又赤牍之中，言佛法者，其见最正，余颇爱之，因足下之赐也。

原念斋说，日本"奉中郎，盖以元政为首"，肯定日僧元政得以阅读和认识袁中郎的诗文，是通过陈元赟介绍的。在元政以前，日本学界不知有袁宏道其人，元政是日本第一个接受公安派文学影响的诗僧，陈元赟是在日本第一个传播者。元政致陈元赟书中表露了他对公安派文学之倾慕以及对陈元赟向他介绍公安派文学的感谢之情。

元政通过陈元赟了解到公安派文学后，顿然给自己文学观

和创作开启了新的境界和途径。他深契袁宏道的文学主张，并从此摹仿袁氏的创作风格赋诗，在其《送元贲老人之尾阳诗》前引中可以得到证明：

> 余尝暇日与元贲老人共阅近代文士雷何思（忌霈）、钟伯敬（惺）、徐文长（渭）集，特爱袁中郎之灵心巧发，不藉古人，自为诗为文焉。今九月之初，既夜正长，而风遽冷，寂寂不睡，灯下拥被，独阅石公（按即袁宏道之号），读到《别石簣》（按即陶望龄）诗，忽感近日老人将有尾阳之行。因效石公韵，缀狂斐十首，以拟《阳关曲》，但不知所以裁之，录呈藻鉴，宓希慈斤，幸幸。（《元元唱和集》）

从上引可以看到，元政不但酷爱袁宏道的诗文，还摹仿他的风韵赋诗撰文。他说袁宏道诗文凭“灵心巧发，不藉古人，自为诗为文”，这正是对“独抒灵性，不拘格套”的准确而又深刻的理解。

元政（1623—1668），又名草山上人，俗名石井吉兵卫。京都人。26岁为日莲宗僧，本擅长和歌、汉诗，著有《草山集》。与陈元贲结识后，过从密切，二人笃厚的友谊一开始就建立在一部《袁中郎集》上。元政比陈元贲小36岁。宽文二年（1662），即在他们相识后，元政《送元贲老人之尾阳诗之八》中：“公本大唐宾，七十六老人。吾少公卅六，才调况非伦。”元政尊陈元贲为“老人”，陈元贲视元政为“忘形交”。元政在接触到袁宏道诗文后，钦慕不已，尽仿公安体赋诗，俨然以性灵派自居。如元政在病中卧读《袁中郎集》，赋《春色不寝，戏和袁中郎渐渐诗》：

> 春水渐渐深，高岩渐渐卑；百花渐渐满，圆月渐渐亏；学者渐渐繁，道人渐渐稀；文章渐渐盛，真风渐渐衰。佛儒博稽古，禅诵亟失时。舍己欲随物，物反与己离。太平不泊焰，雅俗自参差。请息诸缘务，长随天人师。（转引自小松原涛《陈元贲研究》第295页）

袁宏道有《渐渐诗戏题壁上》：

明月渐渐高，青山渐渐卑；花枝渐渐红，春色渐渐亏；禄食渐渐多，牙齿渐渐稀；姬妾渐渐广，颜色渐渐衰，贱当壮盛日，欢非少年时。功德黑暗日，一步不相离。天地犹缺陷，人世总参差。何方寻至乐，稽首问仙师。

袁宏道在诗中用高卑、红亏、多稀、广衰来写明月青山、花枝春色、禄食牙齿、姬妾颜色等。元政仿此格调，用深卑、满亏、繁稀、盛衰写学者与道人、文章与真风，其实都在表述自己对事物对立转化的观点，反映他们对自然和社会变迁的看法。两诗相比较，元政诗极传袁宏道诗之神韵，一个说"人世总参差"，一个说"请息诸缘务"，文字虽有略有异，但佛禅思想似乎是共同的。

元政又有独立创作的极能体现公安派格调的诗《山居》：

霞谷花，昔谁种，春至称心红，未有天女供。霞谷月，自天纵，夜来翔空游，万里形相从。霞谷水，助梵诵，混混何时尽，盈科流不壅。霞谷云，巧错综，仙衣翩跹轻，终无人见缝。鸟之啾，笑我蠢，厖之吠，无物讼。不知谷贵，野菜之甕。观法界，颂拙针颂，今吾进退，绰绰然，终身不受，官之俸，乐只我，又谁共，花月水云，无用之用。（转引自小松原涛《陈元赟研究》，第 298 页）

此诗题下注："以陈简斋山中共赋几篇诗为韵为共字。"此诗末句"无用之用"，沿用于《庄子》之《逍遥游》和《人间世》所说不材之大树，无斤斧之灾，能终其天年，尽其生理。因此诗极富性灵派韵味，故陈元赟阅读后评论说："此篇宛似袁石公口吻，妙品妙品"（转引自小松原涛《陈元赟研究》，第 299 页）。元政初仿袁宏道赋诗，曾请陈元赟为之"润削"，陈元赟十分谦虚地以"白公（居易）求正于俗媪"比喻，"窃不揣僭笔，点撺诸诗"（《元元唱和集·恭复草山上人书》）。元政早陈元赟三年去世，元政卒前，陈元赟病榻前探视，见其病重，以生离死别的沉重心情赋《永诀元政师

一绝以表一生始终骚雅之情》：

师瘿宿疾我衰年，面对相看各泪怜。

此会便成长阔别，他生再结旧诗缘。

此诗表达了二人的心声和深厚的互为师友情，这种友情建立在公安派之"诗缘"上。他们自日万治二年(1659)相识，至日宽文八年(1668)元政卒，交往前后共10年。10年间，二人仿公安体唱和步韵，诗作甚多，在元政卒前五年，即于宽文三年(1663)，就有二人合著《元元唱和集》刊刻行世。书名各取一"元"字，集中分别有四言、五言七律、七绝及杂体诗200余首，前部为陈元赟著，并附有其所著颂、赋、说、记、书多篇。后部为元政诗，除与陈元赟步韵唱和诗外，又有元政《共阅古籍》、《次元赟翁寂照庵即景》、《谢元赟翁来访》、《送元赟老人之尾阳诗》等专为陈元赟所赋之诗。《元元唱和集》是一部中日诗人合著的在日本刊行的公安派诗集，其中感人心弦的诗句甚多，尤以二人各自仿袁宏道《别石簣》所著的十首唱和诗最具有代表性，从中使我们具体看到公安派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元政：送元赟老人之尾阳诗并引……灯下拥被独阅石公(袁宏道之号)之集，读至《别石簣》诗，忽感近日老人将有尾阳之行矣，因效石公韵，缀狂斐十首，以拟《阳关》曲。

一、别赟老，别而遇又别，此别意难言，谁假苏长舌，昔不曾知君，今何思君切！吾无文雅交，无文道将灭。

二、君视吾何如？君吾文章友。世上名利客，总是非吾偶。与君倾心肠，为君岂噤口！斥鷃相顾笑，大鹏遇希有。

三、邂逅遇尾城，至今已四载。今年会洛阳，来往劳孤拐。清谈无点俗，相忘如痴騃。君能言和语，乡音舌尚在。久狎十知九，傍人犹未解。

四、禄薄身自安，兔狼鹿其尾。薄禄犹为祸，劳居踰远

水。远水君莫辞，不劳奈稚子。胜彼奔走士，终岁履无底。

五、学佛不学禅，解经不解义，读书不读文，作诗不作字。久忘人间世，何物更为崇？这般孟浪子，亦有同臭味。遂莫逆于心，相视共如醉。唱和何所以，童子竹马戏。

六、水有沧溟栖万里鲸鲲，竹有嘉实止千仞凤凰。鲲得其处不羡人世界，凤得其实不愿人膏粱。天地之间物各有所主，奈何曲己随人而翕张。

七、西天圣，东土圣，一知妙，一知命。吾孰随？释为姓；公孰依？孔为证。孔若衰，释若盛，公强立，文昌祠，虽老矣，幸为病。

八、公本大唐宾，七十六老人。吾少公卅六，才调况非伦。不知何夙世，合而车双轮。不忍暂别，作诗泪沾巾。

九、重重关山，远远洛水。子忆老亲，亲念幼子。别日猿鸣，归时雀跃。以别之哀，为归之乐。欲升天者，必先沉渊；欲沉渊者，必先升天。要脱八苦，勿乐三禅。

十、能早归来否？绾之祝早归，第三桥边柳。

陈元赞：和元政诗并小序

……余归谒尾阳君，草山元政上人乃仿袁石公《别石簣》十首之韵以赠行，不佞即其韵而酬焉，亦使他日好事者知有二元如昔日之有袁、陶云。

一、别政公，暂别非久别，久暂心无异，岂假叮咛舌。我未曾别公，先别情何切！故知忘形交，俗套自泯灭。

二、吾视师何如，师吾方外友。万里为同调，唱和成奇偶。我吟寄师心，师吟出我口。于喁总天籁，形骸复何有。

三、昔倾盖尾阳，屈指今四载。来侨山城邸，访师长拄拐。挥尘忘道俗，谑浪苦戆骇。方言不须译，却有颖舌在。坐久笑相视，眉语神有解。

四、养贤忝升斗，不是厄摇尾。自愧缁水宜，恩波浩海水，海水固潜虬。风物悲游子，拓落尘寰中，履穿在廓底。

五、形使心为役，礼教身服义。五石不甘匏，十疋成走字。命将地迁徙，老逼人为祟。兰向蕙边开，自然同臭味。蕙兰苟相得，不欲心先醉。新诗名弄丸，岂效宜傺戏。

六、北有化鲲将图南为鹏，岗有梧桐来和鸣凤。鸣凤朝阳声不假金石，游鲲击水食不养稻粱。物于宇宙贵能乎自立，何随世靡而无主张。

七、忠恕圣，慈悲圣，三乘法，五十命。东西人，各从令，吾孔徒，陈元姓，师妙法，莲华证。儒不衰，释不盛，偈与诗，实相并，豪兴起，病忘病。

八、久作扶桑客，东瀛老旅人。伽陀即风雅，何得不同伦。夙世飞车国，今生合两轮，那堪暂分辙，回首泪沾巾。

九、三之日陆，一之夜水。子悲远父，父恋爱子。声袭鸿哀，珠抛泪跃，骊歌慷慨，将悲作乐。生为鱼者，潜必伏渊；生为鸢者，飞戾天。理之所在，不符参惮。

十、能念吾儿否？问我归何时，寒雅噪衰柳。

上列二人诗，不拘格套，打破律调，融合各体诗之长，不愧为公安派自由诗之典型作品。

袁宏道之《别石簣》诗十首撰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按石簣即陶望龄(1562—1609)，字周望，石簣其号。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曾受学于周汝登，学术思想上属泰州学派。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与陶望龄相识后，情意投合，文字交往密切。《袁中郎集》中有与陶石簣诗文多篇，《别石簣》是其中之一。

元政、元贯仿《别石簣》相互唱和，不但说明他们自比袁、陶，更表明他们对公安派诗文之崇慕。

上列二元仿《别石簣》诗，有几点值得伸述：

（一）诗中表达了二人友情之深厚是结缘在公安派诗文之上。元政在诗中表达了相见恨晚之心情，说他与陈元赟的莫逆之交，有别于“世上名利客”，而是“倾心肠”的“文雅交”、“文章友”。陈元赟则称之为“忘形交”、“同调”和无俗套的“方外友”。他们二人在年龄上可以说不是同代人，本难有共同语言，倘若没有某种连结起来吸引力，是难以交往的，更说不上情谊深厚。元政诗中“唱和何所似，童子竹马戏”。陈元赟则和之“唱和成奇偶”，自己所吟之诗可以寄托元政的心，元政所吟的诗如出于自己之口。二人都承认联结起来的是相互的“唱和”和“吟”，这说明他们的友谊建立在对公安派诗文共同的爱好上。

（二）诗中透露了二人的思想信仰。元政是日莲宗僧。日莲宗其源可追溯到中国天台宗。13 世纪日僧日莲（1222—1282）据日天台宗所依《法华经》又创日莲宗。该宗主理事不二，一心诵妙法莲华经，即身成常寂光妙果。元政在诗中说，佛儒分别为东西方圣，佛宗妙悟，儒信天命，自己以“释为姓”。陈元赟自称“吾孔徒”，然此并不准确，陈元赟并非儒家信徒。说自己是孔徒，此只不过是我国古代士人通常的讬名“圣人”门下惯用做法而已。就陈元赟之主导思想来说，非儒家而是道家。且不说他在诗中引述“鲲鹏”、“天籁”、“形使心为役”等出自《庄子》，有着道家色彩。在《元元唱和集》中，有许多诗都带着道家隐士情调。如《次偶作》：“园桃几树尽蒸霞，仿佛秦人避世家。我不避秦惟避俗，山居不问水流花。”陈元赟在另一本学术著作中，公然批判儒家，赞扬老子，说从孟子到周敦颐、二程和朱熹等，“或云性善，或曰博爱，或云性恶，或云善恶混杂，或云中和，或云素丝，或云岐路穷，或云一贯，或云太极乃至无极，或云天理，说虽繁多，不穷实理，还谤老子，逆子不知亲”（《老子经通考·虚用》）。证明陈元赟道家思想很有必要，它可以说明他与元政学术思想和世界观有共

同点，那就是在“出世”思想这点上是一致的。

（三）诗中反映了对性灵说有较深刻的理解。元政在《元元唱和集》中说，袁宏道“自为诗为文”，“灵心巧发，不藉古人”。在仿《别石簣》的《送元贇老人之尾阳》诗中，又有“学佛不学禅，解经不解义，读书不读文，作诗不作字”诗句，这正是脱胎于《别石簣》中的“学道不学禅，谈星不谈义，爱曲不爱音，读书不读字”。袁宏道这些诗句，言在诗外，诗中有禅，可以说是他的性灵说的别注。在创作上，反对摹拟，不受格套限制，诗文“任我而发”，“从自己胸中流出”。元政把他和陈元贇的唱和比作“童子竹马戏”，正是对公安派诗文创作纯任自然的形象比喻。

元政在《元元唱和集》中还有一段对“性灵说”的阐发：“余尝答人书，漫论文章曰：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盖流自性灵者，有德之言也。出自模拟者，不必有德之言也。流自性灵者，或虽不整齐无痕，出自模拟者，虽是整齐未必无痕。余虽不知文章，于此二者暗中摸索，亦可知也。何者？言则心之迹也，因迹求心，虽不中不远矣。由此言之，世之好文章者，不本于道德，徒拾古人唾余，以为巧，可耻之甚也。”这里斥复古派摹拟为拾古人之唾余，要求文学革新态度坚决鲜明。又说自己探索了德和言之关系，指出言为心之迹，因迹求心，才是至情真诗。应该肯定元政深刻地理解了“性灵说”之精神实质。陈元贇对公安派诗文的理解反映在对其评价上。有向他学诗的弟子问他，明代什么人诗最佳，他毫不犹豫回答是袁中郎（见《升庵诗话》）。所以，在承认陈元贇是第一个把公安派启蒙文学传播到日本的中国人的同时，还应承认元政是日本第一个接受性灵说的诗人。《元元唱和集》则是在日本刊行的古代中日诗人共同创作的第一部公安派诗集。

公安派文学主张和创作，经陈元贇介绍给元政后，继而在

日本文坛广泛传播，推动了日本文学革新，起过积极作用。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说，陈元赟“来日时，携来明袁宏道之《袁中郎集》传于僧元政，影响于日本诗文学者最多。元政在日本鼓吹性灵派诗文，实基于此”(《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704 页)。这与原念斋在《先哲丛谈》中说日本崇奉袁中郎诗文，以元政为首是一致的。我国清末学者姚文栋也说，陈元赟与元政相识后，“语以《袁中郎集》，元政因尊奉之，一时摹仿遂成风”(《读海外奇书杂著·陈元赟先生事略》)。木宫泰彦又说公安派文学经传播后，影响于日本诗文学者最多。其具体影究如何呢？据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1942 年华北编译局出版)一书中说，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运动也影响了日本文学界。荻生徂徕(1666—1728)是当时著名学者，蒎园学派的创立者，才学声望均高，门下弟子众多，他为了提倡古学，也借明代文学家李攀龙等主张，鼓吹古文，“天下翕然向之，遂至风靡一世”。“明代排击李、王有袁宏道，北山也借来攻击徂徕派。”北山即山本北山(1752—1812)，名信有，是元政以后日本著名的追踪公安派文学家，他与文学家井上卿、村濑通熙、樫田伯恒等“皆慕中郎风”(《陈元赟研究》，第 298 页)，他们都以公安派文学主张为思想武器，反对复古，在日本倡导文学革新中起了积极作用。

## 第三节　创编和传授柔道

创编和传授柔道属于陈元赟学系中的武科，这是一门讲求实功、实用的实学。陈元赟在这方面的贡献，不仅泽被日本武术界，而且惠及今日国际体坛。

一提起柔道，人们自然会与日本联系起来，这主要是在各项国际柔道比赛中，一律采用日本规则和日本裁判专用语，日本队又往往成绩优异，独占鳌头。柔道又是日本人民普遍喜爱的体育运动。这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误以为柔道是日本人所创编。其实，在陈元赟渡日前，日本还未有正式的柔道，是陈元赟流寓日本后，于宽永三年(1626)前后创编的，柔道的真正鼻祖是陈元赟。

日本许多学者都十分肯定地认为，陈元赟是柔道的创始人。原念斋在《先哲丛谈》中说：

> 元赟善拳法，当时世未有此技，元赟创传之。故此邦拳法以元赟为开祖矣。正保中，于江户城南西久保国正寺教徒。尽其道者，为福野七郎左卫门、三浦与次郎右卫门、矶贝次郎左卫门，……

原念斋肯定陈元赟是日本拳法的“开祖”。他这里指出：在陈元赟东渡前，日本没有拳法；是陈元赟寄寓江户国正寺时，创编并传授给福野、三浦、矶贝的。然原念斋这段话有两点不甚准确处须待辨正：一是说陈元赟于日正保年间创传不确，按正保年共四年，正是明崇祯十七年至清顺治四年(1644—1647)，此时，陈元赟已离开国昌寺受聘于尾张藩德川义直。陈元赟创编柔道准确时间应是日宽永三年至四年(1626—1627)。二是说日本在陈元赟东渡前没有拳法，把柔道笼统称拳法不确切。在陈元赟以前，日本固有拳法，陈元赟创编的是柔道，不能把拳法完全等同柔道。

在许多日本典籍中，与原念斋记载相同，在承认陈元赟是创始人的同时，又有不确之处。诸如，信夫恕轩说：“我邦昔时未有拳法，归化人陈元赟善此技，传之邦人，故此技以元赟为鼻祖。”(《依田学海》卷2“眉批”，转引自《陈元赟研究》第96页)日

籍《凌雨漫录》在《柔术之始》一章中说，“正保年间，陈元赟于西久保国正寺以此（柔术）教传之”（转引《陈元赟研究》，第49页）。日本《国史大辞典》于“陈元赟”条目下说，“明归化人陈元赟于正保年间来江户授徒，有福野七郎右卫门、三浦与次右卫门、矶贝次左卫门从其学，尽穷其技”。丸山三造在所著《日本柔道史》（大东出版社昭和十七年版）中说，“日本之有拳法，是近世陈元赟来我国定居后传三人（福野、三浦、矶贝）之后”。在日本爱宕山现还树立一块残碑《爱宕山拳法碑》，镌刻着：“拳法之有传也，自投化人陈元赟而始”文字。上述均肯定陈元赟的创始地位。要说明一点的是，《国史大辞典》及《爱宕山拳法碑》把陈元赟说成“归化”、“投化”人不妥。陈元赟自至日在一些题款中直到他去世前一年著作《老子经通考》均一直自署“大明武林”或“大明虎林”人，还有自己款刻的“大明陈氏元赟之印”。他自号“芝山”、“既白山人”亦示不忘故国本土之意。元政对他这点甚为尊重，称之为“大唐宾”。

中国学者也有如日学者记其拳法创始地位者。如清人陈家麟在所著《东槎闻见录》中说，陈元赟“兼善拳法，日本拳技，闻自元赟始”。又姚文栋在所编《陈元赟先生事略》中说，“先生又精于拳法，正保中此技自先生始也。”这里说的“拳法”，实指柔道。陈家麟、姚文栋的说法，与原念斋等相同，可能是根据一些日籍而来。

近年来我国学者无谷在《武技要籍探微》中也持同一观点，说陈元赟“大概于1638年间东渡日本，寓居江户西久保区国正寺。曾收三浦义辰、福野正胜及矶贝次郎左卫门等为徒，传授少林擒拿跌扑之法。明亡，陈元赟欷歔惆怅，怀思故国，孤身飘零，客死异地，遗下不少著作，这在日本《本朝武生小传》、《武术系谱略》和《武术流祖录》等，都有记载。《舜水遗书》还收入他俩的信

柬。伊藤四男《柔道教书·柔道的历史》,在《支那传来说》中也介绍了陈元赟授拳的事迹。"(《少林寺资料集》,文献书目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2页)无谷先生只作为少林拳法在国外传播来介绍,未断言在此以前日本无拳法,这是客观的。但也没肯定陈元赟传授的是柔道。又把他渡日时间定为明崇祯十一年,不准。

日人下川潮在所著《陈元赟与柔道始祖》中说:"据敛心派之秘笈,我国(日本)所谓当身之术,即'由大明人陈元赟始传日本之杀活之法,原乃医道之秘事也'。若就敛心派起倒派,扬心派和其他各派多数杀活法秘笈研究,则有三种差别很大的图解,但无论什么人的发式、衣服等装束全是支那人的服式,毫无疑问,此派是从支那传入。而且,研究一下各派采用此杀活法的时代,就可以知道是元赟入朝以后的事。所以,对此加以综合考虑,敛心派秘笈里的杀活法由大明人陈元赟始传的记载,恐怕是事实。"(转引自《陈元赟研究》第96页)下川潮承认通过陈元赟从"支那传入",准确的说,应是"支那"人陈元赟创传。

下川潮提到的拳术中的"杀活"、"当身",按系明衙役巡捕手搏足击之擒捕术,即以拳肘或足尖击对方之要害部位,使之一时处于昏瞶状态中。据日籍《吾园随笔》中说:"元赟语之曰,我国有捕人术,吾未学之,然识其大势,三士(福野、三浦、矶贝)问之,得其概略,更加新意,以创此术。"(《陈元赟研究》,第99页)可见,日本的柔道,其中有吸取中国衙役捕人术。

除原念斋、信夫恕轩、下川潮和陈家麟、姚文栋所说在陈元赟东渡之前,日本未有拳法这点值得进一步商榷,他们都承认陈元赟精善拳法,是日本拳法之"开祖"或"鼻祖"。是他在日本揉合中日拳法和衙役捕人术加以改造和创新而有后来的柔道,因此,从上述意义来说,陈元赟可以被称之为日本柔道的创始

人而无愧。

之所如此说，是陈元赟在创编和传授柔道时，吸取了日本固有拳法，并使之得到提高和完善。日本学者屡言"我邦昔时未有拳法"，"当时世未此技"等，若此"拳法"指柔道则可，若指的是柔道以外的拳术，则不完全符合史实。据知，在陈元赟东渡之前，日本已有自己的拳术。最早将少林拳术介绍到日本的是日僧大智和邵元。早在我国元朝泰定元年(1324)，游学到少林寺的大智，在少林寺苦行修练12年。而后又有邵元禅师从明洪武十二年(1379)起，久居少林寺，还曾任过首座僧。他们都学过少林拳法和棍术，返回日本后，把所学到的拳法棍术传授给弟子(见《少林寺资料》第14—15页)，积久日本而有了自己的拳法。他们都早于陈元赟300余年，故不能说在陈元赟之前日本未有拳法，只是还未正式形成柔道。

我国当代学者梁容若先生根据史实所作的论断是公允的。他说：

> 日本有所谓柔道者，取柔以克刚之义，以锻炼身体，修养精神为目的，以虚静调息之术，能不战而扑敌。相传元赟实传其技，然柔之为术，元赟东渡前日本似已有之。宽永中，关口柔心已有"柔术"名于国内。元赟之功，为改进完成柔道。元赟寓江户国正寺时，浪人福野七郎右卫门、矶贝次郎左卫门、三浦与次右卫门，三人寓同寺，元赟授以大明捕人之武术，三人苦心研究，遂通蕴奥，遍传各地，屡有改进，渐与日本固有柔术混合，迄今重于体育界。(《陈元赟评传》，转引自《陈元赟研究》，第95页)

梁容若上述论断之所以说符合史实而又公允，是他承认在陈元赟东渡前后，日本宽永年间，以关口柔心(1598—1670)为代表，已有柔术名于国内，并形成"关口派"拳法。陈元赟则是揉合明

衙役捕人术，少林拳法和日本固有拳法，改进而为后来之正式柔道，以传授福野、三浦、矶贝等三人，而后才遍传全日本。经过不断改进完善，遂有今日蜚声世界体坛的柔道。梁容若这一说法，既不抹煞日本固有之拳术，又肯定了陈元赟在创建和发展日本柔道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

持此一看法的我国还有周西宽先生。他指出陈元赟传授拳法给福野等三人之后，"日本人民在辗转相传的过程中，对中国拳法加以变通损益，创造了柔术这一驰名世界体坛的运动项目"，并肯定日本的柔道是中国拳术之绪余影响（见《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

日本当代学者小松原涛也基本上持梁容若、周西宽先生同样的见解。他说：

> 按照通常的说法，在江户初期的柔术史上，使得日本柔术近代化的人，是入籍的少林拳法家陈元赟（五官）。陈氏滞留于江户饭仓草庵及西久保虎岳山（一名巨岳山）国昌寺（即国正寺）时间是宽永二年（1625）四月上旬至同年九月十六日。从此寄居以契机，他向福野七郎右卫门正胜、三浦与次郎右卫门义辰、矶贝次郎左卫门三位武士与国昌寺有关系的柔术僧众传授拳法，从而创造了江户柔术新的一派。（《陈元赟研究》第94页）

综合上述各家之论，可以认定，陈元赟东渡前，日本是有自己的拳法的，但还未形成完备的柔道，是陈元赟在揉合中日拳法基础上创编而成后来的柔道。据此，陈元赟可称之为日本柔道的创始人。同时亦应该承认，在陈元赟以后的数百年间，日本拳术界又代有发展提高，形成见重于当今世界体坛的柔道。

柔道具有坚毅、进取、奋勇等美德，经数百年之锤炼，已融化于日本固有文化中，成为其民族一种精神。日本现今有享誉世界

之柔道，寻根溯源，陈元赟是其鼻祖。

陈元赟在日本柔道史上的地位，惜乎我国学术界、体育或武术界所知者甚少。在陈元赟东渡前，日本固有拳法的具体情况和水平，以及陈元赟对之做了何种程度的改造、整理和提高，研究亦不够。柔道作为陈元赟实学的一部分，也值得进一步探索。

## 第四节　传授制陶术及其他技艺

陈元赟多才多艺，不但能文善武，而且通晓劳动生产多项技艺。他的实学，既包括启蒙文学、武术，也包括有各种技艺。

在日本制陶工艺上，陈元赟实学亦有影响。他在日本主持烧制的陶器，因具有独特风格而称为"元赟烧"；他传授的制陶技艺，是对日本之实学的另一贡献。

日本在我国宋代，曾派遣一名叫加藤四郎者来我国景德镇学习烧制陶瓷术，归国后在尾张濑户开窑，创"濑户烧"，此为日本传入中国制陶术之始。明正德年间，又有五郎大夫祥瑞，到景德镇学制五彩瓷器，回国后在奈良开窑制瓷，日本的陶瓷技术又有进一步提高。陈元赟则是在我国清初，日本万治三年(1660)，在尾张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园邸，主持烧窑制陶，并向日本陶工传授制陶技术的。陶工们又转相授受，"元赟烧"技术，遂得流传。至今，名古屋相当我国之景德镇为制陶名城，不可否认其中亦有"元赟烧"一份功劳。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说："元赟又创安南式之元赟窑，颇有雅致"。(《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第 704 页)日本另一学者中村新太郎在所撰《日中二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张柏霞译)中说,陈元赟"还是一个烧制陶器的名手,创造了具有安南风格美丽的元赟陶器,流传很广。"均肯定他在日本制陶史上的历史地位。

梁容若说:

> 万治三年(清顺治十七年),江户户山之尾张藩邸成,藩主毛利义直(按尾张藩主为德川氏,德川义直于庆安三年去世,万治三年为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于园中筑窑窟,名为"御深井烧"或称"御庭烧",使元赟主之,用濑户土,效安南制法,自为书画,施青白色之透明水彩,为时人所激赏,名古屋陶工效之,转相传授,称为"元赟烧",行销甚广。(转引自《陈元赟研究》第 324 页)

濑户在今名古屋之东,尾张之南,是出陶瓷之地。1660 年,陈元赟应尾张第二代藩主之聘,在其园邸主持烧窑制陶。不但传授了烧窑制陶术,而且吸收安南制法,在"自为书画"时,又传授了中国书法和绘画,"元赟烧"故被"时人所激赏"而"行销甚广"。

"元赟烧"主要烧制的是茶壶、茶杯,亦有花瓶、佛座、灯笼、皿钵、碗盏、酒器等,特别是茶器,至今为日人视为上品所珍藏。陶茶器又影响了日本的茶道。茶道讲究选茶、蓄水、烹茶、择器、行茶、品味等茶艺,饮茶又讲人品、意境、美观和礼仪,做到和、敬、清、寂一体。这样,茶道又成为一种自我修养。"元赟烧"进入日本茶道,又丰富了日本人民的精神生活。日人细野要斋于安政四年,题其友野口梅居所珍藏陈既白山人手造茶碗匣盒上文说:"陈元赟才学富赡,通诸技,兼解茗理,又善陶。大馆高门曾赏其陶器为三绝曰:元赟归化而止于我尾,一绝也;归化之人,而陶于御深井城墉中地名,二绝也;埴取之祖母怀,地名此地所出最适宜埏埴,三绝也。余谓:吃茶家多俗流,制茶器者多俗人,唯元赟为雅矣,如其手造之器,则当为茶具之最上品者也。乃间梅居

翁，获此盘于一士人之家，携来示于余，且需为之记，余熟视，嗟赏曰：是不啻三绝焉。又有可称三奇者也。翁问其目。曰：大凡元赟陶器，题名者稀，而是则题，一奇也。其为形、口腹窄，腹大，蓝书福喜二字，陶法精致，非寻常传言元赟陶者之比，二奇也；希世之器，归乎稀世之人，三奇也。……"细野要斋称道的茶器，可以说对"元赟烧"的全面评价。他指出：陈元赟所制之陶器，"陶法精致"，为"希世之器"，是"最上品"，于茶道为"雅"。

陈元赟还经常与日本友人共同参加茶会，在一起讨论和品味茶茗，至今日本还存有他于八十三岁高龄亲书赠茶道馆"茶香烹凤乳"五字。其家有茶室，他亲自烹的茶被称为"陈氏茶"。更有甚者，陈元赟、元政还有烹饮茶诗，进而使茶道体现为茶文化。元政茶诗《雪夜烹茶》："寒光侵席不容眠，起挹溪流手自煎。暖气还生风雪夜，冻蝇鼓翼绕茶烟。"陈元赟《次雪夜烹茶》："寒威夜逼不安眠，活火敲冰炙手煎。饮到三瓯煖胜酒，仰天呵出热炉烟。"姑置二诗如何不论，吟诗配烹茶、饮茶，这就使茶道超出了局限于选茶、择器、蓄水、烹茶、礼仪等茶艺和心性修养上，丰富了作为茶文化的茶道。

除传授制陶技术和影响、丰富日本茶道外，陈元赟还对日本其他技艺有所贡献。如尾张藩主德川义直去世后，他按照明代寺院格式设置寝庙，结构有寝墓、唐门、焚香殿、龙门、地塀等，这对日本建筑学是一座样型。还曾向日医界介绍中医中药及针灸术。

陈元赟还为萩津长门藩主毛利辉元太守撰《长门国志》，为日本保存了中世纪本州西部政治、经济、社会、地理、民俗等方面资料，传播了中国的方志学，为日本以后撰写地方志树立了一个典型。

陈元赟在向日本传播公安派文学的同时，还对日本花道艺

术产生过影响。这就是他把袁宏道的《瓶史》介绍到日本，形成了日本以后花道“宏道流”。《袁中郎集》中有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撰写的《瓶史》。在序文中表述了插花是“幽人韻士，屏绝声色”，把趣情转移到“鍾于山水花竹”上之意。全文分十二节：花目、品第、器具、择水、宜称、屏俗、花祟、洗沐、使令、好事、清赏、监戎。主张择花按四季“迭为宾客”，春为梅、海棠、夏为牡丹、芍药、石榴、秋为木樨、莲、菊，冬为蜡梅。插花瓶花枝“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为妙。”应参差不伦，意态天然。置瓶忌两对、一律、成行。元政在读到此文后，称赞“《瓶史》风流，可见其人”。不仅元政，其他的“日本人见了《瓶史》，大为钦佩，就将中郎的插花诀门，广为传布”，“就当教科书读”(周瘦鹃：《拈花集》，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33—234 页)。“明朝的袁宏道，且有插花体系理论出现。这些从时间上来说，都在日本江户时代以前。现代人一提起插花每多崇尚日本，而不知原是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结晶，中国才是它的发源地。”(江大慧：《插花学》，台湾真善美插花研究班出版，1961 年版，第 28 页)日本的花道艺术，开始于江户时代。据周瘦鹃先生说，其后流派很多，诸如有池坊流、远州流、青山流、未生流、松月堂古流、慈溪流、美笑流、古运州流、千家古流、相河弥流、春山流等等，不下二十多家，“而取法于我国的，即就是独一无二的宏道流”(《拈花集》，第 235 页)。插花艺术虽然陈元赟未直接参与，但从介绍公安派文学来说，亦不可抹煞其作用。

日本当代学者米山寅太郎在《序〈陈元赟研究〉》中说，陈元赟对日本文化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上述各项外，在书法、绘画上也有卓越的贡献，至今日本保存陈元赟手迹，有籀、篆、隶、行、草各体书法，他宗赵松雪书画，娟秀有风致，“字法瘦劲”(陈家麟《东槎见闻录》)向他学书法的，门下又有许多传人。陈元赟所制

之陶配诗配画，诗画逸趣横溢，对日本艺术界亦有一定影响。

我国清末学者王韬(1828—1897)在《扶桑游记》中说："明亡至日本者，凡三人：在水户，则朱舜水也；在尾张，则陈元赟也；在纪伊，则戴曼公。""皆胜国逋臣也"。清末另一学者黄遵宪(1848—1905)在其《日本杂事诗》中有《明室遗民》诗，以极尊敬的心情写道："海外遗民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所说遗民指朱之瑜和陈元赟、戴曼公。三人并称，也是日本公认的明亡后流寓日本的中国最有学问的人。

陈元赟在日本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把毕生精力和才智都献给了日本人民，他创编和传授柔道，传播公安派文学，传授制陶和其他技艺，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等等，都是他的实学思想的体现和贡献。日本人民历来怀着崇敬心情纪念他。日大正十一年(1922)。日本各界在名古屋曾举办"陈元赟二百五十年追远会并遗品展览会"，京都宇治黄檗山曾刊印《陈元赟研究》材料。至今不断有研究陈元赟论著问世。然究其一生，虽然才学出众，而科场运乖，华夏徒浩瀚辽阔，不插翘楚一枝，乃乘桴浮海，孤身飘零，栖身于扶桑的冷馆萧寺，潦倒东瀛窑前灶下，埋骨异乡。生前巅连困苦身后事迹湮没。弘文东洋，史碑至今传颂，扶桑奉为先哲，昌国富民，泽及百世，功垂历史不泯，实学是赖。

# 第四十五章　清代科技实学与朴齐家的《北学议》

在清代，中朝两国使节团频繁往来，为两国人民的相互接触和思想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机会。特别是18世纪中叶开始，朝鲜许多著名的文人、思想家作为使节团成员或随行人员来访中国，和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和实学家接触，共同探讨科技实学，并亲自观察、多方研究当时清朝的先进科学技术，力主学习清朝的先进科技来振兴朝鲜经济。朴齐家就是当时最积极倡导这一实学路线的实学家。他的实学思想集中地反映在他呈献给国王的《北学议》中。

## 第一节　四次燕京之行

朴齐家(1750—1805)，字在先、修其、次修，年轻时因喜读楚辞取号楚亭，晚年为表示自己初志依然、秉性悠存而改称贞蕤。

朴齐家出生在汉城，11岁丧父，靠母亲“鸡鸣不寝为人傭针”生活，加上他是庶子出身，在贫穷与怀才不遇中成长。然而，他天资聪慧，15岁就以善诗、书、画而闻名，19岁就已出版了自己的诗集《楚亭集》。由于他才华横溢，结交了当代很多名士，如李德懋、柳得恭、朴趾源、丁若 镛 、李书九等，都是他的“艺苑之

凤”。特别是朴齐家、李德懋、柳得恭，李书九等人的诗，被誉为“四家诗”，名传燕京。

当时，清朝吏部考功司员外郎、著名学者李调元（号雨村）看了“四家诗”认为悦心爽口、清雅脱俗，并欣然答应为“四家诗”撰写诗评。李调元还把“四家诗”介绍给当时《四库全书》的分校官、文坛名人潘庭筠（号兰公）。潘庭筠也特别欣赏朴齐家的诗，说：“楚亭诗，脱手如弹丸，不为僻涩之音，襟气磊落，如见其人”（《箋注四家诗》）。朴齐家深为清代著名学者的这些赞誉所鼓舞，即书李调元：“不意今者……所抄《巾衍集》，见赏于中朝之大人，倾倒淋漓，不啻若合席读而倾盖遇也。此固毕生之大幸，不世之奇缘也……。”（《贞蕤集》卷 4《与李羹堂调元》）李调元也答书朴齐家说：“仆于君，非有握手之缘而情归如此，此亦有缘焉……。足下之诗文，虽未获窥全貌，而即所寄各种风格……洵人群之鹤而艺苑之凤也……。足下年圃二十七而所得已如此，必传无疑，何中外云云。”（古图书本《贞蕤阁文集》卷 4）自那以后，朴齐家更是热切地盼望有朝一日能亲自赴中国燕京拜见这些著名学者，并“纵观山川人物之壮、宫室车船之制与夫耕农百工技艺之伦”、将“愿学而愿见者，一一笔之于书面，质之于先生之前，然后虽归死田间不恨也”。（《贞蕤集》卷 4《与李羹堂调元》）这一强烈愿望，终于 1778 年 3 月即朴齐家 29 岁时如愿以偿了。

18 世纪的中国清朝，正是乾隆皇帝（1736—1795）在位，燕京政治贤明，商货繁荣，一派盛世景象。在文化上，编纂《四库全书》的庞大工程，使中国硕学名儒云集燕京。朴齐家恰逢此时来到梦寐以求的燕京，无不欢欣鼓舞。他首先前去拜访了李调元和潘庭筠。虽因语言障碍，他们只能以笔谈形式进行对话，但彼此之间都感到心心相印，相见恨晚。

第一次燕行之后，朴齐家还曾于 1790 年 5 月，同年 10 月，

1801年以使节团随员的名义出使燕京，先后同清朝著名学者、实学家纪昀、李鼎元、祝德麟、唐乐宇、鼓元瑞、翁方纲、阮元、江得量、铁保、罗聘、孙星衍、熊方受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礼部尚书、《四库全书》总裁、著名实学家纪昀很赏识朴齐家。他在朴齐家拜访他数日后，不顾年近八旬高龄，还亲自去朝鲜馆回访朴齐家，并在他归国后用绢地写下"偶然相见即相亲，别后忽忽又几春；倒屣常迎天下士，吟诗最忆海东人"的诗句，托使臣捎给正祖转交朴齐家。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之深。

朴齐家不仅作为一个诗人，名震燕京，而且更是作为一个经世实学家为世所知。他很早就有志于改变自己国家贫穷与落后的面貌，专心研究实学。他说："我幼时，慕崔孤云(崔致远857～？——作者注)、赵重峰(赵宪1544—1592，——作者注)之为人，慨然有异世执鞭之愿。孤云为唐进士，东还本国，思有以革新罗之俗而进乎中国，……重峰以质正官入燕，其东还封事，勤勤恳恳，因彼而悟己，见善而思齐，无非用夏变夷之苦心。鸭水以东千有余年之间，有以区区一隅欲一变而至中国者，惟此两人而已"。(《北学议序》)在此，朴齐家明确表示了自己正是象历史上的崔、赵二人那样"因彼而悟己"、"见善而思齐"，去中国学习经世实学和科学技术，以达到救国富民之目的。第一次北行，朴齐家在燕京滞留三个月之久，第二次留住40日有余，第三次、第四次也颇住了些时日。在这些日子里，他"自农蚕、畜牧、城郭、宫室、舟车以至瓦簟、笔尺之制，莫不目数而心较，目有所未至，则必问焉；心有所未谛，则必学焉……凡遇可以通行于我国者，熟视而窥识之，或有未解，复博访以释其疑，归而笔之于书……其用心，勤且挚也"。(朴趾源《北学议序》)

朴齐家通过四次燕行，不仅在考察车、船、田制方面大有收获，而且还深受"燕京学风"之影响。朴齐家入燕时正值清朝汉学

全盛期，实事求是的考证朴学风靡一世，程朱理学被硕学鸿儒冷落于一边。这种“燕京学风”使本来就对朝鲜“朱子学独尊”的现实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朴齐家更加感到程朱学者空谈性理的虚妄和无用，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经济之志”。这样，他将“观乎燕蓟之野，周旋于吴蜀之士”后，对“其俗之可以行于本国，便于日用者，笔之于书，并附其为之之利与不为之弊，而为说也”（朴齐家《北学议序》）。朴齐家名传青史的《北学议》就是这种思想的结晶。

朴齐家是李氏朝鲜第一代检书官。他在任检书官期间非常重视从清朝购入古书珍本，每次去燕京都一定去琉璃厂“聚瀛堂”、“十二家”等有名书店热心阅览。正祖元年（1777）即清朝乾隆四十二年，朝鲜购入在当时很难得到的初印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5200册。所以能够洽谈成功，与朴齐家在燕京的“诗名”有着很大关系。第二年，朴齐家还同李得懋等人亲自去燕京购入《通志堂经解》1750卷，共500册，为清朝文化输入朝鲜作出了很大贡献。

朴齐家始终主张北学清朝，在华夷名分思想根深蒂固的朝鲜，这势必遭到世人的仇视和迫害，就在纯祖元年（1801）他第四次燕行之后，受到“辛酉邪狱”的牵连而被流放三年之久。他怀着“万哭岂尽哀”的悲愤与孤独，渡过了二年零九个月的流放生活，于1805年获释回到故乡，不久朴齐家即与世长辞。他的主要著作有《贞蕤集》、《北学议》。

## 第二节　北学论与北伐论之辨

第一次燕京之行回来，更激发了朴齐家的经世思想。他目睹

乾隆盛世，百业兴隆，国泰民安，考据学家作风朴实，实事求是；再看看自己的国家，国贫民穷，空谈性理，无一实业可举。在如此对比之下，他痛心疾首，挥笔写下了《北学议》，为北学中国清朝大声呐喊。朴齐家的《北学议》是他经过多年考察与研究，充满激情和危机感而写成的绝世之作。

但是，在18世纪末，《北学议》的实学思想只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意识的反映。在国家统治者中间北伐论则是时代的主流。所谓"北伐论"，就是要伐清复明，雪胡乱之耻。由于朝鲜统治者深受中国华夷名分论思想影响，直到正祖时，北伐论仍然是一种正义的象征，反清灭胡思想仍是当时社会的主潮。所以，朝鲜在明朝灭亡以后还不惜动用物力、财力兴建"大报坛"、"万东庙"等，以表示对倭乱时大明军队救援的感激之情，从国王到庶民都以继续使用明朝年号引以自豪，国家奎章阁藏书印中就使用"崇祯后几年"的年号。而且视清朝为夷狄，连到中国的燕京使臣也以傲慢为能事，交谈皆委托翻译官。他们认为"国之所以维持者，亦在名分"(《仁祖实录》卷14四年十月壬子)，因此，即使冒"倾国"之危也要顾全名分。他们认为天下之事有"大义"与"大势"之分，不能以清朝暂时的强势而失去保明之纲常大义。要维护大义名分，就必须将北伐复明的神圣事业进行到底。

主张北伐、为明复仇，这在朝鲜当权者中是极为普遍的。然而这种北伐主张在当时已毫无现实价值，它只是一些昏庸者的一时聒噪，并无实际意义。但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不肯或耻于学习中国清朝的流毒甚深。

自从满清入主中原以后，朝鲜一直以小中华自居，自以为华夏文明东传到了朝鲜，并因此而自豪说："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热河日记》第145页)。这样，他们认为胡邦清朝已无春秋大义、慷慨之士可言，甚至"下士，见五谷则问

中国之有无；中士，以文章为不如我也；上士，谓中国无理学”（《北学议·北学辩》）。对此，朴齐家尖锐批评说：“谓天下尽胡也者，诬人也。中国固有陆，王之学，而朱子之嫡传自在也。我国人说程朱，国无异端，士大夫不敢为江西、馀姚之说者，岂其道出于一而然欤？驱之以科举、束之以风气，不如是，则身无所宴，不得保其子孙焉耳。此其所以反不如中国之大者也。凡尽我国之长技，不过为中国之一物，则其比方较计者，已是不自量之甚者矣”（《北学议·北学辩》）。朴齐家接着说，我从燕京回到朝鲜实事求是地讲到清国农工百技如何之壮观，然“皆茫然不信，失所望而去，以为右袒于胡也”（《北学议·北学辩》），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人还“冒其人而夷之，并其法而弃之，则大不可也。苟利于民，虽其法之出于夷，圣人将取之，而况中国之故哉！”（《北学议·尊周论》）因此，朴齐家认为即使是“胡”也得学彼之长，不学则是庸人自缚的短见。“胡知中国之可利，故至于夺而有之。我国以其夺之胡也，而不知所夺之为中国，故自守而不足，此其已然之明验也。世传丁丑之盟，清汗欲令东人胡服。九王谏曰：朝鲜之于辽沈，肺腑也。今若混其衣服，通其出入，天下未平，事未可知也。不如仍旧，是不拘而囚之也。汗曰善，遂止。”（《北学议·尊周论》）而且，古之英雄，有必报之志，甚至不耻于穿胡服。而我们空守春秋大义之虚荣，不肯学习清国，弃百倍之利而莫之行。这是遗笑千古之错。“匹夫欲报其仇，见其仇之佩利刃也，则思所以夺之。今也以堂堂千乘之国，欲伸大义于天下，而不学中国之一法，不交中国之一士，使吾民劳苦而无功，穷饿而自废……故今之人欲攘夷也，莫如先知夷之为谁，欲尊中国也，莫如尽行其法之为逾尊也。若夫为前明复仇雪耻之事，力学中国二十年后，其议之未晚也（《北学议·尊周论》）。就是说不管从“大义”上看，还是从“大势”上看，都必须努力学习清朝的科技实学。

在北伐论成为社会主流的形势下，朴齐家以极其鲜明的立场主张“北学论”，是难为世所容的。就连北学派中的一些思想家也都指责朴齐家“立论之过高”。朴齐家之所以能够提出先进的北学主张，除深受当时正在形成的“市民意识”和朴趾源等少壮派实学思想家的影响外，更为主要的是他通过四次燕京之行，“益闻其所不闻”，“益见其所未见”，先进的清朝科技实学促使他“因彼而悟己，见善而思齐”。而且还通过清朝领略到西洋科学技术的先进性，使得他本来就较为活跃的实学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以这种新的实学思想审视由于北伐论的泛滥所造成的恶果，使朴齐家更加认识到北伐论的荒谬。他批评北伐论的非现实主义视清朝为夷狄而不愿学其先进科学技术的固陋见解，大声疾呼要实事求是，努力学习中国，仿效中国的文物制度、农工技法，来改变国家经济每况愈下的局面，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唯一救国扶贫的捷径。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思想主张并未得到上至国王下至广大百姓的欢迎而被埋没于书本中，难以付诸实施。

主张北学中国的不只朴齐家一人。当时，朝鲜以燕京使为代表的少壮派实学思想家，普遍地主张北学，但其他人是较“温和”的北学论者，而朴齐家则是最积极、最彻底、最坚决的主张北学中国的实学思想家。他的《北学议》在当时可谓是一面思想革命的旗帜。然而，朴齐家也毕竟是一位历史人物，他不可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如他也认为“今清固胡矣”，肯定华夷有别。可见，从总体上，他的华夷观并未超出当时的传统氛围，这是他的思想局限。

## 第三节 《北学议》的实学思想

何谓“北学”？朴齐家在自己的《北学议》序中说：“取孟子陈良之语，命之曰北学。其言细而易忽，繁而难行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云：“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当时，朝鲜学习中国，如同陈良学习周公仲尼之道一样，都是低势能文化向高势能文化的学习，这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举措。

北学中国，应该如何学、学什么呢？朴齐家认为朝鲜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是贫穷，而贫穷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技术落后。所以，他主张向中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即“实测实学”。

朴齐家主张学习中国“实测实学”的核心是技术导入论。他在自己的《北学议》中，通过对中国的车、船、城、甓、瓦、宫室、窗户、阶砌、道路、桥梁、畜牧、牛、马、驴、鞍、槽、市井、商贾、银、钱、田、粪、桑、果等的详细考察和研究，找出中国之长与朝鲜之短，主张取长补短，导入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善劳动工具，改良操作方法、提高生产效益。特别是在车、船、甓以及两班从商论等问题上，都能反映出朴齐家的思想光辉。

朝鲜很早就开始使用牛车。在高句丽古坟的双楹椽壁画中就出现了牛车。高丽时代也有“不废牛马”的记载。但朝鲜的牛车，制作粗糟，又只是“礼之具而已”，再加上朝鲜“率皆山路”，无法远行，直到18世纪末，车马还未普及，致使“岭南之儿不识虾酱”，“西北之人不辨柿柑。”这种各地的封闭局面是因为道路不通，车马不行造成的。“车出于天，行于地，万物以载，利莫大焉”。（《北学议·车》）如果车行城乡，商贾转输，百货流通，国不期富而富，民不期足而足。因此“有国之用，莫大于车”，“生民之器莫

重于车”。基于这样的认识，朴齐家详细地考察了中国的各种车辆：乘车（太平车），载车（大车），独轮车等。他指出，中国的独轮车：“小商多用之，轮不包铁，差小而薄，舆前广后狭，可腋而驱。轮之半，出舆之上，随其形而裹隔如半鼓。所以防泥，左右悬木如弓，既载之后，夹而约于中，以代栰楯，又有如兀附于辕后，行则常举，止则与轮俱停，所以不倾。一人从后推之，重则一人在前，曳之如牵绳，可敌两马背之力。尝见四妇人，列坐左右，又载水东西各六桶；又尝见因风挂帆而去者，想与船同功。”（《北学议·车》）而这样既轻便又灵活多载的车在朝鲜根本见不到。因此，我们要学习中国大小、轻重、疾徐等各种有用的车制。具体的办法有二：一是派能工巧匠去中国认真学习，加以仿制；二是对每年来往于朝鲜的官车、贸车，“令找人熟见，当为学之”。如此，其功效定会可观。

车虽是当时便利的运输工具，而船更胜于车百倍。朴齐家根据朝鲜三面环海的地理特点，强调发展水上运输业的重要性。他说：“我国国小而民贫，今耕田疾作，用其贤才，通商惠工，尽国中之利，犹患不足，又必通远方之物而后货财殖焉，百用生焉，夫百车之载不及一船，陆行千里不如舟行，万里之为便利也。故通商者，又必以水路为贵。”（《北学议·通江南浙江商船议》）。自倭乱以后，朝鲜造船业停滞不前，致使本来就很落后的造船技术越发落后，既不能多载货物，又不能远航它地。但是，当时中国的舟船不仅坚固，而且负荷量也大，还能随波逐流，畅游远航。因此他主张应学习中国的造船技术，造出像中国那样的又大又结实的船，努力发展水上运输业，开辟以汉江为中心的京畿、忠清、全罗、黄海道的泛江交易，进而开通中国的水路，以朝鲜的绵布、海产品换取中国的绸缎、药材等，并通过贸易开展更广阔的文化学术交流。朴齐家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对于施行锁国政策，深受儒家文

化的影响的朝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远见卓识。

砖作为一种建筑材料，也是朴齐家极为关注的技术问题。他说，由于朝鲜没有长远的观点，只知道应付眼前，所以，朝鲜人终身居住的房屋也是“蜂房蚁穴”，“立不削之木于不平之址，以索缚之”，“千户之乡，无一方正可居之屋”。(《北学议·宫室》)而中国从城郭、宫室、仓库到阶庭都是用砖瓦垒成，如同大厦耸立，既坚固又省费用。砖瓦是用“不禁之土”和“不穷之薪”烧制而成，因此是取之不尽之物。朴齐家在《北学议》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烧砖工艺与技术，并且大力呼吁用十年时间将朝鲜的楼台城郭、桥梁、坟墓、沟渠、堤堰等全部建筑物改造成砖瓦结构。这可谓是一个宏伟的设想。

开发车、船、砖等技术问题，其好处有目共睹，易为大家所接受。然而像朴齐家提出的以商为本、两班从商论以及招聘西士搞活海外贸易等主张，就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够提出的，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接受的。

18世纪的朝鲜，正值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萌生，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日趋解体的时期。这一历史时期，最具有生命力的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体系，为社会走向近代创造了历史前提。但是，在这一时期，过去不曾有的趋利之心、奢侈之风也随之泛起，新的商品货币关系不断地破坏着原有的旧秩序，这就势必遭到旧思想、旧观念、旧势力的顽强抵制。甚至朝鲜实学思想家李瀷也由于看不惯商品货币经济带来的所谓“混乱”而主张废钱策，就连朴齐家的老师、著名的北学派思想家朴趾源在他晚年由于重农抑商传统思想的影响，也对发展商品经济表现出某种保守主义的态度。但是，朴齐家却以他敏锐的经济发展眼光，大胆地为“商”正名，并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两班

贵族指出从商的道路，进而提出贸易富国的先进主张。

朴齐家针对整个社会鄙视商业，对从商者群讥众笑的现实，指出："中国之人，贫则为商贾，苟贤矣，其风流名节，自在也。故儒生直入书肆，宰相或亲往隆福寺买古董"(《北学议·商贾》)。但是，"我国之俗，尚虚文而多顾忌，士大夫宁游食而无所事，农在于野，或无有知之者，其有短褐箬笠，呼卖买而过于市，与夫持绳墨，挟刀凿，以佣食于人家，则其不惭笑，而绝其婚姻者几希矣。故虽家无一文之钱，率皆修饰边幅，峨冠阔袖，以游辞于国中。夫其衣食者，从何而出乎？于是不得不倚势而招权，请托之习成，而侥幸之门开矣。此将市井之所不食其余。故曰：反不如中国商贾之事为明白也"(《北学议·商贾》)。这是对当时朝鲜现实的最辛辣的讽刺和批判。朴齐家认为："夫商处四民之一，以其一而通于三，则非十三不可，今夫人，食稻而衣锦，则其余皆为无用之物矣。然而不有无用之用，以济其有用，则所谓有用者。举将偏滞而不流，单行而易匮也"。(《北学议·市井》)商是四民之一，行商以通士农工三者之有无，是正当的民业之一，这同海民以渔为业，山民以木为业完全一样。如果天下之民尽趋农业，则民失其业，无以为生。因此，必须振兴商业，使四民有无相济相补，国中之宝容于城中，东西南北皆为富有。

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商业。那么，理想的经商者又该是什么人呢？当时的朝鲜虽然国弱民穷，但游民者多而生产者少。游民中大多数是虽"颠连穷饿却拱手安坐，不执耒耕"的两班士大夫。要想国富民强，就必须铲除这些众多的游食之辈。因此，当时的实学思想家们都主张"汰儒"，让而"儒生经商"则是朴齐家鲜明、独特的思想观点。他认为，作为淘汰之列的两班士大夫最理想的工作是经商。因为，他们既非能工巧匠，又非力大气粗，不宜直接从事农工之业。但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读文识数，

所以“凡水陆交通贩贸之事，悉许士族入籍，或资装以假之，设廛以居之，显擢以劝之，使之日趋于利，以渐杀其游食之势，开其乐业之心，而消其豪强之权，此又转移之一助也”。(《丙午正月二十二日朝参时典设暑别提朴齐家所怀》)就是说，从绝游食之辈而开生财之道来说，两班士大夫从商极为应该；从振兴商业树立正气而言，两班士大夫经商也极为必要。在鄙视商业的封建时代，将“商”从传统观念的贱业中拉出来搭到“高贵的两班士大夫”的肩上，这是一个富有革命意义的主张，在18世纪后期的中国和日本，也未曾见到像朝鲜朴齐家这样鲜明地将“士”和“商”直接联系起来的进步主张。如果将他的这种主张和朝鲜在100年之后的1894年的甲午改革时，“士”从“商”才得以承认的史实相联系，我们就更为敬佩朴齐家的卓见与胆识。

在主张大兴商业的基础上，朴齐家还进一步呼吁贸易富国和招聘西士。他认为“我国国小而民贫，今耕田疾作，用其贤才，通商惠工，尽国中之利，犹患不足。又必通远方之物而后货财殖焉，百用生焉”(《北学议·通江南·浙江商船议》)。而“国朝四百年，不通异国之一船”。他深为这种背时局面而痛心，恳请朝廷开国通商。他说，过去日本未通中国时，通过朝鲜输入中国丝，朝鲜从中获利。后来日本自知吃亏，改而直通中国，现在又同三十余国交市。可见，贸易取利是国家富强之手段，人莫不欲自己国家富强，岂有将富强之术让于别人之理呢？基于这种认识，他进一步主张打开国门，行船于闽、浙、交、广(皆中国南方一带)之间，直接和日本、琉球、安南等地开展贸易，然后，再随国力的强弱渐次和海外诸国相通商。

至18世纪末，西洋船只虽已频繁来往于中国南方和日本西部一带，但由于朝鲜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西洋船只还没有正式将朝鲜作为自己航程的目标。所以，直至1797年东莱釜山驶

来了"异样船",朝鲜人对船上人的身材、语言、船身的巨大等深为怪之,谁也不知其为哪国人。最后还是倭馆的日本人用望远镜认出是荷兰人的船队。在如此闭塞的时代,朴齐家积极主张开放国门,出海经商,贸易富国,这在思想上具有极大的启蒙意义。

不仅如此,朴齐家还大胆主张招聘西洋人士。他认为欧罗巴人术无不精,且"皆明于几何,精通利用厚生之方"(《北学议附·丙午所怀》),因此,要向他们学习科学技术。其具体办法是:一,在来泊我沿海的漂流船中定会有一技之长者。留住这些一技之长者,再派自己的能工巧匠前去"仿学其制尽其术",然后再送他们出去:"有漂人来泊沿海诸岛,必须详问船制,及其技艺,令巧工依方造成,或从漂船仿学,或留接漂人,尽其术而后还送不妨"(《北学议附·丙午所怀》);二,直接去中国聘请在钦天监工作的西洋人士到朝鲜,向年轻人传授天文历法、农桑、医药、造甓、建筑、采矿、造纸、武器等技艺,如此数年必大见成效。他认为天主教的天堂地狱说和佛教的三世轮回说虽没有什么用处,而这些西洋人士的厚生之学则是大有用处的。因此,应当招聘西洋人,广泛地向朝鲜人传授他们的科学技术,在朱子学至上,天主教犯禁的当时,朴齐家的这些主张是极为进步和大胆的。

综上所述,清朝的先进文化给朴齐家的实学思想以深刻的影响。在清朝科技实学的影响下,朴齐家当时提出了系统的救国救民的北学主张。他为实现这些主张曾两次上书国王,并敦促国王采取果断措施,将北学中国当作一项国策全面施行。但这些愿望均未得到实现。这是历史造成的必然结果。朴齐家的社会地位只是一介文弱书生,他推行济世的现实手段也只有向国王进言、献策,而当时的国王虽然也是较贤明的君主,但封建社会已发展到了"朽木不可雕"的地步。在这种封建社会末世中,君主的贤明和几个先觉之士的微弱呐喊已无济于事了。

然而，朴齐家救国救民的赤诚之心和执着的探索精神并没有付之东流。尽管他的主张在提出的当时未能得到实施，但由于他的思想和主张代表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它为七十年后的朝鲜开化派所继承和发挥，这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 第四十六章　清代考据实学与金正喜的实学思想

清代考据实学的实事求是学风，对于19世纪初朝鲜实学思想有很大影响。在翁方纲、阮元等人的考据实学思想的影响下，朝鲜实学家金正喜在经学与金石书法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终于使他成为朝鲜金石书法之大师。

## 第一节　金正喜的生平及其对清初考据实学的态度

金正喜，字元春，号阮堂，又号秋史、覃研斋等。朝鲜庆尚北道庆州人。生于朝鲜正祖十年(1786)，卒于朝鲜哲宗七年(1856)，终年71岁。

金正喜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博涉群书，有经学、史学、诗文、旁及金石、考古、书画，多才多艺。金正喜早承家学，其父金鲁敬(号酉堂)官至户曹判书。他曾游英正实学巨匠朴齐家之门。朴齐家很早有志于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专心研究经世实学，经常谈论车船制度及百工技艺。他曾多次去中国燕京，为的是向中国学习经世实学思想和实业技术，以实现其救国富民之理想。当少年金正喜从朴齐家那里亲自听到三次入燕京时所感受到的清代经世实学和较发达的科技文物利器时，激动得跳了起来。从此

以后，金正喜更热切地盼望有朝一日能够亲自去中国燕京感受这一切。终于1809年10月，以冬至兼谢恩副使的父亲吏曹判书金鲁敬的随行人员，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燕京，使他无不欢欣鼓舞。据《阮堂金公小传》记载："判书公（鲁敬）使于燕，公（正喜）随而入，时年二十四，阮阁老元、翁鸿胪方纲，皆当世鸿儒大名震海内外，且显不轻与人接，一见公莫逆也。"（《阮堂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

金正喜来燕京之前，通过朴齐家、柳惠凤早已得知当世清朝鸿儒翁方纲、阮元、曹江等大名。所以，他来到燕京后，迫不急待地要拜访这些鸿儒硕士，向他们请教学问，是他来华的最大的愿望之一。然而，当时与朴齐家、柳惠凤等人交往的不少硕学名士，或离开人世，或上山修道，或南下不在京城。幸亏当时翁方纲、阮元、曹江等人仍留在京城，使金正喜才如愿以偿了。

在滞留燕京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金正喜拜访了名家子弟曹江（1780—?）、覃溪门下高足徐松（1781—1848）、朱野云（1759—1834）、洪占铨，考据实学大师阮元、翁方纲及其翁家兄弟宜泉、星原，还有兵部尚书金光悌及其二子宜园、近园以及李心菴、李鼎元、刘三山、朱子仁等硕学名士，借笔谈形式，交流了学术，交流了感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尤其使金正喜值得幸运的事，是他与翁方纲、阮元考据实学大师的会面。金正喜拜访了翁、阮二大师，质经义，论诗文，及至金石、书画等，见其风度宽雅，识见深奥，使正喜无不为之敬仰。翁、阮二公亦见其之英发，赞叹海东（朝鲜）亦有如许英才，结成莫逆之交。翁方纲接见金正喜时，把自己的《经义考补正》、《诸经附记》、《苏斋笔》等著述，一一介绍给金正喜，使之叹服。阮元也把他的《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研经室集》（部分）等自著赠送给金正喜。金正喜归国后，常以书札进行学术交流，以

敦厚交谊。85岁高龄的翁方纲不顾年老多病，曾以长札，回答质疑，指导其经学，使正喜受益不浅。对此，日本学者藤塚先生曾写过《翁覃溪的研经指导与金秋史(正喜)》一文，详细考察了翁方纲曾写四封手札具体指导金正喜经书的动人的情形。从1815年10月到1817年10月整整二年的时间里，翁方纲先后写了四封数万字长札，对金正喜的质疑一一作了答复，并鼓励金正喜说：

> 如兄之好学深思，而又有间暇余力，年富才敏，足以济之，其臻大成可必也。(《复初斋文集》第十一卷《答金秋史》)

综合翁方纲给金正喜四封长札的内容看，除主要涉及诸经如《礼》、《诗经》、《尚书》、《春秋》、《周易》的注释以及翁著《诸经附记》的内容外，还有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的汉宋折衷论以及金石、书画等内容。金正喜归国20年后，还收到了阮元之子常生寄来的阮元所编《皇清经解》184种，1400卷经书。这无疑对于金正喜考据实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由于金正喜本人的刻苦努力与清朝翁、阮以及诸名流的热心帮助，使他在考据实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果实，终于成为朝鲜金石学之大师，被称为阮堂大师。金正喜念念不忘翁、阮二大师，这也表现在他的取号上。金正喜自号"阮堂"是取自阮元的"阮"字加上"堂"字；他又仿翁方纲的自号"宝苏斋"而取号为"宝覃斋"。金正喜又号为"覃研斋"是取自翁方纲的自号"覃溪"中的"覃"字和阮元的自号"研经斋"中的"研"字再加上"斋"字而成的。仅就这一点，亦足以说明翁方纲、阮元的考据实学思想对金正喜的思想影响是很深的。

金正喜于纯祖九年(1809)中进士，纯祖十九年(1819)登文科，历任奎章阁侍教、成均馆大司成、兵曹判书等官职。但是，在纯祖三十年(1830)之后，金正喜厄运累至，其父参判酉堂鲁敬公以"循私姿虐"、"牟利趣势"、"逆节庇护"等诬诉，被流配。金正喜鸣诉其父之冤，而且被尹尚度之狱事(因攻人疏)受牵，流配于济

州岛大静县近十年，才得免。三年后，又被友人权敦仁所谓误礼事受牵，再次流配于咸镜道北青，幸以翌年放归，过四年，即哲宗七年(1856)而卒。著作有《阮堂先生全集》10卷，传于世。

## 第二节　阮元的求是学风与金正喜的实事求是

金正喜学风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这主要与清朝阮元考据实学的"推明古训，实事求是"思想影响有密切的关系。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1764—1849)是清朝汉学全盛期的核心人物之一，是乾嘉考据实学全盛时期的著名的实学家。阮元25岁中进士，逾年大考，超擢少詹事，升内阁学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督山东、浙江学政，主管江西、湖北举试，任江西、河南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所任之处，搜罗朴学高才，建立精舍、学堂，以高深的经史，严格的家法，培养了大量的经学人才，撰写了《十三经校勘记》、《经籍纂诂》、《皇清解经》等著作，总结和发展了清代汉学，使之达到了高峰。钱穆先生称他为"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海内学者奉为山头焉"。著作有《研经室集》，传于世。他所提倡的"推明训诂，实事求是"的考据实学之学风，对于当时与后世，以及对朝鲜均有深刻的影响。

阮正在乾隆五十一年七月(1786)，举乡试入都，交于戴震弟子王怀祖、任子田，深受其考据实学学风之影响。阮元讲学师承戴东原(戴震)，坚守以诂训发明义理的原则。他说：

> 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研经室续集》第1卷《冯柳东三家诗异文疏证序》)

又说：

> 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

不明。(《研经室一集》第2卷《论语一贯说》)

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研经室集·自序》)

可见,阮元的求是之学风源于戴震,都主张以古训发明义理之说。

然而,他根据"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认为"百世学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渐远者,其言亦渐异。"(《研经室一集》第2卷《曾子十篇注释序》)在他看来,凡取法孔子者,其时代去孔益近,其说益可信,故宋不如唐,唐不如晋魏,晋魏不如两汉,两汉不如子思、孟子,子思、孟子不如七十子。所以,阮元主张训诂必以最先之古训为贵。阮元又主张义理最古,即义理最精确之意,指出"若谓文字最古之义训,即人生最高之真理。"(《释敬》)他谈到性字之义训时指出:

性字之造于周召之前,从心则包仁义礼智等在内,从生则包味臭声包在内,是故周召之时,解性字朴实不乱,何也?字如此实造,事亦如此实讲。(《研经室再续集》,《性斋主人小像跋》)

阮元要为辟此一蹊径,并要求实做从古训求义理之工夫。他经常喜欢举《汉书·河间献王传》的"实事求是"一语,要求做到推明训诂,实事求是。

阮元虽然继承戴东原以古训而明义理之说,但是,他主张讲义理不能在孔孟与宋儒之间造一严格壁垒,使他逐渐形成汉宋兼采的思想,并对汉、宋之争持折衷态度。阮元的"实事求是"和"汉宋兼采"的思想和学风,对于金正喜的实学思想有很大影响。

金正喜也同阮元一样,非常喜欢"实事求是"一语,并作了《实事求是说》一文,专讲他的"实事求是"之说。他说:

《汉书·河间献王传》云,"实事求是"此语乃学问之最要道,若不实以事而但以空疏之术为便,不求其是而但以先人之言为主,其于圣贤之道,未有不背而驰者矣(《全集》卷1《实事求是说》)。

在这里,金正喜所批判的"不实以事"的"事"虽不是注重现实的"经世致用"之意,而是指儒者"偶有注释未尝实事求是"而言。同时,他也批判佛老"虚无之学"和陆王心学之弊,也与清代考据实学思想相一致。然而,他与汉学派全面排斥、否定宋学相反,主张"不必分汉宋之界"、"不必较郑程朱之短"。这主要与翁方纲"汉学商量兼宋学"、"博综马郑而勿畔程朱"和阮元的"言义理,皆不能孔孟与宋儒间造一严格之壁垒"的"汉宋折衷"的学风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阮元阐述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意时,把圣人之道与文字训诂比喻为"宫墙"与"门径"的关系,指出"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国史儒林传序》),主张把圣道与训诂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若"求道太高,卑视章句",则犹如天际之翔,出於堂屋之上,不能窥视门径,"门径苟误,岐步皆岐,安能升堂入";又如"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则"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国史儒林传记》)。这是对圣道与训诂的关系的恰当说明。

金正喜在阮元的"宫墙"与"门径"之喻的基础上,提出了"圣人之道,譬若甲第大宅","训古者门径"之说(《全集》卷1《实事求是说》)。

在他看来,圣贤之道好比甲第大宅主所居住的"堂室",而训诂又好比是"门径","堂室非门径不能入也",若"门径不误堂室","必精训诂"。很显然,金正喜的"堂室"与"门径"之说是对阮元的"宫墙"与"门径"之论的继承和发展。在这里,金正喜还提到

"不尚空论"和"躬行实践"的问题，坚持"精求训诂"的考据实践。金正喜的求是学风对他的金石书法的成就有很大的帮助。

## 第三节　翁、阮的指导与金正喜的金石书法成就

金正喜在朝鲜金石、书法方面享有很高的荣誉和地位，被称为朝鲜金石书法之大师。他在金石书法上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与翁阮二大师尤其是受到翁方纲的指导有着密切关系。

翁方纲（字正三，号覃溪，又号叙彝，1733—1818）是乾嘉考据学全盛期颇为引人注目的汉学家之一。乾隆十七年，翁氏年20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司业，官至内阁学士，先后主管江西、湖北乡试，督学广东、江西、山东，嘉庆十二年重宴鹿鸣，赐三品衔，嘉庆十九年再宴恩荣，加二品卿。著作有《复斋全集》、《礼经目次》、《苏诗补注》等。

翁方纲研读群经，尤精金石之学，著作有《两汉金石记》。

金正喜在燕京逗留期间，曾接受过金石学大师翁方纲有关金石学研究方法的指导。归国后，他运用翁氏的金石学研究方法，对北汉山的无名石碑，参考朝鲜史书《三国史记》、《文献备考》和中国有关史书，进行了周密的考证，判明其为"真兴王巡守碑"，并对其建碑年代、王号、年号、职官等都作出了严密考证，写出了《金石过眼录》。金正喜在"真兴王巡守碑"的考证中，充分显示出他的历史考证的严密性，达到了朝鲜"书道金石学"的顶峰，对朝鲜金石学和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金正喜的金石学的影响和指导下，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朝鲜金石学派。

金正喜以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在埋头于金石学研究的同

时，还致力于书法艺术。金正喜仿翁方纲之书体，摅得北碑和南帖，通达其汉隶之妙理，确立了拙朴清高的“秋史体”，并把朝鲜书画的固有传统与清朝风格融为一体，从而达到了独特的书艺境地。

总之，乾嘉时期，清儒学者虽在文禁森严的形势下，有些学者终日在书本内为考据而考据，致使学术脱离实际生活，但是，阮元、翁方纲等人，却不拘于训诂，提出了“推明古经，实事求是”的口号，并针对汉学者盲目排斥和否定宋学的倾向，提出了“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的“汉宋折衷论”，在整理和保存古典文献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阮元、翁方纲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金石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使朝鲜学者金正喜在金石书法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推动了海东金石、书法的发展。

# 第四十七章　清初经世实学与丁若镛的实学思想

丁若镛是朝鲜李朝末期倡经世实学而开一代新风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之一。他面对朝鲜李朝末期"天崩地裂"的社会危机，以国家民族命运为重，不畏强暴，抨击两班大官僚的专横拔扈，痛斥朱子学者空谈心性的浮华不实的学风，大力提倡经世实学，为实现"以新我之旧邦"奋斗了一生。他在清初经世实学和"西学东渐"的思想影响下，继承和发扬了李瀷等人的实学传统，从而把实学思潮推向新的阶段，终于使他成为朝鲜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 第一节　丁若镛的生平及其对清初实学的态度

丁若镛，字美镛，号俟菴、茶山等，堂号与犹堂。朝鲜京畿道广州郡草阜面马岘里（今扬州郡瓦阜面陵内里）人。生于朝鲜英祖三十八年（1762），卒于朝鲜宪宗二年（1836），享年75岁。

丁若镛从幼攻读经史、古文和诗律，酷爱杜甫诗集，从7岁始作诗，至9岁已自作诗达百余首，其父载运公将它辑成《三眉集》。

16岁时，他拜读星湖李瀷遗书，深受其实事求是学风之影

响，开始立志于实学。他说："星湖李先生瀷之学，镛得见其遗书，欣然以学问为意"(《与犹堂全书》第1集第16卷《自撰墓志铭》，以下简称《全书》)。他又读星湖弟子李家焕、李承薰著作，接触实学北学派洪大容、朴趾源和朴齐家，在他们的实学思想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了研究实学的道路。

22岁时，登生员进士第。28岁时，中甲科第一名，授禧陵直长，历任艺文馆检阅、司宪府持平、司谏院正言、弘文馆修撰、司谏院司谏、承政院同副承旨、兵曹参议、左副承旨、刑曹参议、金井察访、谷山府使等官职。

1800年，支持丁若镛的宰相蔡济恭和国王正祖相继去世，国家大权即落在王后安东金氏手里。1801年，掌握大权的金氏一党，发起了镇压天主教徒事件，史称"辛酉邪狱"。丁若镛由于遭到反对派的诬陷，先流配长鬐，后移配康津，长达18年之久。

进入19世纪后，由于朝鲜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激发了封建统治者的致富欲望。一方面，他们为了争权夺利，组成了朋党，尔虞我诈，互相残杀，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掌握大权的官吏，滥用职权，横征暴敛，贪得无厌，为了获取货币而卖官鬻爵。用钱买官，当上"钱监司"、"钱郡守"，为了捞回本钱和发财致富，必会用各种手段搜刮百姓，把百姓推入苦难的深渊，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因此，丁若镛决心揭露朝政腐败，立志改革朝政。然而，由于他面对文化专制主义，又身处贬谪生活之中，于是他效法明清考据实学家的求是精神，采取借古论今的方式，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考证，批判现实制度的不合理性，以期达到托古而改制的目的。

在18年的流配期间，丁若镛以坚贞不屈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对《周易》、《尚书》、《毛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丧礼》、《乐书》等儒家经典及其注释，"广搜博考，以定讹谬者，

其取舍用”(《全书》),进行了大量的新的注释,其中涉及政治、土地、赋税、科举、兵制、科技、工商、宗教等诸问题,多用以颂古讽今,可谓研古以治今道也。

1818 年,丁若镛 57 岁时解配,回到故乡,继续从事实学研究。他的著名的实学著作《钦钦新书》,就是他的晚年之作。

综观丁若镛的治学之风与清代考据实学派摈弃虚无、崇尚实证极为相似,而其思想内容则源于经书,皆归本于明清经世济民的实学精神,深受中国实学思想的影响。然而,丁若镛接受清初实学的态度决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所选择的。他说

> 清儒之学,长于考证,精于诂训,而略于义理,又积伤于理气性情之说,凡理气性情之说,欲一彗以清扫之,自以为折衷汉宋,而其实宗汉而已。宋未必尽非,而性命之理,存而勿论,汉未必尽是,而迂僻之解,信之不疑,其护短匿疵之论,倍严于俗儒之卫宋,此之流敝,将不知性命为何物?诚正为何业?其害可胜言哉?宋之屈伸,姑舍尧舜周孔之道,果可以字句诂训之学,继之承之乎?宋未必尽是,而其欲体行于身与心则是矣,岂若汉儒之治章句,述诂训,以翼博士之荣禄者哉?(《全书》第 3 集第 32 卷《梅氏书平》)

在他看来,清代考据实学是以反省理学之敝而产生的,所以,它是赞成其反空疏重实证之学风的。但是清代考据实学存在着尊奉汉儒而缺乏理性精神,从这一点看,它未必都是正确的。其实,丁若镛是以追求尧舜周孔之道为治学的根本精神,以择真实而戒妄为途径,以达原儒之本义为目标。根据这一治学宗旨,他以注重经世实学为中心,汉宋兼采,使之符合 朝鲜的社会实际。

丁若镛一生写了 500 多卷的著作,收录在《与犹堂全书》(亦称《茶山全书》)中。主要实学代表著作有《经世遗表》、《牧民心

书》和《钦钦新书》(即"一表二书")等。

## 第二节　清初经世实学对丁若镛的思想影响

丁若镛一生既无亲身入燕京考察之机会,自然也就无法直接接触清初实学家。他主要是通过从清代输入的典籍而接触清初实学的。我们通过对《与犹堂全书》的初步考察,认为丁若镛阅读清初实学著作的途径主要有三:借阅他人之书,或阅读自身藏书,或取奎章阁藏书等。他说:

> 清儒宋鉴,乾隆间人,著《尚书考辩》4卷,刻于嘉庆壬年,所论鄙说,若合符契,特规模不同,辞气缜密,不如荒外之人,粗险不脱洒者,可愧可愧!所探诸家说益广,阎若璩、朱彝尊之论,尤详著可考,但段落不明,蒙士难知,为可欠耳。年前有人瞥示之,至今为恨耳。(《全书》第1集第20卷《与金德叟》)

丁若镛觉得自己不如清初实学家阎若璩等"采诸家说益广",然其所论则"若合符契",而"自愧"特规模不大。由此可见,丁若镛与清初实学的接触,主要是通过书册而实现的。

丁若镛接触清初实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朋友,如李檗、柳得恭、朴齐家等人处借阅书册。他说:

> 近闻翁覃溪门友阮元,取大戴礼曾子十表章,而注解之,亦道绕连脉之意。(《全书》第2集,第1卷《大学公议》)

在这里所提到的清代实学家阮元的注释是通过入燕京曾历访阮元笔谈而得书的朴齐家借阅的。

除此之外,丁若镛有自藏的清初实学家(如毛奇令)的著作。他说:

谪居苦无书籍，溯考乐制，下逮唐宋，粗有纂述，元明以来，名儒硕学，开发之论，涤荡之制，一无所考，顾兹蒙陋，将谁启迪？惟近世毛氏（奇令），所著乐论数种，适携到此。（《全书》第2集，第1卷》《大学公议》）

据初步考察，丁若镛在自己的《与犹堂全书》中，曾引用有清代实学家诸如顾炎武、阎若璩、毛奇令、徐乾学、万斯大、万斯同、黄宗羲、王源、翁才纲、阮元等二十多位学者的言论。可见，他深受清代经世实学和考据实学思想之影响。

现代韩国学者南明镇先生曾作过如下统计：

今略作统计，首先就茶山所著《与犹堂全书》中所引用清代实学家之言及其关系，概略列举如下：

（1）关于顾炎武：诗文三回、有关《尚书》五回、有关《丧礼》二十七回、有关《四书》八回、有关法政集二回，共四十五回；

（2）关于毛奇令：有关诗文集四回、有关《尚书》二十一回、有关《乐书》十七回、有关《四书》一百三十四回，共一百七十六回；

（3）关于阎若璩：有关《尚书》一百五十三回、有关《四书》一回、有关《丧礼》一回，共一百五十五回；

（4）关于徐乾学：诗文集二回、有关《丧礼》一百二十五回，共一百二十七回；

（5）关于李光地：有关《易学》二十八回；

（6）关于万斯大、万斯同：有关《丧礼》，万期大十六回，万斯同十九回；

（7）其他如黄宗羲、戴震、颜元、李塨、胡渭、朱鹤令、王源、朱彝尊、袁枚、阮元等人的言论，在其著作中也都有引证。

这一统计虽不十分准确全面，但从此可窥见丁茶山引证较多的清初实学家是：顾亭林（炎武）、毛大可（奇令）、徐健菴（乾学）、万充宗（斯大）、万季野（斯同）等人。（《清初学术与韩儒丁茶山实学思想》）

可见，丁若镛的实学思想，从思想渊源上，主要是受清初实学的批判精神与考证态度等方面的影响。现在简述如下：

**一、顾炎武对丁若镛实学思想的影响**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绛，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自幼攻读儒学经典，少中乡试，参加复社活动，谋起兵抗清，事败周游四方，不愿出仕于清朝。顾炎武一生，广泛涉足于经史、方志、地理、音韵文字、金石考古以及诗文等学，在众多领域，皆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日知录》（32卷）为其代表著述，一生为学所得，大都荟萃其中，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顾炎武在学术上的成就，不仅在于著作丰富，而且其治学方法富于科学精神，开创清初考据实学之学风。顾炎武治学注重考证，精研深入，推究本源，其明道救世之学，无不渗透着他的经邦济世的实学思想和批判精神。

丁若镛生活于顾炎武150年之后，虽然时间跨度大、地理位置遥远，社会形态也不相同。然而，他们的经世实学与治学方法，却是一脉相承的。这主要是由于丁若镛深受顾炎武经世思想与考证方法的影响的结果。

首先，丁若镛的“王道先富而后教”的经世思想深受于顾炎武的“为民生财，富国教民”的思想。顾炎武说：“欲使民兴孝兴悌，莫急于生财”，“财足而化行”。（《日知录》卷9）而丁若镛则说：“孔子论王道，先富而后教，孟子论王道，先言百亩，乃说孝悌”（《全书》第5集第7卷《井田议一》），其言论如出一辙。

其次，丁若镛也同顾炎武一样，以非凡眼光和观察力来批判社会之弊。丁若镛所论直接援引顾炎武之说，揭露社会弊端。他

说：

> 中国之有生员，犹我邦之有两班，亭林忧尽天下而为生员，若余忧通一国而为两班，然两班之弊尤有甚焉，生员实赴科举而得兹号，两班并文武而冒虚名，生员犹有定额，两班都无限制，生员世有迁变，两班一获而百世不舍，况生员之弊，两班悉兼而有之哉？（《全书》第1集第14卷《跋顾亭林生员论》）

由此可知，丁若镛痛斥朝鲜两班之弊，和亭林指责清代生员之弊相同。但其主张改革及痛斥两班之弊，尤甚于亭林忧责生员之弊，此可谓受亭林生员论之影响的有力证明。

再次，丁若镛在《牧民论》中，论议守令之考绩时，主张采用亭林的郡县论。他说：

> 若夫太平之治，唯清儒顾炎武郡县制，采而行之，斯可以成矣，不然皆苟然而已（《全书》第1集第9卷《考绩议》）。

丁若镛确信，采用郡县论而实行郡县自治，中央监督考核，对称职者"进阶益禄"，对于不称职者"或流或杀"，以期达到太平之治的目的。

最后，丁若镛在经济政策中，也赞同亭林理财节约的主张，指出："臣谨案，唐宋以来，番舶交通中国，黄金皆走于西南海国，而三代以降，矿采遂绝，其无黄金，岂足怪哉？顾炎武谓黄金，多入于佛殿佛躯，斯亦然矣。"（《全书》第5集第7卷《经世遗表·田制九》）

然而，丁若镛接受顾炎武思想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选择的。在他看来，凡是不符合经典原意的，不管谁的文章，都直接指出其非。例如，丁若镛在他的《丧礼四笺》（丧期别）论"丈夫妇人为宗子之母妻"时，引证顾炎武的"买疏谓母年未七十尚与祭，非也。祭统曰：祭必夫妇亲之，是以舅没则姑老，明其不与祭矣，礼

无二敬，故不为妻服。”(《日知录》第5卷)尔后，案之曰：“镛案：买疏非也，当从顾之说。”(《全书》第4集第15卷《丧礼四笺》)等等。

由此可见，丁若镛深受顾炎武的《亭林文集》、《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著作的影响。这些著作对于他的经世实学的形成，无疑会起到补益的作用。

**二、黄宗羲对丁若镛实学思想的影响**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是明清之际倡导经世实学而开一代新风的启蒙思想家之一。

明朝后期，宦官掌握国家大权，形成“阉党”专政。黄宗羲父子都是同明朝最腐朽、最黑暗的“阉党”作斗争的。宗羲父亲因揭发宦官魏忠贤的罪恶而被杀害。明亡以后，他曾几次参加抗清斗争都遭到失败，转而从事学术研究。黄宗羲不仅精通经、史，而且对于天文、历法、数学、音律各方面也都有广博的知识。他批判明末士大夫的空洞虚浮的坏学风，主张经世致用论。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完成于康熙二年(1663)，这本书集中表现了他的经世实学思想。《明夷待访录》一书突出地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具有民主思想的色彩。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等篇章中所阐述的经世实学思想对丁若镛有着深刻的影响。

首先，丁若镛在《原牧》一文中所阐述的“牧为民有”的思想是深受黄宗羲《原君》论思想的影响。

在《原君》篇中，黄宗羲根据古代“公天下”的社会理想和天子禅让的历史传说，认为君位本来是为天下兴利除害而设立的。由此，他痛斥后世君主把天下当作私人的产业，给人民造成无穷灾难的罪恶。他认为，最初的君主，“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明夷待访录

·原君》，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但是，后来“为人君者”，则把天下的产业视为己有，传之于子孙，尽情享受。在夺天下时，他们“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天下一旦夺到手，便“敲剥天下之骨髓，离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其结果是“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

丁若镛完全接受了黄宗羲的思想，在他的《原牧》篇中，公开否定官主民奴之说，主张“牧为民有”之论。他指出：“远古之初，民而已，岂有牧哉！民于于然聚居”但是在人民之间“哄莫之决”，“就而正之”，被人民“咸服推而尊之”为牧，才出现里正等官职。他说：

> 有一夫与邻哄莫之决，有叟焉善为公言就而正之，四邻咸服推而尊之名曰里正。于是数里之民以其里哄莫之决，有叟焉俊而多识就而正之，数里咸服推而其尊之名曰党正。数党之民以其哄莫之决，有叟贤而有德就而正之，数党咸服名曰州长。于是数州之长推一人以为长名之曰国君，数国之君推一人以为长名之曰方伯，四方之伯推一人以为宗名之曰皇王，皇王本起于里正，牧为民有也。（《原牧》）

但是，“后世，一人自立为皇帝，封其子若弟及其侍御仆从之人以为诸侯，诸侯简其私人以为州长，州长荐其私人以为党正、里正。”（《原牧》）他把君主制取代民主制看成是皇帝违反民意而民权独揽的结果。这一进步思想显然是受黄宗羲思想的影响。

丁若镛在《汤论》中，进一步发挥了黄宗羲在《原臣》篇中所阐述的“汤放桀，武王伐纣”是完全正义的思想。丁若镛援引中国“易姓革命”的事实，指出，殷汤和周武王作为臣民征伐君主，是在君主专制时代称之为“叛逆”的行为，但在民主政体时代却被称之为正义行动。在他看来，天子不是天降地出的，而是“众推之

而成，亦众不推之而不成”，所以，如果“九侯八伯不协，九侯八伯议之改天子”，“谁肯曰臣伐君哉！”(《汤论》)他进而提出了由人民协议会取代专制君主制的主张。当然，这一主张在当时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它却反映了无权的人民要求平等的愿望，具有进步意义。

其次，丁若镛关于古代社会立法是根据民意自下而上制定出来的思想，是对黄宗羲在《原法》篇中“三代以上之法，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思想的继承与发挥。黄宗羲认为，三代以上之法，未尝为一己而立。“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原法》)。

丁若镛接受黄宗羲的这一进步思想，指出：“当是时，里正从民望而制之法上之党正，党正从民望而制之法上之州长，州长上之国君，国君上之皇王，故其法皆便民。”但是，“后世，一人自立为皇帝”，“皇帝循己欲制之法以授之诸侯，诸侯循已欲而制之法以授之州长，州长授之党正，党正授之里正，故其法皆尊主而卑民，刻下而附上，壹似乎民为牧生也。”(《原牧》)

当黄宗羲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特别是明亡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得出了与儒家传统的尊君论相反的看法，提出了一切祸患都来自君主的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原君》)并把君主专制下的整个官僚斥责为“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原臣》)的根源。他由此作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的结论。丁若镛在揭露封建君主鱼肉百姓的罪行后，认为封建皇帝是“大盗也已”。(《全书》第1集第12卷《监司论》)丁若镛和黄宗羲在封建社会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条件下，敢于公开谴责君主制，提倡民主制，是具有启蒙意义的进步思想。

### 三、王源对丁若镛实学思想的影响

王源(1648—1710)字昆绳,一字或庵,少年虽就学宋明理学,但他不信其说,完全留心于前代典要及关塞险隘、攻守方略。在历史人物中,他最敬慕诸葛亮和陈亮二人。他曾参与纂修《明史稿·兵志》。

康熙三十二年(1693),王源赴乡试,中京兆举人。当时尚书徐乾学开书局,招揽天下名士,王源也在其中。在这里,他结识了实学家刘献廷,两人志趣相投,尤为对古今兴亡之故,方域要害等兵法见解也一致。刘献廷去世不久,王源又结识了李塨。李塨为他讲颜元之学,使他深为折服,说:"吾知所归矣。"(李塨:《王子传》)经李塨介绍师事颜元。王源服膺颜、李之学后,著有《读易通言》6卷,又著有《前筹一得录》12卷,论自周朝至元朝兴亡成败的原因。王源目睹亡明之覆辙,又著《平书》3卷,其书序云:"平书者,平天下之书也。"《平书》乃颜李学派的经世之作,深得颜门学者的重视。李塨对《平书》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自己的意见附在书后,成《平书订》。《平书》今已佚,但我们从《平书订》中可观其概貌。王源著有《居业堂文集》20卷,尚存。

王源虽生活于明中叶以后经济发达地区,资本主义幼芽破土而出,却受到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使之不能顺利成长。作为17世纪的实学家,王源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对传统的农商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反思。他针对封建地主与豪强贵族兼并土地所造成的恶果,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新主张。(一)取消地主阶级土地所有权,废除"募人代耕"的租佃制度,主张土地归劳动农民所有,"惟农为有田","不为农则无田","有田人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二)采取以赎买为主、没收为辅的"均田"政策,使土地归国家或农民所有;(三)国家将收得土地按户均分给无

地农民，受田农民以收成的六分之一作为农税上缴国家。

王源的田制改革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空想的色彩。他不主张采取暴力夺取方式，而寄希望于封建统治者的一道诏书，期待地主阶级发善心以解决封建土地问题，未免太天真了。但是，我们对此不能过于苛求，因为其中包含有重大意义的合理内核，即把实现农民的土地要求与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具有近代启蒙的意义。这一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古代各种"均田"制思想的终结，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先河。

王源的"惟农有田"的思想在丁若镛的"闾田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王源和丁若镛的田制改革论都是建立在"惟农为有田"、"农者受田"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但是，丁若镛的田制论与王源也有所不同，即丁若镛主张实行集团农制的"闾田制"。所谓"闾田制"，就是在"农者受田"的基础上，以三十户为一闾，选出闾长，在闾长的领导下，共同耕种，共同收获，除适当上缴国家赋税和扣除闾长俸禄之外，按"日役之簿"（即按劳动日）进行合理分配的制度。

这个集团农制有三个基本要点：（一）土地公有和"农者受田"，是实行闾田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不实行公田制，就不能实行闾田制，要实行闾田制就必须以农者受田为前提；（二）以 30 户为一闾，在闾长的领导下，共同耕作，共同收获；（三）扣出田税和闾长俸禄后，按劳动日多少进行分配。其中，第二、三点是实行闾田制的具体保证。因为，如果不实行共同耕作、共同收获，就不能防止懒惰；如果不实行按劳付酬，就不能提高劳动效率，要确立皆劳体制，就必须依靠集团农制。很显然，丁若镛的"闾田制"同王源的田制改革论一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土地私有制，而是在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上作某些改良。然而，在当时

条件下，他提出“农者受田”的口号恰好反映了世代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与消灭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愿望。这一进步思想开启了朝鲜近代“耕者有其田”的理论先河。

**四、阎若璩对丁若镛实学的影响**

阎若璩(1636—1707)字百诗，晚年自号潜邱，是清初考据实学的开拓者之一。阎若璩生而性钝，六岁入小学，读书多遍不能背诵。年15岁，冬夜读书，扞格不能通，愤悱而不寐，坚坐沉思，心忽开朗，自悟异常，年20岁读《尚书》至古文25篇，疑其伪，沈潜30余年，乃得症结所在，作《尚书古文疏证》8卷。年27岁游京师，归太原故籍时，恰遇顾炎武游太原，顾以其所撰《日知录》相质，阎即为之改订数条，炎武虚己从之。年43岁应博学鸿儒科试，不第，仍留京师结识徐乾学，又交胡渭、何焯，日与论学。年50岁，徐乾学以尚书乞旧，奉敕修《一统志》，阎若璩、胡渭等参纂修事。10余年中，成《四书释地》、《二续》、《释地余论》等若干地理学篇，皆名著也。阎若璩60岁以后，朱彝尊、毛西河、李塨等自千里外来访，共同商榷学问。年69岁时，世宗于潜邱手书延请，阎若璩力疾赴都中，因行役之劳，病渐遽，卒而不起。主要著作有《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潜邱劄记》、《孟子生卒年月考》、《毛朱诗说》、《日知录补正》、《丧服翼注》、《博学堂录》等。

阎若璩的考据实学对丁若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的《尚书古文疏证》一书。丁若镛在谪居生活中，曾写过《梅氏书平》(初名《尚书平》)，以纠正毛奇令在《古文尚书冤词》一书中对尚书学的误谬。但是，当他73岁时阅读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之后，深受其求是学风的影响，对自己二十余年前所作《尚书平》9卷，皆按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一文的脉络而加以修补。丁若镛说：

> 余在耽津谪中，治《尚书》，取毛氏《古文冤词》，辨其谬妄，著《尚书平》卷9，专攻梅赜之伪，今已二十年矣。近见清

儒宋鉴所著《尚书考证》，所论者若合符契，窃自幸海外僻陋之见，得与中华大方之家不谋而同，乃宋氏书中屡引阎氏若璩《古文疏证》中言议，多明皙可悦，然谓宋书后出，意当益备。

又说：

阎氏之书浩汗散漫，其已经余昔年评议者，舍之，其或遗漏者，拾之，略加订商，又其第次，标以甲乙，以便考检焉。（《全书》第2集第32卷《梅氏书平》）

由此可见，丁若镛的尚书学是深受阎若璩的思想影响的。

## 第三节 “西学东渐”对丁若镛实学的影响

17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来华和随之而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开始输入中国。

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大都属于天主教中的耶酥会一派。它们为了反对宗教改革，扩大其影响，在罗马开办神学院，把经过严格训练（包括自然科学的学习和训练）的会士派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企图通过传教活动来恢复旧教在欧洲失去的地盘。他们为了顺利地进行传教，往往利用科学技术知识，把科学技术知识当作他们达到传教目的的重要手段。

从传入的科技知识的内容来看，主要是为修改历法而必需的天文学、数学知识以及为防御而引进的火炮技术。此外，解剖学、透视学、地图学、望远镜、制造钟表以及各种机械知识等，也都或多或少地传入中国。

西方的科技知识主要是通过中国传入朝鲜的。所以，当时朝鲜所谓的“西学”，是指17世纪以来由中国传入朝鲜的中译本西

欧科技、宗教、习俗等书和西洋科技文物利器。上述“西学”，除了主要通过入燕京使者传入朝鲜外，还有通过漂流定居的外国人直接传入朝鲜。

17世纪初，入燕京使者李睟光(1563—1628)在他的著作《芝峰类说》中，第一次报道了天主教在中国布教情况。他说：

> 欧罗巴国亦名大西国，有利玛窦泛海八年，越八万里风涛，居东粤十余年，所著《天主实义》2卷，首论天主始制天地主宰安养之道，次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次辨轮回六道之谬，天堂地狱善恶之报，末论人性本善而敬奉天主之意。(《芝峰类说》第2卷，《诸国部·外国》)。

他又赞叹地说：

> 万历癸卯(宣祖三十六年，公历1603年)，余忝副提学时，赴京回还使臣李光庭、权愔，以欧罗巴国舆地图一件六幅送于本馆，……见其图甚精巧，于西域特详，以至中国地方及我东八道，日本六十州，地理远近大小纤悉无遗。(《芝峰类说》第2卷，《诸国部·外国》)

李睟光不仅报道了西欧的天主教及其文物，而且还把西欧天文学知识运用到自己所从事的天文学研究上。他谈到天时说：

> 余尝见欧罗巴人冯宝宝所画天形图，曰天有九层，最上为星行天，其次是日行天，最下为月行天，其说似亦也据。(《芝峰类说》第1卷《天文部·天》)

和李睟光同时代的柳梦寅(1559—1623)，也在他的著作里简述过天主教的特色，介绍了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之后，批判了天主教。他说：

> 有利玛窦者，……著书上下卷八编，……题目曰《天主实义》，言天主上帝也，实者不空也，排老佛之空与无也，…语多有理，而天堂地狱有，以不事婚娶为是，乌得免挟在道

惑世之罪也哉。(《於于野谈》第2卷,《西教》)

1631年(仁祖九年),陈奏使郑斗源去燕京时拜见了明朝掌教官意大利传教士陆若汉,回国时带回了陆赠送的火炮、望远镜、自鸣钟以及西欧风俗记、天文、地图、天主教等书籍。同年,翻译官李荣俊从陆若汉学习了天文推算法并把它传播于朝鲜。

1649年(仁祖十四年),朝鲜密阳巧匠刘兴发仿制自鸣钟成功。同年,入燕京使者金堉带回了西洋人汤若望的时宪历法书籍,经观象监官金尚范多年研究,于1652年(孝宗四年)被采用。

17世纪初,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不仅经由中国传入朝鲜,而且还通过漂流定居的外国人直接传入朝鲜。1628年,漂流定居的3名荷兰人在朝鲜介绍了西欧的科学技术。1653年,漂流定居的荷兰人有30人。他们传播了制造枪炮等科学技术。

17世纪初,开始传入的西学及其西洋文物利器,到18世纪,经过李瀷(1681—1763)、洪大容(1731—1783)等实学思想家们的艰苦努力,使西学在朝鲜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到朝鲜朝肃英年代,西学书在士大夫书架里与道佛儒书一起并排,可以任意阅读与吟味。

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李瀷审时度势,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学。他广泛收集中译本西学科技书,认真进行探讨与研究。他不仅重视西学的物质利器方面,而且也重视天主教教理和伦理学。他对西学的严谨态度,对其门人有很大影响。

1765年(英祖四十一年)冬,洪大容以随行武官的身份,跟冬至使节团,来到清朝国都燕京。在中国滞留期间,他与众多的中国文人相接触,进行了广泛地思想文化交流,寻访南天主堂,拜会了在京外国传教士,参观了天文观测机构,回国后,建立了天文观测所,撰写了《筹解需用》3卷,介绍了近代西方的数学与天文观测知识,为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作出了贡献。

18世纪末19世纪初，经过丁若镛等人的努力，西学在朝鲜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和发展。

丁若镛在少年时，深受李瀷及其学生的实事求是学风的影响。留心收集与阅读中译本的西学书，以实现其富国强兵的抱负。

年23岁时，丁若镛从姐夫李承薰那里借阅和接触了赴燕京时带回来的天文、数学、西洋风俗记、天主教书籍和地球图、自鸣钟、望远镜等西洋利器，又从亲友李檗那里聆听了天主教教理，和二哥若铨、三哥若钟一起，接受了洗礼，加入了天主教。但是，不久，他就认识到天主教的欺骗性，便毅然断绝了同天主教的关系。他把西学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天主教的宗教迷信区别开来，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巨大作用。他说：

> 农之技精，则其占地少，而得谷多，其用力轻，而谷美实。……织之技精，则其费物少，而得丝多，其用力疾，而布帛致美。……兵之技精，则凡所以，击刺防御，转输修筑之功，皆有以益其猛，而护其危者矣。……百工之技精，则凡所以制造，宫室器用，以致城廓，舟船车舆之制，而皆有以坚固便利矣，苟尽得其法，而力行之，则国可富也，兵可强也，民可裕而寿也。（《全书》第1集第11卷《技艺论二》）

丁若镛潜心研究西学，并把它用以造福人民。这是他的实学思想的突出特点之一。

正祖十二年(1789)，丁若镛利用浮力原理，完成了汉江舟桥架设的设计。正祖十五年(1792)，他奉国王命令，在修筑水源城时，亲自制造起重机、鼓轮和滑轮，节约工程经费黄金4万两。正祖二十年(1797)，他撰写了医学集《麻科会通》12卷，并和朴齐家一起，在朝鲜第一次成功地试验与推广了种痘法，为增进人民

的健康作出了贡献。

丁若镛之所以留心收集和潜心研究西学，是因为他把西学看作是“天文历象之说”、“农政水利之法”、“测量推验之器”的缘故。所以，在他的前半生中，为实现科技救国的抱负而奋斗，只是因为他被反对派的诬陷流配长达18年而被迫停止。然而，由于丁若镛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对其进步的世界观和求是学风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丁若镛生活在朝鲜朝末期朱子学衰颓和实学兴起的时期。他在“西学东渐”和清代经世实学的影响下，继承星湖学派和北学派的实学传统，提出了代表市民阶层要求的社会理想，在政治上揭露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提倡民主、民权思想，反对封建等级制，提出人才蔚兴论；在经济上揭露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和赋税制对社会生产发展的障碍，提出“农者受田”、发展工商业和科学技术的方案；在思想上反对朱子学扼杀民族文化、复古倒退的事大主义，提倡研究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对外，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派留学生，搞平等贸易等方略，并为实现其理想而奋斗了一生。

然而，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丁若镛不可能完全否定封建制度，也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所以，他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的新方向，而其社会改革思想，往往带有空想的性质。但是，丁若镛的“以新我之旧邦”的实学思想，对后来朝鲜开化思想和爱国启蒙运动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 后　记

本书是海内外几十位从事实学研究的专家、教授的集体智慧与精诚合作的科学成果。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中国实学思想的演化过程和发展规律的学术著作。

本书写作始于1990年初。当时，我所以萌生主编这部书的念头，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从学术上，中国作为实学思想的发祥地，并曾对日本、朝鲜等国产生过深刻的社会影响，应该由中国学者按照自己的观点撰写一部《中国实学思想史》。但是，至今中国人还未写出一部系统阐述中国实学思想的著作，这不能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从现实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时代在呼唤实学，时代急切地需要实学，实学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填补这块学术空白，必须对这一重要时代课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和说明。于是，我在学术界同仁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下，经与海内外实学专家的多次征求意见和反复讨论，提出了全书的指导思想和编写大纲。参加本书撰写的作者，都是海内外多年从事实学研究的专家，这部书稿的每一章，可以说都是经过作者广泛收集资料和认真思考的成果，最后再由我通纂而定稿。经过将近4年的辛勤劳动，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部具有开拓性质的学术著作。

实学研究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目前学术界在许多重要问题

上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分岐，呈现出可喜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我们相信，学术问题是可以通过认真研究和友好讨论，逐步取得共识的。本书的撰写只是初步尝试，本书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本书作者尽管都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也有选择地吸收了某些学术研究成果，独立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这些看法不一定都对。我们恳切希望海内外学者提出批评和指正，以促进中国实学研究的进一步科学化。如果这部拓荒之作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的学者关心实学研究，从事实学研究，写出更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把我国的实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使中国人站在东方实学研究的前沿，从中国实学研究中吸取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有益的启示，从而为中国现代化作出应有的历史贡献，这是本书的宗旨，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不但得到了中国老一辈专家的全力支持，也得到了一批中青年学者的热情帮助。同时，本书在经济上也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资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母庚才和本书责任编辑吴海、郭来泉、宋焕起也都从多方面予以支持、勉励和指导。没有他们的指导和支持，在目前出版困难的情况下，这部160多万字的书稿是不可能同读者见面的。在此，一并敬致谢意。

主　编

1993年8月于北京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实学思想史 下卷
作者=葛荣晋
页数=431
SS号=10151868
出版日期=